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纪宗安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本书以公元9世纪以前的中亚北部为时空范围，论述围绕东西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传播这一主题，涉及到：1. 从远古时起，在这一地区就已见东西文化交流的端倪；2. 塞种、匈奴等早期游牧民为人类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3. 丝绸之路经过中亚北部地区路线和交通网点的考释；4. 公元5世纪以降至公元9世纪，丝路贸易重心的北移突出了这一地区的重要；5. 粟特移民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活动和历史作用；6. 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中亚北部地区东西文化交流之盛况等六个方面的问题。旨在论证这一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希冀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为更好地开发大西北，促进我国与西邻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一点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ISBN 978-7-101-05923-6

9 787101 059236 >

定价：38.00元

纪宗安 著

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纪宗安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1

ISBN 978-7-101-05923-6

Ⅰ.9… Ⅱ.纪… Ⅲ.①东西文化-文化交流-中亚-中世纪②交通史-研究-中亚-中世纪 Ⅳ.G136.5 F51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4174号

书　　名 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著　　者 纪宗安
责任编辑 王守青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8¼ 插页2 字数15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923-6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亚北部地区的远古文化 …… (23)
第一节 中亚四至及它的北部地区 …… (25)
第二节 远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曙光 …… (34)
第二章 早期游牧民的西迁与东西文化交流 …… (49)
第一节 塞人,早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者 …… (52)
第二节 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 …… (66)
第三章 中亚北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 …… (89)
第一节 丝路北道的前身——草原之路 …… (91)
第二节 新北道的出现及里程走向 …… (99)
第三节 交通网络和重要城镇 …… (124)
第四章 丝路贸易重心的北移及其原因 …… (143)
第一节 公元3—6世纪的中亚形势与丝路贸易 …… (146)
第二节 西突厥的崛起和唐朝政府在中亚北部地区的经营 …… (156)
第五章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 (187)
第一节 “粟特”辨析 …… (189)

第二节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和向东的移民 …… (193)
第三节　粟特人向中亚北部地区的移民 …… (211)
第六章　6—9世纪中亚北部地区东西文化交流之盛况 …… (221)
第一节　城市经济的特点 …… (223)
第二节　蓬勃发展的多种手工业 …… (229)
第三节　以丝绸为主的商业贸易和几种货币 …… (242)
第四节　兼容并蓄的宗教和文化 …… (252)
结束语 …… (263)

重要参考文献 …… (269)

插图目录

地图

地图 1　古代文明发展与中亚的沟通作用 …… 4
地图 2　中亚与中亚北部范围 …… 28
地图 3　中亚与中亚北部地形 …… 31
地图 4　中亚与中亚北部植被分布 …… 32
地图 5　5 世纪以前亚欧民族大迁徙 …… 67
地图 6　草原丝绸之路与早期文明传播 …… 93
地图 7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 94

图版

图版 1　阿尔泰放牧岩画及其图案 …… 35
图版 2　巴里坤兰湾子遗址出土的环首铜刀 …… 45
图版 3　新疆境内出土的古塞人干尸 …… 58
图版 4　新疆新源县出土的战国塞人铜武士像 …… 59
图版 5　具有塞人文化风格的承兽铜盘
（天山阿拉沟出土，战国—汉）…… 59
图版 6　天山阿拉沟出土的虎形圆金牌（战国—汉）…… 63
图版 7　新源县出土的匈奴铜镈（魏晋南北朝） …… 80

图版 8　新疆昭苏县的汉代乌孙封土墓 …… 82
图版 9　天山阿拉沟口唐代烽燧遗址…… 123
图版 10　乌拉斯塔亦石人雕像 …… 160
图版 11　新疆若羌县唐代吐蕃古城堡 …… 179
图版 12　片治肯特出土的沾染萨珊风格的粟特银壶和银碟 …… 208
图版 13　具有西域风格的唐代海兽葡萄镜图案 …… 210
图版 14　穆格山出土的羊皮纸粟特文婚约文书 …… 217
图版 15　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的汉代鸟兽纹锦 …… 238
图版 16　索格底亚那片治肯特遗址出土的中国式青铜钱币 …… 251
图版 17　高昌故城摩尼教经典残页 …… 255
图版 18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女娲伏羲像 …… 260

绪论

若追寻早期人类文明碰撞的痕迹，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将眼光落在地域广阔的旧大陆上：包括亚、非、欧三大洲。有别于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它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

一 寻找中亚，关注中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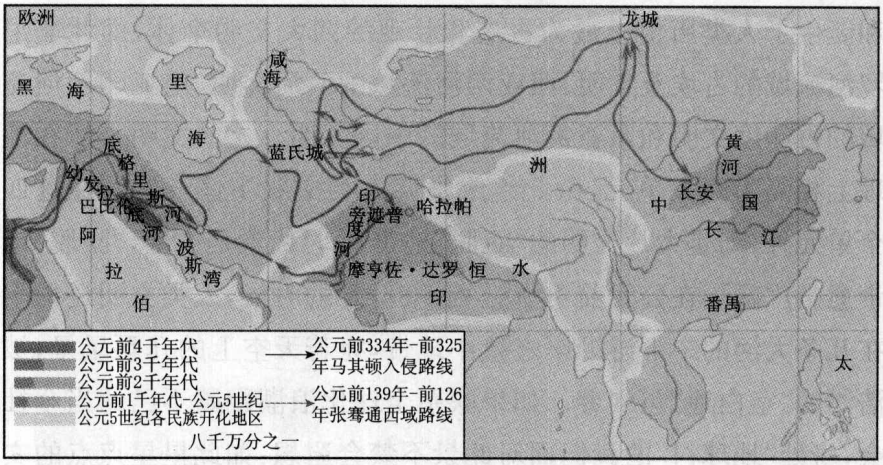
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让我们转到地球的这一面，仔细打量旧大陆这块地方。

从地图1可以看到，在大陆东部和南部的几个大河流域，孕育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和壮观的四大文明个体，即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和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这些文明个体在地理上相隔为四大单元，由此组成早期人类文明主体。然而在这四个单元外，却是大片文明的“瓯脱”地带①，时代愈是古老，“瓯脱”地带愈是广阔。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时候，人类文明还局限在几条大河的中下游沿岸之狭小地带，宛若天空上的几颗星星，被浩渺的“空白地”包围着。如果联系全球化浪潮翻腾不已的当今社会，身处“地球村”的我们面对此景不禁会遐想：如此星星点点的文明区域，究竟如何相互沟通？是怎样在交流和互补中发展起来？又是怎样从如此隔膜的分离状态逐步聚合，形成当今浩大的人类文明整体的？

其实，人类文明起源的多元化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位现代学者

① 匈奴语，原指部落、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或边境荒地，这里代指不同文明个体之间的空白地带。

的想象。如同星星布满天空，上帝也把人类文明的火种撒遍了大自然的角角落落。考古学的巨大发展，以确凿可靠的证据不断地擦拭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界。陆续发现的各古老时代的文明遗址，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情景。他们的分布远超出了四大文明区域，几乎遍布整个大陆。尽管环境条件相差甚远，但阻挡不了他们顽强地生存和开拓。除了气候宜人、水土肥沃的大河流域，不管是森林草原，还是高山大漠，都有早期人类的活动和足迹。尽管四大文明区域的显要遮住了这些文明的光辉，但它们无疑是早期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地图1　古代文明发展与中亚的沟通作用

资料来源：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投向亚欧大陆的腹地。该地区习称为“中亚”，过去也曾有其他称谓，如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有称为“内陆亚洲”，或“亚洲心脏”；1829年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亚历山

大·冯·洪堡最早提出较有影响的“中央亚细亚”；苏联学者则习惯于区分成“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两个广、狭义的区域概念；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以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丹尼斯·西诺尔为代表，提出“中央欧亚”的新概念；而英国和日本学界又有“内亚”和“内陆亚洲”等习称①。

由于所站角度不同，人们对其地理范围的认识也多有歧意。“中央亚细亚”指今中亚五国地区，“中亚细亚”东可起大兴安岭，西到欧洲平原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北接西伯利亚森林，南包中国西藏和伊朗高原。中国有学者则沿袭传统区分广、狭“西域”的做法，将该地域也区分成广义中亚和狭义中亚，狭义中亚系指当今中亚五国；广义中亚则东自我国内蒙古东部，西至里海，南抵伊朗、阿富汗北部及印度、巴基斯坦西北，包括我国新疆和甘肃地区，北达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带②。不过，各种概念和说法比较一致的是：第一，该地区以内陆河流为共同的水文特征。正如洪堡最早所界定的，将这一地区“视作与外界分隔开的一个独特地域，因为它拥有内陆水系，四周由山链环绕，探险者可以分辨出其清楚的几何图案式的体系”③。第二，它们都包括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尤以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为核心。该部分占有中亚五国主要地区，南北大致从北纬35°到50°，东西则在天山西部与咸海之间。

中亚是一个地理环境相当复杂的地区。它由多个地理单元组

---

① 魏长洪、陈香苓：《中亚界定研究概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② 参考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③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9页。

成，地形、植被和气候等都有明显的差异。仅核心地带的中亚五国地区，就可分为沙漠、草原和山地三种类型。哈萨克斯坦（号称“中央哈萨克斯坦”）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降雨量在三百毫米左右，北部是夹杂着针叶树林的茂盛草原，“构成了从多瑙河下游延伸至中国东北的欧亚大草原的一部分”，南部则是散布着杂草与耐旱灌木丛的半沙漠区。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地区包括一些盆地、丘陵和平原，降水稀少，沙漠广布，在拥有一定水源的地区点缀着些许绿洲，属于自蒙古高原到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沙漠地带的中间部分；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拥有着西部天山地区和部分帕米尔山系，主要是高山峻岭和山间谷地、盆地等地形，气候上相对湿润，并可得到雪山融水和河流、湖泊等水源，有山地草原和森林。此外，东面蒙古高原和东部天山地区是由山脉、台地和山谷、盆地等构成，形成草原、沙漠和山间林地相夹杂的地区。由于高大山系相隔，二者又各自形成独特的地理单元。南面阿富汗基本上是块山地，疆域的五分之四为山脉，而伊朗则以高原为主，是由高海拔的沙漠和草原构成的热带干旱草原区。向西则过渡为渐受大西洋暖流影响，相对比较湿润的温带草原地区①。

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地形复杂，有高山，有沙漠；气候恶劣，或干旱，或高寒；植被稀少，物产单薄，与文明主体区域相比，人类生存和活动艰难。然而考古研究表明，这里依然有人类早期文明的存在。早在数十万年前，中亚各地就有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从锡尔

① 以上参考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勒内·格鲁塞著：《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等。

河上游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这一地带文化遗址的分布尤为集中①。而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亚文化遗址就更为密集。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众多的文化遗址则构成了中亚自己独特的文明发展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介于四大文明区域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早期人类文明沟通和交往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和媒介。以中亚为基点，往东靠近构成东方文明核心的中国中原文化密集区，往南毗邻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区域，往西南则通往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区域。在人类活动能力极其有限的远古时代，各文明区域只能就近接触其他文化，与相毗邻的文明个体沟通和交往。这样，中亚就成为能够与各主要文明个体直接沟通和交往的唯一地区。基于这一点，远古时期文明主体单元之间的沟通大都经过中亚地区的文明个体而进行。嗣后，伴随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横贯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作用逐步凸现出来，并逐步构成枝干蔓延、襟带相连的交通网络。历史上无论是草原丝路还是绿洲丝路，各主干线无不以中亚地区的草原、绿洲和山口为必经之路。在东、西方之间，民族的群体迁徙、商贸物质的运输以及使者和僧侣的旅行，也必须在中亚地区的草原或沙漠中穿行。如果从丝绸之路发生史来考察，在丝绸之路全线通畅之前肯定会有局部交通的充分铺垫。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中亚及其庞大帝国的建立，使丝路西段的商道达到一定繁荣；而张骞出使西域则使

① 例如，锡尔河上游的库尔布拉克遗址所发现的阿舍利文化距今有70—50万年；在巴基斯坦西北索恩等地区竟在20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包括一件石核石器和若干石片石器的一组制品”；甚至在阿尔泰山北麓也发现了距今148万年左右的文化遗迹。大致在距今25—13万年，塔吉克和阿富汗洼地一带达到“原始人类最为繁荣的阶段”。（参考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第2章）

中亚与中原之间的了解和往来迅速扩展。多个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蔓延，要么发源于中亚，要么以中亚为中转站，可见中亚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最大桥梁和枢纽。为此有学者指出："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①尽管中亚一带没有发展成像四大古文化区域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但它却以不可替代的中介地位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　关于中亚史的研究

尽管中亚不属文明发达区域，但是人们对该地区的认识却很早就开始了。以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多卷本的论著《历史》为代表，西方世界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注意到其文明"边缘"以外的中亚民族。在书中，希罗多德最早将中亚居民区分为：北部游牧民族，主要有锡尔河以东的塞种人和咸海以南的玛萨该塔伊人；南部绿洲上的定居民族，则因地名而称之为索格底亚那人、花剌子模人等，甚至还提到中亚东北远至阿尔泰山地区的秃头人和独目人。在许多罗马作家的地理志和史著中，西方人原以为是丝绸生产者的那些"长着蓝眼睛，红头发"的塞里斯人，其实并非中国人，而是中亚地区从事居间商贸的民族或部落。强大的波斯、阿拉伯以及

①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序，第1页。

突厥帝国曾经长期占据或控制过中亚地区，因而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对中亚有着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大量的波斯和阿拉伯文献对中亚的地理、民族和风土人情都有过细腻而准确的叙述。特别是阿拉伯人，他们对中亚认识的深度和水平几乎超过了中亚以外任何其他地区的民族。其地理志书，如伊本·库达特拔《道里邦国志》、马苏第《黄金草原》、埃德里记《诸国风土记》、雅库特《地名辞典》、卡兹维尼《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阿布尔菲达《地理书》、伊本·瓦尔迪《奇迹书》等，都对中亚地区的道路里程、风土人情物产等作了生动详尽的描述。在丝绸之路另一端的中国，也很早就认识到中亚这片世界的存在。立足中原，中国史家习惯把包括中亚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称为“西域”。反映先秦地理观的《穆天子传》，以浪漫的笔调初步描绘了这里的地理和民族。而《史记》和《汉书》则因张骞出使西域和汉朝对西域的开拓与管辖，留下了大量真实确凿的记载。以后历代中原王朝不断加强着与西域的往来联系，络绎不绝的行旅，包括使者、商人和僧侣也越来越多地深入到中亚腹地。各部正史中的西域传、西戎传等，各地理图记（如隋裴矩《西域图记》、韦节《西番记》、佚名《隋西域志》、《西域道里志》等，唐高宗朝官修《西国志》、《唐西域图志》、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等）中有关西域的介绍，以及大量私人游记（北魏宋云《西域行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王玄策《中天竺国记》、韦弘机《西征记》、慧超《往五天竺国记》、杜环《经行记》等）对西域的描绘，使人们对穿越中亚的交通道路的认识逐步清晰和细致起来。总之，古代中外文献为后来人们深入研究中亚史地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19 世纪，中亚地区成为英、俄等列强争夺的对象，由此更凸现

其重要地位。大致从该世纪中叶起，英、日、俄、德、法、美、瑞典等国政府开始陆续派人深入中亚进行实地调查，西方探险家们纷纷涌进中亚腹地。在探险和考察过程中，亚洲腹地大量的文化遗址、珍奇的历史文物和丰富的古文字史料不断被发现，从而激起了诸多东方学家的研究兴趣，一股“中亚热”迅速兴起。最初是德国地质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和费迪南德·李希霍芬等对中亚地理环境的调查和研究。早在1829年，洪堡就沿西伯利亚到里海长途旅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地理范围和环境作了深入研究。他所采用的“中央亚细亚”这一专业术语及其对中亚地理界限的划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而，李希霍芬先后七次在欧亚腹地旅行考察，他敏锐地把中亚地理与东西文明交流联系起来，原创性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的“丝绸之路”一词。接着瑞典人斯文·赫定从19世纪80年代起对亚洲腹地进行了多次探险考察，到20世纪20—30年代还成功主持了瑞中联合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时八年的科学考察。他在考察中所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引起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再度热注。自19世纪末叶起，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对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先后进行了四次探险，重点考察了从葱岭到塔里木盆地两缘乃至河西的丝路交通和重要古城镇遗址。法国人伯希和是考古学家兼东方学家，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将中亚史和丝绸之路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层面。

沙皇俄国因扩张疆土的急切野心表现出对中亚探险更高的热情。仅在18世纪下半叶，就先后有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等人多次深入中亚，其足迹远及新、甘、青、宁等地区。后又如愿以偿地把中亚广大腹地逐步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因此也方便了俄国学者对中亚史地的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俄国学者在中亚史的研

究领域里游刃有余。到20世纪上半叶，苏联学者们将中亚史研究又不断推向新高度。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城市，如塔什干、阿拉木图、伏龙芝等地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并涌现出一大批中亚史研究专家，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史地及考古学专著，从而使中亚史研究成为国际学界为之瞩目的一门显学。在苏联时期，学者们对中亚及外蒙古地区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考察活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物和学术资料。他们对中亚史地的研究深入而系统，特别是在中亚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学以及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有权威性成果，如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等均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19至20世纪，法国和日本对中亚史地的研究也有相当突出的成就。法国自1822年起就先后成立了法国亚细亚学会、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研究中心以及法国汉学研究所、突厥研究所、蒙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涌现出如沙畹、伯希和、儒莲、格鲁塞、布尔努瓦等著名学者，发表了如沙畹《西突厥史料》、《宋云行记》，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汉书·西域传注》，儒莲《回鹘史料》、《大唐西域记》，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玛雅尔与埃迪旺·尼古拉合著《中亚的石窟与遗址》、玛雅尔与韩百诗合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等权威性专著。其中格鲁塞对中亚和草原地带的研究最为专注和充满热情，他的一系列论著如《从希腊到中国》、《草原帝国》、《蒙古帝国》以及四卷本《东方的文明》等，代表了20世纪40至60年代法国中亚史和北方草原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同时，日本学者在中亚史的专题性研究上尤为突出。以丝绸之路为主线，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丝绸之路文化史》，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冈崎敬《东西交涉考古学》，伊濑仙太郎《西域经营史之研究》，安部健夫《西突厥国史研究》，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亚细亚文化史研究》，护雅夫《古代游牧帝国》、《中国文明与内陆亚细亚》，水野精一《西域》，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中亚史》，岛崎昌《隋唐时代的突厥斯坦研究》，增天精一《为沙所埋的丝绸之路》，保柳睦美《丝绸之路地带的自然变迁》，井上靖《亚历山大之路》等，反映了20世纪日本在中亚史某些领域的主要学术成果。

近数十年来，特别是中亚五国脱离苏联、宣布独立以来，中亚地区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出现一股新的“中亚热”。此时国际学界在中亚学研究领域上不断拓展，由最初的地理交通、文物整理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宗教、艺术、习俗等方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有：地理和考古文献领域出现了赫尔曼《公元100年前后中国、印度和罗马之间的交通路线》，亨廷顿《亚洲的脉冲：西域历史地理图解日记》，瓦尔德施密特《犍陀罗—库车—吐鲁番》，达伯斯《中国新疆的发现和考察史》，冯·加班《大草原与城市》，哈格《通向亚洲之路》，包伊斯《中世纪伊朗语摩尼教遗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齐莫《景教突厥文吐鲁番文献》、《摩尼教突厥文文献》，斯米尔诺娃《粟特钱币》等新成果，亨宁《粟特文古代信件断代》、《巴黎的粟特文献》、《大夏语铭文》、《呼罗珊文献》等表现其在考古文献方面涉猎尤广。政治史领域有巴托尔德《突厥斯坦史纲》、豪西格《伊斯兰之前的中亚史和丝绸之路史》、葛玛丽《850—1250年间的和卓回鹘王国》、哥尔久《古代中亚的国王、可汗及其他统治者》、

《蒙古帝国建立后的中亚摄政者》、李特文斯基《中亚》等。经济史领域主要有维勒尔《罗马帝国同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远方贸易》、齐莫《高昌回鹘王国的贸易》等。民族史领域主要有亨宁《粟特学》、葛玛丽《匈奴—突厥关系》、伯恩斯坦《匈奴史纲》、巴赞《突厥人和粟特人》、施塔维斯基《民族》、托马斯《楼兰鄯善的早期居民》等。宗教史和文化艺术史领域密切相连，同时获得重大进展，主要有克林凯特《摩尼教的艺术本质》、《丝路地区的供养人》、《亚洲内地宗教教会中的基督教和佛教》及其与海西希合著《中亚各种宗教的融合》，亨宁《一个粟特神》，弗伦茨《沿着丝绸之路的艺术与文化》，贝勒《西域佛教记》、《玄奘生平》，法尔克《丝绸艺术史》，包伊斯《祆教徒》，贝雷尼茨基《粟特人的艺术》，施塔维斯基《贵霜人的艺术》，马松《丝绸传播史略》，阿尔特海姆和雷侯尔克合著《中亚的古代希腊文化》，夏马尔克《中亚与中央亚细亚壁画》、《粟特壁画》（与别列尼茨基合著），哈尔马塔《中亚文明史》等。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组织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编撰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①，成为目前中亚史研究的集大成巨作。

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也有一批学者长期坚持着中亚史地研究，并呈现出将中亚史与西域史地和丝绸之路密切结合的特点。早在近代以前，中国历代学者就有致力于西域史地研究的传统，自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起，历代正史都有《西域传》、《西戎传》、《地理志》、《食货志》等志传专门记载西域地区；同时一些地理志书如玄奘《大唐西域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

① 现已见第1卷，由A. H. 丹尼和V. M. 马松主编，芮传明译；第2卷，由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译；第3卷，由B. A. 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余太山统一审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

《太平寰宇记》、陈诚《西域蕃国志》等，别史杂著如慧皎《高僧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段成式《酉阳杂俎》、耶律楚材《西游录》等，也把目光投向这一地区。后来，中国学者对西域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就是代表性的著作。20世纪20年代，国内开始注意与国际学界接轨，主要从翻译、考古、文献三个方面加强了对中亚史的研究，涌现出一些成果丰硕的专家。翻译方面，早年曾在法兰西学院工作的冯承钧堪为代表。他熟悉西方汉学，大力翻译有关西域南海史地方面的论著，最后汇集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和《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等书。尚有其他诸多译作，如《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和个人的研究著作《西域地名》、《景教碑考》等都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考古学方面，有黄文弼、向达等人的传世成果。20世纪20年代，黄文弼参加了斯文·赫定主持的中瑞联合考察团对中国西北的考察工作，此后在1933、1943和1957年又先后三次亲赴新疆考察，足迹遍布天山南北。他的著作如《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7—1958)新疆考古报告》、《西北史地论丛》、《蒙新考察日记》等为我国西北史地、考古和文化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文献整理方面，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影响最大。该书以开阔的视野，爬梳和筛选了古今中外有关西域、南海和中西交通诸方面的文献资料，至今仍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此外，岑仲勉在突厥史方面汇辑成的《突厥集史》、针对沙畹所作加以补充考证的《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元也里克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等均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影响。陈寅

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则从唐代政治文化入手，宏观论证了西域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以上列举的部分学术成果极大地开拓了我国的中亚史和丝绸之路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和开发西部等国家政策激励下，中亚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局面。在中亚史领域，专门研究机构如西北大学中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历史系西北民族和中亚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等纷纷建立。在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史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武汉大学“三到九世纪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高校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等成为专门的研究实体，产生了一批研究中亚史和丝绸之路史的学术新秀及成果。

同时，大规模学术合作项目、诸多专著、译著或系列丛书纷纷推出。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成果——周菁保主编的“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包括《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等系列专著；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项目，由王希隆、杨恕主编的“中国西部考察探险”丛书，推出了诸如俄国学者谢苗诺夫《天山游记》、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宁越天山到罗布泊》、罗鲍罗夫斯基《天山东部与南山行记》、奥布鲁切夫《中亚细亚、华北与南山》、芬兰学者曼涅海姆《1906—1908年亚洲旅行摄影记》、英国学者罗伯特·肖尔《鞑靼高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等，包括了多国学者约多达数十部专著在内的大部头成果。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主编的“边疆史地”

丛书则产生了《安西与北庭》、《北部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唐代西州行政体制考论》、《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史》等学术成果。此外，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研究”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策划发行的“瑞典东方学译丛·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亚洲探险之旅”丛书，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探察”丛书和“边地文化探险”丛书，龟兹石窟研究所陈世良主编的“西域佛教研究”丛书等，都有较大影响。其次，探索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专题化研究明显加强，促使学术研究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在琳琅满目的学术成果中，与中亚史关系较密切的有：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嚈哒史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荣新江《西域考察与研究》、《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古道西风——考古发现中的中西文化交流》、《沙海古卷》，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姜伯勤《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中国祆教艺术史》、《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西北社会与文明》，齐东方《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唐代金银器研究》，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吴玉贵译著《唐代的外来文明》等。

此外，丝绸之路上重要民族的研究也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关于粟特人的研究，除了荣新江、张志清合著《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以及荣新江以粟特人东迁

为主要内容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专著外，近十年来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以逐步丰富起来的考古文书和墓志等资料探讨了粟特人的迁徙路线、聚落分布、商业贸易、政治活动、宗教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汉化进程和对华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草原丝路阿尔泰文化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如1996年召开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反映了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①。

三 本书的研究基点和内容

综上所述，虽然中外学界对中亚史和丝绸之路的研究已获得厚重的成果，但仍不乏有待细化和深入研究的地方，特别是对中亚局部的研究，尚留有一些空白。而将中亚史地、民族与丝绸之路结合起来研究，或立足于丝路发展史来考察中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则更有待进一步发掘。例如，中亚北部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对中亚北部历史地位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和提高。中亚北部，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其

① 以上主要参考了K.Ш.哈菲佐娃著，阿拉腾奥其尔译：《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木子《中国西域楼兰学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山田信夫《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2、3期连载)、李琪《论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阿尔泰历史文化研究走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魏长洪、陈香苓《中亚界定研究概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郑炳林、屈直敏《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研讨会综述》(《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胡振华《中亚与中亚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等。

地形相对平坦，草原苍茫无际，马群如云游荡，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扫视北纬约40°至50°之间，除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弧形山区外，“几乎整个亚洲大陆被一条纵向的草原覆盖着……这片大草原从中国东北部起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库伦延伸到马里和巴尔赫地区”①。这条草原地带从中亚北部向东西延伸，平坦而开阔，犹如横亘在欧亚大陆的巨大走廊，而中亚北部的草原正好是这条走廊中间宽敞的厅堂。从哈萨克草原极目眺望，向东穿越缺口较大的准噶尔盆地和阿尔泰山山口，可以进入腹地广阔的蒙古大草原；向西沿咸海、里海一线，可到黑海北岸的东欧草原乃至大西洋沿岸；向南则通向伊朗高原地带和两河地区的绿洲。在一百四十八万年以前，阿尔泰山北麓已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当社会文明之初，农业地带的人们还只是徒步行走和牛车运输的时候，草原上的游牧民们已在骑马驰骋，而他们那有着高高车轮的庞大队伍则以更大承载快速传播着东西方文明。同时出于游牧社会“逐水草而居”的习性或其他自然灾害、政治经济等原因，一批又一批游牧民族和部落在草原上迁徙，不断接触并沟通了其他地区的民族乃至农业社会。不管他们从哪儿起身，向哪儿转徙，中亚往往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如同快捷高效的搬运夫，这些游牧民族在草原走廊往来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地把东、西方的文明汇聚到中亚，然后转输到另一个地方，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聚合和发展。正是在这些游牧民族的努力下，穿越中亚北部的东西交通渠道——草原丝路最早出现在亚欧大陆上，而中亚北部就成为草原丝路的天然枢纽。在分析了中亚沙漠之路的

---

① 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导言，第9页。

艰难之后，格鲁塞曾指出："然而，在这条狭窄的文明小径以北，草原为游牧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由无数条道组成的无边无际的路，即蛮族之路。"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道："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畔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地区内，浩浩荡荡的蛮族大军畅通无阻，因为尽管阿尔泰山和天山北部的山嘴在朝着巴尔喀什湖方向似乎已经合拢，然而实际上两山之间在楚固恰克方向，在塔尔巴哈台的额敏河处，空隙仍十分宽阔，裕勒都斯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朝着西北方向的空隙也很宽，来自蒙古利亚的牧马人在这里看到了远方一望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塔尔巴哈台、阿拉套和穆扎尔特通道上不断有从东方草原向西方草原迁徙的游牧民通过。"①费德里科·马约尔则指出："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帝修筑长城的匈奴人，公元6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庭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一直到13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②丹尼斯·西诺尔认为"中亚是一个文化区域"，而且中亚的历史"就是蛮族的历史"③。从这一角度看，强调游牧民族在中亚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无疑表明了中亚北部草原在文明交流和汇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基于以上情况，本书拟以公元9世纪以前的中亚北部为时空范

---

① 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导言，第11页。

②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序，第1页。

③ 丹尼斯·西诺尔著，喻融融译：《什么是中亚》，《民族译丛》1986年第1期。

围，围绕东西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传播这一主题，来考察人类文明在这里发生、发展并不断碰撞、交流的历史现象，旨在揭示、论证这一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希冀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中，为更好地开发大西北，促进我国与西邻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一点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本书主要涉及到以下问题：第一，追寻中亚地区的远古历史，大量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遗址充分证明这里很早就有人类文化萌生和繁衍，而且远自青铜时代，特别是从米努辛斯克地区的文化遗址中，可以发现东西文化交流的端倪；第二，丝绸之路的早期发展史，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历史，塞种、匈奴等早期游牧民以迁徙、交往等方式较早传播着东西不同的文化，为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丝绸之路的发展史，经历了从简单到丰富，从隔离到连接，由此逐步发达的变化过程。从张骞“凿空”绿洲丝路之初，局限于南疆比较单薄的南道和北道，到后来青海道、伊北道乃至天山以北新北道的产生，再到回鹘道、碎叶道以及天山南北相连的诸多支线的襟带相连，丝绸之路逐步发展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纵横交通网络。本书对经过中亚北部地区的重要路线和交通网点做了深入细致的考释；第四，丝绸之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诸多此消彼长的变化。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记录并向汉武帝报告了绿洲丝路，中亚地区的交通重心曾一度南移。然而由于西域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公元5世纪以降至公元9世纪，丝路贸易重心再度北移，这一变化突出了中亚北部地区的重要性和发展持久性；第五，作为颇具商业特性的民族，粟特人曾经大量东迁和北移。为经商求利，他们无所不至，从而将其民族文化传播到丝路沿线和东方各地，也把东、西方文明携带到

丝路沿线广大地区。同时他们又与各种政治势力结合起来，极大地影响了丝绸之路和东方社会的发展变化。通过考察粟特移民的四处迁徙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的活动，本书揭示了该民族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第六，公元6—9世纪，伴随陆上丝绸之路发展达到鼎盛，东西文化交流之盛况在中亚北部地区充分体现出来，正是在这一时期，中亚北部在东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也进一步凸现出来。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前贤们的研究成果为本书铺垫了最好的基石，这是笔者能够写成此书的重要前提。另外，为了准确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也为了避免重复的笔墨，笔者在撰写过程中注意选择自己的思路和方法。

举其要点有三：一是笔者既不局限于某个狭小的时代断面，也没有从头至尾伸张到整个中亚和丝绸之路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而是以公元9世纪为下限。这是因为就丝绸之路发展史看，公元9世纪是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至此中亚北部地区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二是在资料使用上，尽力发掘基础雄厚的苏联和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直接从苏联考古资料中引用了不少有份量的成果，这也可视为本书的一个特点。三是笔者注意了时间与空间、重点与难点的结合与协调。在时间轨迹之外，笔者强调了空间的概念，特别是在5世纪以后丝路中心再度北移的问题上，以重笔浓墨论述了北新道的路线、城镇和网络

形式。另一方面，笔者在论述北新道网络和粟特人东迁北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远古时代原始文明的交流和塞人、匈奴等古老民族的迁徙活动，力图在中古中亚北部地区发展史上给读者搭建起丝绸之路的全景图。

第一章

中亚北部地区的远古文化

让我们先从中亚的地理环境入手，描绘其四至范围和北部状况，追寻人类初期生存和活动的文化遗迹，以遥望远古时代就已露出的东西文明交流的曙光。

第一节　中亚四至及它的北部地区

在蜿蜒西去的漫漫丝路上，古代的行旅寻觅着水井，蹒跚艰难地穿过戈壁，翻越山岭，走过人迹罕见的一个又一个地区，连接沟通着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古老的文明；

在一望无垠的旷漠荒原上，剽悍的北方游牧民一批又一批地离开大漠南北的故乡，驰骋向西，指鞭它方，激荡世界，传播文明，活跃在中外历史舞台上；

无论是商队、使节、僧侣，还是游牧民，都熟悉这样一片地方，它亘古广阔、四通八达，是东西南北交往的孔道与通衢，也是纵横交叉的枢纽与中心，它，就是中亚地区。

中亚，顾名思义，是指亚洲大陆的中部地区。作为一区域地理概念，对它的四至范围曾有过种种不同意见：19 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兼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首次试图界定“中亚”的范围。洪堡在其重要著作《中亚》（Asie centrale，1843 年出版于巴黎）一书中，主张将中亚置于从北纬 44.5°以北 5°至以南 5°这样一大片地区内，他认为这即是整个亚洲大陆的中央部分；另一位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德·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在其重要著述《中国》（1877 年）一书中分析了有关“中亚”的所有定义，认为均不能令人满意，因而提出自己

的看法，他说道："中亚，即意味着亚洲内陆地带以其水文体系为特征（即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界限则北起阿尔泰山，南抵西藏高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大兴安岭"①；赫罗兹尼在《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一书中写道："西方人的摇篮即以里海、帕米尔和阿尔泰为界的中亚地区"②；英国学者汉布里在《中亚史纲》导言中甚至认为，中亚实际就是一片浩渺无垠的沙漠和草原；日本学者羽田亨说："此名称所包括的地域，大略指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东突厥斯坦，即新疆天山南路的地方，北面包括流入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阿拉湖等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犁准葛尔盆地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和注入咸海的河流的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南面以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为限"③；苏联学者在《中亚——自然地理评述》一书中为这一地区划定的范围是："最北面到阿拉海的西岸（北纬45°32′），南端位于契力图赫捷尔地区库什卡河河谷（北纬35°08′），极西点是位于里海岸边的苏艾海岬（东经52°23′），而最东边是汉捷戈尔山峰以东的中部天山之冰川汇结点（东经80°22′），中亚地区总面积达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平方公里"④；王治来《中亚史纲》开卷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划定的范围是"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作为中心，附带地涉及其周围

① 摘自[巴基斯坦]A. H. 丹尼. V. M. 马拉主编，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1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66页，附录L. I. 米罗什尼科夫《释本书"中亚"一词的含义》。

② 赫罗兹尼著，谢德风、孙秉莹译：《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11页。

③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④ 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亚——自然地理评述》，莫斯科1958年版，第7页。

地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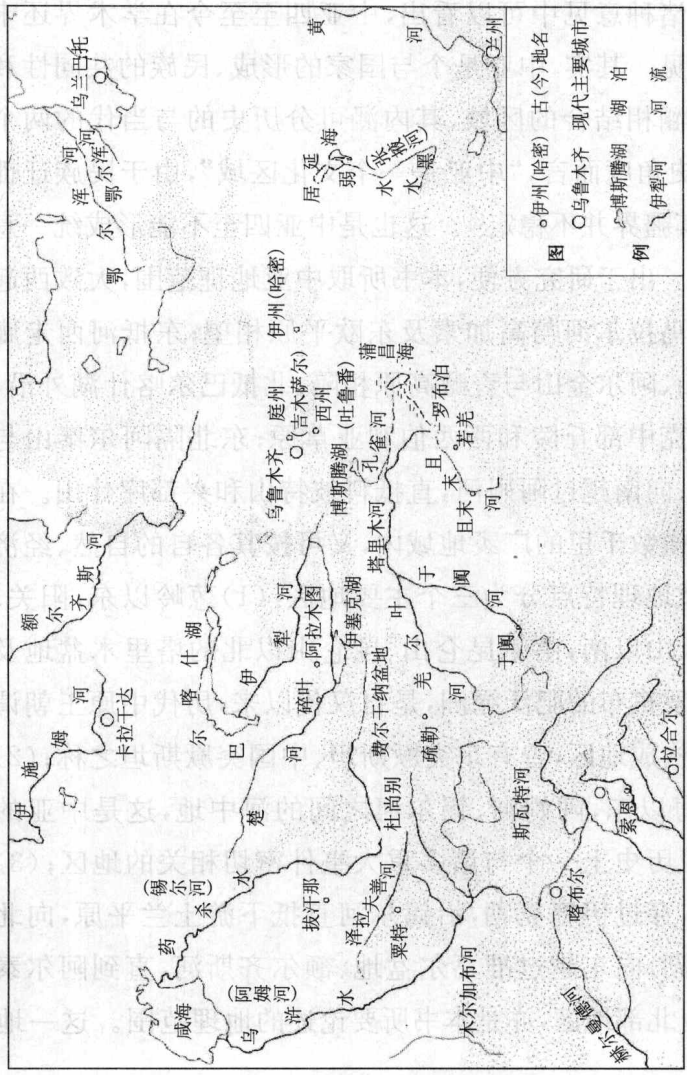
由上述诸种意见中可以看出，中亚四至至今在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其实，中亚是个与国家的形成、民族的共同性和历史文化的内涵相结合的区域，其内涵可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个概念②。从历史角度而言，“中亚是一个文化区域”，由于民族迁徙和纷争频繁，其疆界并不稳定③。这也是中亚四至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的因素之一。出于研究方便，本书所取中亚地理范围，大致西起咸海，隔里海、乌拉尔河与高加索及东欧平原相望；东抵河西走廊西头，以昆仑山、阿尔金山与青藏高原相隔；北抵巴尔喀什湖外沿，延伸可至哈萨克中部丘陵和西西伯利亚草原；东北隔阿尔泰山与蒙古高原为邻；向南越过阿姆河，直抵科彼特山和兴都库什山。在这东西南北纵横数千里的广袤地域内，又可按其各自的自然、经济地理、政治区域地理特点分为三个主要地区：(1)葱岭以东，阳关、玉门关以西，天山以南，喀喇昆仑山、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及其南北边缘星罗棋布的肥沃绿洲，是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原王朝谓之西域的主要构成地区，曾有东突厥斯坦、中国突厥斯坦之称；(2)葱岭以西，咸海以东，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这是中亚的腹地，也是中亚历史上一个与诸多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地区；(3)中部天山以西，穿过伊塞克湖，沿锡尔河直抵下游土兰平原，向北包括巴尔喀什湖，向东越过准葛尔盆地、额尔齐斯河，直到阿尔泰山西麓，为中亚北部地区，亦是本书所要论述的地理范围。这一地区

---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② 魏长洪、陈香苓：《中亚界定研究概述》，《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4 期。

③ [美]西诺尔撰，喻融融译：《什么是中亚》，《民族学译丛》1986 年第 1 期。



地图2　中亚与中亚北部范围

资料来源: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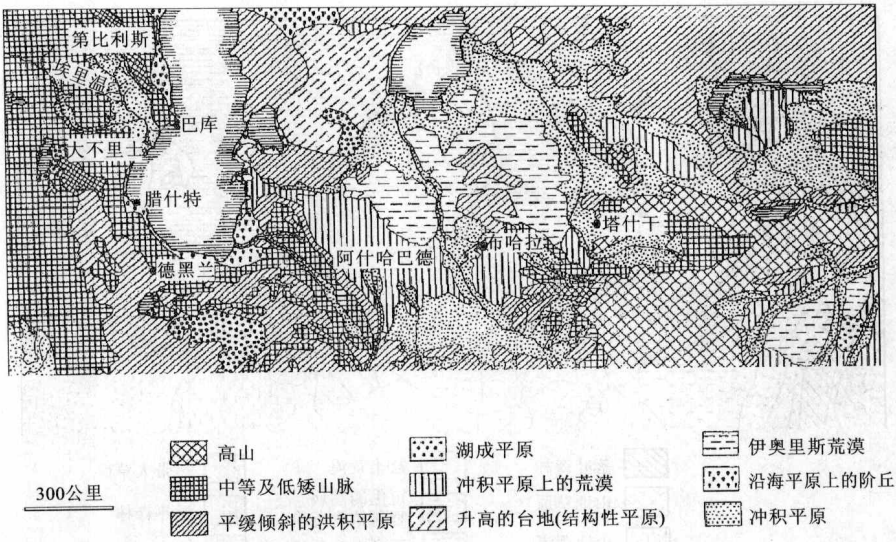
又可大致分为东部天山以北，准葛尔阿拉套山以东，阿尔泰山以西之准葛尔盆地，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塞克湖以北之七河地区①，或曰伊犁—楚河地区，即今我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北部和哈萨克共和国南部与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北部地区。

中亚北部地区处在四方古老文明区域的包围与联系之中。翻开世界上古史册，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即亚、非、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多出现在大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爱琴海岸的古希腊、罗马，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古巴比伦，黑海北岸的顿河、伏尔加河流域，都是人类活动的摇篮地带。还有印度、恒河流域以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古老东方文明，以及它们与西方古文明之间的接触交往，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页。而自从东西方文明开始接触交往以来，中亚北部地区就成为重要的十字交叉路口之一，既当东西南北通衢要道，又是东西陆路交通的一段重要津梁。从这里向东沿天山北麓，过阿尔泰山南端，越阴山，直抵河套北端，很早就通过活动在大漠南北的中国古代各游牧民族，开始了与黄河流域古老中原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北面的西伯利亚草原、南俄草原，黑海北岸顿河、伏尔加河平原，远至东欧平原可连成一片平坦无垠的广域，任凭金戈铁马驰骋东西，开拓出一条隐形的“草原之路”，最早担负起传播东西方物质文明的历史使命；向南横渡锡尔河，穿过河中地，与印度古国相连，并通过河中地区向西渐次越过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半岛与古波斯、叙利亚、大食

① “七河”-Семьречь 的义译，具体是指从南部注入巴尔喀什湖的伊犁河、卡腊塔尔河、阿克苏河和列普西河，以及从北面流入巴尔喀什湖的阿雅古支河、巴卡纳斯河和托拉乌河。七河地区的东北为萨司克湖和阿拉湖，东为准葛尔阿拉套山脉，南为纳林河上游，因有巴尔喀什湖水系的七条河流经该地区而得名。

乃至希腊、罗马等地中海国家发生久远之联系。至此已见，中亚北部地区与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地均能连接起来，东西方文明很早就在这里相遇，并通过这里继续传播。故该地区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据有显赫地位，值得重视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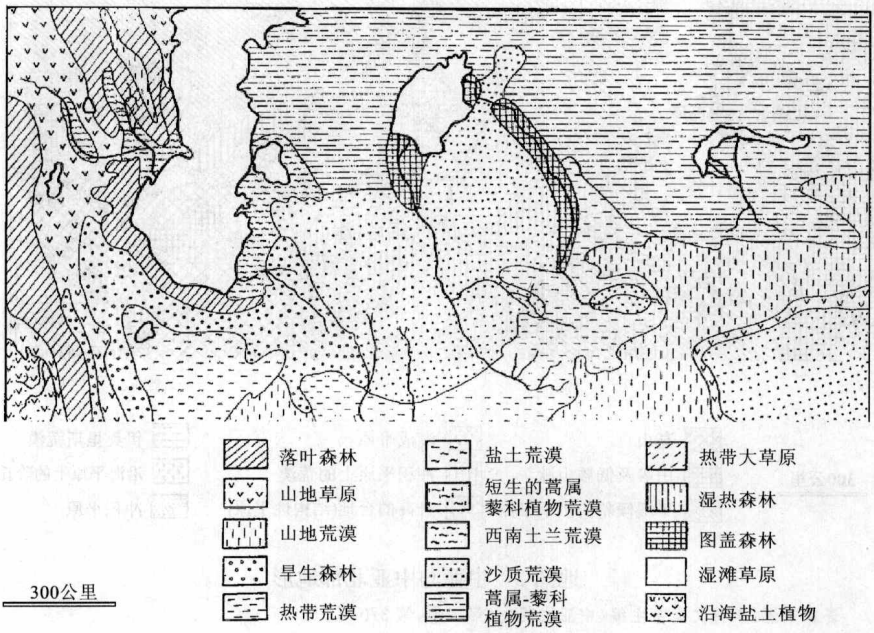
中亚北部地区地形复杂多变，自然条件十分特殊。这里有耸立入云、积雪盖顶的高山，大小冰川和皑皑白雪为奔腾湍急的山地河流提供了丰富的水源，郁郁葱葱的山地森林和草原是四季更替不断的良好牧场。中央天山以西的支脉从新疆中部绵亘伸展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交界处，介于伊犁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外伊犁阿拉套山、吉尔吉斯山、塔拉斯山等是中亚北部的一片最大山地。中部的准葛尔阿拉套山（又称谢米列契阿拉套）是天山最北支的一部分，其南面是伊犁河谷平原，明显地表现为一高山环抱的盆地，其东北面是呈东西走向的塔尔巴哈台山脉，介于两山之间有一狭窄地堑，即著名的古典准葛尔门，高一千零六十公尺，形成天山北坡悬壁，是亚洲中部关口中最低者。谢苗诺夫在《天山游记》中认为，古代中西商路的一支就经过这里。东部阿尔泰山系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东端渐没于蒙古高原，与萨彦岭、唐努山脉相连，西坡和缓，支脉广延，与准葛尔盆地相接。以上所述各大山地的走向，一律由东向西，或由东南趋向西北，这无疑有利于东西交通道路的开辟与畅通，商队行旅可顺着自然形成的山麓平原、山间谷地东来西往，少受翻山越岭之苦。另外，这些山麓平原和山间谷地多是湿润的灰土、褐栗土层，适宜于栽培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海拔五百至一千公尺的山地和山前地带可以用作春夏秋冬分季牧场或全年放牧的四季牧场。



地图 3　中亚与中亚北部地形

资料来源：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 370 页。

在高山峻岭和山谷盆地之间，有许多满载冰雪融水的山溪和山地河流，沿悬崖、穿峡谷，汹涌急促地奔向山麓平原，构成密布的河网沟渠，供给人畜用水，灌溉农田。中亚北部地区的主要河流是锡尔河、楚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它们大都是典型的山地河流，属内陆水系，其落差大，水流湍急，多和山前耕地草场相连，其中尤以楚河—伊犁河谷、塔拉斯河谷土地宽平肥沃，由西向东延伸，是中亚北部地区的粮仓，多有肥沃的耕地和星罗棋布的村庄城镇。苏联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不同时期密集的古文化遗存，揭示出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谷这一狭长的东西通道，曾是古代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聚居地和丝绸之路北道经过的地方。



地图4　中亚与中亚北部植被分布

资料来源：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370页。

流水成潴构成的主要湖泊有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伊塞克湖在巍峨天山的环抱之中，为一构造湖。因湖水常年不冻，汉文史籍又称之为“热海”。求法印度路经此地的唐僧玄奘曾对它作过生动形象的描述：“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忽，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①这是关于伊塞克湖的最早最具体的文献记载。沿湖两岸，与南北山麓平

① （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页。

原之间，存在着东西交通古道。考古工作者在湖东南普尔热瓦尔斯基城附近发掘到大量乌孙文化遗存，说明远自古代，这里已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休养生息之地，伊塞克湖盆地是古代中西交通史上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地区。巴尔喀什湖为一堰塞湖，中国古称夷播海。伊犁、卡腊塔尔、阿克苏和列普西四条河从南流入巴尔喀什湖，阿雅古支、巴卡纳斯和托拉乌三条河从北流入巴尔喀什湖，这七条河流的入口处，形成古老的水泛地三角洲，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巴尔喀什湖周沿盆地西南与伊犁河谷地相连，东去衔接阿拉湖盆地。阿拉湖位于准葛尔阿拉套和塔尔巴哈台山之间，在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山之间的是斋桑湖盆地。斋桑湖面积仅次于巴尔喀什湖，额尔齐斯河从湖中穿过。从地图上看，伊塞克湖盆地、伊犁河谷、巴尔喀什湖盆地、阿拉湖、斋桑湖盆地以及准葛尔盆地虽各为群山环抱，但相互间仍有通道可连，本身又较平坦富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从河西走廊及大漠南北迁出的游牧部落，很多都从这些地区经过或滞留，积极从事社会生产及物质文化的交流活动。

总之，中亚北部地区因其四通八达的重要地理位置和独特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自古以来就是绿洲和草原的联系带，是一个农牧综合经济区。它不但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尤其是“马的文化”的摇篮地，而且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它吸引并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来自我国河西走廊及蒙古高原一带的古代居民，从塞种、月氏、乌孙到匈奴，继之鲜卑、柔然、突厥和回鹘，直到契丹、蒙古，他们波浪式地涌向这里，或作暂短逗留后更向南向西而去，或建立起地方政权，与周边诸大政治势力发生密切关系。无论是去是留，他们都在这一地区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东西方文化交流

传播的重任，为人类文明在相互学习交往中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而且早在游牧民族大迁徙时代之前，几个首尾衔接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就已经露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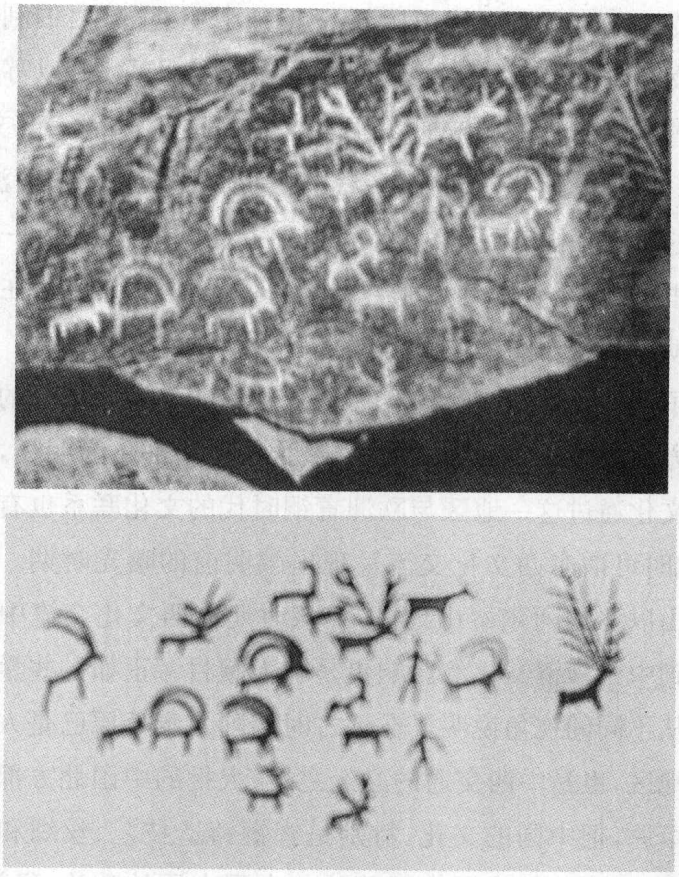
第二节　远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曙光

中亚不但是人类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且从远古时起，就已见四方文化荟萃融合和交流传播的端倪。经苏联考古工作者从1938—1956年发掘工作查明，中亚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费尔干纳盆地、纳林河流域、斋桑湖盆地及额尔齐斯河流域等地。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手斧比中亚南部的古文化更早。而在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上游以及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又与多伦、满洲里、海拉尔及北京山顶洞人的文化颇有相似之处。苏联学者就曾明确认为这是蒙古人种所创造，其发源地很可能就在中国的北部①。中国学者李琪则指出："中亚地区东邻亚洲的中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连东欧的俄罗斯，南接阿富汗、伊朗，处于东西交通要冲。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晚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可以说存在两种类型。一种属欧洲石器时代类型；另一种属亚洲石器时代类型。前者反映了在某一阶段迁徙和流动的痕迹；后者则表现为当地文化的演化……"②

对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活动画面，古人类学家摩尔根曾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沿着海岸或湖岸，沿着河道四处散布，可以

① 柯斯文：《原始文化》，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5—36页。

② 李琪：《中亚史前文化的开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图版 1　阿尔泰放牧岩画及其图案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遍及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我们在各个大陆上都发现处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石器和石器遗物，其中有充足的资料足以证明上述人类迁移的事实。”①看来远古时代的人类正是在渔猎、采集的生产活动中，顺着山谷，沿着河流，行走迁移，乃至遥远的地方，并留下了东

① 摩尔根著，杨东莼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上册，第 20 页。

西文化交流的最初痕迹。这似乎也正是中亚北部、西伯利亚地区旧石器文化与河套文化、山顶洞文化相近的原因。所以苏联学者蒙盖特曾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的发展分成了三大文化区，即“非洲、地中海地区，欧洲冰区和中国西伯利亚区”①。请注意，蒙盖特在这里把中国与西伯利亚（包括中亚北部地区）划入一个物质文化圈里，说明至少在他看来，从远古时起，这两个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到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②，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文化受古代东方文化中心黄河流域的影响，比中亚南部更为明显，而东方的中国文化通过这一地区与欧洲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也有了一定加强，此时可谓东西文化交流呈现出黎明前的曙光时期。特别是位于天山以北的阿尔泰山地区，在该时期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以及受到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更是引人瞩目。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从不同的视角说明早在远古时期阿尔泰草原已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区，也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大批的中国北方部落来到阿尔泰草原，把中国的文化，特别是青铜铸造技艺、丝织和蚕桑文化传到欧亚草原，促进了中亚等地与中国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所发现的青铜时代的物质文化分析，阿尔泰草原地区无疑受到古代东方文化中心黄河流域的影响”③。

中亚北部和西伯利亚的早期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

---

① 参考 A. Л. Монгайт, Археология в СССР. Изд. АН СССР. М. 1955г.（A. Л.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莫斯科 1955 年版。）

② 中亚的青铜时代约当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期到公元前 800 年之间。中亚的原始社会不但延续到青铜时代，而且还延续到铁器时代。

③ 李琪：《论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阿尔泰历史文化研究走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略和我国早商文化同时，并可以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文化为代表。这里从铜石并用时代起，包括了三个依次更替的考古文化，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末期，反映了人类的生产活动从狩猎、畜牧发展到游牧的过程，以及不同地区的古文化在这里接触交流的情景。这三个前后连贯的古文化是：阿凡纳羡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

阿凡纳羡沃文化①属铜石并用文化，约当公元前三千年末到前二千年初。出土器物很多，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穿孔的河蚬壳。因为阿姆河是出产这类淡水软体动物的河流中距离叶尼塞河最近的一条，所以只有在当地同阿姆河沿岸居住的一些部落有某种联系的条件下，这种介壳才会流传到叶尼塞河沿岸②。加之墓葬遗物中有安诺型③的彩陶，说明此时此地与咸海周围地区已有了联系交往。在阿凡纳羡沃文化考古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伊尔库茨克近郊发掘的墓葬拾物中有一种白玉环，与我国殷商时代出现于黄河流域的白玉环和白玉璧在有几圈同心圆线刻的纹饰上几乎完全相同④。而远至西方的塞伊马墓地⑤也出土了这种白玉环。苏联学

---

① 米努辛斯克盆地巴帖尼村附近的阿凡纳羡沃山旁的墓葬遗物。

② 参考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③ 安诺是科彼特山前阿什哈巴德附近的一个绿洲，是重要和著名的中亚青铜文化遗址，也是中亚南部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手制陶器和地穴式住房为安诺文化的特点，而其中彩陶与中国的仰韶彩陶相似。

④ 参考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⑤ 塞伊马文化是欧洲伏尔加河和奥格河上的古文化，发现于1914—1922年，考古时间定为公元前1600—前1300年间。此文化因素曾东传至贝加尔湖并南下达内蒙古南部，与殷商文化相遇。所以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留下许多共同之处。如白玉的西传就证实，在塞伊马时期，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沿岸，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和中国北部之间曾有联系。塞伊马、贝加尔湖和绥远等地铜刀的相似形制很可能也是沿玉器之路传播的。经由此路传播的还有塞伊马所出的其他器物，如安阳出土的锛和塞伊马所出的十分相像（格卢哈烈娃1946年6月26日在东方文化博物馆报告时所示。见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者承认，根据中国资料，黄河流域的白玉环和白玉璧的生产可能早于塞伊马所出（安阳殷墟的发掘表明，公元前15—前3世纪已有白玉器）。于是就无法排除在玉器产品的交流上，中原地区与西伯利亚乃至更远的西方之间有某种联系。

安德罗诺沃文化，大致属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约当公元前二千年中叶至第一千年初。安德罗诺沃位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阿钦斯克南，东经90°东侧，北纬55°至56°之间。1914年在该地发现青铜文化。该文化的遗存广布于西西伯利亚全境、叶尼塞河中游、阿尔泰地区、七河地区和伊塞克湖沿岸，甚至远及乌拉尔河、帕米尔南麓和罗布泊一带。197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在罗布泊以西七十公里、孔雀河下游北岸的台地上发掘了四十余座墓葬，采集到十八具头骨，经古人类学家研究，认为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甚至与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区铜器时代居民的头骨较相近。若按照某些次级型态差别，又可具体分为两组，其中第一组头骨接近安德罗诺沃类型，第二组头骨更接近阿凡纳羡沃类型，而且它们分别出自两种不同形制的叠压墓葬中，说明略有体态差别的欧洲人种居民曾先后移植到罗布泊地区①。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更加充分地说明了中亚北部与周围不同文化类型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影响。“这些遗存表明，当地从事养马业者居住于半地下土窑之中，窑壁以粘土筑就，窑顶用树干柳枝搭成，上面撒有一层厚土。这种居住形式证明这些地区居民吸取了中亚南部定居居民用细碎泥土垒筑民宅的技术。与此同时，中亚南部也开始盛行

①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养马业和养驼业，可见这一时期，哈萨克北部农业畜牧业文化和中亚南部定居的农业文化彼此交流，互为影响，孕育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在纳马兹加四至六期，亦即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日趋加强。从而形成了安德罗诺沃地域文化”。同时“在谢米列契和天山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工具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出土物相同。这一带后来是乌孙文化产生的地域。伯恩施坦在这里发掘的阿尔帕古墓证明了谢米列契和天山塞人——乌孙文化正是在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①。七河地区和伊塞克湖沿岸的沙丘遗址也有同安德罗诺沃器物特点极其相似的陶器和金属制品出土②。而托斯托夫《花剌子模古代史》认为，在花剌子模发现的塔扎巴格亚布文化则有许多特点在安德罗诺沃遗存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发展。在大量出土的墓葬品中，有各种质地的串珠饰物，它们有可能与青铜时代末期广泛流行的、制作技术显然是从古典东方传入的膏泥饰物有联系。这时的服装主要是毛织物。安德罗诺沃人完全可以利用牲畜，“不仅取得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可以有兽皮、羊毛、山羊毛以及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长的纺织物，这便首先使得正常的交换成为可能”③。而交换的初步成果表现在，其文化遗存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和顿涅茨河流域诸平原的木椁墓期遗存有许多相似之处，体现出欧亚大陆中部具有草原世界文化的统一性，其历史意义不应低估。东部安德罗诺

① 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西域研究》1996 年第 2 期。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 г. стр104-105.（《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出版，104—105 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4 页。

沃文化在公元前13—前12世纪发生了大转变，而西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则一直存在到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末期，即继续存在了四五百年。这种变化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是畜牧生产从定居放牧过渡到游牧；二是中国北部的部落大量迁入，从而产生所谓的卡拉苏克文化。

卡拉苏克文化是发现在卡拉苏克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末期的文化，约当公元前1200—前700年。卡拉苏克河在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东经77°至82°、北纬53°至55°间，下游有城市也名卡拉苏克。在该河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从叶尼塞河到阿尔泰边区和卡拉干达一带，而与卡拉苏克文化同类型的文化发现于阿尔泰山和斋桑湖附近，其分布比安德罗诺沃文化更加广泛，且墓地较以前稠密，墓葬数量加多，往往一处墓地就有一百多座墓葬，说明卡拉苏克时期当地人口有很大增长。与卡拉苏克文化同期的文化有中国的商周文化、伏尔加河下游的木椁墓文化晚期（赫瓦冷期，黑海沿岸草原的钦麦尔期）。古人类学家通过对卡拉苏克人头骨的研究，确定了这众多居民的种族类型和它在人种系统中的地位。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中指出，在这些居民中“高脸，圆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或甚至扁平的鼻子”者占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些特征在欧罗巴人种中是看不到的，“它们表明这一类型很可能起源于蒙古人种。卡拉苏克人脸型……表明他们接近远东人种的华北类型”。结论是“来自东南方的蒙古人种华北类型成分曾大量渗入”①。此时的卡拉苏克文化正值中国殷商和西周时期，大批中国

① 参考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北方的狄人部落[①]迁居到南西伯利亚，包括以西的广大草原地区，把中国文化，特别是青铜铸造技艺传到了欧亚草原，不但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早期交流[②]。苏联学者吉谢列夫认为，是丁零人携带了新的卡拉苏克文化从中国北部来到西伯利亚南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卡拉苏克文化的分布地区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丁零人的分布地区为何如此吻合。从中国北部迁来的蒙古利亚人种并没有消灭当地原有的安德罗诺沃人，而是同他们融合了。

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器与中国北部的殷商文化十分相似，如青铜曲柄刀，有人曾把它与我国周朝的刀币相提并论[③]。内蒙古出土的一件铜戈，有许多特点都与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戈相似，所以有苏联学者认为“蒙古戈是安阳戈和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戈之间的一个环节。同刀的情形一样，戈上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西伯利亚和绥

---

① 中国先秦史籍中所说的“狄”、“狄历”、“瞿”等，都是丁零的异称。商周王朝几次对瞿族鬼方的进攻，显然曾经迫使该族向北方蒙古草原迁徙，后来的丁零人应即是他们的后裔。丁零人分布较广，东丁零分布于从贝加尔湖到鄂毕河地区，西丁零分布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

② 有学者甚至认为卡拉苏克文化是受到中国中原地区夏文化的影响。如陈立柱文指出，考古资料和上古文献显示，自公元前16世纪亡国后，夏族民众曾向北迁徙到山西乃至蒙古草原地带。专从考古资料考察，可以看到从中原二里头文化到匈奴墓葬文化，再到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苏克文化，其主要器物如圆底陶罐和青铜戈、剑等表现出明显的继承和演变序列。由此可以推知，夏族民众以迁徙的方式，不但把夏文化推进到蒙古草原广大地区，成为匈奴文化的主要渊源，而且在公元前14世纪影响到叶尼塞河流域，与西部其他种族相融合构成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明显不同的卡拉苏克文化。卡拉苏克居民和匈奴人的人类学特征也充分证明了这种民族迁徙和文化融合现象的存在。（陈立柱《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③ 参见C. B.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远的卡拉苏克铜器同中国中原地区繁荣的殷商时代文化有渊源关系”①。中国长城以北的绥远地区，是当时黄河流域殷商文化与北部草原地区卡拉苏克文化相联系的中间媒介，当地曾有大量卡拉苏克形的器物出土。如一种称为板刀的铜刀就与卡拉苏克铜刀相近：曲柄，柄根部有“段”，有的凹背，环首、弧首和纹饰细节也相似，这种板刀可以认为是同卡拉苏克铜刀有亲缘关系的绥远形制。1950年我国政府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上，展出了安阳殷墟出土的器物，其中就有同绥远卡拉苏克式铜刀的板刀几乎完全一样的大刀，而商戈的铜援、玉援与明显具有卡拉苏克式特点的绥远铜戈直接相似，说明绥远的卡拉苏克式铜器是仿照中原较古老的殷商标本制成的本地器物，是具有中国传统的过渡性器物。由此苏联学者认为“卡拉苏克时期叶尼塞河沿岸的青铜工艺，在西西伯利亚没有任何相似现象，看来它的高度发达应与东南方有联系。根据某些事实推测，从中国向北方的迁徙可能早在殷商时代即已开始”②。中国北方的移民带着绥远铜器开始进入叶尼塞河沿岸，与此同时也带去了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另外在一块卡拉苏克文化的石碑上，刻有带篷四轮车图和与周代弓形器相似的小轭③，苏联学者综合研究了卡拉苏克碑，指出其图形由于象征性和装饰性的陪衬，显得复杂而奇怪。对于它们的特点，除了追溯本地渊源外，还要从邻近各地区去寻求解释，首先是从中国去寻求，因为卡拉苏克时期有许多东西是从中国传入的，而商周铜器、陶器、

① 参见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玉器和其他材料制品的纹饰都广泛采用象征性形象，其中以饕餮纹最为常见，那是平安和幸福的象征。饕餮往往表现为大大几何图案化的绵羊嘴脸，它们有许多很像卡拉苏克脸相，尤其相似的是牛饕餮细部的刻画，这种纹饰在多伦多的安大略古物馆所藏殷商时代的中国骨柄上即可见到①。通过一系列比较研究，可以认为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石碑的图象反映了外来的、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古代中国的象征性图形的简略图象。不过与此同时，与饕餮纹似有联系的象征性图形传到叶尼塞河沿岸之后，已经起了十分明显的变化。殷商时代和周代的中国象征性图画并不是拟人的，饕餮始终只是兽类嘴脸的图案化。在叶尼塞河沿岸，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情况，除了纯属写意的图象，如牛图外，除了那些同中国作品一样可以视为图案化的兽头图象之外，甚至在十分简略的脸像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拟人形象。而考查卡拉苏克石碑图像的起源可以看出，像牛耳、牛角这样的细节乃是米努辛斯克盆地石碑雕像赖以为基础的中国图像的细部②。

卡拉苏克时期叶尼塞河中游铸铜业的进步，当与中国北部冶金文化的影响有关系。这可从卡拉苏克铸工的制品，在器形和装饰技术方面不仅近似长城地区的卡拉苏克型铜器，而且很像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铜器以及西周铜器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如卡拉苏克的铜刀可从安阳铜刀上找到原型，安阳所出铜刀的装饰，有一种扁平的动物形象，其总体轮廓、各部分的比例及半张开的口，都与

---

① 参见 C. B.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② 同上注。

卡拉苏克铜刀的某些部件极其相似①，从而再次证实了卡拉苏克器物有很多特点是来自东南方向的结论。这一结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说明卡拉苏克文化与中国北部有明显的联系，而卡拉苏克器物、技法和艺术品的传播，显然表明殷商时代的卓越成就已远传西方。

此时与考古资料可以互为映证的文献史料是汉文古籍中关于周穆王西征的记载。穆王西巡，正是发生在卡拉苏克文化时期。据《晋书》记，公元279年②在汲县战国魏安釐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公元前1001—前947年）西征犬戎，“益国二十”，直到极西处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故事。这个美好而又久远的故事《竹书纪年》③和《史记》都加采录。《竹书纪年》卷下周穆王条：“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④《史记·秦本记》、《史记·赵世家》记造父以骏马骊、骅、骝、騄献于穆王，穆王命造父驾车，西巡狩，得见西王母⑤。这些记载虽带有传奇虚构色彩，但多少能反映出一些远在公元前10世纪黄河流域与中亚地区之间的某种联系。尤其是《穆天子传》一书好似旅行日记，行程日期、道路方向、山川地理、风土人情，逐一列数，载记明晰。书中涉及我国西北民族和地理，非常具体生动，是我们研究战国时期中西交通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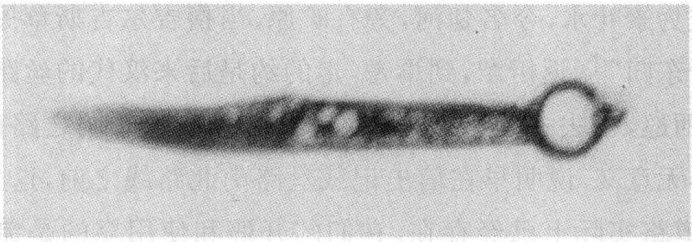
① 参见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② 荀勖《穆天子传序》说在281年〔见（晋）郭璞注，（明）范钦校订《穆天子传》荀注，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四部丛刊本〕。

③ 《竹书纪年》，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晋咸宁五年（27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280或281年）在汲郡的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凡十二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

④ （梁）沈约注，（明）范钦订《竹书纪年》卷下，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四部丛刊本。

⑤ 《史记》卷5、卷43，中华书局点校本。



图版 2　巴里坤兰湾子遗址出土的环首铜刀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书中所记，周穆王自宗周（洛阳）启程后，先向北涉障水，越钟山，至河套以北，然后向西，绕道山西和陕西北部，西南下到青海，经乐都、积石再向西去，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循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到库车，再北越天山，经特克斯河谷到伊犁河边。晋郭璞注“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剖闾氏”一句，曰“剖音倚”，所以“剖闾”当是伊犁的不同音译①。又“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一句，玄池有可能是指伊塞克湖（也有指斋桑湖）。又“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看来西王母之国很可能就在伊塞克湖西边不远。古之移民、商贾、行旅取道库车北上，出特克斯河谷，经伊犁河至伊塞克湖者，实为不少，说明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已是一条常被使用的中西通道。穆天子令西王母“己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乃发宪命，诏六师之人□其羽。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硕鸟解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翔畈于旷原，得获无疆，鸟兽绝群”。

① 钱伯泉：《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3 期。

溽水，或为素叶水，今名楚河，旁有旷原，当指吉尔吉斯草原。“乙亥，天子东归”①，返伊犁，到焉耆，走的约是后来汉代的丝路北道。穆天子西巡，一去一往，基本循的是以后开通的丝绸之路南北大道，这不无意义，说明早在信史记载丝路南北路线之前，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存在，它们的开辟和使用靠的是羌人、塞人、月氏、乌孙……这一批又一批的古代游牧民。

《穆天子传》记下了周穆王每到一处就慷慨馈赠各部落酋长，如“天子乃赐□之人□吾黄金之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天子乃赐赤乌之人□丌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珠三百裹”；“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戏□黄金之鹿，白银之麋，贝带四十，珠四百裹”；赐□之人潜时“黄金之罍三六，朱三百裹”；赐鄄韩人无凫“黄金银罍四七，贝带五十，珠三百裹，变□雕官”；“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赐智氏“黄金之罍二九，贝带四十，珠丹三百裹，桂姜百□；送重□之人“黄金之罍二九，银鸟一只，贝带五十，珠七百裹，□箭桂姜百□，丝□雕官”②。由上可见，穆王沿途带给各个部族的不但有丝绸、金银器皿、贝饰、药材、漆器，甚至还有交通工具车辆和饲养放牧的人，想必穆王西巡的这支队伍是十分庞大的。众多的随员携带着巨量宝物，驾车浩荡向西，他们给西戎诸部落人民带去了中原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用品，以及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人。而各地少数民族首领也热情地为穆王旅途所需提供大量的马、牛、羊、猪、狗、骆驼和穄酒，并以当地特产，最精美的白玉回赠穆王。穆王在群玉山

---

① （晋）郭璞注，（明）范钦校订《穆天子传》卷2、卷3，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四部丛刊本。

② （晋）郭璞注，（明）范钦校订《穆天子传》卷2、卷3、卷4。

(今叶城)得玉版三车,还有大量用作服饰的玉器达万只,装满了一车。巨蒐人送给穆王最好的枝斯(玉名)四十,其他玉佩一百只,琅玕四十。一部《穆天子传》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先秦时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友好交往的场景。在一南一北的绿洲之路和草原之路上,新疆的玉石成批东运,中原丝绸、铜器等物品源源西传,构成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内容。类似的记载还有《汲冢周书·王会解》,记述武王伐纣灭商后,周成王在镐京以盛会庆祝,各地诸侯及部落首领携特产前来。如渠搜赠会飞且食虎的鬻犬;康民赠水果桴苡,形似梨,味鲜美;大夏国赠自己繁殖的白牛;昆仑、莎车、月氏都赠以各种礼品。这里提到的康民或即古之康居,在锡尔河中下游一带,渠搜或即大宛,在费尔干纳盆地,是很早就热心与中国交往的两个古国。

现在中亚与东西方各地区之间远自上古时期的沟通和交往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在 1996 年召开的"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著名考古学家 Elena E. Kuzmina 在《塔里木盆地居民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的联系:铜器时代亚洲草原上的牧人》首先强调,安德罗诺沃文化与新疆青铜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哈萨克和美国合作建立的欧亚草原游牧民研究课题中心的负责人 Jeannine Davis-Kimball 专文论述了早期铁器时代的南乌拉尔、七河流域和新疆游牧人之间的族际交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1990 年《剑桥早期内亚史》主编 Denis Sinor 在《语言的神话和神话的语言》一文中指出:"在新疆古尸发现之前,就有证据表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古代生活着欧洲人种的居民……而中国和古代希腊人的一些带有共同性的神话观念证明

了穿越内亚(即中亚)的史前交通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志敏认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传入的,而新疆正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①。

总之,远古以来至公元前7世纪,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传播,或者说见于信史记载之前,中西通道的开辟与使用,首先出现在北方草原地区。即从中原北上,经过蒙古草原,折向西进入中亚北部地区,然后南去伊朗、印度,西去南俄草原、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地区,与东南欧文化发生早期交往。而前述种种考古文化,已为这一推测提供了考古学上的确凿证据。从物质交流的社会背景上看,青铜时代中亚北部草原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而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如乳制品、肉类、皮毛、毛织物等,数量日益增多,"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所以"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②。

卡拉苏克文化之后,中亚北部地区进入有史记载的游牧民族大迁徙时代,随之带来的是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传播。

---

① 徐文堪:《"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第二章

早期游牧民的西迁与东西文化交流

著名的英国近代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在其影响广泛深远的一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评介了欧亚内陆地形的特点与游牧民族迁徙的关系，以及这种迁徙对世界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他指出，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草原的地势很低，越过它几乎没有困难，所以“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尔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①。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自古以来活跃在北部的游牧民族，由于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与改变，由于内外政治因素的干扰与影响，在不得不作举族迁徙时，大多被西部开阔平坦的草原所吸引，向西经过中亚北部地区，沿里海、高加索、黑海北岸，闯入欧洲平原，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历史。也正是这一股股自东向西，呈波浪状连续迁徙的游牧民族震荡并连接着东西两端的文明，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很早就走上世界，在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交往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里将要叙述的几个西迁游牧民族，由于其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邻或交错杂处的居住活动地域，相近甚至相同的语言及风俗习惯，尤其是其历史活动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和长期性（如有关乌孙活动的记载直到《辽史》、《元史》中还可以见到），使我们难以将它们断然分离割裂开，只能根据所述民族各自在历史上的主要活动时间和与本书写作宗旨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加以分段叙述，以求在一个粗线条轮廓下，较明晰地看出他们活

---

① ［英］哈·麦金德著，陈江等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53—54 页。

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与中西交通这一问题之关系。

第一节　塞人，早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者

公元前7世纪以降，在当时的文明古国希腊、波斯和中国周围，在从欧洲东部到亚洲中部、西北部的辽阔草原、半沙漠和山前地带，散居着许许多多独立的游牧部落，它们在古波斯文献中被称为“萨迦人”(Sacar)，印度人同此称呼；古希腊、罗马作家称他们为西叙亚人，或译作斯基泰人(Scythia)。斯特拉波指出：“大部分西叙亚人，甚至全部西叙亚人，都是游牧民。”“从里海开始，大量的西叙亚人被称作达伊人，居住在东部的部族称马萨该特人和萨迦人，他们统称西叙亚人。但每一个部族有自己单独的名称。”①希罗多德则具体描述了欧亚草原自西向东游牧民族的分布情况，其中提到南俄罗斯草原以东，里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分布在吉尔吉斯草原至锡尔河下游之间的奄蔡人以及天山附近的伊塞顿人。伊塞顿人大约就是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这里汉代曾经是乌孙国居地。《汉书·西域传》乌孙条记，乌孙称自己的居地原是“塞地”，即塞人游牧区。塞人的首领为“塞王”，按族类则称之为塞种。“塞”古读音(Sak)恰同“萨迦”，近人也有译作“塞克”或“萨基”者，苏联考古学界则多以“早期游牧民”称呼这诸多的游牧民族，而不问是否斯

---

① 斯特拉波：《地理书》，转引自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стр145.（《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45页）

基泰、萨迦，还是塞克①。因为严格来说，塞人确切的种族起源和部族构成至今尚不清楚，学术界也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不过我们起码知道，塞人是一支东起中国蒙古草原，西至欧亚大陆之间，来去倏忽、庞大而强悍的古代游牧民族。有学者考察说，四千二百年前，由于气候异常，导致黑海、里海低地发生海侵，塞人被迫迁出西徐亚陆台和黑海、里海低地。从那时起，“自由的西徐亚人”足迹遍及包括西域在内的欧亚草原。他们在西域建立了若干“行国”和“城邦国”②。塞人以自己特有的整个民族结构和形式，从事着早期的历史交往。“这种历史交往使它扮演了双重的历史角色：它既是早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侵袭者和劫掠者；又是两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早期东西交通的开拓者。塞人的活动是古代世界历史交往的一个缩影。”③

就中亚地区而言，按照大流士纳黑希鲁斯塔姆楔形文字石刻（在波斯波利斯附近）所记载，塞种部落联盟被分作三个集团：即哈依玛瓦加萨迦人，意为带着所崇拜植物叶子的萨迦人，或译为牧地塞人，分布在费尔干纳盆地及帕米尔、阿赖岭等地；塔拉达拉亚萨迦人，意为海那边（海外的、河那边、水边的）萨迦人，分布于咸海以东、阿姆河以北，索格底亚那地区（有人说他们是玛撒该塔伊人，意指大的萨迦族）；吉格拉哈依达萨迦人，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分布于吉尔吉斯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山地和草原地带，包括天山

---

① ［俄］费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81 年版，第 19 页。

② 曾宪法：《先秦时期塞种人之族源及其东渐问题》，《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

③ 彭树智：《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1 期。

以北，巴尔哈什湖以东以南及西南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①。另一个论及塞人的重要史料是记载大流士战功的贝希斯敦铭文。铭文第五段（二十至三十行）写道："大流士大帝说，我和塞人的军队一起到了海那边塞人的国家，这里的人们戴着尖帽子。我们在靠近海的地方通过一座浮桥来到这个国家，击溃了塞人，俘虏了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人投降了我。"②大流士任命一个部下为他统治萨迦部落，在被缚送的九个被俘首领中，最后一个人头戴尖顶帽子，也许就是铭文中提到的那个斯昆哈。贝希斯敦铭文上方的浮雕中，这个塞人首领戴尖顶帽，穿拖至膝盖的短袖男长衣，右侧挂着短剑，左侧挂着斧钺，这正可与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塞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③互为印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观察波斯波利斯浮雕上塞人的相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人种的特征："扁平的脸，楔状的稀疏的胡子，窄眼眶。"④苏联学者注意到，距阿拉木图五十公里阿拉套山谷中的一座伊塞克墓地，墓主是公元前5—前4世纪的一位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年，欧罗巴人种的脸上掺杂着某些蒙古人种的特征。另外在伊塞克湖地区一座塞种时期的贵族墓中，找到一尖

---

① 参考 К. А. Акишев, Г. А. Кушаев.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долины реки Или.（《伊犁河谷古塞人和乌孙人的古文化》，阿拉木图1963年出版，第1章）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1—192页。

③ 希罗多德著，王敦书编译：《历史》第7卷64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下册，第494页。

④ К. А. 阿吉谢夫、Г. А. 库沙耶夫：《伊犁河谷古塞人和乌孙人的古文化》，阿拉木图1963年版，第1章。

顶帽①。说明贝希斯敦浮雕上被画上蒙古人种特点的塞人是属于居住在天山周围地区、七河流域的吉格拉哈依达萨迦人集团，他们和蒙古人种居地相邻，早有交往，无疑导致了中亚北部地区早期的种族混合和人种的蒙古化过程，使一些东方蒙古人种的邻居，如前面提到的伊塞顿人及后来的月氏人、乌孙人等加入了他们的集团。而在阿姆河出土的塞人战士的金箔画像上，看到的则是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点：长脸，高挺的鼻子，直眼眶（这是东伊朗人种的粟特人，中亚古老的欧罗巴居民）②。按照汉籍记载，塞人乃先秦时期世代居住在敦煌附近的允姓之戎，后“为月氏所迫，遂往葱岭南奔”③，并在兴都库什山和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地区）河谷一带，建成塞人的三个国家：罽宾、休循和捐毒，希腊史家把这些人叫“印度赛西安人”④。关于塞人南迁的情况，汉文史料语焉不详。斯特拉波著述中提到的萨迦苏卡伊人，一般认为即指这些南迁的塞人。他们南迁时先入罽宾（克什米尔谷地），然后渐渐扩展到犍陀罗地区，最后定居于旁遮普的各小邦内，如呾叉始罗与马士腊。而我认为，早期塞人的迁徙活动绝不会仅沿一条路线进行。美国学者赖斯在其《中亚古代艺术》一书中就曾这样描述：“在阿赫明尼德王朝时期，亚洲平原的中部大都被塞种部落所控制。他们据信是从突厥斯坦的极东部、西藏和天山迁到那里来的。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突厥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стр145\151.（《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45、151页）

② K. A. 阿吉谢夫、Г. A. 库沙耶夫：《伊犁河谷古塞人和乌孙人的古文化》，阿拉木图1963年版，第1章。

③ （唐）道宣：《广弘明集》，引荀济上梁武帝萧衍：《论佛教表》，自谓引之《汉书·西域传》，但今本《汉书》中不见。

④ B. B.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Т. Ⅱ. Ч. Ⅰ. 1964 г. стр297.（[俄]B. B. 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七河简史》，莫斯科1964年版，第297页）

人的先驱者。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故乡后向西迁往今阿富汗与波斯之地，直到公元8世纪时才达到乌拉尔山山麓，然后他们从巴尔喀什湖分出，出现于阿尔泰，并随即在今吉尔吉斯之地建立大本营。”①尽管赖斯所述未见得就完全符合事实，但他起码反映出塞人迁徙的多路线、多区域和长期性的特点。

从中外史料反映的情况看，塞人很早就参与过西亚的历史活动。他们不止一次地介入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斗争。早在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形成之前，就有关于他们和米底人交战的报道。在征服米底人后，波斯王吉尔二世发起向塞人的进军，俘虏了塞王阿莫尔加。但塞王的妻子斯班列拉集合起大量军队，击败波斯人，解救了自己的丈夫，迫使吉尔与塞人结成联盟。在军事进攻中，塞人妇女常常帮助自己的丈夫，有时甚至率领军队。见于记载的著名女塞王就有三位。如在塞人—米底人的战斗中，塞人的首领是女王札丽拉。史料报道说，她亲自参加战斗，并征服了邻国。在她死后，修建了上面竖有她雕像的纪念塔。似乎就是她，还领导部民从事农业生产，修筑了“不少的城市”②。波斯之居鲁士大帝也正是在与塞人马萨该达人③作战中死于一位女王之手。据此可见，马萨该达人牢固地保持着母权制的残余，妇女享有特殊的荣誉和尊敬，希罗多德说“那里的妇女和男子享有同等地位”。加富罗夫认为马

---

① 转引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②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145-146.（《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45—146页）

③ 马萨该达人，古希腊罗马作家提到过，在里海以东和乌拉尔附近的马萨该达人（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已分布在北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控制了西北突厥斯坦直到公元前2世纪。马萨该达人部落联盟是中亚西叙亚—塞人居民的一部分，色诺芬直接称他们为塞人。参见[俄]П. Г. 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萨该达在中国史料中以大月氏一名著称①。公元前8世纪，一部分世居中亚北部的塞人，在同样操北伊朗语的萨尔马提人②的压力下，从中亚西北部迁往黑海西北，并在公元前6世纪与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因此古典作家们曾从黑海北岸希腊殖民者③那里获得许多有关北土耳其斯坦古代塞人的知识。而居住在我国河西地区的塞人为当时强大的秦国所迫，不得不沿天山南北麓西行，逐渐散居到伊犁河谷、楚河河谷、锡尔河流域并更向西去。于是东起黄河流域，经蒙古草原，过阿尔泰山，沿天山北麓，通向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草原的道路，因遍居在黑海北岸、里海周围直至锡尔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斯基泰游牧民而显得方便通畅。这批早期游牧民充当了东西商业贸易的中介者。他们驱赶着自己大群的驼、马、牛、驴长途运载沉重的货物，穿过极其辽阔而又无国界的草原谷地，以其独特的游牧方式将古老文明的中国与波斯、与希腊城邦联结了起来。而截止目前在新疆伊犁地区、中亚北部七河地区、阿尔泰地区以及蒙古草原地区发现的塞人文化古迹，已为我们初步勾画出一幅鲜为人知的塞人物质文化的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65.（《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第65页）

② 萨尔马提或译萨尔马希安，为古代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原先游牧于中亚北部，约于公元前2或前1世纪西迁，逐走西徐亚人，而分布于里海至黑海间。据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第110—117节所说，他们居住在今顿河以东地区，在萨尔马提人中，包括马萨该特和阿兰等部。

③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历史上的一项重大运动是各城邦的对外移民。当时黑海沿岸就是希腊向东方的移民区之一。最初的移民是农业性质，以后随着贸易交换关系的发展，建立商业据点的需要，移民才日渐具有工商业性质。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有些移民城邦也成为希腊世界的最重要工商业中心。希腊移民城邦在客观上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尤为深远的影响是通过移民运动，希腊和海外各地的贸易联系加强了，各城邦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扩大了。

情景，以及他们与邻近甚至边远地区的密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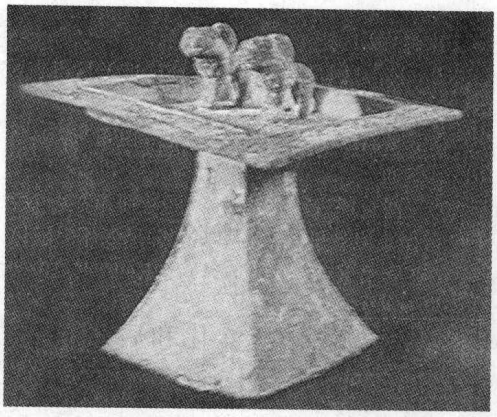
图版3　新疆境内出土的古塞人干尸

资料来源：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目前我国新疆地区可以判定属于塞人文化的考古材料主要有两批。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伊犁地区特克斯和新源县发掘的部分墓葬，以及在此之前昭苏发掘的部分墓葬；二是尼勒克县古铜矿及伊犁地区出土的有关铜器。1983年新源七十一团在基建时挖出的六件铜器中，有一铜武士"造型凝重，肌腱发达，头戴尖顶大沿帽，帽尖上铸一尖刺弯勾，双手空握执物，唯物已失，双腿一跪一蹲，重三公斤，高四十厘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铜器珍品，对认识当时塞人的形象特征和衣冠服饰具有重要意义"①。其他器物，如喇叭高足承兽铜盘、对兽铜件、三足铜锅等，在苏联中亚地区都曾有过出土，被认为是塞人文化遗物。

① 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图版 4　新疆新源县出土的战国塞人铜武士像



图版 5　具有塞人文化风格的承兽铜盘(天山阿拉沟出土,战国—汉)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1976—1978 年配合南疆铁路建设,在天山东部阿拉沟曾发掘了竖穴木椁墓七座,出土的文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其中铜器方座的同类物件在中亚地区也曾出土多件,细部特征有异同,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被认为是拜火教的祭祀台,这是塞人文化中的典型器物①。被认为是塞人文化遗物的还有虎纹圆金牌,据到过伊朗的同志说,曾在那里见到它的同样物②。墓中还出土有中原的漆器和丝织物(菱纹链式罗)。而尼勒克奴拉赛铜矿出土的平衡石锤的造型与湖北大冶铜绿山所见的石器造型一样③。它们反映出伊犁地区这支塞人的历史文化不仅与中亚而且与我国中原地区也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

① [俄]A. H. 伯恩斯坦:《谢米列契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基本阶段》,《苏联考古学》1949 年第 11 期。

②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③ 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

中亚北部谢米列契地区(即七河地区),从楚河河谷到塔拉斯河谷的山前地带曾发掘出大量青铜时代的塞人古墓,其文化承前西叙亚时代卡拉苏克文化,并夹带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残迹。按照弗鲁姆金在《苏联中亚考古》中所说:"公元前第二至一千年,哈萨克草原和邻近咸海地区的古代居民,在北方游牧民的压力下撤向南部,这便导致一次人口大流动和种族混合,因此青铜时代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后期的卡拉苏克型文化,遍及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在吉尔吉斯,这种文化受到来自中国和南西伯利亚的影响,主要发现于楚河和怛逻斯河流域。"①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楚河地区文化遗址上找到的中国西周式的曲柄刀,以及类似西周"鼎"和"釜"的祭祀器物——煮食品的锅。这些祭祀器物常常用西叙亚风格的野兽格斗画加以装饰,于是在形制和装饰的艺术手法上表现出中原汉文化与塞人文化的混合②。

说到西叙亚风格的动物饰纹,这一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精彩、独特、极富表现力的艺术,在中国北方、蒙古、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很早就引起了考古学者和艺术史家们的注意。起初它是以黑海北岸斯基泰部落带有独特风格的装饰艺术"斯基泰野兽纹"之名而著称的,后来表现为以阿姆河宝藏为代表的萨迦部落艺术进一步为人们所注意,最后在南西伯利亚诸部落地区(包括阿尔泰边区)也找到了这种独特艺术的

---

① [俄]费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版,第20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104-106.(《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104—106页)

大量珍品，被称作“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饰纹”①。这一装饰艺术的动物造型主要是复制野兽和当地特有动物的形象，也常有神幻动物的形象，它们或是当地独创的主题，或是承袭西亚的主题，如狮身有翼人兽和半鹰半狮兽。而造型结构亦是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单兽、斗兽或狩猎场面，动物形象接近写实。在楚河地区苏库鲁克城找到一块很有趣的铜牌，属于塞人的文化遗存，牌子边缘绕以光滑平整的装饰带，接头处有两只相对的猛兽头（雪豹或豹），而带子本身像是模仿两只猛兽的躯体，牌子扣环的中央刻有两只浮雕狮像，也表现得极为生动②。我们知道塞人艺术的典型特点就是以动物图案装饰刀具、带钩、铜镜、饰牌等，图案的主题往往表现为各类动物及它们之间的搏斗，被称为“野兽体裁”，或曰“动物饰纹”。在苏库鲁克城附近还找到一个用长十七厘米的兽角做成的张嘴猛兽头像，用类似的物品作为护身符，这在乌拉尔地区的萨尔马特人当中是很流行的。另外，在伊塞克湖东岸，丢普斯克墓葬中找到的环形青铜小牌，上面画有奔跑的公山羊和其他猛兽。而伊塞克湖周围地区，不少岩画上也有表现塞人动物艺术风格的画。在天山中部地区拿勒河谷找到一个长方形祭台，台上安有二十二个走兽（虎?）的塑雕，这是在吉尔吉斯发现的所有祭台中最好的一个，在

---

① 动物艺术一般就以斯基泰艺术为代表，或称为“动物风格的艺术”和“野兽纹艺术”，这种艺术初见于公元前8—前6世纪，繁荣于公元前6—前4世纪，到公元前3—前2世纪时渐趋衰落，其特点是用动物的形象来装饰各种用品，典型地表现了早期游牧人的审美观念。彼得大帝也曾收集到一批阿尔泰—西伯利亚古物，约在公元前6—前2世纪之间，表现出动物风格艺术。它们是从17世纪上半叶时起，贫困的哥萨克人在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地区盗挖古墓，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宝物。彼得大帝的朋友，荷兰学者威特森敦促彼得大帝征集并收入爱尔米塔日博物馆，但由于出土情况未作记录，故科学价值不高。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108.（《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108页）

小拿勒河谷还找到一枚上面刻有牦牛的金牌①。所有这些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做成的表现动物艺术风格的制品便是斯基泰装饰艺术在七河地区的反映，说明这一地区早自塞种文化起，就好似一个各民族文化的温床，接纳并养育了来自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并且作为与南部绿洲文化的接触地带，无疑会缩短这两类文化的接触距离，有益于它们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七河地区的这一特点在以后的东西文化交流中时常表现出来。

与塞种文化同时期存在于南西伯利亚的是塔加尔文化，其特点之一也是动物风格艺术。嗣后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迈埃米尔文化②，表现出当地又一次接纳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所以在其文化艺术中（如铜镜的缘饰）出现了中国龙的形象和源自华北的卷涡纹，说明当时中国北部与蒙古草原、萨颜岭地区以及阿尔泰、额尔齐斯河流域不仅存在着人种的混合，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不乏联系与交往。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饰纹起源也很早，可以上溯到晚商时期。如商周时期的兽头刀和短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兽头形饰、动物纹饰牌、伏卧形虎纹饰牌和长方型透雕铜饰牌等③。这些丰富多彩的动物造型饰牌和多种题材的动物图纹，是中国北方民族特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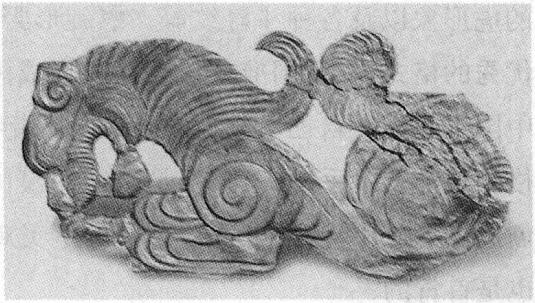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150-153.（《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50—153页）

② 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历史纲要》将阿尔泰地区发现的游牧人墓葬分为三个时期：迈埃米尔时期（公元前7—前5世纪）；巴泽雷克时期（公元前5—前3世纪）和希伯时期（公元前2—公元1世纪）。（见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历史纲要》，1953年莫斯科版，第61—62页）

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82页。

艺术风格，也是草原诸部落一脉相传，自成体系的艺术。它的产生与发展仰赖当地游牧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积极创造，而并非像一些外国学者强调的与斯基泰—西伯利亚兽纹有着起源上的承续关系①。其实，动物纹艺术为古代整个欧亚草原所盛行，是斯基泰、塞人、月氏、乌孙、匈奴等广大游牧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基于民族和地理上的差异，在欧亚草原考古文化中，草原动物纹艺术形成了“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中国北方草原动物纹”、“巴泽雷克兽形纹”、“大县黄金宝藏中的动物纹”等典型类型②。不过由于处在草原地带这一相同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各种动物纹类型中又在思想意识和艺术形式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同时伴随民族迁移和交往的发展，这些不同的动物纹类型之间逐步发生了相互影响和交流。大约到了春秋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动物纹造型艺术才明显地吸收了斯基泰式野兽纹的某些题材，如屈足鹿、狮身鹰头兽、后截躯体扭转兽，袭击幻性野兽



图版 6　天山阿拉沟出土的虎形圆金牌(战国—汉)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① 参见 C. И.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M. 罗斯托夫捷夫：《俄罗斯南部和中国的野兽饰纹》及《中亚细亚、俄罗斯、中国的野兽纹》，1929 年出版；A. 萨尔蒙鲁：《芦芹斋的收藏品中的中国—西伯利亚的艺术》，1933 年出版。

② 参考吴研春：《古代亚欧大陆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 期)和《草原动物纹艺术产生的思想根源和文化背景》(《新疆艺术》1998 年第 1 期)等文。

的虎形象以及各种斗兽纹等。螺旋形野兽纹是斯基泰动物纹中最优秀的格式，在我国准葛尔旗西沟畔战国晚期墓中有它的仿制物。中国工匠们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中，借鉴并吸收了斯基泰动物风格的装饰艺术手法，但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予以适当的改造和创造性的应用，使之更适合自己的审美观念，这一点就连俄国学者也是首肯的①。

从塞人的物质文化遗迹来看，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区及阿尔泰山地区受到古代东方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汉族文化的影响比中亚南部更加明显，这应该是反映出它们之间联系的亲疏程度有所不同。在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和乌拉干河（巴泽雷克遗址，1929年发现）等流域发现一批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部落贵族首领的石顶巨墓。特殊的自然条件和造墓技术使墓土封冻得很结实，墓中很好地保存了中国的丝织品和玉器、漆器、金器、青铜器等及其他物品，其中还有不少内地的高级丝织品，以及用大量的捻股细丝线织成的普通平纹织物。这些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一铺盖在皮衣服上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泽雷克三号墓出土的一块花纹丝织物，其制作技术和图案都显得极为突出。织物每平方厘米有18×24支纱，由一经两纬组成，红绿相间，上下相反，斜纹交织，相映成辉。还有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的茧绸，是一块鞍褥面，制作精致，每平方厘米竟达40×52支纱，宽约四十三厘米，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中，凤凰的飞栖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赋有极强的表现力和优美的色调。已故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这类丝织品是中国制造的，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供最富有的人们，特别是供公主下嫁时用的。刺绣的凤凰题材象征着宫廷的昌盛。同墓出土的还有中国秦式镜（白色金属镜，直径为 11.5 厘米，素卷边。镜背有“羽状”地纹，其上沿边缘有四个“山”字形雕饰，约属公元前 4 世纪）和西亚生产的织物——羊毛绒毯和非常细密的羊毛织品，表现出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的艺术风格。仍在这座五号墓中，发现了当地独一无二的一辆古代马车。马车系由车厢和四个多辐的车轮构成，轮高 1.5 米，车厢上设有座位，上方有篷，车前有辕有轭，可以同时套四匹马。从车的形制来看，显然来自中国，有可能是中国皇帝在公主下嫁某个阿尔泰部落首领时赐予的①。若如是，早在公元前 5 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中原汉民族与境外游牧民族之间的联姻，而这种婚姻关系中特别有意义的应是双方互赠礼品。中国朝廷送去的是丝织品、青铜制品及各种食物；游牧部落首领则以马匹回赠，于是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方式，两种物质文化就通过这种关系得以密切地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对双方都是有利，受到双方欢迎的。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青铜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东起中国蒙古草原，西至欧亚大陆，表现出草原文化的很大统一性和向农业文化区域传播的流动性。此时游牧世界的许多文化特征趋于一致，而农业定居地区的文化艺术深受其影响。我们认为在这场早期的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接触传播中，是一大批从顿河到阿尔泰山商路所经过的草原走廊上来去倏忽的塞种游牧民，充当了早期的文化传播者和东西陆路交通的开拓者。继而，匈奴等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西迁运动又更加推动了这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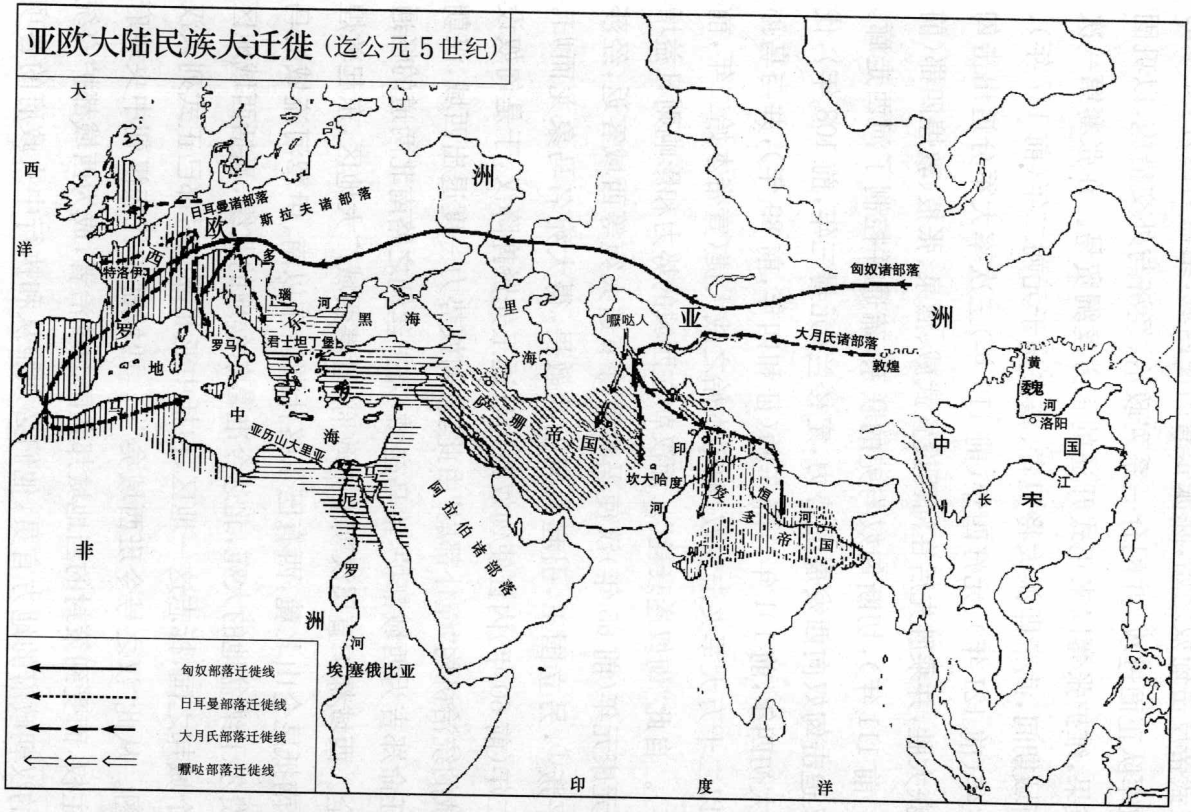
---

① 参考 А. Л. Монгайт, Археология в СССР. Изд. АН СССР. М. 1955г.（А. Л.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5 年版）

化的交流与传播。

第二节　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远自夏商以来，大漠南北曾先后出现过被称作鬼方、荤粥、猃狁和戎、狄等族，它们经过长期的聚散融合，直到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才以“匈奴”这个名称登上了历史舞台。初游牧于黄河河套及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匈奴与中原接触较前频繁，在交往中多受汉文化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起来。冒顿单于时期（前209—前174年）先后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北服丁零、浑庾，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此后便不断南向中原推进，连年入寇汉朝边境，对初建的西汉政权构成最大的威胁。汉初，国力孱弱，不足以抗御匈奴，故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单于，岁给大量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继位（前140年），中央政权在取得一系列斗争胜利后获得巩固，封建经济蒸蒸日上，于是才正面展开对匈奴侵扰的反击。汉武帝采取的办法是，军事出击和外交结盟相配合，争取受匈奴政权压迫的民族和地区，包括匈奴属部的支持，采取联合行动，以达到孤立匈奴，消灭其有生力量的目的。于是便有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壮举，并以“凿空”之美誉载入中西交通史册。



地图5 5世纪以前亚欧民族大迁徙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地图》，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始，除派张骞出使西域，结盟与国外，更多的是采取军队正面进攻，并配合一系列政治、经济与外交措施，以巩固斗争成果，维护张骞以来正式开通的官方丝绸贸易。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期间，武帝即派大将卫青、霍去病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元狩二年（前121年）、元狩四年（前119年）三次率大军分道出击匈奴，均获大胜，并乘胜先后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前121年、前111年），切断匈奴与羌的联系，疏通并控制了河西走廊。此后又追击匈奴向西发展的势力，定楼兰（元封三年，前108年），伐大宛（太初四年，前101年），降车师（征和四年，前89年），并与乌孙联合，以二十万大军夹击匈奴，取得本始之战大捷（宣帝本始二年，前101年）。自此“匈奴遂衰耗”。而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和影响则日益增长，如元康元年（前65年）汉使冯奉世持节送大宛等西域客返，经莎车时平叛①，另立国王，引起大宛王的敬畏，得大宛名马象龙而归。神爵二年（前60年）内讧使匈奴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于是匈奴设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势力一度退出西域，汉朝政府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乌垒城，兼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畅通与安全。西域都护直属汉朝中央政府，管辖西域广大地区，东起敦煌以西，南抵昆仑山北麓，西有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北达今准葛尔盆地的北缘，囊括西域地区五十个城邦之国，标志这一地区，包括中亚北部此时都已正式列入汉朝版图。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②。西域都护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主权，而受到策封的当地城邦各国的统治者，成为西域都护府统帅下的汉朝政府的地方官员，他们必须服从和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

---

① 指莎车的呼屠征与旁国共杀王万年和汉朝的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并攻击南道。

② 本段内容主要参见《汉书》卷96，《西域传》。

政令，送质子入侍中央。西域都护府既然是汉朝政府设置在西域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构，就有权指挥和调遣本地的各族军队，镇叛安乱和调解边疆各民族内部及相互间的矛盾与纠纷，维护西北地区与内地的统一。如第一任都护郑吉就曾干预和排解过乌孙内部纠纷；汉元帝时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曾征调西域十五处兵马打败盘踞在塔拉斯河地区的郅支单于；东汉初年，都护班超率西域各地军队粉碎了割据北疆地区的匈奴呼衍王，迫其遁走远徙等，而这种统一化的、强有力的行政管辖，必然使丝路交通更加通畅，更加有利于东西经济文化的交融与传播。

早在西域都护设置之前，汉朝政府就十分重视对丝路通道的保护和管理，不断修整和延建万里长城，沿途列"亭障"，起"烽燧"，确保丝路上往来使者、商贾们的食宿和安全。此外，汉朝政府在伐大宛取胜之后，初设西域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尔勒西南）屯田。"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①以后历届都护都能不懈地组织和管理屯田，以供来往使者和中外商人，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方便。诸如汉昭帝时期获得成功的伊循屯田；公元前68年开始的郑吉、司马熹等人的渠犁屯田；大致与此同时的常惠、辛庆忌等人在乌孙赤谷城的屯田等。这些散布在多处屯田点上的农业生产活动势必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水利灌溉设施、良种和田间管理方法等带往西域。如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乌孙赤谷城，使原来"不田作种树"（树当植）的乌孙地区开始出现了农业；大宛本不知穿井术，后"宛城新得

① 参见《汉书》卷96，《西域传》。

秦人知穿井术”，均说明屯田之社会效用不仅仅是满足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它使得西域人民“得汉巧”，大大改变了游牧民原来单一的生产方式，丰富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考古材料提供了具体说明。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伊塞克湖东岸和谢米列契地区发现多处乌孙人的村落和古墓，遗址中找到大量的石锄、镰刀和石碾。在村庄周围发现有灌溉沟渠的痕迹，以及从远古时期起就被耕种过的小块土地。在古迹文化层中还找到大量的日用陶器、陶纺锤、网坠、骨制品、家畜残骨、备用石料等，甚至还发现有粮窖①，无疑反映出部分乌孙人此时已过定居生活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应该是中原汉族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

作为通例，游牧和农业两种生产方式之间始终存在着经济交流、互通有无的问题。游牧社会既然不能生产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全部必需品，就必须通过战争掠夺和交易互换两种方式从农业区取得他们所需的粮食、衣着和工具等许多手工产品，如匈奴“嗜汉财物”，喜欢汉朝的“絮缯酒米食物”，而汉朝方面又何尝不嗜匈奴财物呢？“赢驴驼驼”，“骅骝骟骊马”②对汉代经济来说同样是必需和有益的。所以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结成一种相互补充和调剂的依存关系，边疆依赖中原，中原有求于边疆，其中经济上的联系又是其他一切关系的根结所在，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西北地区众多的游牧民族总和中原汉族政权结下不解之缘的主要原因。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矛盾构成中国古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стр147-148.（《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出版，第147—148页）

② （汉）桓宽：《盐铁论·力耕》。

代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对于汉族人民来说，陆续大批输入的牲畜和畜产品，是对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有力支持，直接为运输和农耕提供了动力。骡、驴等新畜种的引进，“既杂胡种，马乃益壮”①，促进了农业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匈奴人金日磾为汉朝政府养马，“马肥好”，武帝为之奇异，擢升他为马监，这可谓是匈奴人传授养马术的典型事例②。游牧民族通过互市和贡纳运入中原地区的大批牲畜中，最大量的是马。马在古代是重要的军用物资，马之多少，即兵之强弱，故历代中原王朝无不注意开展同游牧民族地区之间的市马贸易。成书于战国时的《逸周书》即谈到大夏、莎车等地以骆驼、骣骝（野马）、騠（骡）等输向内地。西汉武帝素来爱马，《汉书·张骞传》曰：“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大）宛马曰‘天马’云。”武帝为得汗血马，不惜消费亿万，两次出师大宛，取胜之后，亲自作“天马之歌”以言志。非武帝怪癖，实乃看到马在经济、军事上所具有的战略重要性。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曾就这一问题较为详尽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宛马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张骞的注意，博得武帝的偏爱，是因为这是一种优良的大品种战马，用处特别大，尤其是当匈奴人从月氏人中导入了“铁骑”的技术之后更为如此。匈奴人用这种挂甲的战马来补充他们善于奔驰的轻骑马，大宛的这种汗血马比汉族或蒙古人地区的那种小马更善于运载全副披挂的重骑兵。另外当时人们尚不懂得为战马钉铁掌，在戈壁百战中，马蹄磨损严重，影响战斗力，而“天马”是山马，蹄脚坚硬，磨损较慢，人们称之为“日行千里驹”，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② 《汉书》卷68，《金日磾传》。

所以这种马对于在与宿敌匈奴人不断征战中损失了大批战马，急需以良种马补充军马的汉朝政府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①。苏联学者 Ю. А. 札德列勃夫斯克所著《费尔干纳的古代农业文化》在对楚河地区乌孙古墓中找到的大量马的遗骨进行古动物学研究，并参照了乌孙墓中出土的金牌饰件上马的形象后认为，乌孙马与较早的欧亚大陆马的区别在于它有强壮沉重的身躯，发达的胸脯，粗壮的脖子和硕大的头，“乌孙马以速度快和坚忍耐劳而区别于其他马，这类马带有十分发达有力的蹄和宽胸脯的外形是从山东汉代浅浮雕的中国造型艺术中以及唐宋时期的钱币上得知的”②。而“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专家都一致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和之后的两个时代的造型艺术中，对中国马匹的描绘截然不同”③，说明游牧民族输入的良种马对中原农业文化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是应该加以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由于农业经济是一种比游牧经济更为健全、发达的经济方式，所以比较而言，北方游牧民族更多地从汉族农业地区获得了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吸取了汉族人民先进生产技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在西迁之前，曾游牧于大漠南北，或居河西走廊、阿尔泰山西部至天山东段，有的与中国北境、西北境壤地相接，有的因各种原因被安置入居汉地，与汉族人民杂居错处，久而久之，势必大量染濡汉文化。如南匈奴内附汉廷后，所领八部牧民分布在当时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各郡，

---

① [法]L. 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 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61.（《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61 页）

③ 同上注①，第 27 页。

即今陇东、内蒙古河套，沿旧长城以北及晋北、冀北一带。八部中吸引了许多汉人，他们把汉族文化传授给匈奴，并为之作谋士，有如郭衡为单于比绘画地图及奉献地图①。类似情况在早期汉匈关系史上已经出现。大抵自战国以来，汉人进入匈奴地区的不少，秦时更多，故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谓秦时逃入匈奴者，今其子孙仍称"秦人"。王国维曾研究过一块匈奴相邦玉印，认为它的形制和文字都很像先秦古钤②。可见匈奴人很早就知道一点中原的文物制度，并加以效仿。老上单于时，勉从帝命送和亲公主去匈奴的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的官员"疏记"，将当时比较先进的计算和登记方法传给他们③。而在汉朝居官多年，汉化很深的长水胡人卫律④出使匈奴后降，也曾将自己从汉人那里学会的筑城、凿井、治楼以藏谷等方法传教给匈奴⑤，这些无疑对匈奴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汉匈关系中最具社会进步意义的还是经济上的联系。自冒顿单于以来，匈奴人乐与汉人互通关市。通过关市，匈奴从汉族地区换得不少衣食物品和金属器具，特别是丝绸和铜。关市吸引着匈奴的上上下下，使其"自单于以下皆和亲，往来长城下"⑥。在日后汉匈之间发生长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匈奴仍然不愿放弃关市，就是因为其社会本身的迫切需要。除关市以外，汉匈和亲更是造成了一种经济文化交流的社会效果。伴随着汉公主下嫁匈奴单于的是，年年奉送絮、缯、酒、米、秫、金帛、丝絮等财物，

---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

② 参考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匈奴相邦印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册。

③ 同上注①。

④ 其父为长水地方的匈奴人。曾与协律都尉李延年为友，李被诛后，恐受株连而逃匈奴，被封丁令王。

⑤ 同上注①。

⑥ 同上注①。

而匈奴单于、太子、大臣、使节、居次等也不断入汉，或奉献珍宝，或入侍汉帝。他们居住在汉宫或长安蕖街①，受汉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所以自武帝以后，愈来愈多的匈奴人倾向与汉朝恢复和亲，并不断有大批王、侯率其部属投归汉朝②。汉帝每每诏赐单于、驸马、王侯贵官的物资也极其丰富，品种繁多，如冠带、衣囊、黄金、玺、盩绶、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剑、弓箭、乐器、鼓舞、棨戟③、甲兵等，甚至有南方的龙眼、荔枝、橙橘等。于是更加深了汉匈两族在经济、文化、语言、习俗、服饰等方面的交流和影响。上述汉文化给匈奴以长期、强烈的影响还可以从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如1922年苏联考古学家科兹洛夫领导的“蒙古西藏考察团”在蒙古乌兰巴托以北哈拉河畔的诺颜山发现的一些匈奴墓，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一些匈奴古墓中有丰富的丝、毛织物、青铜、铁器、漆器、玉器，还有中国华盖、青铜镜、各种服饰、马具等，其中的丝绢，按其纹样及织法显系中国内地产品，有的织上了“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的词句，一个漆杯的底部刻有“建平五年”(即元寿元年)和“上林”的汉字铭文。墓中为椁棺、椁三重的所谓“国君三重”的棺材。马长寿先生认为此墓应是匈奴乌珠留若提鞮单于(名囊知牙师，公元前13—8年在位)之墓。1928年和1929年在恰克图附近发现的匈奴墓中，也有不少中国的丝织品、铜镜、漆器、玉器等，它们大多是中国皇帝赐给匈奴单于的。1940年在苏联阿巴干城以南八公里处发现一座中国式的瓦顶房屋，找到的瓦当

---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

② 参见《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书》卷8，《宣帝纪》；《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汉书》卷94上，《匈奴传》。

③ 古时官吏出行的一种仪仗，用木头做成，状如戟。

上刻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的隶书铭文，其他器物均为中国或匈奴制造①。岑仲勉先生认为这座房屋有可能是丁零王卫律的宫殿。

我们不厌其烦地叙述汉文化对匈奴的长期影响，目的在于说明，正是因为匈奴居于大漠南北、新疆东北部时已多习染汉文化，所以匈奴衰败后不断西迁的残部，就会自然而然地将汉文化的影响带往西方，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起到中介作用。公元1世纪中叶，以郅支单于为首的一股匈奴势力侵入天山中部以西，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加强了中国文化对七河地区的影响以及东西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流。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认为，在塔拉斯、楚河地区、费尔干纳、中部天山、阿赖山脉和南部阿尔泰地区的古墓发掘中，多有匈奴遗物，其中亦不乏中国制品。墓中所出的毁形头骨和墓穴的形制乃是匈奴的特征。这种习俗②后来进一步传入欧洲③。反之，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不断通过匈奴传入东方。如科兹洛夫考察队在漠北找到的匈奴酋长古墓中，发现多种艺术品，上面的装饰与中亚及南俄罗斯境内伊兰游牧人所通行的图案相同。墓中还出土有希腊式刺绣图案的丝织品。《中亚古国史》的作者麦高文

---

① 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69—74页；《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李逸友：《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等。

② 这是一种使颅骨人工变形的游牧民族的习俗。往往从孩童时代起就用绷带挤压，缠住头部，造成额头、头顶狭窄，并向后倾斜。这种习俗不仅仅是区别民族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成为胜利者对于被战胜者的社会地位优越的标志。考古发现七河地区古墓中的变形颅骨是欧亚民族中最为古老的。苏联学者认为这种较晚时代仍为人们所知的习俗（土库曼人在不久前还保留着它）是源于东方，极可能是出自北匈奴。[见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1950г. стр60.（《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第60页）]

③ 参见[俄]费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版，第21页；《苏联考古资料与研究》第14辑，第60、145页等文。

认为，这是“从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通过中央亚细亚而东传的”①。近人有提出，在陈汤、甘延寿与郅支单于交战时，曾俘虏了一百多名罗马士兵，他们有可能是卡尔莱战役（克拉苏败于安息之战）之后的幸存者。因为据说当时被俘的一万多名罗马士兵中有一些被安息人流放到了帝国的东部边缘地区，后来这些人又在距他们失败地区六千多公里的地方替匈奴人守护一座城池（郅支城?）以防御汉人。郅支败后，他们再次被俘，而且是被汉人所俘，最后在中国边塞地区建立了一个小城池来安置他们。《汉书·地理志》记，在甘肃今永昌县以南有一座小城名犁靬②。如若是，他们将是一批希腊文化的携带者，势必在西方文化东传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布尔努瓦说：“由于他们精通两种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而使他们的新主子目瞪口呆，这两种军事艺术就是修建坚强的城堡垣垒和摆龟甲形阵列，汉人称后者为鱼鳞形的阵列。”③

除物质文化的传播外，部分匈奴人经由七河地区的西迁活动，导致了整个日尔曼民族的骚动，影响及于大部分欧洲。公元前1世纪中叶，匈奴统治集团的剧烈内讧导致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后经不断火并，剩下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前者一直与汉朝保持友好臣属关系，后来娶汉宫女王嫱为妻。而郅支单于却暗中与汉分庭抗礼，当自知力难取胜后，便向西推进，沿途迫使乌揭、丁零、坚昆降服；又击败乌孙，留杀汉使，骗取康居信任后，立足塔拉斯河地区，都郅支城（唐时的怛逻斯城，今吉尔吉斯首府江布尔市）。郅支

① ［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页。

② 参见冯承钧：《西力东渐记》1944年版，第1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07页注2。

③ ［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62页。

单于的西迁及活动主要是沿丝路北道和在中亚北部地区。他们的残余和后裔有可能与公元1世纪末被东汉军队击溃的北匈奴单于人马汇合。《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袁安传》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看来遁走乌孙之地指的是巴尔喀什湖以南和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以及锡尔河、咸海以北的草原地带。直到公元2世纪前半期，残留在西域的北匈奴仍经常侵扰天山南路，后于2世纪中期，在新兴鲜卑的威逼下，未沦入臣民的一部分再次西迁，先至中亚北部康居地，即锡尔河中下游迤北的草原地带，进而更向西远去，踏着咸海、里海以北的欧亚草原通道闯入欧洲①。公元4世纪70年代，被中国汉朝军队彻底击溃、隐没了二百余年的一批匈奴人"冲过了'乌拉尔大门'②出现于欧洲地区；他们猛扑那住在南俄罗斯和近代罗马利亚的哥特人；当时，他们的进攻，使日尔曼人和罗马人都充满了惊惶情绪"③。首先受到匈奴人冲击的是克里米亚人和乌克兰的东哥特人。他们被迫渡过德涅斯特河，驱赶西哥特人越过罗马帝国的多瑙河国界，并于410年攻陷罗马，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跟随东、西哥特人之后在欧洲大陆上辗转活动的还有阿兰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及勃艮第、法兰克、盎格鲁、萨克森等日尔曼民族。总之，是匈奴人使整个日尔曼民族运动起

---

① 参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② "乌拉尔大门"指极无防御的欧洲边境。通过那里的空旷地点，所有亚洲的游牧部族，如匈奴人、阿哇尔人、保加利亚人、蒙古人进入了欧洲。他们的骑兵队驰骋草原，搜索敌人或战利品，他们的马车载着他们的家眷和牲口跟在后面，除了有时受到有些大河的阻碍外，所向无敌；如果河流太深，不能跋涉，他们则乘着膨胀的皮囊渡过。见布赖斯《外高加索和阿拉拉特》第132页。

③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第132页。

来，加速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匈奴人迁入欧洲后，曾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直到公元451年(一说453年)其首领阿提拉死去为止。这个帝国向被它征服的罗马人、希腊人、日尔曼人征收赋税。公元423年，阿提拉从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那里取得了350镑黄金和贡赋，次年又索取了双倍于这项数目的黄金。此后十五年，款额上涨了三倍。为了征集这笔巨款，拜占庭帝国必须使用它那复杂的一切财政机关，“每一个元老被课某个数目的款子，往往大大地超过他的实际财产；但凡是列在他名下的数目，不管他有与没有，是必须缴付的……在有些情况下，高贵妇女的家藏珠宝，或者那些一生过惯豪华生活的人们的家庭用具，就在市场上陈列出售”①。阿提拉还曾宣布，下多瑙河南岸的米西亚一带，约一百里宽，二百里长的领土属于匈奴的边境。在这里有一个大市场，市场靠近从爱琴海沿岸到多瑙河流域的一条在几百年中形成的大商路②。在阿提拉的帝国内，混合有多种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为帝国最高统治者服务。拜占庭史学家普力斯克斯记载，当他出使匈奴帝国时，看到的是“极为稀奇的语言，即混合着匈奴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的喧嚷；大汗沉默地但不无威严地坐在这喧扰场面的中间，由他的披着蓬松毛皮的卫兵和两个秘书在旁侍奉着。一个秘书替他办理希腊文件，另一个秘书替他办理罗马皇帝与帝国省长的通讯事宜……”当普力斯克斯在接待室里等待阿提拉接见的时候，有一个穿着匈奴服装的人，讲流利的希腊语来招呼他。这是一个被俘的希腊商人，后释放为自由人，并娶了一个蛮族妇女，他认为“现在的生活方

①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33页。

② 同上揭书，第134页。

式比过去好得多”①。因为奴隶制在匈奴人中比在罗马帝国内要缓和些。这件事颇有意义，它揭露了罗马帝国内被赋税压榨的人民甚至视匈奴人为救星，能够帮助自己摆脱后期罗马帝国的残暴政府。由上可见，匈奴人的西迁无论是在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欧洲大陆政治局势的激荡，以及交通道路的进一步疏通和延续方面，都不无意义。“中国与罗马是古代世界雄踞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和类型不同的两大文明中心。他们在经济结构、政治机制、文化形态和民族心理上存在着极大差异，各以自身的能量向四周辐射，导致中西文明碰撞。匈奴人充当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角，去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灭亡了西罗马帝国。”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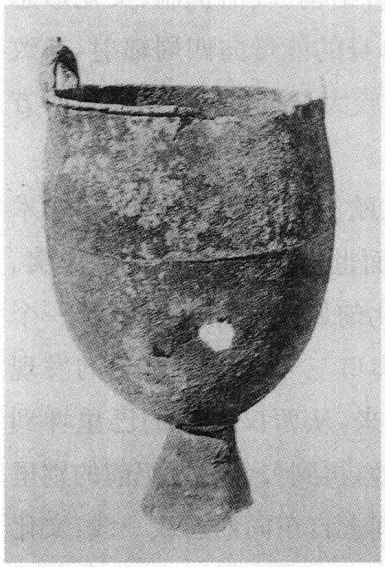
关于匈奴西迁的时间、路线以及在欧洲大陆活动的史实，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不过大量考古资料的面世，正逐步廓清这些史实。“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遗址的发现为北匈奴西迁路线确定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匈奴墓的发现又把它与新疆巴里坤这两地联系了起来，从西汉时期的巴里坤到东汉前期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再到公元2世纪前的别里克塔什1号墓地，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自东向西连成一线，文化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渐远渐变的趋势。这些新的考古材料印证了文献关于单于屏气蒙毡，遁走乌孙之地，以后又入康居的记载，为我们指明了匈奴西迁的前半段路程的大致路线。而从新疆地区至南俄草原一直到欧洲一线发现的大量匈奴人遗留下的铜镀标本又

---

① ［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第135页。

② 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为匈奴西迁的后半部分路线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①不过本文的取材和论述主要基于，注重游牧民族迁徙无常的特性，和由此必然带来的世界不同地区之间交通道路的疏畅和拓长，不同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匈奴西迁问题将继续热心关注和深入探讨，并希冀发掘出更多的史料，使此问题的研究更加推进。



图版7　新源县出土的匈奴铜镈(魏晋南北朝)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与匈奴同时或先后活跃在中亚北部地区的还有大月氏、乌孙、柔然、鲜卑等游牧民族。苏联史学界曾将起自匈奴，结止于西突厥汗国成立这段时间称为民族大迁徙时代②，其中尤以月氏和乌孙为要，在历时二三百年的汉匈斗争中，他们始终是中原王朝力争的盟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就是以与月氏、乌孙结盟，共击匈奴为直接目的，结果导致丝绸之路明载史册。所以论及游牧民族西迁与东西文化交流之关系，不可不注意月氏与乌孙。

月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周朝末年故居在中国之北。

---

① 马利清：《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1期。

②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151.(《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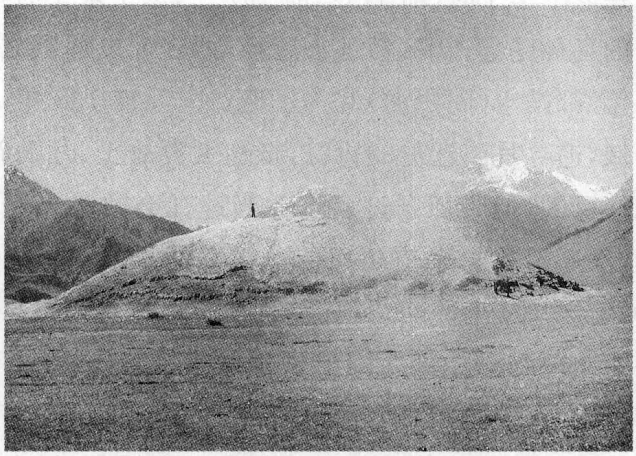
《逸周书·王会解》伊尹："献令列禺氏于正北"；《穆天子传》中禺知即禺氏，地在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与献令合①。战国时之月氏，亦在中国正北。秦汉时，居敦煌祁连间，后为匈奴所破，西击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天山以北，伊犁河上游一带），这大约发生在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年）。十余年后，月氏又被强大起来的乌孙昆莫击溃，乃远去过宛，西去大夏而臣之，（约在公元前135年）都妫水（阿姆河）北为王庭。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追寻月氏迁徙的行踪，抵达大夏故土、月氏新居，虽未能达到出使目的，但带回了许多有关当地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情报，是首次通过官方渠道相互传送信息的重要事件。月氏从伊犁河、楚河地区举族南徙阿姆河流域，循的很可能就是早年萨迦人往来于中亚北部与河中地之间的常用通道，以后从北部地区南下的小股游牧民，北上的粟特移民和往来的僧侣、使节、商贾等也多用此道。月氏人休养生息在肥沃的阿姆河流域，积极参与了中亚南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活动，与希腊化的大夏王朝，与安息王朝、印度巽加王朝、贵霜王朝的历史，以及与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历史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中亚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本书论述重点放在北部地区，故在月氏问题上恕不多言。

乌孙是我国西北地区另一个古老的民族。原与月氏共居敦煌祁连间，弱小时曾败于月氏，后归属匈奴。日渐强大后，便离开了匈奴单于，攻打西迁塞地的月氏，夺其地。从此广布于天山以北，伊犁河上游直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中心设在伊塞克湖

---

①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附近。钱伯泉认为乌孙的先民原是纯粹的蒙古人种，居住在六盘山一带。后来与大月氏同处河西地区，乌孙在山丹县以西至敦煌一带匈奴昆邪王故地，大月氏则在山丹县以东至兰州一带匈奴休屠王故地。



图版8　新疆昭苏县的汉代乌孙封土墓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约公元前177年秋至前176年初夏，乌孙为月氏人攻灭，归附匈奴，而大月氏则为匈奴逐至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41年左右，匈奴和乌孙合力攻打大月氏，大月氏被迫再次迁徙，而乌孙人则留在伊犁河流域为匈奴据守西域门户①。乌孙在中亚北部地区居住时间最长且与汉族政权交往最密。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是以联络乌孙，共结反匈奴同盟为目的。此后汉乌长期和亲，

① 详见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西迁》(《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和《乌孙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迁的经过》(《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等文。

先后嫁乌孙昆莫的汉公主见于史载的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楚王戊的孙女解忧和随解忧去乌孙，后嫁乌孙右大将的冯嫽。汉乌和亲是一种政治联姻，在战略上形成夹击匈奴之势，对西域各地的政治局势发生过重大影响，对西汉政权统一新疆的斗争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本始二年，造成匈奴在西域势力一次大溃退的战役就是十五万汉军与五万乌孙军队联合作战取胜的。汉乌和亲除政治、军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外，在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细君公主出嫁乌孙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超过了汉朝出嫁公主的常例。而乌孙也以汉朝最需要的好马千匹为聘，以后每隔一年，西汉政府就派人带着帷帐锦绣等前去探望①，这实际上是双方政府定期的经济往来活动。细君到乌孙后，有别于游牧民族"穹庐为室旃为墙"，而"自治宫室居"。这无疑会对乌孙人的居室建筑，生活方式发生一定的影响。据新疆考古资料分析，武帝之后，乌孙墓室已普遍出现了较完备的木椁结构。墓口平铺两三层原木作顶，基底平铺原木为地板，四壁叠砌完整的原木，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木椁墓室，其结构与当今伊犁地区牧区所见木屋几乎完全相同，说明当时地面上人们的居室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②。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伊塞克湖地区、谢米列契地区也发现多处乌孙人的村落。居室形式多样，既有毡制帐篷，适宜半游牧的生活方式，也有夯土房屋。在谢米列契东部，距伊塞克湖一百五十公里的戈根河谷，发现的阿克塔斯村就很引人注目。村中居然出现修筑在石头基底上，面积为五百六十

---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

② 王炳华、王明哲著：《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平方米的宏伟建筑物，这对游牧部族来说是极为罕见的①。苏联考古工作者在楚河河谷还找到一面属于乌孙时期的青铜镜，镜子打坏分成四块，中央纽部缺，直径为九厘米，有两个同心圆饰带，靠外的刻以浮雕装饰花纹，靠内的是象形汉字铭文，但铸造模糊，难以辨认。镜子中央有一复杂构图，为植物主题的结丛，可以认出的有葡萄嘟噜和藤蔓的编织，似乎有某种神奇动物画迹，也许是龙。苏联学者认为这是汉代中国的产品，很可能是随下嫁公主流入这一地区的②。考古材料还反映出此时乌孙人的手工业生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在一位乌孙萨满教女巫师的墓葬中（墓在距阿拉木图三百公里的卡尔加林斯克峡谷的峭壁上）发现了大量的金饰件，收集到的用绿松石点缀的金饰件约有三百件，其中有两个镶嵌宝石的戒指，上面有双峰骆驼的凸雕像；有一个长方形薄片头饰，上面有鸟、兽、人以及各种植物构成的装饰图案，而在托垫上画的是带翼的马和骑在龙上的人，表现出东西方绘画题材的混合。头饰上还镶嵌了不少光玉髓、贵榴石和绿松石③。这件古物充分体现了古代乌孙工匠的高超技艺。极有趣的是，在位于拿勒河西面的一座乌孙墓中，发现一位死者安有木制小腿假肢④，看来乌孙人的社会经济、物质文化生活已较丰富，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这其中无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148.（《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48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苏联考古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109页）

③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163.（《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63页）

④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164.（《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64页）

疑有汉族文化通过和亲渠道或其他方式对他们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如杜佑引傅元《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以方俗语之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①可见西域琵琶有可能源于中原。而解忧公主也曾派女儿弟史到京师学鼓琴，这说明中原音乐通过乌孙流入和影响及于西域。西域诸国中大都有"译长"之设，《汉书·张骞传》曰："乌孙发译导送骞"，而汉欲以相夫为公主嫁乌孙，"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为的是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往来之需要。

除了汉文化对乌孙文化以及通过乌孙对西域地区发生种种影响外，西方文化也在乌孙文化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并且有可能通过乌孙传入中国。如在伊犁河地区乌孙古墓中找到大量显然是西方文化的饰物——串珠粒，有时一处竟然在一百个以上，其料质有玻璃、玛瑙、石头、光玉髓、膏泥等，颜色和形制亦多种多样，有白、金黄、深蓝、淡绿、橙黄等，形状有菱形、圆柱形、正方形、三角棱柱形、六面体圆柱形、橘状、扁平状等②。正如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研究后指出"罗马出口最多的和最远的物资是玻璃制品……作项链用的玻璃珠子，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安南海岸到处可见，甚至在中亚和乌克兰也有发现。人们有时将它制成珠形，有时又制成椭圆形，还有梨形、圆柱形和双耳尖顶形等。有不透明的，也有半透明的，还有蓝色和绿色的"。又说"犹太人多为玻璃工匠，他们同样也拥有一种支付丝绸交换的货币，如琉璃艺术品，尤其是著名的项链珠子"③。所以这些珠子或者是在丝绸贸易中作为交换物，通过商人

① ［唐］杜佑：《通典》卷144，《乐四》引傅弦《琵琶赋》。

② ［法］L. 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③ 同上注，第93页。

之手从西方运来，或者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当地乌孙工匠自己的仿制品。与此同时找到的还有大量陶器，其中圆底有短壶嘴的梨形陶罐，类似花剌子模出土的器皿。有的器皿口沿下画有贵霜时期陶器上广泛流行的装饰图案——等腰三角形的几何图形①。大量的考古材料充分说明，乌孙也和匈奴一样，不但仰慕学习汉文化，并将这古老的东方文明带往中亚，传向西方，使世界东西两端的文明通过他们的传导作用而连接起来，在相互学习交往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最后需要稍加提及的是，北匈奴西迁后，其地盘被鲜卑占据，史称"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②。可见此时天山北路，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故地，已在鲜卑的势力范围之内。鲜卑在檀石槐死后，势力渐衰，直到拓跋部再度强盛，兼并诸部，在中国北部建立代国。一度"西兼乌孙故地，东知勿吉以西，控弦士马将百万"。时鲜卑北面有柔然部，柔然在其首领社仑时势大振，西北方与"匈奴余种"相接，《魏书·西域传》说：大月氏"北与蠕蠕（即柔然）接，数为所侵"。乌孙亦"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③。悦般"与蠕蠕结好"。看来此时柔然的势力也已扩达中亚北部。后有人认为，继匈奴之后进入欧洲的阿哇尔人即是柔然。薛宗正指出，柔然作为亚欧草原上一个强有力的游牧民族政权，自始至终注重对西域的经营，曾促使嚈哒、高车等属部向西推进，在西域丝路上取得一系

---

① К. А. Акишев, Г. А. Кушаев.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долины реки Или. АЛma－Ata, 1963.（К. А. 阿吉谢夫、Г. А. 库沙耶夫：《伊犁河谷塞人和乌孙人的古文化》第二章，阿拉木图 1963 年版）

② 《三国志》卷 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③ 《北史》卷 97，《西域传》。

列辉煌的胜利，使丝路重又凿通①。公元4世纪中期，嚈哒人②不堪柔然的压迫和进攻，离开故地阿尔泰山以南和天山东部地区，循月氏西迁路线先西去后南下，积极参与了河中地区诸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尤其是与波斯帝国之间围绕称霸西域，控制商路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后来建立了强大的帝国政权，控制了中亚广大地区，成为公元5世纪前后至6世纪中期，中亚腹地能够左右政局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正如冯承钧所说："当时嚈哒之势正强，天山南路诸国多役属之。天山北路自龟兹以北，西抵伊犁河下游，似为悦般人③居地……悦般之西与天山之南，尽属嚈哒。"④无论是鲜卑、柔然，还是悦般、嚈哒人，在其强盛时期的活动都离不开中亚北部地区，离不开与周边诸大强国势力之间发生政治、经济交往。于是，他们对丝路的畅通使用，对东西文化的交流无疑起到过一定作用，其具体事例将在后文列举。

纵观公元前后近一千年内，从中国北部、西北部接连不断陆续西迁的游牧民族大致走着同一条路线，即循天山南北麓向西，进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河、伊塞克湖地区和以西、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再由此南下过费尔干纳盆地，入河中，进帕米尔，或者从中亚北部地区继续向西，沿里海、黑海以北草原，进入东

---

① 薛宗正：《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族群的西迁和崛起》，《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

② 在汉文史籍中关于嚈哒的起源和族属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车师别种（《梁书》），另一种说是"大月氏之种类"（《魏书》）。也有人认为嚈哒是匈奴与月氏的混血，肤色较白，故称白匈奴。嚈哒人最早称滑，分布于阿尔泰山以南到天山东部地区。

③ 公元4世纪60、70年代（一说5世纪30至50年代），北匈奴单于西走康居，这一部分匈奴人应当就是史上提到的悦般部，其位置约在楚河西北，楚河流域，东境可达乌鲁木齐以西及伊犁河盆地。

④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0—41页。

欧平原。这一股股西迁游牧民族的马蹄不停地踏在这条贯穿东西的草原大道上，使渺无人烟的古漠荒原上出现了一条无形的东西大道，也使东西方的物质文明沿着这条大道往来传播。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后才能对丝绸之路北道作出一定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创和疏通，早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与中国北部地区游牧民族的迁徙活动密切相关，是他们为东西交通立下了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

第三章

中亚北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

从中国古都长安出发，向西经过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将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大陆联结起来的丝绸之路，自从它开辟以来就不断随着行旅、商人、使节、僧侣们的探险步伐，随着所经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着。新支线的开辟、交通网的完善与商道重心的移动，构成了近九个世纪的丝路贸易史。其中，中亚北部地区又在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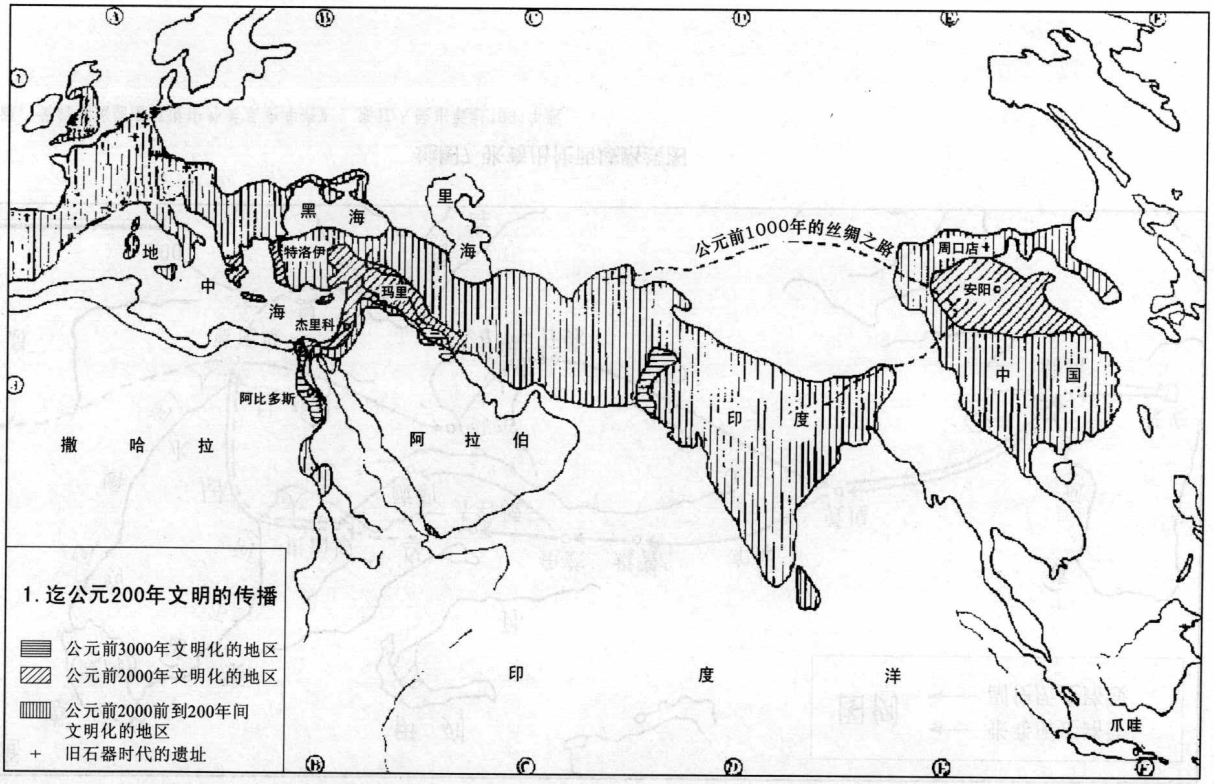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丝路北道的前身——草原之路

人类物质文明一但在各个地域产生后，不会长期囿于孤立、封闭状态，必然要向外寻求联系，并在相互交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后的两三个世纪内，世界上曾有四大帝国并立，构成一新月形强阵。其在东方的秦汉大帝国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争霸的局面，一统中华，日臻强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广地万里”的汉帝国开始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传播汉文化的影响；其在西方，罗马帝国正处在全盛时代，继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罗马军团仍不断挥戈东进，将希腊化王国推向东方，使东西方之间发生了一次大的沟通；而勃兴于亚洲中南部的是贵霜帝国和摩揭陀帝国。在这四强国之间有一个起缓冲和调解作用的安息王国，它在当时的东西贸易中充当居间商人，竭力控制丝绸贸易，从中自肥。此时古代世界东西两端强国的经济繁荣，自然会引起人口增长后的拓土要求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愿望，于是东西方大国间寻求官方贸易的条件已经具备，世界几大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接触开始

走上正轨并逐渐步入高潮。丝绸之路就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正式记入史册的。而为此做出不朽贡献的开拓者，是挺身为朝廷寻找击退匈奴的西方盟友、两次持节出使西域的汉中人张骞。张骞两次往返西域，取道有所不同，其本身就是踏勘中西陆路通道的实践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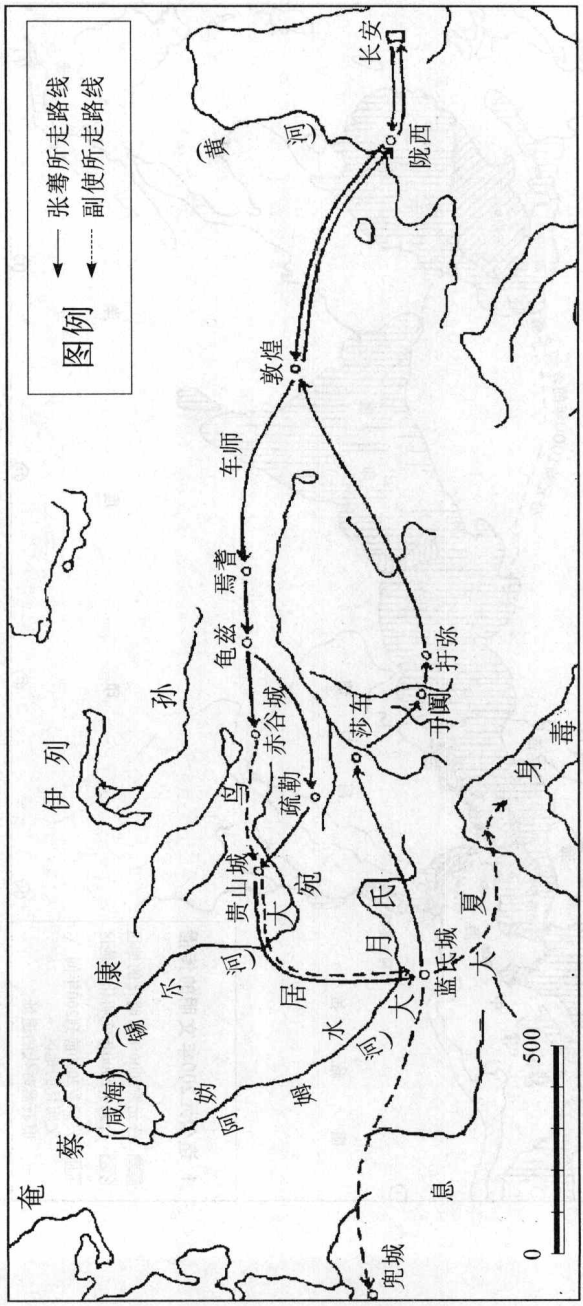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中国丝绸曾出现在中亚、西亚、东欧、北欧和印度，说明中国同西方的交通贸易实际上早已存在，不过为民间转手贸易，量少费时久。只有当汉武帝击退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才为中国同西方开展直接交往、扩大贸易提供了条件，并使原先一直处在朦胧状态中的丝绸之路开始明见于史册。根据张骞出使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曾具体记述了当时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走向和行经地。它们是：自玉门关、阳关出河西，“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此道的走向是，从河西走廊出阳关后，沿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顺阿姆河而下，经阿富汗北部抵古波斯东境安息国。另一条路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此道的走向是，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向西，从疏勒（今喀什）过葱岭，先至费尔干纳盆地，然后顺锡尔河、咸海以北草原地区的康居、奄蔡，再经里海、黑海以北草原，抵南俄并远达希腊、罗马。

这里所记的丝路北道在出葱岭后，沿锡尔河以北西去的路线，有人划入“草原之路”的范围。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加藤九祚合编的《丝绸之路辞典》正式提出了丝绸之路包括有“草原之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是通过绿洲路（即通常所称的西安经甘



地图6 草原丝绸之路与早期文明传播

资料来源：引自钱伯斯著，杨慧玟译《世界历史地图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地图7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资料来源：黄时鉴《插图解说中外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肃、新疆到中亚和欧洲的道路)运往西方,而且还通过北面的草原路和南面的海洋路运到遥远的西方。因此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绿洲路(也有称沙漠路或新疆三道),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是对绿洲路、草原路和海洋路的总称。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持同样看法,并指出草原路线有两条:一是从内蒙古过阴山,经宁夏到巴里坤,再经吉木萨尔、伊犁到达碎叶;另一条从蒙古过杭爱山,经科布多越阿尔泰山,向西到巴尔喀什湖,然后向西与一条森林道相接。在西方史料中,也有对草原丝路的早期记述。如希罗多德就依据公元前7至前6世纪时出身于今马尔马拉海普洛孔湟索斯地方的阿利司铁阿斯(Aristeas)所著《阿里玛斯比亚》(Arimaspea 即《独目篇》)的记述,指出了一条越过中亚东去的商路,其终点在"秃头者"所居之地,经学者考证即是今阿尔泰山脚下。同时希罗多德指出:"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基泰人当中,有一些人曾到他们那里去过。"①(《历史》IV24)考古资料更加充分地证明,欧亚草原是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往来迁徙,但在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极其微弱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逐渐成为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至迟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②。笔者认为,草原之路是丝绸之路

① 参考王宏谋:《古代内陆欧亚的社会形态及交通路线》,《昌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② 参考龚缨晏:《远古时期的"草原通道"》,《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见于信史记载之前，存在于广阔的中亚北部地区的隐形通道，它无确定不变的走向和所经地点的明确记载，零散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仅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模糊、多变的道路轮廓。但若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因张骞出使才正式被记载的丝路北道，和以后出现的新北道，就会从中找到草原之路的影子。所以我们说“草原之路”也可谓是丝路北道、新北道的雏形和前身。若追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可归结为自古以来连续不断的游牧民的迁徙活动。

如前文所述，远自公元前7世纪起就有原居甘肃河西地的塞人循天山山脉，沿伊犁河流域向西进入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加入了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大联盟。此后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又有月氏、乌孙人先后从河西地迁出，其行进路线虽史无明载，但据有关史地和考古资料分析，当有一部分是依循塞人已踏出的旧路，沿天山北麓西行，后越过天山，抵伊犁河上源裕勒都斯河和特克斯河，散居在伊犁河上游直到伊塞克湖周围地区。公元3—5世纪，匈奴人、柔然人又有沿这条通道进入南俄草原和东欧地区的。正是这些从中国大漠南北以及河西地区一批又一批迁出的游牧民，千百年来披荆斩棘，历经艰辛，逐渐踏出一条横贯东西的草原大道，并沿用至汉代，构成丝绸之路北道的组成部分。据20世纪80年代苏联考古资料披露，在哈萨克斯坦西部，位于面对里海的斯贴普走廊地带，发掘出列别节夫卡古墓群，出土有汉代内行花纹镜和方格规矩镜，明显是东方的输入品。经考古工作者综合分析认为，公元2—3世纪时，这群古坟的主人已在此定居，管辖经过黑海北岸、斯帖普地带的商路。这条路向东所经地区，如塔什干绿洲、费尔干纳盆地等处也发现有中国制造的铜镜。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考古学者发现在北高加索出土的丝织品，不但数量

多，而且种类也多，对此他们确信地说："从中亚来的，经由此路到拜占庭的永久的贸易商路是存在的，这个贸易商路经由咸海、里海北岸，越过伏尔加河到北高加索。"①除"草原之路"的名称外，还有将丝路北道称作"毛皮路"的，它反映出早期的东西贸易中，热心从事转运、贩卖商品的游牧民们，投入交换的主要产品是大量受欢迎的珍贵毛皮。《史记·货殖列传》记，汉代都邑中的一些大商店，一岁可买卖"狐鼲裘千皮"。无论是"草原之路"，还是"毛皮之路"的称谓都说明，游牧民是初期商道的开拓者和贸易的经营者。

从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路段来看，丝路南北两道的最初走向与所经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就我国境内的新疆地区而论，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中部绵亘着东西走向的天山，这三大山脉向西汇聚成帕米尔山结，自然将汉代西域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现今为新疆地区，以天山为界，分作南疆和北疆。南疆地区自东向西，有白龙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及其支流向东穿过沙漠注入罗布泊；北疆地区自东向西，经莫贺延碛（又称噶顺沙漠、哈顺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这些山脉、沙漠与河流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边缘地区，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一些绿洲村落和将它们连接起来的道路，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南北两道最初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都是通过南疆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北道在葱岭以西，经大宛、康居、奄蔡的路段，不但是天山南麓道路的延续，而且也与东北去七河地区、斋桑泊，过阿尔泰山至鄂毕河上游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再沿叶尼塞河至贝加尔湖以南的草原通道相连。这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的经行大道，

---

① 峰巍撰，姚义田译：《出土中国镜的列别节夫卡古坟》，《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从东向西横亘在中亚北部的广域内。此外，这条大道向南还可以与中原通向正北方向的道路相衔接，向西、西南亦有多条道路可通。如长安以北二百余里的云阳（今淳化县西北）就曾是中原向北通道上的一个战略要地。首先是秦始皇选中云阳北甘泉山修建林光宫（汉改名甘泉宫），并从山下修了一条向北直通阴山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约合今一千四百里）（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成为秦军抗击匈奴的一条捷径。西汉时期，云阳和直道更显重要，史载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还祠黄帝庙于桥山，乃归甘泉”（《汉书·武帝纪》），走的就是秦直道。直道在《冀州图经》（省称冀州图，唐以前作品）中也有反映：“自周、秦、汉、魏以来，出师北伐，唯有三道。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回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①这条从中原北上至漠南漠北的大道，从今库伦和林向西沿杭爱山，经科布多盆地，穿过乌里雅苏台，翻越阿尔泰山，可至高昌北山并通往车师后部，与以后的新北道合。而漠北向河西也有通道。《新唐书·地理志》删丹县条记：“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这是河西走廊以北居延海一带，东通河套阴山北，与上述秦汉直道或唐初形成的参天可汗道相连，西通巴里坤湖，经吉木萨尔，直趋伊犁的大道。唐武后垂拱二年（636年）北讨铁勒，即取此路。可见，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自古以来随着游牧民的迁徙，以及游牧民族与中原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49。

汉族王朝发生多种政治、经济交往关系，自然持续地形成多条通道。游牧民马蹄所至，高山大川多不能阻挡。从东西交通的意义上说，草原之路出现和使用的时间比张骞记录下的丝路两道为更早。它的某些路段因长期经常使用而被后来的使臣、商旅、僧客所熟知，最后才正式记入史册。所以我们说，横贯中亚北部地区的草原之路是丝路北道、新北道的雏形与前身。

第二节　新北道的出现及里程走向

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旧道的完善，新道的扩拓和密织，交通网络的进一步形成上。关于新北道的出现及使用时间，据汉文史籍的不同记载，学者们所持各异，有西汉末年说、三国说、南北朝说及隋说等①。下面我们将有关史料略作排比，以求探明新北道的形成过程及里程走向。

关于新北道的主干材料有三条，其一是《汉书·西域传》曰："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阨。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柱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击之……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前文提到，西汉时期丝路的主干线在新疆境内分南北两道。其中北道出敦煌向西，过三龙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北，穿越白龙

---

① 西汉说，见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东汉说，见《新疆简史》上册；三国说，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南北朝说，见向达：《新疆考古概况》；隋说，见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堆(今罗布淖尔东北盐碛之地),经楼兰古城(今罗布淖尔北岸),折向北至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再转向西南,顺天山南麓,沿孔雀河北岸(塔里木河下游)径直向西去。1979—1980年,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同志们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北岸老开屏地发掘出一座东汉墓,在孔雀河南岸还发现了烽燧遗址。它们正处在楼兰古城向西北,循孔雀河河谷西行,抵达库尔勒、焉耆地区的古道上①。这条旧北道的东端,因经过楼兰古国,又有楼兰故道之称。此道里程虽较短,但出关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古楼兰国东面的白龙堆盐碛,因千里无水草,亦名旱海。《汉书·匈奴传》孟康注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故尔以象形名其地也,唐人谓之莫贺延碛。"张燕公裴行俭碑云,公之送波斯王子归,入莫贺延碛,"中遇风沙大起,天地暝晦,引导皆迷"②。宋人王延德使高昌,谓之鬼魅碛。清人谓之噶顺沙碛,指出自敦煌县西南境之巴颜布拉克以西,流沙极目蜿蜒,出没之状犹有存者③。正因为白龙堆沙碛,行旅如此艰难,所以到了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中,公元2、3年之际)戊己校尉徐普议开新道。即路出敦煌后,不经过三陇沙和白龙堆,径直向西北,经横坑,出五船北,经伊吾抵车师前部,再南至龟兹,与原北道合。或经车师后国(吉木萨尔县附近),沿天山北麓,西达乌孙,赴康居。所谓五船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丁谦《西域传地理考证》曰:"从安西(古瓜

① 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② (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3,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23册。

③ 官修《新疆图志》卷87,《古迹》,收入《中国边疆丛书》第13册。

州)至哈密(古伊州)十一站计九百里,小南路在驿路之东。"[1]看来五船在车师后部东南,白龙堆北头。有人考证,新道便是以后唐代从柳中县(现在托克逊)东南九十里入大沙海而至玉门关的大海道[2],《西州图经残卷》记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当)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屡践沙石,往来困弊。"《元和郡县志》卷40西州柳中县条:"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太平寰宇记》卷156记,西州"东南经少(沙)海,又渡碛至伊(沙之误)州一千三百里"。可见大海道大致上应是前面提到的楼兰故道,即旧北道的一段,亦是以后丝路中道的东端。元始中,徐普关于正式开辟五船新道的建议,尽管可以避白龙堆之险厄,还可省一半路程,却因为车师后王姑句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原来楼兰当丝路孔道时,常常要迎送汉使,为他们充当向导并负水担粮。楼兰近汉,而车师后王姑句却对新道出车师后国,日后汉使往来,就要为之供应,深感"心不便也"。加上因靠近尚属强大的匈奴,有所顾忌,不愿执行戊己校尉的命令,甚至以降匈奴来抗拒。当时伊吾至车师后庭等地,一直是匈奴占据出没之处,汉使不便通过,商旅尤不取此道,所以新北道在西汉末年并未正式开通。

第二条史料是《三国志·魏志》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

---

① (清)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1集,1915年。

② [日]岛崎昌:《西域交通史上的新道和伊吾路》,收入《隋唐时代的东土耳其斯坦研究》一书。

西诣龟兹，至葱领（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此条材料已明确提出了三道，原丝路北道在这里已改称为中道，而徐普议开的五船道被称为新道。新道的出现使丝路略向北移，突出了车师前后庭的作用，成为新北道正式形成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车师，亦称姑师①，王治交河城，后分为车师前后王庭，辖境包括吐鲁番盆地及博格达山以北吉木萨尔一带。其东北部与匈奴右地相邻。匈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蒲类海为大本营，控制天山以北的东部地区，并且通过假道车师山北地带向西直达乌孙，向南过车师本部（吐鲁番盆地）转焉耆、危须、尉犁和天山南麓其他地区。所以车师对匈奴来说，是确保后方安全，补充给养和兵员，控制天山南麓广大地区，联合西域诸国对抗汉朝的至关紧要之地。而对西汉王朝来说，要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形成夹击匈奴的态势，进而确保西域丝路畅通无阻，也必须首先控制车师。车师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随之产生的政治军事作用使之成为汉匈必争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②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至元康四年（前62年）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汉匈五争车师，结果各有胜负。而东汉政府虽曾几次在伊吾驻兵屯田，设宜禾都尉，却是屡设屡撤，未能长久坚持。所以此时仅仅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形成一条经高昌、抵伊吾，供作战使用的行军道路。如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等出敦煌昆仑塞，伐匈奴于蒲类海上，遂进击车师后部，其行军路线即五船道。至曹魏时期，随着匈奴的

① 裴骃集解引徐广注曰，姑师即车师，钱大昕曰，车姑声相近。

② 《后汉书》卷88，《西域传》。

被削弱，伊吾正式设县。西晋时设伊吾郡，郡治在敦煌，由敦煌太守兼理。这标志着汉匈出入西域之孔道的伊吾，已成为天山东部地区的重要一站。中央政权加强对伊吾的管理，为的是控制往来于天山以北的通道。于是，徐普议开的五船新道此时已常被使用，并构成丝路新北道的东端线段。

第三条史料是《隋书·裴矩传》引矩撰《西域图记》，对丝路三道作了一个较为详尽明晰的叙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从这条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丝绸之路发展至隋，新北道已与最初的南北两道并驾齐驱，成为一条重要商道。这条日臻完善和重要的新北道是天山北部地区横贯东西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它由玉门关至伊吾、伊吾至庭州、庭州至碎叶以及更向西去的区段道路连接而成。下面我们逐段探明新北道的大致走向和里程。

魏晋以来形成的玉门关西北行至伊吾的五船道到了隋唐时期，已成为较固定的新北道的第一段线路。隋代，伊吾地区归附，薛世雄曾奉命在汉伊吾城故址修筑新城。唐朝政府于公元640年在伊吾设伊州，下设柔远、纳职二县，又在伊州以北（今伊吾）设伊

吾军①保护北道，于是玉门关至伊州的这段交通线遂成为丝路出河西进入新疆境内的一段重要通道。唐初玄奘法师西往印度，行至安西后，走的就是这条道。史载法师于贞观三年(629 年)秋从长安出发，是年冬到瓜州，然后向“北行至五十余里有瓠瓠河(今疏勒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②。据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的分析：“……哈密通道经过疏勒河的地方，确在瓜州城正北八英里，设若承认玄奘时代的疏勒河在今日河流之北两英里，我们的地图标示的旧河床所在则与《慈恩传》五十余里之记载恰合……玄奘时代的玉门关确在何处，我现在还不能说，据我们在 1907 年调查中发现的结果，这个原在敦煌西边很远的玉门关，就在玄奘时代好像迁到瓜州之北为时不久。”如若是，作为通西域襟喉的玉门关此时北移，正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北道作用日渐突出与重要③。《慈恩传》接着写道：“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玄奘法师因违令西行，为了避开官吏的

---

① 伊吾军，《元和郡县志》卷 40 庭州条记：伊吾军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景龙四年置，管兵三千人，马三百匹，在理所东南七百里”。同卷伊州条：“伊吾军在州西北三百里折罗漫山北甘露川置，刺史为使，景龙四年置。”《西域水道记》卷 3 录姜行本《纪功碑》：“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师次伊吾时罗漫山，北登黑绀所……”同卷指明该碑在巴尔库勒(清代镇西，今巴里坤)，东南库舍图岭，是时罗漫山(又称折罗漫山)即为库舍图岭，据此断定伊吾军在该岭之北巴里坤境内。

②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1，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2 页。

③ 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学术界的不断研究，可以证明从汉至唐玉门关址屡有废立和迁徙，有学者认为唐代玉门址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双塔堡一带(参考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2001 年第 4 期)，玉门关址的这些变迁无疑与丝绸之路转移变化紧密相关。相关问题可以参考赵评春：《西汉玉门关、县及其长城建置时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41 期)、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等文。

耳目，不得不舍弃能够提供水和食物的烽亭，而另走险境。即使这样，法师仍然得到了第一烽校尉王祥和第四烽校尉王伯龙的热情款待与帮助，绕过了其余三烽，平安抵达伊吾。《辛卯侍行记》卷6“哈密歧路”条谓：城东二百二十里为沁城，沁城东南九十里为胡桐窝，其南一程为野马泉，这或许就是王伯龙指给玄奘避开第五烽星星峡，别出他路约百里外可以取水的野马泉。说明除政府设置亭障，控制管理的交通道路外，还有民间商人、行旅、百姓们自行使用的一些歧路支道，配合和补充丝路主干道也在发挥作用。

玄奘原欲从伊吾至北庭，走裴矩所记北新道。从伊吾继续西北行，经蒲类海、铁勒部至突厥汗庭的一段，亦与《魏书》所记“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①的道路合。蒲类海，今巴里坤地区。《西域释地》云：“蒲类海一名婆悉海，俗不知其名，呼为海子，东西袤一百余里，对海宽数十里。”《方士淦东归记》云：“巴里坤汉之月氏地也，本系蒙古游牧地，居天山之阴，夏月冰雪不化，山逼城垣，寒冷异常，居民商贾在城外，西北有海，周围六十里，海沿泥淖，人不能到，汉书蒲类也，常现海市，相传中有寒龟……”②这一带两汉时期一直是匈奴在西域的大本营。由此向东，为北匈奴正西之极境，由此以西，则为车师后部东之极境，是其地为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接壤之要地③，故汉匈争战较多。及宣帝神爵二年秋，使都护西域都尉郑吉破车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徐松释

---

① 《三国志》卷30，《魏书》引《魏略·西戎传》。

② 《新疆图志》卷87，《古迹》镇西厅、巴里坤八景条。

③ 吴其昌：《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纪功碑跋尾》，载《国学季刊》2卷2号，1929年12月。

曰："山，天山也，今博罗图山，姑师地，正今吐鲁番及奇台县、阜康县境。分姑师为车师前、后国，且弥国，西国，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共八国。《后书》以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为车师六国。"①西汉时的山北六国与东汉时的车师六国应不包括车师前后王国，指的是并属车师后部王的东西且弥国、卑陆前后国、郁立师、劫国、乌贪訾离等分布在吉木萨尔西至玛纳斯一带的一些小国，不一定限于六个。如卑陆前后国，约在阜康县境内（《汉西域图考》），郁立师西与卑陆接，其方位约在阜康县至古牧地一带②，它们相互为邻，皆属车师后部，亦多当丝路北道。

车师后部治于赖城，即隋末唐初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旧唐书·西戎传》曰："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通鉴》贞观十四年条记，平高昌，以其地为西州，于是突厥可汗惧来降，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通典》谓庭州即后汉车师后王之地，盖可汗浮图城即后王治所，西突厥建牙于此，故加可汗二字，浮图即务涂之音转。唐建庭州及北庭都护府，因其地，于是可汗浮图城名遂不后见③。关于务涂谷的方位，据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今济木萨城北五里（应为二十里）有破城，为唐都护府遗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汉城又在今城之南。"④又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记："保惠城南十五里入南山，山麓有千佛洞，绀宇壮丽，山南通吐鲁番，宋

①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见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9页。

② 参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4册《西域杂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页。

④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见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495页。

王延德使高昌记云，自前庭至后庭，经雪山龙堂殆由斯路。”千佛洞位于今吉木萨尔县城南约十五里的山前台地上，台地向南越山，可通吐鲁番盆地。由于车师前后王国所要控制的主要是沿博格达山北麓的山前牧场及山下的广大平原地，因此后部王治务涂谷可能就在千佛洞一带①。务涂谷北三十五里，即清代吉木萨城北二十里处为唐代庭州州治金满县，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又改后庭县，亦是北庭都护府治地，遗址尚存。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又记：“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唐造像碣。”据在此地进行过考古工作的同志说：“古城遗址东西为一片大平川，没有交通障碍，遗址西通乌鲁木齐和伊犁河流域，东通哈密与内地连接，南三十余里可直达务涂谷，通吐鲁番盆地。”②结合文献史料看，自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以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后不久，又于同年九月下旬在西州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统辖伊、西、庭三州，稍后占据焉耆地区。高宗龙朔二年至武后长安二年间，曾在庭州设置金山都护府，都护兼任庭州刺史③。长安二年十二月“戊申（十六日）置北庭都护于庭州”，“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④。可见北庭都护府建立后，扩大了原金山都护府的管辖范围，统有天山以北诸游牧部落，辖境远达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先天元年以后，又统有伊州，并加强了防

---

① 参见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② 同上注。

③ 在庭州设置金山都护府，史无明文记载，但据《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张说之文集》卷16《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两段史料，王方翼和杜怀宝都曾以庭州刺史兼任金山都护，可为强证。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7、215。

卫力量，统三军，总兵力达二万余人，马五千余匹。至此，唐朝已逐渐完成了对东部天山地区的控制，将伊、西、庭三州连为一体。

从交通状况看，三州之间各有道路相通，其中伊州至北庭的道路又简称伊北路，是北新道在新疆境内的东部干线，其走向与里程，据《新唐书·地理志》"纳职县"条记："自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纳职县，多数学者考订在哈密县城西之四堡。四堡又称拉布楚喀，似为纳职之音转。四堡在三堡南十五里，三堡在哈密以西一百二十里，故纳职县正如《元和郡县志》卷40所记"东北至州一百二十里"。纳职西去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即今西盐池北五十里的惠井子①。《新疆图志·道路志五》惠井子驿条记："唐地志纳职县西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唐时，风戈壁（指自瞭土敦到七克腾木之路）亦有间道能通北庭，即今由惠井子踰乌克塔克山之路。"惠井子至哈密的里程与罗护至伊州的里程相合。这里提到的七克腾木在哈密西南六百八十里，西盐池以南一百四十里，《辛卯侍行记》的作者陶葆廉认为即是赤亭守捉，乌克塔克山大致相当于乏驴岭。独山守捉在今木垒县大石头地。蒲类县在今奇台县境内。据考古发掘，在县城西有一座"唐朝墩古城"遗址，曾先后出土了许多从唐至元的砖瓦、钱币等古物，其中包括有不少古阿拉伯银币，甚至还找到一枚日本铜钱，上铸"宽永通宝"四个汉字，为水尾天皇时代所铸。学者们认

① 安部建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王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章第2节。

为墩古城很可能就是唐蒲类县①。据文献资料统计，伊州经罗护守捉至北庭共九百七十里，其中伊州至罗护五百一十里，罗护至北庭四百六十里。从清代驿路里程上看，自惠井子（罗护）西北上乌克塔格山（乏驴岭）奔莫家地沟（赤谷）至长泉、阿克他斯（龙泉）约一百二十里，然后西行九十里至木垒，九十里至老奇台，九十里至古城，九十里至吉木萨尔，共四百八十里，与四百六十里大体相同。可见唐代伊北路沿用至清代变化不大。

伊北路在出哈密五百一十里至惠井子处分出一支，转向西南，经匪草滩与伊西路在赤亭守捉会合。另外设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的伊吾军与北庭之间也有道路可通。在这条路上，哈密之北九十五里焕采沟有汉永和五年碑，哈密之北一百五十里天山庙有唐行本碑（利用班超旧碑刻成），在镇西（巴里坤）之东五里石人子有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在奇台县石城子曾出土有几块云纹瓦当和绳纹筒瓦，显系汉朝官家建筑典型风格的瓦片，后在送至日本的丝路展览会上引起专家们的注意②。说明此路实为汉唐之古道。如汉延和四年（前92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即由今镇西至迪化路③，《西域水道记》有记，通鉴魏永平元年（508年）高车王弥俄突与柔然佗汗可汗战于蒲类海，不胜，走三百里，佗汗军伊吾北山，其中有北山之径道。此处北山即指天山东脉博格达山。裴矩所记北道的东段自伊吾经蒲类海、铁勒，抵突厥可汗庭，即是从哈密经巴里坤，赴吉木萨尔的伊北路，这是北新道的东段，是在以往巴里坤古道的基础上形成的。

---

① 车慕奇：《丝绸之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② 同上注。

③ 《新疆图志》卷791，《道路一》。

北道过车师后王庭之后，又经卑陆、单桓、乌贪訾离等山北小国，至乌孙境地（绥来以至伊犁皆汉之乌孙境），即《后汉书·西域传》记："（车师）后王居务涂谷……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道路从这里再沿伊犁河谷进入碎叶城所在的七河地区。新北道从庭州至碎叶的通道又称碎叶路，是丝路北道在新疆境内西段的主干线。其具体行程按《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条的记载："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今新疆玛纳斯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今巴尔喀什湖——著者注）。"综合文献及考古资料，上段引文中所提到的地点，可大体比定如下：西延城为北庭故城（护堡子古城）外城西城门向外（西）突出部分，亦是北庭城的组成部分；沙钵守捉，即北庭城西五十里之双岔河。据实地考古调查，双岔河北现有一座约百米见方的小古城遗址，城内外散布很多具有唐代特点的陶片，紧邻城的门外东北至北庭故城西门（西延城）之间断续可见有古道的痕迹，沿途有烽燧遗址①，当地群众称其为"唐朝路"；冯洛守捉，据《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条载："凭洛镇在府西三百七十里"，故凭洛镇约在今乌鲁木齐市以北一带；耶勒城守捉，据《新唐书·地理

① 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志》记其东距沙钵城守捉八十里，方位大致在今三台附近；俱六城守捉，《元和郡县志》庭州条记其“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①，方位大致接近今阜康城；轮台在今乌鲁木齐市附近，今地众说纷纭，笔者从乌市南乌拉泊古城说②；张堡城守捉，即元之昌八里，今昌吉县城附近的花园古城；移得建河，《西域水道记》卷三疑为玛纳斯河；清镇军，据《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记，北庭城“西七百里有清海军，本清海镇，天宝中为军”。《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条记：“清海军在（庭）州西七百里，旧名镇城镇，天宝中改名清海军。”岑仲勉先生认为清镇军城在喀喇乌苏东一百八十里安集海一带，并说七百里当九百里之误③。黑水指库尔喀喇乌苏，即查屯河；石漆河，晶河之旧称，俗称精河；车岭，精河之南，努勒台山（今图称婆罗科努山）；弓月城，今伊宁市北霍城一带，吐鲁番吁孜古城。看来这条碎叶路即是从庭州西延城出发，经过今阜康、米泉、昌吉等地，南抵乌市附近的轮台古城，再向西渡玛纳斯河、奎屯河后，南逾婆罗科努山，在今伊宁市北弓月城涉伊犁河，进入伊塞克湖地区，然后经过楚河河谷东口至碎叶城的，全程长三千多里。

至此我们已大致交待了新北道自出现后，逐渐在天山以北地区形成的交通路线。它以庭州为中心与枢纽，向东抵伊州，为伊北路。伊北路又可东入玉门关，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长安；向西抵碎叶，为碎叶路。碎叶作为中亚北部地区的一大重镇，是唐朝政府经营西域的桥头堡，亦是东西经济文化荟萃交流之地。新北道出

---

① （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卷4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4页。

② 参见钱伯泉：《唐轮台位置续考》，《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③ 参考岑仲勉：《庭州至碎叶道里考》，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

现后与两汉丝路北道，即隋唐以后改称的丝路中道沿天山南北麓西行，并且穿过天山，从东到西有许多孔道相连，关系极为密切。如前文提到伊北路出哈密五百余里，在罗护守捉处有一叉道转向西州高昌，并进而西去焉耆，与同时并存的丝路中道在龟兹合。此时的中道出汉玉门关故地（小方盘城）西行经后坑（一名西湖）约百八十里进入白龙堆沙地，再西行过五颗树、新开泉、甜水泉等约二百五十里，出敦煌县界，进入楼兰国东境。这里是一片盐碛地，盐块坚如石，驼蹄流血，所经诸站概无人居，按《水经注》云：蒲昌海水积鄯善之东北，地广千里，有盐泽之称。东去玉门、阳关一千三百里，广袤三百里，西北四次渡塔里木河，出蒲昌县境（唐属西州辖地，现鄯善），过鲁克沁（柳中），抵吐鲁番汉车师前庭之地（交河城）①，两汉戊己校尉屯驻于此。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始称高昌壁（亦称高昌垒），魏晋仍以高昌为戊己校尉治所。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前凉张骏平高昌，改置郡县。西凉、后凉仍为高昌郡。自北凉沮渠无讳承平元年（443年）起，自立为高昌国，王姓屡易，有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王朝享国最久，凡十王，传一百四十一年②。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末王智盛出降，唐以其地为西州。高昌为隋唐丝路中道上的咽喉之地，西北有伊西道与伊州相连，北可通庭州，西去焉耆深入中道。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焉耆王突骑支附强大的铁勒莫何可汗，焉耆入中国的大碛路遂关闭，道由高昌，于是从吐鲁番盆地至焉耆走银山道③。唐太

① 玉门关—吐鲁番道里路线参见《新疆图志》卷81，道路三。

② 参见黄文弼：《高昌麴氏年表》，收入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据《西州图经残卷》银山道条记："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卤，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

宗贞观二年，突骑支请复开碛路，太宗许之。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击，大掠而去，说明当丝路孔道大有利可图，高昌才会有此举。出焉耆五十里有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西域图志》云：按《晋书》铁门应是唐书之铁门关，是唐代开元时期十三"中关"之一①。《晋书·焉耆国传》记："其地南至尉犁，北与乌孙接……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记："今自库尔勒北二十里至岩口，所谓遮留谷，入山径路崎岖。三十里越大石岭，下逼海都河，地处要害或置关地。岑参有《题铁门关楼》及《宿铁关西馆》诗。"《新疆图志·道路志六》云："从紫泥泉驿西行十里上大石岭，三十里出岩口，即古称为铁门者也。"由此看来，铁门关应在大石岭附近，于术守捉在铁门关南二十余里的遮留谷一带。出遮留谷二十余里抵库尔勒，库尔勒是古焉耆西境。《大唐西域记》卷一记，从焉耆西行至龟兹，仅在近焉耆国处越一小山，其后则道路平坦，此小山应指铁门关至遮留谷的一段路。中道出铁门关，二十里过于术守捉城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②。然后从"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川，南临思浑河，及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渡拔

① 杜佑《唐六典》卷6刑部中记：凡京城四面关而当驿道及当驿道而非四面关者，皆为中关，中关一十三，安西铁门为其一。

②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下》。

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二十里至碎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三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①。汉文史料如此翔实地记载了丝路中道自焉耆过库车，再经姑墨、温宿、越凌山，抵碎叶、怛逻斯的道路，不言自明地告诉我们这条通道当时显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这里笔者详细引出这段文字，并对中道上某几处网点略加说明，为的是一来可给下文介绍北道连接中道的交通网络作些铺垫，二来新北道进入七河地区后西去的路线大体与中道（旧北道）越葱岭后西去的路线合，所以我们对上引材料中有关丝路逾凌山进入中亚北部地区的具体路线，结合考古资料再做些说明。

《新唐书·地理志》记中道过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又西北行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新疆图志·道路志五》称玄奘法师"卓锡孤行，自辟涂径经凌山，渡大清池，跨千泉……"凌山即葱岭北原，今汗腾格里山一带。《释迦方志》谓："此路不得赭衣持瓠及声叫，有犯者，龙能飞风雨沙，遇必皆没。"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描述"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

①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下》。

② 《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四》。

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饮，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①。对照上述唐书地志所记横亘在乌孙赤谷城与阿克苏之间的勃达岭，东距姑墨二百七十里，应是汗腾格里山的一道山岭，从山势险情来看，与凌山也极为相像。杜环《经行记》云：“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达岭，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厥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其水岭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岭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数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细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万仞，转堕者莫知所在。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②所以汗腾格里山尽管峻峭，但自古以来就已有穿越它的一处或几处孔道，通过它们便可进入伊塞克湖地区。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讨郅支，引六校军分行，其中三校就是发温宿，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热海）西，走的就是玄奘和杜环记下的这条道。阗池即伊塞克湖，南北两岸均有道路可行。

关于伊塞克湖两岸及其以西的道路，我们可以借助苏联考古工作者们的勘查结果来说明。通过他们在伊塞克湖地区的长期发掘工作，终于在1940年揭示了湖南岸从顿斯克湖湾（Тонского）到丢普斯克湖湾（Тюпског）之间为古老的上巴尔斯寒地区（Верхний Варсхан），以及从塔拉斯向东到楚河河谷道路上的下巴尔斯寒城。从中西交通的角度上看，位于伊塞克湖南岸的上巴尔斯寒地区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从中亚到中国商业贸易路线上的一个分界地

---

①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② （唐）杜佑：《通典》卷193，引杜环《经行记》。

区，处在东西突厥斯坦之间，居于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无论是上巴尔斯寒的南部边界，还是丢普斯克城（第七个居民点）向北，都有客栈，沿伊塞克湖北岸它们常常相遇。穆斯林学者库达玛记述巴尔斯寒地区是由一组村落（四个大村，五个小村）构成。其中七个村庄遗址均已被找到。其统治者出身于葛逻禄族，城内有士兵六千人，居民主要是九姓回鹘人①。从上巴尔斯寒地区东去中国，南下大宛，北上碎叶，均有道路可通。去中国的道路大约须通过杜卢加尔特（Тургарт）隘口，从大宛往巴尔斯寒的直接通道经过乌兹肯特（Узгент，现在的乌兹干 Узген，吉尔吉斯奥什地区 Ошской 中心），穿过雅瑟（Ясы）隘口，阿尔普（Арп）山谷和阿特巴什城（Атбаш），此城在距阿特巴什河和喀喇昆河汇流处不远的一片山丘上，距大宛、巴尔斯寒和东突厥斯坦的边界都是等距离的六天路程。从中国到中亚的商业贸易路线经过上巴尔斯寒地区后（大约相当于唐书中所记的冻城、贺猎城一带），向北进入游牧民居住的富庶的卓克明（Чонкенин）谷地。道路沿卓克明河右岸北行，在勃奥姆斯（Поомского）狭谷附近穿过楚河，一直伸向碎叶城，进入人口稠密的楚河地区，即汉籍所谓碎叶川。公元13世纪穆斯林地理学家库达马曾提到，从巴尔斯寒地区到碎叶，沿水草牧场的商道行程有十五天，而突厥驿送只需三天②。

丝路从碎叶向西，顺着吉尔吉斯阿拉套山，沿楚河左岸而行，

---

① 参见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1950г.（《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

②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Ⅱ. Ч. Ⅰ. 1964 г. М. стр39.（[苏]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七河简史》，莫斯科1964年版，第39页）

约二法尔沙赫[①]处有布金肯特城(Пунджикет),可以比定为肯斯梅契城(Кысмыч),西去二法尔沙赫为拉巴肯特城(Набакет)。8世纪时,这座城市作为西突厥汗们的大帐而为阿拉伯人所知晓[②]。塔巴里(9—10世纪)由于参加突厥人反阿拉伯的斗争,也详细报道了拉巴肯特城。这座城曾移居了大量的粟特人,8世纪初穆格山出土的一份粟特文书中提到它。从简短的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发掘,如7—8世纪粟特人的建筑物、佛教寺庙、大量的粟特碑文、景教遗物等充分显示出这座城市的首府特点[③]。拉巴肯特城西距朱里(Джуль)十五法尔沙赫,即位于今伏龙芝城东约九十里处,现在阿克别什姆城(Ак-Бешим)东约三十五公里处的奥尔洛夫卡村(Орловка)大致附合拉瓦肯特城的方位。它很可能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上提到东距碎叶四十里的新城,是楚河河谷中又一处巨大的商业中心。商道从这里分成两条,一条通往碎叶,一条穿过吉里·阿雷克(Джили-арык)山口,通往伊塞克湖岸。这个至今仍叫吉里的山口,据历史学家加尔吉兹的解释,词的原义是"狭而险",在拉瓦肯特与山口之间,还有一座商业城叫克尔明肯特(Керминкет)。从拉瓦尔肯特西去2法尔沙赫处是基尔明拉伊村(Кирмирау),意为红水、红河,Кирмир即Красный,而复母音ау与аб(水、河)同义。К. М. 拜帕柯夫将它比定为靠近红河的波克洛夫斯

---

① 古波斯里制,一法尔沙赫约等于六公里。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8.(《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8页)

③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Ⅱ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32.(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哈萨克斯坦科学出版社,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32页)

克(Покровское)城①。从基尔明拉伊村向西经二法尔沙赫至楚梅什克(Чумышск)古城,П. Н 科热茂阔提到“楚梅什克古城遗址有相当坚固的外墙防御设施,使其在带有长墙建筑的城镇中具有特殊地位,宏伟的建筑显示出它是重要的军事、行政中心”②。再经四法尔沙赫为萨雷格(Сарыг)城。阿拉伯地理学家库达姆和伊本·赫尔塔特别注意到萨雷格城距阿克别什姆四法尔沙赫,距朱里七法尔沙赫,而红河城的位置最附合这一距离。它距阿克别什姆二十五公里,距伏龙芝三十五公里(有一法尔沙赫的误差)。另外,马格吉西和马赫木德·喀什噶里提到,在巴拉沙贡附近有一座带城墙、壕沟和堡寨的乌尔杜(Урду)古城,根据他们不谋而合的记述可将乌尔杜视为红河城。于是可得出的结论是,考古发掘的红河城即是 11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到的乌尔杜城和 10 世纪地理学家提到的萨雷格城。发掘表明,城市在形成之前,布满了粟特人的防御性房屋,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就像一座小城堡,表现了当地粟特移民家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本世纪初,在红河城遗址上找到大量古物,表明城市的完全繁荣是在葛逻禄时代③。从萨雷格城起,丝绸之路稍北向西经七法尔沙赫便是朱里城。朱里(Джуль)很可能是一个突厥词,意为草原。巴托尔德认为它就是现在的伏龙芝城。实际上朱里在伏龙芝城西边约十公里处,很可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 (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33. (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版,第 33 页)

② Кожемяко П. Н. Ранне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города и поселение Чуйской долины, ХР. 1959 г. стр112. (П. Н. 科热茂阔:《楚河河谷的中古早期城市和村镇》,伏龙芝 1959 年版,第 112 页)

③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21. (《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21 页)

能是考古发掘的索库鲁克(Сокулук)城。因为朱里一直存在到15世纪,而在索库鲁克城里找到大量13世纪的古物可以作为比定意见的重要依据①。从朱里城向西四法尔沙赫处有一个大城镇哈兰·朱汪(Харран—джува),10世纪作者马克吉西报道说:"城内异教徒占优势,而它的苏丹是一个穆斯林。城市四周是围墙,中央是城堡,城堡内住着德赫干们。"②所谓"异教徒"一词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突厥游牧民,他们在城市的名称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其名称的第二部分"朱汪",是突厥语"巨大"。这一古城在阿克苏河右岸,在楚河河谷的所有城市中,它更靠北面,其附近还有一系列村镇。在古代游牧民居住区,哈兰·朱汪城是一个中心,它维护从这里向北分布的游牧民聚居点以及游牧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贸易安全。此城位于自然形成的高地上,并以坚固的防御围墙为特征③。从哈兰·朱汪向西四法尔沙赫有鲁兹肯特(НУзкет)城,又向西八法尔沙赫有阿斯巴拉(Аспара)城,这也是两个古老的城市,具有古代粟特城堡的所有特点④。伯恩斯坦确定其位置是日什多别城(Шиш-тобе)⑤。根据鲁兹肯特在史料中被称为"大村庄"和"城",而附近五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 (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31.(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31页)

② С. Л. 沃林:《关于塔拉斯河谷及毗邻地区9—15世纪阿拉伯和波斯文史料报道》,见《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集》第8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72—92页。

③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32.(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32页)

④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Ⅱ. Ч. Ⅰ. 1964г. стр282.(《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1册,莫斯科1964年版,第282页)

⑤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24-25.(《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24—25页。

十五至六十公里地段内以日什多别为最大城址，故伯恩斯坦的比定应该是正确的。从伏龙芝向西的这些古城中间分布着设防的客栈和坚固的堡垒，其防御工事虽然规模不大，但都带有高墙，墙的中央和各角设有塔楼，如门布拉克地区“十月风暴”村庄内有一个商队客栈式的古城遗址，叫阿巴尔扎日（Абарджадж），存在的时间为公元6—12世纪，它至今还保留了另一个名称：梅布拉克（Мыбулак），意为一千条泉水，即玄奘所记：“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钖，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害，有诛无赦。’此群鹿得终其寿。”①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道里邦国志》记阿巴尔札日地有丘岗，环丘冒出泉水千眼，汇为东流之河，人们在此地猎取黑雉。道路从楚河河谷转向塔拉斯河谷时经过下巴尔斯寒，它位于塔拉斯以东三法尔沙赫处②。谢里果娃《中世纪的塔拉斯》指出，今江布尔城以东二十公里处有一座托尔特戈里（Тортколь）城，即是下巴尔斯寒城。而从楚河河谷到塔拉斯河谷的道路上，最后一个居民点是卡斯拉巴斯（Касрабас）城。伊宾·赫尔达特别赫述及此城“是一个暖和的地方，葛逻禄人在这里过冬”③。塔拉斯城是塔拉斯河谷的中心城市，其周围布满大大小小的若干城市，道路至此分为两大方向，一是向西南经奇姆肯特（Чимкент）、伊斯宾扎

① （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77页。

② С.Л.沃林：《关于塔拉斯河谷及毗邻地区9—15世纪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报道》，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集，第8卷，1960年版，第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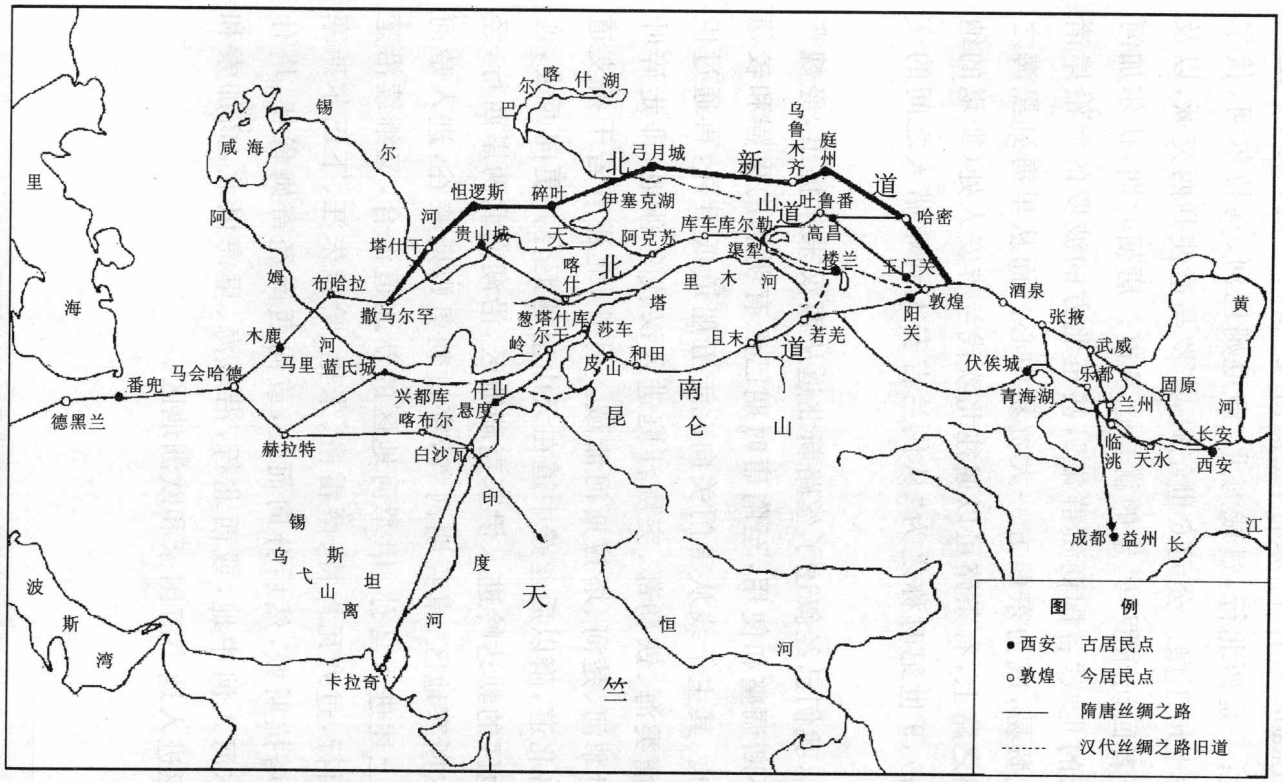
③ 同上注。

普(Испиджаб)、塔什干(察什)至俱占堤(霍占),过锡尔河,进入河中地区;一是西北行,过咸海北,涉厄姆巴河、乌拉尔河、伏尔加河到君士坦丁堡。公元6世纪时,东罗马遣使到西突厥,以及西突厥使者回访东罗马,走的就是这条道。唐朝时期,伏尔加河下游的依的儿城"各国商贾群集",甚至北方的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也来此贸易,成为东西方一大贸易中心。而从里海到黑海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有条路可以通往北欧伐兰吉安人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9世纪时称之为"从伐兰吉安人到希腊人之间的交通线"①。

至此,我们已经叙述了丝路新北道从西汉末年提出,经魏晋时期的不断调整和使用,至隋唐时期已经有明确的里程和较稳定的走向。其主干线从玉门关向北走五船道抵伊吾,再通过伊北道,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汗庭进入汉代乌孙地,即走碎叶路进入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另外,北道有若干条支道与汉丝路北道,隋以后丝路中道在天山南麓汇合并更向西去,通过凌山地区的勃达岭进入伊塞克湖地区,沿湖南北两岸西行,经过上巴尔斯寒地区、卓克明河谷,穿过勃奥姆斯峡谷,进入楚河地区,与上述进入乌孙、伊犁河地区的新北道汇合,又继续沿楚河河谷西行,过列瓦肯特、萨雷格、朱里、哈拉朱汪、下巴尔斯寒等城,抵塔拉斯城,然后分向而去,或向西南经奇姆肯特、塔什干渡锡尔河入河中地,或西北行,沿咸海、里海以北,高加索和小亚细亚进入地中海国家和欧洲地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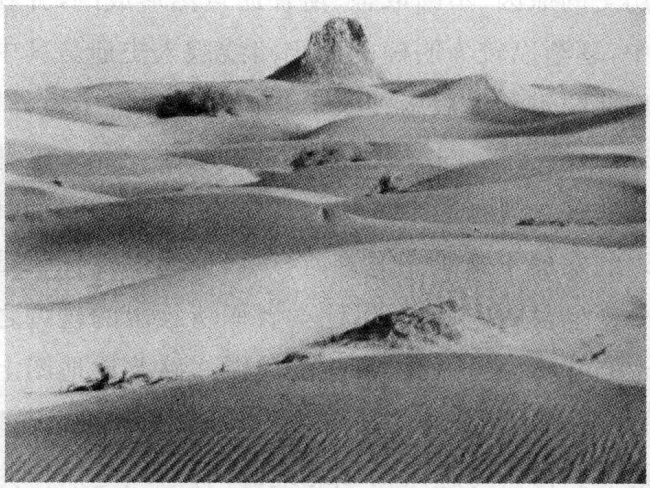
① 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地图8 中亚北部与丝绸之路的发展（9世纪前）

资料来源：据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图1《丝绸之路图》修改。

此时新北道在早期草原之路、汉魏旧北道的基础上，已从分段组合阶段趋向完全通畅①。对于我们来说，搞清楚丝路北道出葱岭后，在中亚北部七河地区的要站路线和里程走向，无疑能够更加显现出新北道的重要，看出中亚北部地区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和地位。



图版 9　天山阿拉沟口唐代烽燧遗址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① 关于唐代中亚一段（特别是碎叶路及其以西）丝路的走向里程，上世纪 90 年代末许序雅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也做了非常精细的考证。作者结合西方史料和考古成果，纠正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不少谬误之处，同时对丝路到唐前后的变迁有所补正，可供参考。（参考许序雅博士学位论文《唐代丝绸之路和中亚历史地理研究》[浙江大学，1998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及《〈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 4 期]等文）

第三节 交通网络和重要城镇

丝绸之路是为适应种种政治、经济的需要，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种种历史的原因，不断取舍、增补而自然形成的，并在长期的发挥作用中，逐渐以较为明确的固定路线载入史册。其中除上述东汉以前南北两道和以后南、北、中三道为丝路主干道外，还有许多辅助支道，纵横交错，编织成一个密密的交通网络。这些旁道支路将主干线从多处沟通连接起来，使之更加四通八达，而其自身也随丝路主道的发展不断扩充完善，在东西交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季羡林先生曾明确指出，以往学者们所绘出的丝绸之路与实际行走的道路并不完全一致，真正的丝绸之路要比地图上复杂得多①。这里我们仍将目光集中在新北道出现后的中亚北部地区。

新北道以伊吾作为进入西域北地的门户，以庭州作为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枢纽，以轮台作为西通碎叶的又一重镇，不仅三点连接成北道主干线，成为横贯东西的大动脉，而且各自向外尚有一些辐射支线。其中主要是向南越天山与中道上一些重镇相通，使循天山南北两麓西去的北中两道“襟带相连”，可以往来穿插而行，处在更大的选择和机动范围内。如玄奘西行抵伊吾停留十余日后，本欲绕道北行，避开高昌，过可汗浮图城，南转至焉耆。后因高昌王遣使再三邀请，才改道过南碛（莫贺延碛）至高昌白力城。玄奘出伊吾往高昌的路线是，从哈密西行，六十里头堡（苏木喀喇

① 季羡林：《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灰)，二十里二堡(阿斯塔纳)，六十里三堡(托和齐)。从三堡起分南北两路：北路经沙枣园、鸭子泉、瞭望墩、一碗泉、东盐池、西盐池、七克塔木(在此以前的路段与伊北路合，七克塔木即罗护守捉处)、特库斯、辟展、汉墩、连桥、森尼木、胜金口等站，商旅多取此路(或称小南路)，亦即五船道；南路经四堡(拉布楚喀)、五堡(哈喇都伯)、察罕、罗海、内勒滚、阿萨尔图、伊里克库木，察克玛克塔什、额什墨、楚辉(白力城)、鲁克沁至高昌王城哈喇和卓①。此路南临莫贺延碛，地少水草，行涉艰难，但却因地较平坦，里程较短(北路全程九百五十里，南路八百三十里)，故隋以前多取此路，亦即焉耆王突骑支请求复开的大碛路。至此可以看出，伊州和西州扼守住东部天山南北两个端口，是丝路北中两道西去的门户锁匙，而它们之间又有道路相通，在东西贯通、南来北往的丝路交通网上，首先表现出了襟带相连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以北道上最大的交通枢纽——北庭为中心，密织成了一张交通网。除前文已提到的，在横贯东西的北道交通大动脉上，以北庭为中心，向东有伊北路，向西有碎叶路外，还有四面八方伸出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北庭至回鹘牙帐，再至长安的回鹘道；从北庭至西州的乌骨道、他地道等六条道；从北庭经轮台至焉耆等。下面我们分别作些介绍。

回鹘道，即唐建中二年(781 年)北庭节度使李元中，四镇留后郭昕假道回鹘朝奏之路。尽管它是在唐上元元年(760 年)以后，吐蕃占据了河西，遮断内地与西域交通，唐朝政府不得已假道回鹘，才习用此称，但在历史上，这条道路早已出现，并且是漠北地区通

① 参见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校注》，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6 页。

过阿尔泰山、巴里坤进入西域的一条重要通道。突厥卢尼文①《毗伽可汗碑》记："余往征突骑施，越金山山林，至曳咥河外，余扑击。"②即是横越阿尔泰山，过巴里坤草原，西去玛纳斯河下游直入七河地区的。回鹘路大致可以分作从北庭至回鹘牙帐，从回鹘牙帐至长安这样两大路段。《元和郡县志》卷40记，从庭州"东北至回鹘牙帐三千里"，中间经过郝遮镇（在蒲类东北四十里，当回鹘路），特罗堡子（在蒲类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回约二十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唐蒲类县大致在今奇台附近，《新疆图志·道路志一》奇台条记其北行路线："城北十里头屯，十里二屯，二十里北道桥（郝遮镇），一百二十里黄草原湖驿，八十里将军戈壁，折东八十里苏吉，八十里元湖驿接科布多南境台路。"回鹘牙帐约在科布多东北方向的哈喇巴喇哈逊。从北道桥至元湖驿曾是元太祖西征时所走之路，直至近代仍是从蒙古至新疆的常用之路。从回鹘牙帐至长安即是贾耽记边州入四夷之七道中的第四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即由中受降城向西经天德军至西受降城，西北出高阙（今狼山口）至碛口鹳鹈泉，再西北一千五百里至回鹘牙帐。反之，从西受降城可以向南经灵州（宁夏灵武附近）或东南经丰州、夏州或向东经天德军、中受降城向长安③。

从庭州至西州（即车师前后王庭之间）有多条支道可通。据

---

① 古代突厥民族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因与古代北欧日尔曼民族使用的卢尼文外形相似而得名。突厥汗国、回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等都曾使用过这种文字。另外，由于这种文字的重要碑文曾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流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鄂尔浑—叶尼塞文"，还有"兰突厥文"、"西伯利亚文"等名称。（参见《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1982年，北京）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14页。

③ 严耕望：《唐代长安灵州道及灵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载《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5卷1期，《唐代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考》，同书，6卷1期。

《西州图经残卷》(见《敦煌石室佚书》)记载,西州州内十一条道路中,有八条向北越博格达山至庭州,其中尤以他地道、乌骨道、赤亭道为要。赤亭道即前文已提到过的伊北道出伊州向西五百一十里至罗护守捉处后,折向西南经赤亭守捉至西州的一条支道。他地道据《图经》记:"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此道在《新唐书·地理志》卷40西州交河县条下也有反映:"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城,至北庭都护城。"《图经》和《地志》所记从交河城通北庭,仅此一道,它是北庭与西州之间的主要通道。宋王延德从高昌至北庭走的也是这条道。《新疆图志》道路一记,唐署交河县北行经柳谷度金沙岭①至北庭都护城。宋王延德使高昌,自前庭至后庭,经雪山,陶葆廉《辛卯侍行记》谓古之金岭,当为济木萨东南一带之山。延德经行盖今柏杨河东北经四道桥之路,今此路商人尚有行者,蒙古游牧记补注谓汉时车师前部通后部金满城之路当在今之济木萨地。现吐鲁番地区牲畜转场至吉木萨尔也走这条路。乌骨道据《西州图经》记:"右道出高昌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险石麓,唯通人径,马行多损。"贞观十六年(642年),安西都护郭孝恪从高昌"自乌骨邀击"处月即走此路。其路线大约是从高昌故城(哈拉和卓)②西北走木头沟或玉门口③向北庭,这是西州至北庭路程最短的一条捷径,全程只有四百

---

① 金沙岭即天山博格达峰,《读史方舆纪要》曰:"在庭州东南,西州西北,此西域之金山也……亦谓之金沙岭,一名金岭……唐贞观中尝置此为戍守处,曰金岭城。开元中改西州曰金山都督府,亦以山为名,亦谓金娑山。"

② 在吐鲁番二堡(阿斯塔拉)之南,与交河城相距八十里。

③ 《西域图志》卷14:"玉门口在哈喇和卓西北十里……为土尔番及哈喇和卓往山北大路,入谷迤西北行十余里出北口。"

里，但因“峻险石麓……马行多损”，故不常用。在乌骨道与赤亭道之间，又有新开、花谷、移摩、萨捍、突波等五道。从《西州图经残卷》的记载看，花谷道“出蒲昌县界西合柳中（谷）向庭州，丰水草，通人马”；移摩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牛车”；萨捍道“出蒲昌县萨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牛车”；突波道“出蒲昌县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牛车”；新开道经文残缺①。这五道均出蒲昌县界，向西或西北合柳谷，至庭州的里程也基本相同，可见是一排穿过博格达山，相距较近的平行路线。另外，西州至北庭还可以走西北方向的白水涧道。《西州图经》记白水涧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马车。”处月已西诸蕃分布在轮台至北庭一带。《太平寰宇记》卷156西州条：“西北至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可见唐轮台县正在白水涧道上。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呈三角形分布在天山东北地区的伊、西、庭三州之间，均有道路可以互通，构成一个地区交通网，这对于丝路经过这一地区时获得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对于稳定唐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无疑是很有益的。

此外，中道与新北道南北相接之地还有焉耆、库车和姑墨。《旧唐书·西突厥传》记：“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此南庭在龟兹北三弥山一带，北庭即可汗浮图城。从焉耆往北只有一条主要山道，即从今焉耆北到和静，经巴仑

① 《西州图经残卷》载《敦煌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其中后书阙首八行，无赤亭、新开二道，首八行之文，残缺不完，三行残存“右道出蒲”四字，证以后文，应脱“昌县界”三字，因知此两道并出蒲昌县界。参见冯承钧：《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一书中。

台越天山胜利达坂至轮台，再经碎叶路至北庭。另外，丝路中道从东界吕光馆起向西进入龟兹道后，有道路向西北经太平渠、北大渠、喀喇木墩，从垓布齐山口进入山峡，再经小裕勒都斯（回语裕勒都斯，星也，谓裕勒都斯河源发如星）、大裕勒都斯、巩古斯达坂（即空格斯）出境，接伊犁东南支路。《准葛尔行程记》曰："自小裕勒都斯冬夏皆宜，惟季春犹雪，遇风即结成霰，自此路分两歧，取其捷者，自大裕勒都斯八十里往鄂惇库尔山口，又五十里过鄂惇库尔山岭，若取其坦者，自大裕勒都斯过乌纳罕达岭至空格斯河源。"所以从焉耆西北行，过大小裕勒都斯山可以达伊犁，说明《汉书·西域传》载焉耆北与乌孙接实为不误。

库车，除可通北庭外，还可通伊犁。《新疆图志》载"库车城北四十里（多村庄），过苏巴什，沿铜厂河折西北入山峡行（山高峻，蜿蜒而上过此乃平易）有径路达伊犁，约马行十余程。"《新疆识略》记：库车"至扣克纳克达巴罕六百里通伊犁"。《新疆要略》记："库车西北至伊犁一千七百余里。"总之，库车至伊犁，有支路可通，两地又各有向西进入伊塞克湖和楚河流域的道路，在楚河河谷东端的碎叶一带合为一道，西去成为新北道在中亚境内的主干道。

姑墨，即阿克苏，《汉书·西域传》称："（姑墨）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可见姑墨位于一条穿过塔里木盆地，连贯南北的支线上。曾有一些往天竺的僧侣，抵北道佛教中心龟兹后，又慕名南折于阗，再向西行。东晋法显，稍后的智猛及宋初的行勤，往天竺皆经此道。汉与乌孙交通，有时亦由于阗北上姑墨，再往乌孙。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北道自从开辟以来，与旧北道，即与后来的中道之间保持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其本身某段路线就

是在旧北道基础上形成(如逾葱岭后出大宛、康居、奄蔡的路线),或者与中道襟带相连,如北庭与高昌、焉耆、库车之间,伊犁与焉耆、库车之间均有支道相连,加上并行的一些辅助道和连通南道的支线,如疏勒至莎车道,姑墨至于阗道,构成一个四通八达、东西南北往来均有道路可循的交通网,反映出在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并用时期,东西交通的便利与通畅。

最后,北道上新老城镇的不断突起和发展,贸易网点的迅速增加,也反映出丝路贸易的盛况以及新北道的突出地位与作用。新北道上从东向西,重要的府州城镇有伊吾、北庭、轮台、弓月、碎叶、塔拉斯等,下面我们再逐一作些介绍。

1. 伊吾,现称哈密。《后汉书》为伊吾卢,《晋书》为宜禾县,《隋书》称伊吾,唐置伊州。蒙古语为 Khamil,《辛卯侍行记》云:"缠回(Vigurs)之称哈密,皆曰哈木尔(Kamul)或呼库木尔(Qomul)。"① 哈密北枕天山,南临莫贺延碛,是出玉门后千里戈壁中一块较大的绿州。很早时起就有行旅为取捷径,从武威西北行,穿戈壁进入哈密。魏晋以后,罗布泊水缩减,楼兰古国破灭,一条新北道逐渐形成,哈密成了东西通往的孔道。作为新北道东端的第一大站,道路从它北出博格达山进入巴里坤草原后,沿天山北麓一直西去。南去吐鲁番折向西可步入汉丝路北道。对哈密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要站位置,清人祁韵士在《西陲竹枝词》中写道:"玉门碛远度伊州,无数瓜畦望里收。天作雪山隔南北,西陲锁钥镇咽喉。"正因为如此,哈密自古以来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两汉时,在哈密地区汉匈军队进行了长期的拉锯式争夺战,所谓"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

① 冯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页。

吾，以制西域焉”①。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耿忠大破匈奴呼衍王，始在此筑城，留兵屯守，置宜禾都尉，以后仍屡置屡撤。东晋时，前凉张骏取伊吾、复置都尉。隋大业六年，设置伊吾郡。太宗贞观四年平定高昌之后，少数民族首领石万年率七城降，唐置西伊州，六年后改为伊州，天宝初为伊吾郡，乾元初复为伊州，辖伊吾、柔远、纳职三县。作为新北道上的第一大站，伊吾与高昌、鄯善并列，成为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要地。

2. 庭州，新北道在新疆境内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不仅处在东西交通干线上，而且南越天山，可通交河、高昌、焉耆、库车等地，实为天山北部一大交通枢纽重地。《新唐书·高昌传》称之为可汗浮图城。《旧唐书·地理志》记：“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辍耕录》所谓“高昌以北名别失八里，译言连五城”。别失八里多出现在《元史》中，庭州置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下属四个县，州治在金满县。《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下记：“长安二年改置北庭都护府，按三十六蕃，开元二十一年改置北庭节度使，以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原书注文称州西北去突骑施三千余里，北去坚昆七十里，东去斩啜一千七百里，可见当时庭州是唐设在天山北部前沿防卫阵地上的堡垒，管辖伊、西、庭三州之军，其中瀚海军就设在北庭都护府城中，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天山军设在西州城内，开元二年置；伊吾军设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景龙四年置②。唐贞元五年（790年）庭州为吐蕃所陷。西州回鹘（亦称高昌回鹘）时期，这里实为回鹘王避暑之一陪都。宋太平

① 《后汉书》卷88，《西域传》。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

兴国6—8年(981—983年)王延德使高昌时,回鹘王正避暑于北庭,故王延德使高昌记中论及高昌回鹘地域时说:"盖尽有汉前后庭地矣。"庭州故城遗址,经考古工作者先后多次实测踏查,确定为今吉木萨尔县北护堡子古城,古城可见有内外两重,呈不规则南北长方形。外城周长近五公里,夯土版筑。有城门四座,仅北门保存尚可,城四角有角楼,城墙外部筑敌台和较密集的马面,外绕护城壕,内城周长约三公里,城内遗址破坏严重,采集的遗物主要为陶器,还有唐代钱币、刻花石球、铜镜、蒲类州之印及莲花纹砖、瓦当等。清代在城内发现过唐金满县残碑。除唐代文物外,也有高昌回鹘时期及元代的陶、瓷器等。综合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资料,考古工作者认为:"北庭故城平面布局及防御设施构筑特点使用了传统中原地区的筑城技法。这个规模与设置,与其政治、军事地位是完全相当的。"其"外城可能始建于初唐,后经两次修补,内城可能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其废弃当在元末明初"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提到"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其俗帐居,随逐水草",其城内"汉户,皆龙朔已后流移人也"。而游牧民的"帐门皆向东开门,向慕皇风也"②。汉文化对游牧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3. 轮台。西域历史上汉唐时期均有轮台当丝路孔道,是引起诸多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古地。汉之轮台,在天山南麓,即今新疆轮台县地。《史记》作仑头,所属乌垒城是西域都护府治所之地,常有驻军屯田,为汉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大重镇。唐之轮台,在天山北麓,今乌鲁木齐市附近,具体方位众说纷纭,迄今无定论。有

---

① 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

认为与今米泉县大草滩古代城址相当①，或认为故地在乌鲁木齐市南约十公里的乌拉泊古城（烂城子）②，还有主张“轮台地望正在今昌吉境内，今昌吉县城附近有唐代破城子一座，其中曾发现唐代莲花砖遗物，或即唐轮台遗址所在地”③。尽管轮台古城安在，还有待更新的考古资料来确定，但据文献史料记载，轮台为唐代丝路北道上的一座重镇则是无疑的。《新唐书·焉耆传》记，当时丝路南北中道上分别设有征收西域商贾税的据点：“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收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轮台是北道上设置的唯一税卡，其经济位置重要显然可见。轮台又是北庭的西大门，自碎叶、伊犁，沿天山北麓经北庭东去内地的道路必经此地。从轮台南逾白水涧道（今达坂城至吐鲁番西北的白杨河天山峡道）行三百多里可抵西州西境，扼守住焉耆的通道，是唐代连接天山南北丝路通道的又一个网点。曾身为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和瀚海军使的封常清就常常驻守轮台，跟随封常清去北庭的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就曾在轮台写下十余首记事诗，其中不乏描绘轮台景物和史实的脍炙人口的诗句。诸如“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成为我们今天

---

① 王有德：《再谈唐代轮台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钱伯泉：《唐轮台位置续考》，《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林必成：《唐代“轮台”初探》，《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③ 薛宗正：《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研究唐代轮台和北庭历史、地理的可贵资料。

4. 弓月。唐代弓月是丝路北道上离开新疆境内的最后一个大城镇，亦是西突厥后期的牙帐。《新唐书·西突厥传》曰："突骑施乌质勒……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故址在伊犁河上游伊宁县境吐鲁番圩子故城（一说是尼勒克县的古城遗址）①。唐时弓月城西去接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东去经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和西州，南通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也是丝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交通贸易网点。从弓月穿越天山抵龟兹的道路，早在汉代已经开通，当时居住在伊犁河一带的乌孙，就常常取道龟兹去长安。今拜城北，通往喀拉克达格、额什巴什山谷的博者克拉格沟内，尚存东汉永寿四年（158 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城诵"的汉文隶书石刻②，可见这里是汉代乌孙通龟兹的捷径，唐代弓月城至龟兹取此道。《旧唐书·王方翼传》："永隆中（"隆"应作"淳"，682—683 年间），（十姓突厥阿史那）车薄反叛，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兵救之，至伊丽河，贼前来拒，因纵击，大破之。"很可能就是走这条捷径。另外在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高昌县上安西都护牒"与共出的另一文牒（均残），记录了一件民事纠纷的诉讼案。前件记叙的是胡人曹禄山控告京师汉人李绍瑾于弓月城借其兄绢二百七十五匹，同往龟兹，并带有"驼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口鞍衣

---

① 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回顾 1982 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3、4 期。

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4 页；《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清理简报》注 4，载《文物》1972 年第 1 期。

裳”①。后其兄不知下落，运往龟兹的绢财也出了差错。后一件是名叫“绍瑾”的陈辞录记，其中提及禄山告他，并有会练之日，有一名毕娑在场，当绍瑾来时，毕娑从弓月城向西去了，今不知在何处。这件当年打到安西都护府转高昌县处理的民间官司反映出，弓月城向东向西均可通行，而且城内向私人一次就可借到二百七十五匹绢，可见弓月城当时既是中西交通大道上一要津，亦是丝绸贸易转运站，在这里聚积贮存了大量的丝织物，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离开弓月城西去，下一个北道上的重镇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碎叶了。

5. 碎叶，是新北道进入七河地区的第一大镇。它依山靠河，位居要冲。东面从北向南依次衔接北庭路、安西路，均可通达长安；西面与塔拉斯路接，南下可进入河中地，再向西可远交大食、大秦，西北沿里海、黑海远去，可进入俄罗斯和东欧之地。这种交通四方、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其以对东西交通和丝绸贸易的特殊作用而名留史册。新旧唐书、《大唐西域记》、《通典》引《经行记》、《元和郡县志》、《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域水道记》，以及9至11世纪的穆斯林文献《道里邦国志》、《税册》，波斯作家的《世界境域志》、《记述的装饰》等，都从不同方面记述了它的自然地理及历史情况。其中最早提到碎叶城的是7世纪的中国史料，即贞观初，玄奘西行经过此地，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

①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

糜、麦、蒲萄，林树稀跌。气序风寒，人衣氈褐。”①素叶水城即碎叶，因碎叶水（又作细叶水、睢合水，即今巴尔喀什湖以南之楚河）而得名。碎叶与楚河地区其他粟特人建筑的城市不同，自从玄奘访问它时起到11世纪一直是汗的大本营。即从西突厥统治者算起，直到突骑施和葛逻禄时期。公元766年葛逻禄被击溃后，汗帐向西迁徙，依次为巴拉沙衮、列瓦肯特、乌尔杜。在穆斯林史料中，它出现在从9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的文献中。根据库达玛撰《税册》②的意见，碎叶西距列瓦肯特四法尔沙赫，位于楚河南岸群山之中。这与中国史籍的记载“索虏城在大河（今楚河）南，城已圮，唐碎叶镇城故墟也，渡河百里逾山丹岭”③以及《唐书·地理志》“碎叶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相符。1939年苏联楚河考察队的工作人员认为当时揭示的洛沃罗些城（Новоросейское）很可能就是碎叶④。但上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研究人员和外国学者相当肯定地指出碎叶位于托克马克附近的阿克别什姆遗址上⑤。阿克别什姆城是5世纪以后到10世纪之间，吉尔吉斯北部一个大的商业、手工业、农业和文化中心。城内居住着不同种族的人民，有粟特人、突厥人、

---

① （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1页。

② 著者全名库达玛·本·贾法尔，生年不明，卒于公元958年或948年，所撰《税册》成书当在回历316/公元928年以后。所据材料大部分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相同（指《道里邦国志》），惟加了许多注释性说明。维·米诺尔斯基疑其原为胡尔达书叶边的注释，后录入正文。此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书》第6卷，莱顿，1889年出版。

③ （清）李光庭：《汉西域图考》卷1，见《清朝藩属舆地丛书》第5册，台湾国风出版社1967年版。

④ 参见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21-22.（《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第21—22页）

⑤ 参见 G. 柯劳松：《阿克别什姆—碎叶》（收入《第25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莫斯科1965年）；K. M. 拜帕柯夫：《古城碎叶和巴拉沙衮述论》等文。

叙利亚人，甚至定期还有中国人。这座商业性很强的城市无论是与中亚河中地区，还是与东突厥斯坦及中国本土都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和文化联系。1953—1954 年在阿克别什姆城进行发掘的五个考察目标，分布在城市的所有主要部分，反映出 8 世纪时城市面积约为三十五公顷。公元 748 年（天宝七载）城市被毁后，又向东南方向修建了面积为六十公顷的新城。城内有高大的城堡，城市四周有大大小小封建领主的城堡、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宅院，用墙围绕起来的耕地和果园。肯兹拉索夫在《1953—1954 年在阿克别什姆古城的考古勘查》中断定，该处考古发掘提供的材料主要属于 5—10 世纪，个别属于 11 世纪。11—12 世纪喀喇汗朝时期，城市已基本成为一片废墟，而文献史料上也不再提及碎叶，取而代之的是 Орду 城（虎斯斡尔朵），即巴拉沙衮，作为喀喇汗朝和喀喇契丹人的首都，它一直存在到 14 世纪①。

碎叶是唐代鼎盛时期，中国最西北边疆的军事重镇。从调露元年（679 年）唐朝政府平定阿史那都支、李遮匐叛乱之后，安西都护兼首任镇守使王方翼扩筑碎叶城，到开元七年十姓可汗突骑施首领苏禄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首尾四十年里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虽屡失屡复，仍始终隶属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的管辖。这里是丝路北道与中道逾天山、葱岭后的咽喉，兼控西突厥两厢十姓，可谓唐朝安在西陲边防线上的一座桥头堡，其军事要地的作用通过安西都护常驻节其地即可明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28.（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出版，第 28 页）。

显地看出来。唐朝几次平定西突厥的叛乱都与碎叶有关，其中突出重要的一次是，仪凤二年(678 年)唐高宗命裴行俭以护送久住京师长安的波斯王子泥涅斯回国为名，曾抵达碎叶。裴行俭此行真正目的在于声东击西，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疏通被堵塞的北部交通，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统辖，结果如愿以偿。裴行俭计擒都支、遮匐，“立碑碎叶而还”①。次年(调露元年，公元 679 年)留为安西都护的王方翼加筑碎叶城。《唐会要》卷 73《安西都护府》条记：“调露元年九月，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作屈曲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新、旧唐书王方翼传所记略同。唐人张说记扩修的碎叶城：“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番承风谒贺。”②于是唐朝政府在西域诸国中的威望得到一次大的提高。

唐朝政府在碎叶地区驻有保大军，军乃边疆最高一级的驻防单位，少则八九千人，多则二三万人。唐制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经营屯田，唐节度使参谋检校弄部员外郎王济，就曾在这一地区组织过屯垦和修建水利设施。元初耶律楚材西游至此还见过王济碑，并就目击记述了这一带的农耕遗迹：“川北头有钜丽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时凿渠道南山，夹为石闸以引水，闸背跨坚岸。”③屯田是保卫边疆的重要谋略之一，大有“益积蓄，省大费”④，“因田积谷兼兵民之力，省飞挽之劳，比夫负海转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① 《新唐书》卷 108，《裴行俭传》。

② (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卷 16，《王方翼碑》。

③ (清)李光庭：《汉西域图考》卷 1，见《清朝藩属舆地丛书》第 5 册，台湾国风出版社 1967 年版。

④ (唐)杜佑：《通典》卷 2，《食货》。

者，其利岂不博哉”[①]的好处，既可不扰民，又可长久率安于边，以边土养边民及边兵，自为耕战，毋烦征调。屯田士卒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传播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文化。屯田还是保持丝路畅通的养路队，“以屯田，遂通西域”[②]。碎叶为北道上一重要关津，唐代大量精美的丝绸和其他商品，被商人们源源不断地运往碎叶，再转送到世界各地，并且也输回了西方各国的生产生活用品和奇珍异宝。如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8 年）三月，大食请献狮子，道经碎叶，后受阻未能成行，但既然有此请，当不是唯一的一次。

6. 塔拉斯，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江布尔城，是塔拉斯河谷的最大城市，亦是谢米列契西南地区古老的商贸中心。穆斯林史学家认为，这座城是由公元 6 世纪来自布哈拉的粟特移民修筑的[③]。其实这座城市远在汉代就已存在。汉代文献称塔拉斯河为都赖水，塔拉斯城作郅支城[④]，唐代文献多称呾罗私、怛罗斯[⑤]。公元 569 年（周武帝天和四年，陈宣帝大建元年）东罗马使臣蔡马库斯出使西突厥，其《奉使西突厥纪行》中已记该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亦对此城作了详细记述，曰：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

---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 503，《邦计部·屯田》。

② 《后汉书》卷 88，《西域传》。

③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28.（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版，第 28 页）

④ 《汉书》卷 70，《陈汤传》。

⑤ 如《大唐西域记》卷 1 作“呾逻私”，《新唐书·突厥传》作“怛逻斯”，耶律楚材《西游录》作“塔剌思”，常德《西使记》作“塔剌寺”，《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作“塔拉斯”，明陈诚《西域番国志》称之为“养夷”，这是蒙古人的称呼，后改名奥李阿塔（意为神圣的父亲）。公元 1936 年又改称江布尔，以纪念哈萨克民间诗人江布尔。

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①。玄宗天宝十年曾在此地爆发了著名的怛逻斯战役，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败在大食人手中，造成唐朝势力在中亚地区骤然减退和汉文化大量西传两种后果，使塔拉斯城更加昭著于中西交通史册。公元 9—13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皆谓怛逻斯为突厥人与回教徒的通商要地。1253 年法国人卢白鲁克奉使蒙古，记该城有日尔曼俘虏居住。元明时期，文献史料中多有提及塔拉斯城的，如《海屯行记》、《西游录》、《西游记》、多格腊忒的《别失八里史》等②，说明此城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一直延续到蒙元以后。

塔拉斯城是丝路北道进入中亚地区后靠西头的一大重镇，在它周围密集了许多城镇，是从事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据点。如玄奘提到，从塔拉斯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③。被 10 世纪穆斯林学者马克吉西提及的有阿特拉赫（Атлах）、库里（Куль）、苏瑟（Сусы）和杰卡普肯特（Текабкет）等。而苏联考古工作者则更为详尽明确地列数出其西面有朱维卡特（Джувикат）城，北面有卡瓦卡特（Кавакат）城，东北面有金基里（Джикиль）城，南面有别赫鲁（Пехлу）城、阿特拉赫、哈木肯特（Хамукет）城等④。苏联学者认为位于中部塔拉斯地区的朱汪·多别

---

① （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7 页。

②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4 册第 94 页，第 5 册第 229 页。

③ （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8 页。

④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6.（《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76 页）

(Джуван-Тобе)遗址即是阿特拉赫城,因为城内找到一块带有突厥铭文《Атлах》的石制品残片可以为证,而且还确定了这里曾经是著名的怛逻斯大战的战场①。其附近的玛伊·多别(Май-Тобе)遗址是哈木肯特城,它是由粟特移民们建立起来的,所以城市的主要结构是德赫干的城堡加城市居民的住宅②。

下面再略谈一下色里金城和伊斯宾札普城。色里金城是突厥边境上的一个要塞,距塔拉斯城四法尔沙赫。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座与采矿业有密切关系的城市,这里有蕴藏丰富的银矿、铁矿,是中亚北部地区一重要的矿业中心③。伊斯宾札普即是玄奘游记中提到的白水城,《元史·西北地附录》、《元经世大典图》中的赛兰城。马赫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作 Isbijab,在波斯、阿拉伯语中意为白水④。此城在中世纪时,为锡尔河中游、南哈萨克斯坦山前地带的主要城市和最大商业中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又是穆斯林在中亚西北部的最前哨。它位于塔什干城的东北,今奇姆肯特城以东约十五公里处,今地仍叫赛兰⑤。中古时期从伊斯宾札普到察赤的道路不

---

① 参考 С. Л. 沃林:《关于塔拉斯河谷及毗邻地区 9—15 世纪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报道》(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集,第 8 卷,阿拉木图 1960 年版,第 78、80 页)及 С. Л. 沃林:《南哈萨克斯坦地名札记》,阿拉木图 1978 年版,第 179—180 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25.(《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25 页)

③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9.(《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9 页)

④ 参考 С. Л. 沃林:《关于塔拉斯河谷及毗邻地区 9—15 世纪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报道》(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集,第 8 卷,阿拉木图 1960 年版,第 78、80 页)及 С. Л. 沃林:《南哈萨克斯坦地名札记》,阿拉木图 1978 年版,第 152—154 页。

⑤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 1973 г. стр192-194.(А. М. 别列尼茨基等:《中亚中古城市》,列宁格勒 1973 年版,第 192—194 页)

与现在从塔什干到奇姆肯特的道路合，而是略向东，沿途分布有不少城市和村镇，如沙拉普（Шараб）、布杜赫肯特（Пудухкет）、塔姆达日（Тамтадж）、阿巴尔札日（Абарджадж）和朱维卡特（Джувикат）等①。另外丝路的一条支线从伊斯宾札普向西北方向的法拉普（Фараб）、沙夫加尔（Шавгар）和更远的锡尔河下游而去②。

总观七河地区的古代城市主要分布在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公元6—9世纪，丝路北道在此地的线段西起伊斯宾札普，东迄伊塞克湖地区，沿线大小城镇密集，既反映出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丝路的畅通、东西贸易的便利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基地和中转站，与北道在新疆地区构成四通八达的贸易网一样，在七河地区也织就了一张横贯东西、纵连南北的交通网，从而使这一地区被更多更广地纳入东西文化交流的轨道和共同的贸易市场，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可谓是七河地区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在论述了新北道的形成和发展之后，我们认为，动荡变化的政治形势造成丝路贸易重心逐渐北移，是与新北道的命运息息相关、互为里表的。所以下一章将从政治史的角度揭示北道发展与繁荣的原因，从而为进一步论述公元6世纪以后，中亚北部地区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盛况提供依据。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24.（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24页）

②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91.（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91页）

第四章

丝路贸易重心的北移及其原因

名扬遐迩的丝绸之路，起于汉，盛于唐，其间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发展，起着不小的变化。除表现在前章所述主干道增多，由两道变三道；旁道支线增多，逐渐密织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沿途大小城镇增多，构成星罗棋布的贸易网点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丝路贸易重心渐向北移，北道使用频繁，作用越来越显要。一般说来，初开丝路的主要和直接动力是政治因素，嗣后维系丝路贸易经久不衰的则是由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但丝路畅通与否，道路有无变迁，却受到不同时期丝路所经国家与地区及其相互之间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影响。公元3世纪以前，丝路南道较为繁荣，使臣、僧侣、商贾多取此道，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活动亦大多集中在天山以南地区。如张骞两次通西域，往返经过的是天山以南地区；班超父子经营西域，主要活动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城郭诸国；汉朝政府在西域最早设置的使者校尉，亦未兼领北部；而佛教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由大月氏人传入中国，也是通过南疆地区。如此种种，究其原因，根本之点还在于当时尚属强大的匈奴盘踞在天山以北，汉朝势力未能完全控制。而葱岭以西，远至西亚、地中海地区，是显赫的贵霜帝国①操纵着东西贸易，尤其到了第三代贵霜王迦腻色迦统治时期，进入贵霜帝国最繁荣强盛阶段，其领土范围包括了印度北部、花剌子模、索格底亚那及大宛等地。北与康居相接，并与之结盟联姻，关系密切；东越葱岭与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上的城郭国家也有往来，对汉朝政府态度尚友好。如公元84年，贵霜曾助班超平定疏勒王忠的反叛，三年之后又在击破

---

① 贵霜王国由大月氏贵霜部落的翕侯丘就却约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创立，约于2世纪初叶达全盛，时版图北起花剌子模，南达文迪亚山（约北纬22°—25°，东经73°—84°间），地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崇尚佛教。公元3世纪后王国分裂，5世纪亡于嚈哒。

莎车中有功，后虽因请婚不成一度反目，但终为汉军所败，之后第年贡献不已。贵霜帝国与安息接壤，同处在中国西去罗马帝国的商路上，充当东西贸易的中介，获得很大利益。公元3世纪以后，贵霜帝国开始衰败，5世纪为嚈哒所灭。而丝路所经地区、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促成丝绸之路向北渐渐扩辟了一条新北道。3至5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北道开始形成并日渐重要，一直持续到唐代后期丝绸贸易重心转向海路。再从中亚地区看，5世纪以后，通向中原的道路已不再经由大宛了，而是偏向北移，从锡尔河右岸经楚河、伊犁河到达伊塞克湖岸，与新北道相接。所以纵观整个丝路贸易发展史，北道繁荣的时间虽然较南道晚，但却比南道长，这是由政治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第一节　公元3—6世纪的中亚形势与丝路贸易

公元3—6世纪，东西方文明世界都处在极大的政治动荡之中，政权急促迭替，中亚四周强邻勃起，古典世界陷入某种震荡和危机中，而引起这场动荡的震源主要是来自中国漠北草原上游牧民族持续性的迁徙和他们介入所经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如前所述，公元2世纪中叶，北匈奴在东汉军队的连连攻击下，被迫向西北迁徙，终于导致日尔曼民族在欧洲世界发起一场大骚

动，几乎全部涌入罗马境地。在匈奴冲击下掀起的这场日尔曼人入侵浪潮，加速了东西罗马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残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又不断受到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的挑战，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国威。在伊朗历史上统治达 4 世纪之久的萨珊王朝（226—651 年），是在始祖萨珊①的孙子阿尔达希尔时，开始向外扩张。征服克尔曼，打败库齐斯坦、伊斯法罕等地的王公，兼并其地，并在公元 224 年的霍尔木兹平原大战中，大败安息国王兵，两年后又夺得安息首府泰西封，取代了显赫一时的希腊化安息王朝。萨珊王朝建立后，尤其是沙普尔一世（241—272 年）时，在与东罗马、贵霜、阿尔美尼亚等王朝的不断交战中宏扬国威，扩拓国土，并以自己的强大控制东西方贸易。中国丝绸要运销罗马，必须经过萨珊波斯。而萨珊人对中罗之间丝绸贸易的严格控制与操纵，就像当年贵霜和安息那样，不容他人染指。此时曾不可一世的贵霜帝国已在萨珊王朝和嚈哒人的不断打击下衰落了，分裂成众多的小国，散布在河中地区，被称为昭武九姓②。它们无一统地存在了很久，常常沦为周邻强国的附庸，并且东面与中国几代王朝多有较频繁的往来。南面的摩揭陀到公元 4 世纪前半期，兴起笈多王朝，中国高僧法显就是在笈多王朝最强盛时期去印度游历的。公元 5 至 6 世纪中期，从中国境内迁来中亚南部的嚈哒人强大起来，北遏柔然，南控印度③，波斯王也屡屡败在其手下。威镇西域的嚈哒人很

---

① 始祖萨珊，大约是波斯波利斯一个阿纳喜特神庙的祭司，即阿赫门王朝发源地的人。

② 一般指康、米、史、何、曹、安、石、戊地、火寻等九国，实际上不止九国。

③ 嚈哒人是在公元 5 世纪中叶开始侵入印度的。这时嚈哒人已经完全统治了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吐火罗地区，并屡屡打败波斯，故能抽出兵力，南下进攻衰落的笈多王朝。5 世纪末或 6 世纪初，嚈哒人灭掉兴都库什山以南、犍陀罗及印度河流域的寄多罗王朝或寄多罗子孙统治的诸小国。

注重对商路的控制，并频频向中国王朝进贡通商，据史料所载，从北魏高宗太安二年（456年）至北周明帝二年（558年），一个世纪内，嚈哒人派向中国的朝贡使臣就有22次①。

此时东面的情形是，继汉以后，统辖北部中国的是曹魏政权，更北面取代匈奴盘踞大漠草原的鲜卑势力尚不强大，局部地区的统一使内地与西域的交通、中国与中亚及欧洲间的贸易往来持续发展。《三国志·魏志》的《乌丸、鲜卑、东夷传》记："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②为通西域，曹魏政权在河西地区设立凉州刺史兼理联络西域各地。徐邈为凉州刺史时，"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以市金帛天马，通供中国之费……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③。不久，曹魏政权复置戊己校尉（222年），驻地设在丝路要冲高昌。继而又恢复西域长史，驻地设在海头（罗布泊西），从而对这一时期丝路的畅通与安全起到了保证作用。西域商人东去曹魏境内进行交易，总要途经敦煌，当时这一带豪族地主势力很强，"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甚至"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④，十分有碍贸易的正常进行。为此，敦煌太守仓慈规定，西域商人"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

①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22—124页。

②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

③ 《三国志》卷27，《徐邈传》。

④ 《三国志》卷16，《仓慈传》。

其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①。结果是“西域人入贡，财货流动”②。既促进了丝路贸易，也繁荣了当地经济。仓慈任敦煌太守十余年，劳抚西域各族，深受各国商人的爱戴和尊敬。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③。以后几位继任太守，也基本依循仓慈的作法，堪可称颂。

司马氏代魏，是为西晋。武帝时，声威显赫，西域诸国大多接受其册封，有如“晋守侍中”、“奉晋大侯”等，就连远在中亚的大宛王也是晋朝政府所封。“太康六年（285年），武帝（司马炎）遣使杨颙拜其王蓝度为大宛王。蓝度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④。而大宛人一如既往，“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⑤。

公元4世纪初，五胡乱华，晋元帝退守江南，是为东晋。与此同时，并存许多地方割据政权，被称为十六国。十六国中凡地处西北的较大政权，均和西域保持贸易往来，丝绸之路没有被阻塞。有学者指出，西域自汉代归入中国版图以来，各族人民一直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即使中原暂时处于分裂和割据的时期，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过。各封建割据王朝（包括少数民族政权）都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西域的管理⑥。如张骏建都姑藏（武威）的前凉与西域通，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诸

① 《三国志》卷16，《仓慈传》。
② 《晋书》卷26，《食货志》。
③ 《三国志》卷16，《仓慈传》。
④ 《晋书》卷97，《四夷传》。
⑤ 同上注。
⑥ 马国荣：《北魏与西域关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珍品，并得一方贡玉，上有文曰“执万国建元疆”①。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二年，前凉置戊己校尉，治地为高昌郡（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开中原王朝在西域设置郡县之始。前秦建都长安，王苻坚命吕光为持节都护西讨诸军事，统兵七万五千，以征西域。吕光降焉耆，克龟兹，威震西域，诸国贡使相率于道，“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②。苻坚败于淝水，吕光携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东返入玉门关，攻取凉州，建立后凉。光命其子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郡，焉耆、龟兹诸国皆朝贡。先后建都于敦煌、酒泉的西凉地区，多有西域贾人前来经商。西凉刺史韩褒规定“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③。此外，后秦（建都长安）、西秦（建都于苑川，今兰州榆中一带）、南凉（建都乐都）、北凉（建都张掖）等朝，或在西域屯田、驻军、设官置守，或派官兵征讨叛逆，慰抚各地，总在不断地和西域诸国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综观这一纷乱时期，中原封建王朝对西域的管辖，主要采用了三种形式：一是建立军政机构，派驻官吏，对西域行使主权，如曹魏、十六国和北魏等；二是册封地方首领，如东晋、刘宋和西魏等。这两种形式的管辖对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内地王朝对西域地区一脉相承的治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军事力量的强制，而是西域与内地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关系不容分割的结果，是中原王朝长期管辖的结果，是西域地方政权和各族民众向心力的结果。

---

① 《晋书》卷86，《张骏传》。

② 《晋书》卷122，《吕光传》。

③ 《周书》卷37，《韩褒传》。

所以尽管中原地区处在分裂割据状态，但新疆各族与内地各族，特别是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仍然有所发展①。“这种联系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始终畅通并未中断；二是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内地的影响，愈来愈多地出现一致性”②。前秦亡后，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广大地区出现了局部统一的北魏新政权，其建立者是北匈奴西迁后，辗转占据了大漠南北的鲜卑贵族。史载：“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兵利马疾，过于匈奴。”③鲜卑早在英主檀石槐时代，就曾大拓领土。西边击乌孙，尽辖天山北路直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广大地区。公元315年，晋愍帝封拓跋禄官为代王，三年后其子耶律建代国，控制地域东自濊貊（今朝鲜北部），西及破洛那（费尔干纳），为日后北魏政权联络西域打下了基础。北魏时期的丝绸贸易，较十六国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魏太武帝时大破柔然，疏勒、焉耆、龟兹、车师、鄯善、乌孙、悦般、渴槃陀、粟特等九国遣使贡献。太武帝曾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辈往西域各地，后途中为柔然所执，未能尽达。两年后（437年），太武帝复遣侍郎董琬等携带大量金帛出使西域，招抚九国。董琬至乌孙（此时被柔然所侵，西迁于葱岭山中），乌孙提供向导，西至破洛那、者舌，而西域亦有十六国派出使节随董琬入贡，于是自后相继者不间于岁，魏使亦多至数十人④。董琬出使西域，“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介绍了西域四个地区及丝路可分为四道的情况，即“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

---

① 参考赵荣织：《纷乱时期中原封建王朝对西域的管辖》，《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

③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④ 《魏书》卷102，《西域传》。

相并。至太延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①。董琬基于有限的活动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西域的某些地理情况，增进了内地对它的了解，进一步沟通了双方的联系。事实上，北魏政权一直很重视与西域的交往，为了保证丝路畅通，曾出兵讨伐“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的北凉。以后又两度用兵西域，攻灭鄯善，讨平龟兹，起因仍是这两国堵塞道路，劫杀来往使者、商贾。北魏还使自己的首都洛阳成为当时西域和诸外国商人聚居的乐园，他们“乐中国风土，因而富者，不可胜数”②。另设有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的四馆：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其中崦嵫馆是专门用以招待西来的使者和商人的。同时设有安置暂居或侨居洛阳的外国商人使者的四里：归正、归德、慕化、慕义。慕义里专供西方侨居者使用。这里“门巷修整，闾阖填列……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③。此外，洛阳还设有供西域和外国商人买卖的专门市场，称为“四通市”。《魏书·西域传》对北魏政府与西域诸国进行贸易交往的情景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其中提到中亚北部地区的国家有大宛、石国、粟特等。如“太和

---

① 《魏书》卷102，《西域传》。

② 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页。

③ 同上注。

三年，(洛那国)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太延三年，(者舌国)遣使朝贡，自是不绝”；“粟特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①。北魏政府还很注意与嚈哒关系，曾两次遣使嚈哒，“延昌中(512—515年)，(高湖)假员外散骑常侍，使于嚈哒，西域诸国莫不敬惮之，破洛侯、乌孙并因之以献名马。还，拜冗从仆射。神龟中(518—520年)……又假平西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使嚈哒”②。此时嚈哒在占据了阿姆河两岸直抵兴都库什山地区后，势力向北扩展达到准葛尔盆地，控制了高车，并充分利用丝路北道上的交通枢纽高昌，积极开展与北魏的交往，造成“蠕蠕、嚈哒、吐浴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③的形势。由于高昌内附，使商道不致梗塞，尤其北道可以较好地被利用。另外，北魏政府与西去丝路上的居间大国波斯萨珊王朝的关系尚属友好，仅文成帝兴光二年至孝明帝正光二年(455—521年)的六十余年中，萨珊使者来朝竟达十批之多，带来狮子、驯象和其他珍品。其国书上说：“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萨珊)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④此时萨珊王朝地处东西文明世界的正中，控制着中国与罗马间的丝绸贸易，后来虽有道路走里海附近，经中亚北部直入中国，但仍不能完全摆脱波斯的控制。北魏与波斯之间能够平和相处，就为这个时期的东西贸易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以后北魏分裂

---

① 张星烺先生认为，粟特似为俄粟特之讹音，略去其首俄字。俄粟特民族今代仍居高加索山和系间，即古代阿兰或阿思人之苗裔(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62页)。笔者以为，这里提到的粟特有可能是来自河中地区的早期移民。

② 《魏书》卷32，《高湖传》。

③ 《魏书》卷103，《高车传》。

④ 《北史》卷97，《西域传》。

成东、西魏，旋即又为北齐、北周取代。当时北齐、北周境内的胡商可以自由往来，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与此同时，隋室勃兴，中原内地和西域地区再次出现的一统局面，使海内宴平、国富民殷。隋炀帝有志通西域，也使丝路贸易开始步入它在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

隋初，西域和外国商人多至张掖与汉人互市，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管理贸易事务。裴矩知炀帝志勤远略，便留意向胡商探访西方各国的风俗、山川、险要及政治、经济情况，后汇集材料，撰写出《西域图记》三卷，并附有详细地图，系统介绍了从敦煌到西方各国去的交通路线及要塞。此书呈上后，炀帝大悦，擢裴矩为黄门侍郎，同时对西域诸国及丝路贸易发生了更大的兴趣。炀帝招致西域常采用夸示富庶以诱之的办法。如大业五年，炀帝西巡至张掖，事先命裴矩劝说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吐屯设亲到张掖谨见，所以当驾幸燕支山（今甘肃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又称焉支山）时，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都在道边迎候。炀帝设宴观风殿，奏九部乐及鱼龙戏助兴，外加赐赍，又令武威、张掖两地士女盛装外出游览，凡有车马衣服不华丽者，责郡县官吏备换。于是观赏的游人车马长达数十里。此等壮观的场面使伊吾吐屯设当即表示愿意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归服朝廷，其后诸国相率入贡者三十有余。次年元宵节，炀帝又将西域各国首领召集到洛阳，于皇城端门外街（端门街）盛陈百戏，通宵达旦，声闻数十里，竟然终月方罢，费资巨万，以后岁岁如此。对外国商人，则允其在洛阳东市（丰都市）交易之请，并且下令先整修店肆，充积珍货，人人着盛装，处处设挂帷帐，菜铺上要有龙须席，胡客至酒店，酒足饭饱之后可以分文不取，美

其名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①，以至遭到胡客黠者的取笑。隋炀帝这种好大喜功、虚夸炫耀招徕外商的作法，劳民伤财，实不可取。但另一方面，却也表明炀帝对与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十分重视，这势必引起西域商胡争相入朝，往来相继，贸易不绝。正如《北史·西域传》所评论：“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枝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弊哉！”其实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炀帝的作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隋朝负责掌管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的鸿胪寺中专门设有“西戎使者”，“互市监及副，掌互市”②。此时西域诸国朝贡及贸易之盛况，在史书中不乏记载。如《隋书》卷83记：大业中，大宛国“遣使贡方物”；大业五年，石国“遣使朝贡”。张鷟《朝野佥载》记“隋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骏曳地，号曰师子驄”。《隋书》中还提到，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蕃诸国，曾到罽宾，得玛瑙杯，到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狮子皮、火鼠毛而还。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途经突厥，染干可汗亲率诸酋长拔刀芟草，于是“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③。这后一条材料尤其说明，在原有的基础上，隋朝与北部的交通道路又有改善和发展。自隋以降，突厥势力在北部崛起并日渐强盛，成为当时周边少数民族中最能与中

① 《隋书》卷4，《炀帝本纪》。
② 《隋书》卷26，《百官志》。
③ 《隋书》卷51，《长孙晟传》。

原抗衡的力量，于是自然将唐朝政府经营边疆的目光吸引了过去。随着突厥问题的解决，唐朝政府对西域地区，尤其是对西突厥本部所在的中亚北部地区展开了全面的经营管辖，从而维护了自汉代以来丝路贸易的通畅和边疆的统一安定，同时也将中亚北部地区推到了这一时期东西交通的前沿，显现出丝路贸易重心渐向北移的特点。

第二节　西突厥的崛起和唐朝政府在中亚北部地区的经营

突厥原是铁勒（或丁零）的一支，初游牧于叶尼塞河上游，5世纪中期以后辗转至金山（阿尔泰山）南，高昌北山（博格达山）一带，臣属柔然①，为其“锻奴”。迨6世纪中叶阿史那土门为首领时，攻灭柔然（552年），尽有其地，土门始自称伊列可汗。与此同时，土门弟室点密率十大首领，领众十万，往平西域，号十姓部落，亦自为可汗②，此乃西突厥可汗及十姓部落之始祖。当土门子木杆可汗在位时，室点密子达头可汗居西方千泉，于是天山北路尽在其势力范围内。6世纪后期，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汗国，东突厥于贞观四年

① 柔然是在鲜卑南入中原后占据漠北和天山北路的。到第七代首领社仑时，国势强盛，击破高车，逼走嚈哒，乌孙亦不堪其侵扰，西迁葱岭山中。自是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完全归柔然所有。而天山南路，高昌、焉耆、于阗等国亦为其属。始光二年（425年），魏太武帝亲征，柔然一度势衰，但很快又复振，至北魏分裂，东西两魏均争以币帛公主供奉柔然，唯恐为后。后虽遭嚈哒人的打击，但直至公元6世纪中叶才为突厥所灭。

②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

(630 年)被唐朝翦灭,西突厥控制了天山以北、金山以西,远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其汗帐也从未离开过天山北麓和伊犁河、楚河流域。而达头可汗在位期间,曾进据漠北,其身后本部汗位迭替,发生混乱,直到射匮可汗在位时(611—618 年),才将处于分裂状态下的西突厥各部又统一了起来,使西突厥进入国势强盛时期。射匮在位不久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立(618—628 年)。史称他勇而有谋,善于攻战,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初据乌孙旧地,建庭于伊犁河流域,后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国势之盛,西戎史上"未有之也"①。

西突厥的崛起使之可以与周边强国匹敌,在丝绸国际贸易中夺利,从而将其长期盘踞的中亚北部地区摆到了东西贸易的重要位置上。早在室点密自立为可汗之时,突厥势力西边已沿着锡尔河中游扩展达咸海。公元 558 年,突厥骑兵追逐咸海周围的游牧民,曾向伏尔加河岸进逼。但因为嚈哒国家还在威胁着突厥战线的两翼,室点密被迫停了下来,先巩固北部后方,再与萨珊波斯结成同盟,将女儿嫁给库思老一世(531—579 年),换取萨珊人将原先付给嚈哒人的沉重贡赋转交给自己②。不久嚈哒人就在波斯和西突厥的军事夹击下溃败了。突厥人开始积极介入丝绸贸易。这时在西方,丝绸生产刚刚出现,远不能满足贵族阶层的无穷欲壑。而突厥人一方面和丝绸直接生产者有联系,另一方面能够控制贩运转卖丝织品的粟特人,并且和粟特人一起,都欲和丝绸的最大需求国拜占庭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根据粟特人的建议,公元 567 年,

---

① 《旧唐书》卷 194 下,《突厥传下》。

②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1, стр223.(《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 1 卷,伏龙芝 1984 年版,第 223 页)

室点密向波斯派去了商谈签订自由过境贸易条约的使团。使团由粟特人马尼亚赫率领，成员均是粟特人，抵达之后，波斯王买下使者带来的全部丝绸，马上又当面付之一炬，以此向粟特人表明“自己既不想得罪他们，也不使用突厥人运来的丝绸”①。第一次出使失败，汗又派去由突厥人组成的第二个使团，结果除了三四个人逃生，其余统被毒死。这一事件意味着两强国间的盟友关系因丝绸贸易上的利益冲突已完全破裂。粟特首领马尼亚赫向室点密建议，和萨珊波斯的宿敌拜占庭结为军事同盟，绕过波斯，直接出使罗马。在得到可汗同意后，于公元567年底携带大批丝绸绢礼物和可汗书，经高加索来到拜占庭，568年初谒见了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并向他保证，突厥人“将和居住在他们境内的罗马帝国的敌人作战”②。翌年，拜占庭派出东方城市总督、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带领一个使团随马尼亚赫往突厥汗国报聘。蔡马库斯一行在西突厥可汗驻地，今库车北山外特克斯河谷见到室点密汗，并随突厥军队到过波斯。蔡马库斯完成使命准备回国时，突厥诸部及邻国听说罗马大使在境，即将归国，且有突厥大使扈行，便纷纷请求随同前往，但获准的只有柯力亚忒部数人。罗马大使偕突厥人西行，“渡欧克河，复经长途而抵大湖（阿拉尔海），蔡马库斯停休三日，遣佐治骑行先归，报告皇帝，往突厥之大使已归也。佐治与突厥人十二名，取最短道，经沙漠无水之境，向拜占庭而西行。蔡马库斯沿大泽沙岸，行十二日，道路崎岖，履危涉险，而至亦克河（按巴河），又至得嶷黑海（乌拉尔河），再经沮洳地多日，至阿得拉河（今伏尔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1, стр224.（《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24页）

② 同上注。

加河)”,后抵拜占庭①。这里所记蔡马库斯走里海北,经乌拉尔河、伏尔加河、高加索等地至拜占庭的道路,基本上就是受命掌西域互市的裴矩,从胡商那里探听到并记入所撰《西域图记》中丝路北道的西段。在蔡马库斯出使之后,东罗马帝国充分认识到与突厥结盟的价值和意义,又先后派出六批使臣至突厥②。共同的丝绸贸易利益驱使罗马采纳突厥的劝说,中断了与波斯之间已缔结了九年的和平条约,继而交战长达数十年(571—5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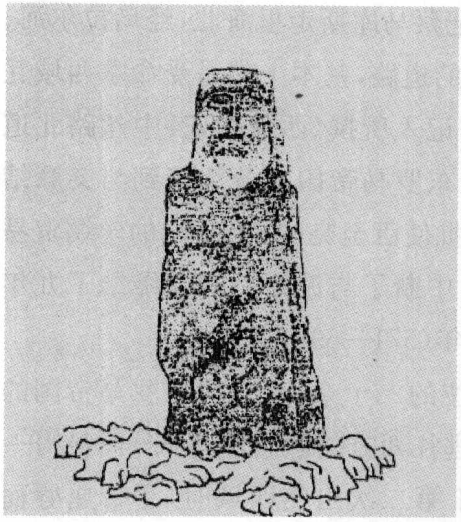
到了室点密子达头可汗在位的二十余年里,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因后者支持迫于突厥压力逃往西方的假阿哇尔人③而显得一度紧张,所以当罗马使臣瓦伦丁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尽带屈辱而归。达头还曾派出一支骑兵突出南俄草原,袭击克里米亚的拜占庭移民区,围攻拜占庭的城市和克里米亚半岛,骚扰达十余年。另外,室点密可汗去世后三年,波斯萨珊朝国王库思老一世也死去,其子霍尔穆兹四世继位,为了争夺丝绸贸易的利益,继续与突厥为敌,与东罗马战争不断。战争消耗了国力,萨珊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到7世纪中叶终于在北面可萨人和西面阿拉伯人的进攻下灭亡。

---

①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转引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290页。

②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1, стр224.(《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24页)。

③ 东罗马史家普里斯库提到东方有一个叫阿哇尔的部族。公元461—465年间,阿哇尔人曾压迫Savirs族西奔(杨益宪认为即悦般),后者又驱逐乌罗、浑等三族西走。阿哇尔人自己又亡于别的种族,乌罗、浑等三族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及黑海北岸,这些部族在西迁中曾路经高加索,那里人误以为他们是阿哇尔人,并以此名称呼他们,而他们也就以阿哇尔人自居。6世纪中叶史学家弥南在《希腊史》中说,公元557年阿哇尔人到了阿兰地区,与拜占庭结盟,打败了阿提拉后裔和诸斯拉夫部落。室点密打败阿哇尔人后,一部分奔中国,定居拜占庭北境上的是假阿哇尔人,是乌罗、浑人。



图版10 乌拉斯塔亦石人雕像

资料来源：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强大的统叶护可汗继位于唐代隋的王朝更替时期，中原各地燃烧着农民起义的大火，并陷入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新建立的唐王朝苦于东突厥的威逼，亟欲通过联合西突厥来解除威胁。于是高祖对西突厥特别优渥，许统叶护求婚之请。后因东突厥连年入寇，西北路阻，才通婚未成。高祖武德元年至五年，统叶护均遣使，贡条支巨鸟，献狮子皮，献名马。高祖亦"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乐于庭，赐帛各有差"①。贞观初年，玄奘法师西去印度求经，至伊吾后，原意取道北线，走可汗浮图城后，虽改经高昌，沿天山南麓西去，但所过仍是西突厥控制地区，途中所历各国并为西突厥役属。鉴于西突厥与唐朝政府的友好关系，都为法师提供行路的方便和保护。玄奘过伊塞克湖地区到了楚河以南的碎叶城，并在这里谒见了统叶护可汗，目睹戎马之盛和汗帐披金戴银之豪华。此时西突厥疆域南面已达信度河（印度河）矣。

西突厥的强大使"它具有各方面的文化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远东文化和东亚各国文化的媒介"②。定居在中亚北部地区城市和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09，帝王部。

② ［俄］B.B.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绿洲的突厥人非常积极地加入到当地文化的形成中去，他们的文化是整个中亚北部地区中古早期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苏联学者有称此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中亚—突厥文化的综合”①。又由于西突厥始终活跃在阿尔泰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所以丝绸之路渐渐显出依重北道的趋势。巴托尔德就曾明确指出：“突厥占领时期，在七河地区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份量……这一游牧国家的中心所在，总成为各国商人极力注目的地方。这里总是他们商品货物最好的市场，特别是纺织品，这是自中国和西亚输入游牧地区的主要商品。这种纺织品输入的必要，伴随着7世纪大宛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引起由西亚通往中国的商路的北移。商人们避开大宛和喀什葛尔，自撒马尔罕取路向东北方经由塔什干和塔拉斯进入七河地区，直抵楚河之岸；是后他们沿着伊塞克湖的南沿，越过勃达岭，到过阿克苏。据我们所知，这条商路最初是7世纪高僧玄奘和《新唐书》才提到的。”②苏联学者伊凡诺夫在1957年著作中也认为：“公元7世纪时，西亚与中国之间的旧商路改道北线，即自撒马尔罕和塔什干，沿楚河和伊塞克湖南岸而行。”③根据中外文记载的一致性来究其商道北移的原因，首先是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然。西突厥的崛起强大和在中亚北部地区的活动，唐朝政府全力平定突厥、统辖西域后，采取羁縻怀柔政策经营西域，就使西突厥在中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190.（K. M.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190页）

②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Ⅱ. Ч. Ⅰ. 1964г.（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七河简史》，莫斯科1964年版）

③ ［俄］费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版，第23—24页。

亚北部地区保持了原有的显赫地位，得以热衷从事东西丝绸贸易，从中取利。而中亚地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昭武九姓国为抵御西突厥，依山筑垒修建的城市防线，以后又被大食人继续利用来防御突厥。在这些沿山麓修筑的城镇之间，自然形成的商路将它们连接起来，所以伴随政治形势的变化，从撒马尔罕北上塔什干，经塔拉斯，沿楚河河谷、伊犁河谷，从天山北麓东去的路线越来越显得重要。另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丝路逐渐北移还有某些自然因素。如东汉以后，塔克拉玛干沙漠受西伯利亚暴风影响，逐渐南侵，埋没了不少昔日的村庄、城镇和道路。而且就路程本身来看，北道比南道的路程短，还可免受翻越葱岭山巅的艰险。尤其是不受自古垄断丝路的波斯的控制，可直接与丝绸需求量最大的东罗马进行交往。7世纪中叶以后，大食入侵并占据了河中地区，迫使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大量向北移居七河地区，而大食势力却始终未能北涉锡尔河，东逾葱岭。相反，中亚北部地区仍然是突厥人的活动地域，属唐朝政府管辖，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在这里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突厥人、粟特人和阿拉伯人使中亚北部地区在中西交通上变得重要起来。北道地位的突出是汉代以来中西陆路交通发展的一个结果和特点，也是丝路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标志。直到清代，新疆仍以哈密为出入门户，以伊犁为总汇要之区。清人汪之昌《天山南北路考》一文中说："谓以形势论，北可能控南，故……北路屯田二十八万余亩，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设兵则北路驻防，而南路仅换防，皆可为证据。"[①]除上述原因外，丝路北道日见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突厥游牧民们也酷爱丝

① （清）汪之昌：《青学斋集》卷28，载谭其骧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

绸制品。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亚北部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游牧民们的衣着服装除使用毛料、皮革制作外，贴身穿的衣服是用豪华的丝绸制成，外面再套上毛料或毛皮衣服。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战士，穿着竖领丝绸衬衫，妇女穿的是宽松的、下摆散开似钟形的精美丝绸衬衫，胸前开襟，系有花结式的小绦带，衣服上绣有金线花瓣花纹，嘴上还盖有丝绸手帕。而突厥汗王们就更为奢侈了。他们像所有游牧民一样，住在帐篷中，但与其四周毡帐不同的是大汗的毡房用丝织幔帐装饰，这些色彩斑斓、做工精巧的织物使人眼花缭乱。汗王的所有衣服也是用丝绸制作，外面是宽敞的丝绸长袍，里面是精美的丝绸衬衣。作为权力的标志，他们配带着丝绸绦带，绦带在头上缠绕几圈后，一端垂落在肩后①。受汗王信任的人穿着丝绸衣服站在王座的左右两边。可见突厥人对丝绸的总需求量是不小的。而内地丝绸、丝织品西运的数量则更大，其情景有如唐代诗人张籍所描述的“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②。这些丝绸有的用以民间贸易，如前文提到过的弓月城，一次私人丝绸贸易就可提取二百七十余匹。有的用以外交往来，如高昌麴文泰赠玄奘“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又以绫绢五百匹”转“献叶护可汗”③。尤其是中原王朝为了笼络突厥，从北周、北齐开始到隋、唐初期，每年都要送去大量的缯丝绵绸，加上劫掠来的战利品，突厥人手中掌握了为数不少的丝绸，除自己受用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0;76;78;82-83.（《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莫斯科1950年版，第70、76、78、82—83页）

② （唐）张籍：《张司业集》卷6《凉州词》。

③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页。

外，还有大量剩余，于是他们将多余的丝绸辗转远销西亚、南欧、北非等各个地区与国家。所以文献及考古资料反映出，公元6世纪以后，中国丝绸运入罗马帝国的逐渐多了起来。在此之前希腊人马赛里奴斯的记载已反映出，过去他们那里只有贵妇人才穿得起绸缎衣服，而现在国内丝绸衣服已较为普及了①。反之，西方文化珍品也作为丝绸的交换物，纷纷流入东方。根据毕古列夫斯卡娅在《拜占庭通向印度之路》中的列述，有大量的玻璃、光玉髓、琥珀、珠母制成的串珠，青金石、软玉制成的垂饰、画眉颜料，具有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儿童玩具和祭祀用品，巴比伦的地毯、宝石、珊瑚等。突厥人除了从事丝绸转手贸易，还推售自己的畜产品。在呼罗珊和马维兰纳赫(河中地)的市场上，突厥人的羊肉被认为是最好的。有“体魄非常大，肥尾拖曳在地上的牡绵羊”(即肥尾羊)，有很好的羊羔皮，其中黑色、棕红色最为珍贵(即黑卷毛羊)。阿拉伯史料曾经提到突厥人大量繁殖绵羊，在塔拉斯河谷大量繁殖山羊，这些羊皮是来自塔拉斯最畅销的商品②。马在游牧民的军事化生活中占有首要位置。可以肯定，突厥战士每人应有一匹备用马，否则很难解释突骑施苏禄汗的军队，在十七天内从楚河河谷东部到了阿姆河以南的捷尔美兹地区，考古材料也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在突厥古墓中，葬者身旁多有两匹马的骨骼，突厥马一般可以分为两个品种，即头大、脖子短粗的非良种马和腿细善跑的良种马。在墓葬中，找到的大多是非良种马的残骨，良种马仅被文献史料记载，看

①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页。

②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1, стр264.(《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64页)

来不用作陪葬①。突厥马也与唐朝进行贸易交换，并且因其品种优良得到优惠价格。突厥人制作的武器、金属器皿散布在欧亚广大地区内，对其他民族的军事、文化生活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如粟特人就是模仿突厥军队制作武器装备的②。总之，我们可以充分肯定和赞扬西突厥强大时期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他们积极参与丝绸的国际贸易并将它又一次推上高峰，是他们以自己的强大传播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因子，促进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将唐朝政府经营边疆的目光吸引到西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发展的鼎盛时代。隋末战争动乱结束后，中原和西域地区再次出现大一统局面，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也步入最繁荣昌盛时期。由于唐初以来直至中期，王朝对边疆经营的重点一直放在西部有关突厥问题的解决上，故而唐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经营就构成继汉以来中西交通史上最重要的篇章。其不朽的伟业与功绩、成败与得失着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臣服西突厥，统一西北边疆

唐初，东突厥居大漠南北，屡为边患；西突厥称霸西域，数世如兹，高祖欲联合西突厥以制东突厥，但无结果。及太宗继位，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1, стр265.（《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65页）

②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VI-начало XIII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95.（K. M.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95页）

利用居金山西南的薛延陀，册立其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于贞观四年联合出兵，首先平定了东突厥，马上又转向西突厥，介入并利用其汗国内部统治者的纷争，以求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此时西突厥内部，自强有力的统叶护可汗死后，为争夺汗位的内讧、残杀，使之陷入一片混乱。贞观七年，太宗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前往西域，册立泥孰[①]为吞阿类拔奚利邲咄陆可汗，赐以鼓纛缎彩巨万，此为唐朝政府册立西突厥可汗之始。据说刘善因和同去的左千牛胄曹韦弘机到达西域后，因石国叛乱，道路阻绝，滞留西域三年，韦弘机“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②]，惜未流传。

翌年，泥孰卒，其弟同俄设被唐朝册立为沙钵罗至利失可汗。同俄设分其国为十部，号为十设，每设赐箭一枝，故亦称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各管一箭，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俟斤，一俟斤管一箭，居碎叶以西，左右两厢合称十姓部落。此后左右两厢常各拥可汗，相互对峙。贞观十二年(638 年)，弩失毕部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与至利失对抗，两人以伊犁河为界，中分西突厥领土，东属至利失，西属欲谷设。欲谷设建庭于镞曷山(今吉尔吉斯山)西，称北庭；而至利失被乙毗咄陆迫逐拔汗那，其弟立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建庭于睢合水(锡尔河)北，称南庭。不久，乙毗咄陆手下一叶护贺鲁，在内乱中率众数千帐要求内属，并助唐平定龟兹，被任命为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其部众被安置在庭州莫贺城(今阜康县东一百九十里)。贺鲁内附以后，打

① 其父莫贺设，高祖时来朝，与时为世子的太宗结为盟兄。

② 《旧唐书》卷 185，《韦机传》。

着唐朝的旗号私下招抚离散，庐帐渐多，羽翼渐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崩，贺鲁欲乘国中有大丧攻取西、庭二州，后因唐朝有备未遂。永徽二年正月，贺鲁拥众西走，建牙帐于双河(今博罗塔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统有十姓部落，胜兵达数十万。旋即入寇庭州，扯起叛旗，回纥等诸部请求讨伐，于是高宗三次命将发师以讨之①，终于全歼贺鲁叛军，荡平西突厥汗国，将其部落及领土尽归唐朝。唐将苏定方令突厥诸部各归原地，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划疆埸，复生业，十姓部落安堵如故。对于自天山北路西达里海之北的西突厥故地，唐朝设置了昆陵、蒙池二都护府管辖。昆陵都护府居楚河以东，即原五咄陆之地，唐朝任命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左卫大将军、兴昔亡可汗统辖其地；蒙池都护府居楚河以西，即相当于原五弩失毕之地，阿史那步真被任命为蒙池都护、右卫大将军、继往绝可汗，统辖其地。自此，西突厥本土—中亚北部地区及其属国皆归附中原，唐朝政府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全面经营。

二、各项经营管理措施

唐朝政府在臣服西突厥之前，先陆续略取天山南路西突厥各藩篱属国，使其唇亡齿寒。与此同时，设置各种行政机构，实行有效的管辖。贞观四年(630年)七月，太宗诏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於碛口贮粮，赈抚散居伊吾的西突厥众人。九月，伊吾城主石万年入朝，率所属七城来降，太宗以其地置西伊州，后二

① 即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年，656年；显庆二年，657年。

年改为伊州。伊州的设置，使唐朝政府控制了天山北道上的第一要站，掌握了东部天山的门户。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 年），唐朝经营西域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出兵平定高昌。平高昌的原因是“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而高昌王“麴文泰与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贡道其国，咸见壅掠”。遭高昌攻掠的焉耆王龙突骑支倾心向唐，北方的薛延陀也遣使上书，请出兵讨高昌。与此同时，屯兵可汗浮图城观望的阿史那贺鲁先降，于是唐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以高昌为西州，始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①。伊、西、庭三州的建立和安西都护府的设置标志唐朝政府经营西域已获得很大成功，三州建置与中原内地州县制度同，直属中央政府管辖，州刺史施政秉承京师诏令，户籍赋税上达户部。另外从大量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还反映出伊、西、庭三州也推行均田、租庸调和府兵等制度，充分显示出三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其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均属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伊州是天山东部地区的门户，高昌是丝路中道上的锁匙，庭州居北道枢纽之地，且三州之间彼此两两相连，结成一个稳定的三角网，唐朝政府若把握住这个铁三角，就可有力地控制天山南北的局势，保障丝路的畅通和安全。

西突厥在天山南路的另一个重要属国是龟兹。唐伐焉耆平乱时，龟兹助焉耆。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太宗以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大都护郭孝恪等率铁勒十三部，十余万人进伐龟兹，龟兹王弃城西逃拨换城（今阿克苏县）被擒，龟兹平，徙安西都护府治所于此，统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镇，是为设四镇之

① 《旧唐书》卷 198，《高昌传》。

始。高宗年间，又相继设龟兹、焉耆、疏勒及于阗地区的毗沙都督府。四镇是唐朝政府布在西域的驻兵重地，是安西大都护府属下的军事机构，而都督府则是地方政府，其都督由当地首领兼任，具有羁縻性质，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唐平定西突厥，在西域地区广设府州，除伊、西、庭三州有如中原州县，属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管辖外，其余均为羁縻府州，用当地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施以怀柔政策，也不失唐朝政府实际有效的管辖。当时在原西突厥本部的天山以北至七河地区，设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昆陵都护府属地适当天山北路，东起巴里坤湖，北至阿尔泰山，西抵中亚楚河，下属二十三个都督府①，大致分布在原西突厥五咄陆，又称左厢五箭之地。蒙池都护府据楚河以西至里海北，领原西突厥五弩失毕，又称右厢五箭之地，五部共置若干州，州名及处地至今未见记载，不可考。唯知五弩失毕部有两大中心，东为楚河南岸的碎叶城，西为塔拉斯河上的塔拉斯城，它们扼守住七河地区的东西两端，是丝路北道上

---

① 二十三个都督府，至今已经考证明确的有：以处木昆部置匐延都督府，地当今塔尔巴哈台附近；以胡禄屋部置盐泊都督府，地当库尔喀喇乌孙及阿雅尔淖尔一带；以摄舍提部置双河都督府，地当博罗塔拉及额毕淖尔一带；以鼠尼施部置鹰娑都督府，地当裕勒都斯河流域；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洁山都督府，在今伊犁河西萨米尔省；以葛逻禄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地当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及斋桑泊与乌伦古湖之间；以葛逻禄炽俟部置大漠州都督府，地当乌隆古湖之西；以葛逻禄踏实力部置玄池都督府，地当今塔尔巴哈台，此葛逻禄三部自号三姓叶护，另析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而轮台州都督府不知以何部置，地当乌鲁木齐附近；金满州都督府以处月部置，地当今吉木萨尔北；凭洛州都督府未详以何部置，地当迪化与古城之间；沙陀州都督府，以沙陀部置，地当巴里坤湖东；咽麵州都督府，以咽麵部置，其地应在伊塞克湖附近；嗢鹿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贺莫部置，初治伊犁河流域，即今新疆伊宁一带，后移至碎叶川以东，即今中亚托克马克以东，伊塞克湖以北地区；孤舒州都督府，以突骑施哥舒部置，当在突骑施境内；憑落州都督府，在今吉木萨尔以西；千泉都督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伏龙芝）以西的波得果贰诺一带；俱兰都督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卢戈沃伊附近；颉利都督府，在今伊塞克湖一带。（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参见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书）

的两大商埠。昆陵、蒙池都护府初属安西大都护府，武后长安二年(702年)转属北庭大都护府，都护府及下属各州均为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西域的主要行政建置，它们与中央王朝之间保有宗主国与属邦之关系。唐室对它们兼有册封汗王、授予官职、赏赐品物、保护其免遭邻国侵凌等四项职责。而各属国对唐朝政府亦履行称臣奉贡、遣子侍宿卫、助兵马、助军用的四项义务。唐朝政府在广设羁縻府州、以怀柔政策推之于行政管理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在西域地区安置军事设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和后盾，维护此地区的安全与统一。

唐太宗、高宗两朝管辖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是安西大都护府，建于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灭高昌以其地置西州的同时，初安西都护府兼西州刺史。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龟兹后，府治移其都(今库车县)；永徽二年(651年)，高宗又迁府治回高昌故地。显庆三年(658年)杨胄再平龟兹时，复移都护府治所于此，自是不再迁动。安西都护府的主要职权在于统领诸藩部府州，和分置在各要冲之地的驻兵，也就是四镇戍兵。四镇初为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待唐朝平定西突厥，辖区远达楚河、塔拉斯河一带，以碎叶置换焉耆，为四镇之一，直至“开元七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①，获准。武后临朝，为了对付复起的东突厥默啜可汗和吐蕃势力的交侵，加强对北部地区的管理，于长安二年在原金山都护府的基础上增置北庭大都护府，府治在庭州，初以阿史那献为大都护，分掌天山以北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塞克湖以北，原西突厥本部诸府州，即昆陵、蒙池二都

① 《新唐书》卷215，《突厥传》。

护府辖地。于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并立，为唐朝政府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至玄宗朝又增设安西、北庭两节度使，委以兵马、财赋大权。安西节度使又称安西四镇节度使，或称碛西节度使、四镇节度使，自开元六年三月汤嘉惠除四镇节度使、经略使，始有节度使之号。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遂为定额。安西节度使统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镇，与安西大都护府同治于龟兹都城，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北庭节度使治所在北庭都护府内，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共有兵二万人，马五千匹，衣赐四十八万匹段。安西、北庭合计管兵四万四千人，马七千七百匹，衣赐年一百一十万匹段，军食年约一十六万七千二百石（天宝中统计数字）①。如此浩大的军事费用，来源有二，其一是税西域商贾。开元七年，诏南路于四镇，北路于轮台征收西域贾人商税以资军用。其二是取之于戍兵营田、屯田及地租，不足者用和籴填补。

唐朝政府在西域经营屯田和兴修水利，是保证军队的供给和地方财政开支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初置四镇的同时“调山东丁勇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②。而北道上“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据统计，唐在西域的屯田共有五十六屯，占地二千八百顷，其中北面伊吾军有一屯，西州天山军有一屯，北庭都护府有二十屯③。从考古材料上看，今巴里坤、轮台、焉耆、库车等地留下许多唐代屯田遗址，有的遗址中，还保存有仓库和地

① （唐）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下。

②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③ 南宋本《唐六典》卷7“屯田郎中”条注。转引自玉井是博《南宋本唐六典校勘记》。

窑，内贮存麦面、小米、高粱、胡麻等①。甚至远在中亚地区的塔拉斯河一带，发现有唐代的屯田遗址。因前文已有涉及，兹不赘述。与屯田、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是水利的兴修。据唐代出土文书记，安西都护府下有一专管水利的机构，叫掏拓所，主管官吏叫掏拓使②。又有文献记载，绥来县城北五百四十里处有一废渠，长数十里，宽约丈余，相传是唐时所开③。

在交通运输方面，唐朝政府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是沿交通要道定距离设馆或驿。唐代的驿传制度规定"三十里置一驿，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④。而"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之地，置驿则"不必三十里"⑤。如西州到焉耆的路上有吕光馆、新城馆；西州到北庭的路上有龙泉馆；焉耆到龟兹的路上有银山碛西馆、铁关西馆、安西馆；伊西路上有达匪馆、赤亭馆、北馆；拨换到疏勒的路上有济浊馆、谒者馆、葭芦馆；疏勒到于阗的路上有羯饭馆等⑥。除馆以外，西域境内还设有驿。出土文书上记有宁戎驿、达匪驿、狼泉驿，而且前两驿在文书中两见⑦。文书还反映出，馆驿所用的劳动力，是征用百姓轮番服役。总之，当年丝路上，沿途馆驿，自长安一直设到中亚。行旅商贾，军书差役往来如梭的情景，有如岑参边塞诗中所云："一

---

① 参见《新疆考古三个月》，载《考古简讯》1958年第5期；《新疆考古的发现》，载《考古》1959年第2期。

② [日]大谷光瑞：《新西域记》，日本有光社1937年版。

③ 《新疆图志》卷89，《古迹》。

④ 《通典》卷33。

⑤ 《唐六典》卷5。

⑥ 参见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

⑦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补遗43、45页，第6册568页，第7册96、97页。

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①]唐代还设过一种叫车坊（又称长行坊、长运坊）的专门机构，属官办，坊内一般设有收马所（收长行牲口）、长行群（放牧牲口）、槽（喂养牲口）等机构，运输工具主要是车、马以及骆驼、牛、骡、驴等，一般不承担大宗运输任务，主要是供官吏和家属乘载。长行坊隶属州县，有完整的机构，设有检校官、检校长行使、长行典等[②]。车坊是与馆驿并存的交通机构，它们相辅相成，对加强政府在西域的管辖以及各地间的联络交往都发挥了必要和有益的作用。

总之，唐朝政府在平定西突厥，完全控制其本部及其属国的广阔地域后，从天山南北向西至中亚地区广设州府，遍置馆驿，疏通道路，驻兵屯田，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行政管辖，从而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长距离的安全屏障，也为这条商道的繁荣提供了充裕的物资条件，使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好情景，其详细内容将在第六章评述。

三、与周边几大势力的斗争和退出西域

公元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围绕丝路贸易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厚利，唐朝政府与东西突厥的余部旁支，与大食、吐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种斗争几乎伴随着唐朝经营中亚的全过程，最后以大唐势力退出，中西交通的重心转向海路，而陆路交通一度仰赖回纥而告终。

---

① 《全唐诗》卷198。

② 参见孔祥星：《唐代新疆地方的交通组织长行坊》，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

太宗、高宗两朝，东西突厥虽已先后平定，但其余部常有纷争和扰攘山北之事，举其主要的有：仪凤中（677—678 年），匐延府（今额敏县一带）都督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伙同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联合，侵逼安西。朝廷采纳吏部侍郎裴行俭计取的建议，诏裴行俭以册送波斯王子①安抚大食之名前往西域。波斯王子一行至西州后，裴行俭佯言行猎，使都支在麻痹大意中被擒。叛军既平，泥涅师自返其国，又命同行副使兼安西都护王方翼留筑碎叶城，并刻石纪功，时为调露元年（679 年）②。高宗末年（682 年），又有阿史那车薄围攻弓月城，再以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进讨，庭州刺史、安西副都护王方翼大败车薄于伊犁河，又与咽麵十万援兵战于热海，获大胜，威服西域。综观高宗一朝，西突厥十部虽时有离心叛乱，但旋即被平。至高宗末年武后初年，东突厥复兴，西突厥突骑施部又在西部勃起。

东突厥自太宗初年颉利可汗亡后，以其地置府州，与唐朝相安无事达五十年。嗣后，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颉利族首领骨咄禄聚众渐强，自称可汗，开始入寇边境，先后被唐军击溃，遂又向西侵逼。天授元年（690 年）骨咄禄死，其弟默啜代立，向武后求赐粟种、农具及河曲六州之突厥降户，渐渐强盛起来。“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③景龙二年（708 年）灭突骑施部，并葛逻禄三姓，控阿尔泰山以西至里海地，甚至出兵康国，

① 波斯王子泥涅师为萨珊朝末王伊嗣俟之孙。公元 651 年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下，伊嗣俟被杀，历时 4 个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灭亡。为了扶植抵御阿拉伯人的势力，唐朝政府立伊嗣俟之子卑路斯为波斯都督（661 年），次年又立他为波斯王，但终不能复国，客死长安。这次护送回国的波斯王子泥涅师是卑路斯的儿子，曾随父同住长安。

② 《新唐书》卷 108，《裴行俭传》。

③ 《新唐书》卷 215，《突厥传》。

远征铁门关①。开元二年(714年),默啜子同俄特勤围攻北庭大都护府,被大都护郭虔瓘击毙,分兵侵扰金满及柳中的人马也被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郭知运所败。不久默啜死,内相杀伐,余部于天宝初年入降,故地为回纥人占有。

在东突厥复兴之后,7世纪末西突厥突骑施亦开始强盛。突骑施为西突厥五咄陆部之一,原居伊犁河中下游南北两岸,地分两部,其首领乌质勒初隶蒙池都护斛瑟罗,号莫贺达干。斛瑟罗政残,"众皆畏之",而乌质勒"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②。后攻得碎叶,徙牙帐居之,称其为大牙,同时以弓月城为小牙,一时间"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庭州"③,尽并斛瑟罗地,称雄西域。神龙中(706年)武后封乌质勒为怀德郡王,同年卒,子娑葛继立,袭封爵(金河郡主),不久国乱被杀(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娑葛部将车鼻施啜苏禄鸠集余众达二十万,自立为可汗④。自此,娑葛部族称"黄姓",苏禄部族称"黑姓",二姓更相猜仇,争斗不已。开元五年(717年)⑤苏禄遣使来朝,册立为忠顺可汗、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继而又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苏禄在位期间,虽曾与唐朝政府发生过一些矛盾磨擦,但基本上尚能友好相处。尤其是代表唐朝政府支持中亚诸国反对阿拉伯人入侵的斗争,常常重创大食,以致于他们送给

---

①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四篇之九。此处铁门关系 Baysun Tau 山脉中的 Buzgala 关隘(汤姆森《鄂尔浑碑文考释》),是从布哈拉、撒马尔罕前往巴里黑的必经要冲。(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9页,注1)

②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

③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

④ 《册府元龟》卷967,外臣部,封册三。

⑤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记为开元三年,即715年。

苏禄一个绰号："阿布·木札欣"，意为"抵人者"（即公牛或大象）①。至德以后（756年）突骑施衰落，黄黑二姓皆立可汗相攻，唐朝自身多故，不暇治。另一突厥旁支葛逻禄部强盛，居碎叶川，臣役二姓。

葛逻禄原属西突厥部，分布在阿尔泰山以西，哈拉额尔齐斯河流域。东与东突厥别部车鼻相接，曾一度臣属之。贞观末年，车鼻叛唐，葛逻禄亦发兵助讨。车鼻亡后，葛逻禄三部谋落、炽俟、踏实力都诣长安相见。高宗显庆二年，平定贺鲁之乱后，以其三部置阴山、大漠、玄池都督府，各部首领为都督。此后葛逻禄三部依违于东西两突厥之间，视其强弱，叛服不常。西突厥突骑施部瓦解后，骁勇善斗的葛逻禄部乘虚从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逐渐向西迁徙，更加积极地参与了中亚北部地区繁杂的部族斗争。天宝初，值突厥内乱，与回纥可汗骨力裴罗自称左右叶护。十二载，葛逻禄叶护顿毗伽生擒突厥叛帅阿布思（拔悉密酋），被唐朝政府宠以殊荣，授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金山郡王，依旧充叶护，俸禄由北庭给，其妻、母并封为国夫人②。计天宝年间，葛逻禄共五次朝贡。至德以后，渐渐强盛起来的葛逻禄开始与回纥为敌，尽据碎叶至塔拉斯诸城，广布于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其南面已到了伊塞克湖以南，但因东面受阻于回纥，不能自达长安朝贡。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东西突厥虽在唐朝前期已先后平定，但中亚北部地区却从来没有平静过。突厥余部、别部此起彼伏，时有叛

---

① B. B. 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莫斯科1964年版，第34页。公元738年，苏禄在喀里斯坦之战被莫贺达干与都摩度所杀。据柏林民族博物馆所藏高昌残碑证之，攻杀苏禄之役实有中国人参加。正如吉布所说："是中国的外交搬掉了伊斯兰入侵中亚的这个外部障碍，而使其自己与阿拉伯人发生了正面的接触。"参见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页。

② 《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三。

乱、分争扰攘山北之事，其中堪称强大、雄居一隅者有如复兴之东突厥（亦称后突厥），西突厥突骑施部、葛逻禄部等。而7世纪中叶以后，西北地区的局势又因南有吐蕃的崛起并不断北上骚扰，图据四镇、控制丝路，西有大食帝国的东侵而变得更加复杂，斗争也更加剧烈。

吐蕃世居西藏高原，建庭逻娑（今拉萨）。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始通中国并请婚，太宗不许，于是扰边为患。贞观十五年（641年）以文成公主下嫁，唐吐结欢，汉文化随之大量输入吐蕃，对改善其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而唐则因吐蕃有道径通天竺，便利了对西南的经营与交通。如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平定天竺即得力于此道。太宗死后不久，弄赞亦卒（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其幼孙立，禄东赞任相秉国政。至禄东赞子钦陵为相时（685—699年），吐蕃渐强，兼并青海吐谷浑，东犯陇右，西争西域，为唐一大边患。

高宗龙朔初年（661年）吐蕃以武力侵吞吐谷浑后，又于咸亨元年（670年）率于阗兵取龟兹拨换城（阿克苏），陷安西四镇。上元二年（675年）吐蕃参与西突厥都支叛乱，联兵攻安西。至是吐蕃军在山南日见猖狂。高宗时期，吐蕃尽管北上蚕食陷四镇，与唐争夺西域，但西州以东，天山以北，尤其是伊、西、庭三州牢牢控制在唐朝手中，并未出现太大的动乱。

武后执政，与吐蕃多有交战。长寿元年（692年）命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十月破吐蕃，克四镇，复置安西大都护府治于龟兹，驻兵三万以戍边，吐蕃稍收敛。但时隔四年（696年），吐蕃大败肃边道大总管王孝杰于折罗漫山（博格达山），九月兵围凉州城，执都督，遣使请和，并提出两个苛刻的条件，即唐罢四镇戍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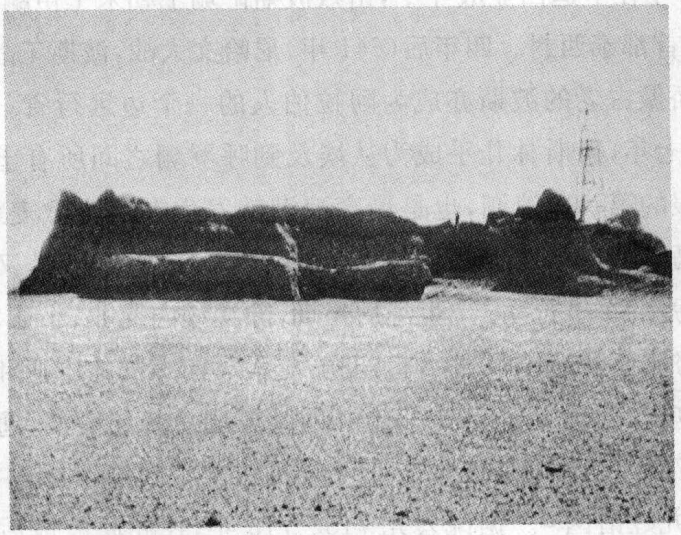
割让碎叶以西五弩失毕部地予吐蕃。武后命郭元振使吐蕃，与当国大将钦陵辩议，郭元振据理力争，久议不决。其后吐蕃内乱，西境暂安。

中宗时，唐吐再次和亲。景龙二年(708 年)，中宗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吐蕃请以水草丰美的河西九曲地(今青海贵德县以南)为公主汤沐邑，自是复强。至玄宗时，东犯陇右，西谋再克四镇，主要表现在与唐争夺大小勃律上。吐蕃王庭西约三千里有小勃律(今吉尔吉特，在克什米尔之北)，小勃律东南三百里有大勃律，大小勃律为吐蕃入四镇之天然要道。正如开元十年(722 年)吐蕃发兵侵小勃律时宣称“我非谋汝地，假道以入四镇而已”①。所以开元初小勃律王没谨忙入朝后，玄宗在小勃律置绥远军，后又取喝盘陀(今蒲犁县)，设葱岭守捉，为的就是把守住四镇西南的门户，扼住吐蕃西面出入的咽喉。开元十年，吐蕃侵逼小勃律，夺其九城，没谨忙寄书求援，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就说过：“勃律是大唐之西门，若勃律失守，西域必陷于吐蕃。”②这次入侵虽在唐军和勃律的夹击下未能得逞，但十余年后，吐蕃再次西攻小勃律，使其残破，没谨忙卒，三传至苏失利之，与吐联姻后归附，西域二十余国皆臣属，贡献不入长安。安西都护曾三次发兵进讨，均无功而返。直到天宝六年(747 年)，玄宗亲诏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统兵万人往讨，才一举拿下小勃律，唐朝于此地设归仁军，驻兵三千镇守，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③。小勃律之战是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军队在西域地区取得的一次辉煌战果，它对维护唐朝政府在西域地

---

① 《新唐书》卷 216，《吐蕃传》。
② 《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
③ 《新唐书》卷 135，《高仙芝传》。

区的管辖以及东西交通大道的畅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高仙芝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作战技艺，受到了唐朝政府的极大信任和奖赏，短短的时间里，被升任为鸿胪卿，权任御史中丞，又加封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等。此时官运亨通的高仙芝，开始踌躇满志，屡胜而骄，贪得无厌，不能平和地对待西域诸小国，终于因个人举措失当，引发怛逻斯大战，惨败在大食军队手下，严重损伤了唐朝政府在西域诸小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加速了唐朝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衰退。怛逻斯战役是唐与大食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也是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大食帝国向东扩展势力的必然结果。



图版11　新疆若羌县唐代吐蕃古城堡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大食，亦称哈里发帝国或伊斯兰帝国，为穆罕默德所建立，兴

起于公元7世纪初，正当隋末唐初之际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公元632年，62岁的先知穆罕默德病逝，其老友及岳父艾卜·伯尔克被拥戴为第一任哈里发，在其仅仅两年的执政期间（632—634年）已向北部开始了穆斯林的征服。继任者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更将军队推向四面八方，完成了一系列军事征战。635年攻下了叙利亚古城大马士革，636年亚姆科河之役的胜利战胜了拜占庭，结束了它对叙利亚的统治。640年征服埃及，641年11月8日签订了亚历山大条约，拜占庭同意每个成年人缴纳两个第纳尔的人头税和一定数量的谷物税，于是这座伟大的文化中心和与欧洲进行海上贸易的著名商埠就落入了阿拉伯人手中。向东，637年在卡迪西亚战斗中，击败波斯萨珊王朝末王伊嗣俟，次年攻占其首都泰西封。四年后（641年）尼哈文大战，波斯王战败只身逃奔，骄傲古老的波斯亦成为阿拉伯人的一个边远行省。于是先知死后七年，穆斯林几乎成为从埃及到呼罗珊之间所有土地的主人，征服的第一次浪潮，也是最高浪潮就发生在这个欧麦尔时代。到“倭马亚朝”（中国史称白衣大食）时期（661—749年），又开始了向外扩张的军事行动。7世纪后半期，除继续向北非、小亚、君士坦丁堡、努比亚等地侵略外，8世纪初，更大举向东部的中亚和印度西北部进攻。公元705年，走马上任的呼罗珊总督屈底波，通过十年（705—715年）不间断的征战，终于先后占领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昭武九姓诸国①。据说公元713—715年，在屈底波最后一次战事中，曾率兵越过锡尔河，深入到拔汗那，甚至有说他到了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并传说他曾发誓要占领中国的土地，当地首领只要

① 参阅[德]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茂德著，吴云贵等译：《伊斯兰教简史》。

不再流血，愿意帮助他遵守誓言。于是便送给他象征土地和贡赋的一袋泥土，一袋中国钱，并在四位皇室青年身上盖上他的印记①。其实这个传说很难令人置信。因为据汉文史籍记载，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屈底波曾派遣一位使臣至中国宫廷"献马钿带，谒见不拜……有司切责，乃拜"②。由此看来，大食使臣对唐廷还是恭敬和畏惧的，双方也不像是有过领土纠纷。阿拉伯人对中亚地区的入侵，起初是以袭击为主，表现出临时性的特征。屈底波时代将这种入侵活动推向高潮，但时间短暂。屈底波死后，扩张也随之停止。阿拉伯人虽然占领了吐火罗、石汗那，在索格底亚那，固守住布哈拉，并有移民居住，在撒马尔罕也派军队加以防守，但其周围地区却没有被征服，且遭受敌对态度。地方统治者受到突骑施人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中国的支持。阿拉伯人对其帝国东部的管辖是无力的，呼罗珊是帝国东部边远偏僻的一个省份，有极大的独立性，若干年后，推翻倭马亚朝的革命运动首先从这里发起。公元749年11月倭马亚朝被阿拔斯朝(中国史称黑衣大食)所取代。阿拔斯朝首任哈里发艾布·阿拔斯只统治了四年。在他统治的头两年，爆发了中西关系史上著名的怛逻斯大战，中方战败，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以上分别叙述了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西突厥余部、别部、吐蕃、大食与唐在西域的争夺。然而在这一个世纪内，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单线的发展，而是相互交叉牵制，形成复杂的多边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吐蕃和大食这三方几乎同时崛

---

① 参见[英]珀西·赛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卷上册。

②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

起，同时强盛，其关系构成了当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西域是三方角逐的中心①。概括来说，太宗朝至高宗显庆中，主要是先后与东西突厥较量，最后以平定突厥，全面统辖西域而告终。此时大食开始与唐朝正式发生关系。永徽二年（651 年）大食始遣使朝贡②。高宗显庆以后，经武后执政，到玄宗开天年间，西突厥余部、别部时有叛扰，后突厥、突骑施、葛逻禄相继勃兴，活跃在中亚北部地区。南面吐蕃垂涎四镇与河西，多次北上与唐争夺。西边大食帝国在吞并波斯后，隔边省呼罗珊与中国相邻，并且不断侵扰河中地区属唐朝羁縻府州的昭武九姓小国，整个西域地区的形势长期陷入混乱。在唐朝、大食、吐蕃、突骑施这四大势力的角逐中，既有分争又有联合。起初，突骑施与唐朝政府虽然也有矛盾，但在中亚诸小国与大食帝国的斗争中，又基本上能够代表唐朝政府予以支援，成为大食东侵的障碍。而急于向天山南北伸展势力的吐蕃就自然与大食结成联盟，大食支持吐蕃攻取四镇，吐蕃牵制了唐朝政府出兵中亚支援诸小国与大食的斗争。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原因，在这场角逐中，唐朝政府尚能保持优势，实际控制着西域广大地区，直到 8 世纪中叶，才发生根本改变。

8 世纪中叶以后，唐朝进入由开天极盛转衰时期。表面上社会经济极其繁荣，实际上，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尖锐激化。主要表现在均田制被破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朝廷内有宦官干政，外有藩镇势力膨胀；而玄宗老年昏聩，怠于政事，宠溺艳妻，重用颉胡；外加边将们对周边少数民族缺乏平和态度，常常生事邀功，挑起冲突，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

① 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旧唐书》卷 198，《大食传》。

先是天宝十年(751年)怛逻斯战败,仅隔四年,安史之乱爆发,随着又是此伏彼起的藩镇叛乱,很快东京陷落,长安震动,全国兵力集中讨难,造成边镇空虚。吐蕃趁机深入,一边助唐讨伐,一边连陷陇右州县,到代宗广德元年(768年)就完全占有陇右并犯长安,虽被击退,但中原通西域的道路亦被阻绝。其时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守郭昕坚守拒敌,并数遣使奉表朝廷,均不得达,音讯不通有十余年,直到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才遣使间道,经占据大漠南北的回纥境地抵长安。此后安西、北庭二都护府的官员就由这条道往返于西域和长安之间。于是回纥在中亚乘时崛起。

回纥是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北方草原最古老的民族之一。4世纪时以袁纥的译名最早见于汉文史籍,当时是高车的一部,居于鄂尔浑河流域。5世纪时,其首领树者做了高车诸部的总头领。突厥兴起后,与之共同游牧在北部草原地区的铁勒诸部中。独洛河(土拉河)一带有韦纥,显系袁纥的异译,唐初汉译名为回纥,受东突厥统治。而天山以北有乌护,汉译名作乌鹘,受西突厥统治,后西徙葱岭,不复见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漠北有薛延陀汗国继起,回纥臣属。贞观二十年(646年),唐与回纥等铁勒诸部合兵灭薛延陀,于其地分设都督府州,统属燕然都护府管辖。而回纥部设立的是瀚海都督府,其首领吐迷度任瀚海都督,授怀化大将军。当时曾修筑了一条经回纥、突厥诸部而入内地的"参天至尊道","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备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①。安史乱后,这条大道发挥了

① 《新唐书》卷217,《回纥传》。

更加重要的作用。回纥自与唐朝交往后，一直尚能保持友好关系。吐迷度子婆润曾两次调兵援助唐军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以后又在唐朝平定后突厥汗国时举兵相助。开天年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受唐两次册封，此后即位的每一位新可汗都由唐朝册封，并先后娶了五位唐室公主。德宗贞元四年(788年)，遣使求得唐朝同意，改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贞元五年至七年，吐蕃进犯并攻陷北庭，唐与北部地区关系中断。但不久，回鹘又回击葛逻禄、吐蕃，重占北庭，并遣使向唐廷报捷，直到9世纪前期，北庭一带实为回鹘汗国所占有。回鹘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民族，当其全盛时期，凭恃着助唐有功，在多年从事的绢马贸易中贪欲越来越大，每年输送的马匹不断增多，“动至数万匹”，马绢比值也不断上升，“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造成“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①的状况。这种不等价、不互利的贸易无疑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巨额的绢马贸易中，回纥人本身是无法消费如此大量的丝织品的，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丝绸的转手贸易。除马匹外，回纥输往唐朝的物资还有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玻璃器、香药、安息鸡舌香等。这些东西显然来自西方，是回纥用大批丝织品换取来的。于是这一时期回纥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大的中转站，使中西陆路交通得以冲破政治动乱的障碍，继续维持，这不能不说是回纥民族对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

唐自安史乱后，又有朱泚的造反，吐蕃、回纥的寇扰，顾此失彼，仅得勉强维持。故自北庭失陷后，再无力克服，于是周边各强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大势力：葱岭以西的大食，天山以南的吐蕃，原牧于漠北的回纥，及阿尔泰山以北的黠戛斯，都开始了对天山南北道及牧场的争夺。“唐朝的退出，预示着西域从而整个亚洲大陆的强权政治时代基本结束。吐蕃获取天山南部则必须与当地势力联盟维系，回鹘虽此后一度强盛，但亦未能覆盖整个北部草原，旋受迫于黠戛斯而出高原。随着分立趋势的发展，整个亚洲大陆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①。大食与吐蕃相攻伐，互相牵制兵力，反而减轻了西境上的威胁和压力。贞元七年（792 年）回鹘击破葛逻禄、吐蕃于北庭，一度控制了天山北路。但从 8 世纪末叶起，回鹘统治集团内部危机加剧，汗位改姓，一些属部摆脱了汗国的统治，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终于在会昌元年（841 年）被黠戛斯攻灭，余部向南向西迁徙。会昌二年十月，黠戛斯遣使入朝，武宗大喜，欲利用黠戛斯制回鹘，伏吐蕃，克复西域，但却无力办到了。哀帝天祐四年（907 年）黄巢农民起义军降将朱温废帝自立，唐朝灭亡。而天山南北以及中亚广大地区开始了外来民族与土著居民相融合，几个政权并存发展的局面。中西交通也因频繁的战乱，造成经济重心南移，开始了陆路衰退，代之以海路兴起的时期。9 世纪以后，中西陆路交通经喀喇汗朝、西辽王朝的持续发展，至蒙古兴起，四大汗国建立，又一次出现了高峰。但纵观整个陆路交通史，其最为鼎盛繁荣时期仍推公元 6—9 世纪，它表现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广泛接触交流上，而中亚北部地区则在这种多民族的世界性文化交流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因此下文将尽可能详细地论述此问题，以突出本书的重点。

---

① 李鸿宾：《西域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2 期。

第五章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在论述公元6—9世纪中亚北部贸易盛况之前，我们插入一个与本书主题有关并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问题，即粟特人的移民活动以及他们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一节　“粟特”辨析

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为一些史籍和论著中将粟特、康国、康居、俄粟特相互混称的现象而困扰，莫明这四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有人说：“汉代的康居就是隋唐时代的康国，亦即粟特。”起初我接受了这一解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感到并不尽然。于是又重新回到原先的疑惑中去思考，并通过追逐粟特人的历史活动踪迹，侧重对它的移民和各项社会活动进行研究，力求揭示出粟特人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处的地位和做出的贡献。

粟特（Soga、Sogdiana）一名见于汉文史籍《汉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北史·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作粟戈（粟为粟字之讹），《魏略·西戎传》作属繇，《晋书·西域传》作粟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作速利，《大唐西域记》称窣利，《宋书》作肃特。在古希腊、波斯文史料中，粟特称Suguda、Saghdo（希罗多德《历史》），Sugude、Sugda、Suguda（古希腊铭文），粟特文写作Sugd—，Sgud—，匈牙利学者哈尔玛达认为“粟特”词义为古伊朗语“圣地”①。根据中外文史料记载，粟特人公元前五六世纪时已经出现，是世代繁衍聚居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一个古

① 参见黄振华：《粟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北京1982年，第176页。

伊朗民族，曾先后隶属于波斯阿赫明尼德王朝、希腊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帝国。汉时为康居属国。当时的康居古国位于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至咸海一带。公元前128年左右，张骞曾至其国，与其建立了联系。是时康居东与仍旧独立的费尔干纳接壤，南和帕提亚、巴克特里亚毗邻，西面包括花剌子模和布哈拉绿洲。粟特的一部分也被纳入它的版图之内。到了隋唐以后至穆斯林时期，河中地区为昭武九姓所居，其中又以地处撒马尔罕的康国为要为大，所以出现了粟特、康国混称或以康国代粟特的现象。也许就因为康字相同，或加之汉代粟特的一部分也确被纳入康居的版图，才造成以康国等同汉代康居之舛误。如《册府元龟》有两次提到"康国者，康居之后"，"五王居康居，后名康国"①。成书于宋代的《高僧传》中凡举康姓之沙门释者皆谓之康居人，但从所述内容看，他们大多应属粟特人，也就是康国人。如初集卷一提到康僧会"其先……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初集卷四提到的康僧渊"貌虽梵人"，"鼻高眼深"②，显系伊兰雅利安民族。而最能表现这种舛误的一段文字记载见于《魏书·西域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③张星烺先生认为"此节应为《隋书》，而见于《魏书》者，后人误增"，是也。但张先生又认为"汉代康居即唐代之康国"④，则非也。我们承

① 《册府元龟》卷961、966。

②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页，第150—151页。

③ 《魏书》卷102。《北史》卷97、《隋书》卷83记述相同。

④ 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5、79页。

认在中亚地区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康居与粟特之间并非没有联系，但无论从地望、民族、习俗、社会生产方式等诸方面来看，又毕竟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不该混淆。根据张骞出使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最早记录了西域诸国的情况，称“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大宛地处费尔干纳盆地，所以康居当分布在锡尔河中下游和迤北的草原地带。这与苏联考古发掘提出的“康居文化部族居住在肯特门丢别河谷，塔什干绿洲和费尔干纳西部的结论”①是基本一致的。《晋书》卷97曰：“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这条材料反映出康居与粟特有居地相邻的关系。康居是游牧民族，根据“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的特点，他们可以在国势强盛时，将辖境远推至河中地区，臣服粟特，也可能在外族（如匈奴、嚈哒、柔然）迁徙浪潮的冲击下，有族人南下进入索格底亚那，并在那里居住下来，逐渐与当地部族融合同化。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不会完全取代本地民族，也就不可能成为世居河中地区的粟特人的前身②。粟特人属东伊朗人种，是一个“力田逐利者杂半”的半农半商民族，尤以善于经商而著称。玄奘关于他们曾有过一段较详尽的描述：“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1, стр167.（《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167页）

② 关于康国与康居的关系，陈海涛曾有专文论述，该文认为：隋唐时期所出现的昭武九姓国家与《汉书》、《晋书》等载的康居有明显的同源关系，而同一时期文献中大量出现的粟特，并非传统所认识的是康国（撒马尔汗）的前身，而是安国（布哈拉）的前身。隋唐时期的昭武九姓国家，大部分都是在汉晋时期康居所属诸小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康国对其他昭武诸国的统属，有其历史的传统根源。（陈海涛：《康居与康国关系考》，《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3期）

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①文中的素叶水又称细叶水、睢合水，即楚河。羯霜那国都城位于撒马尔罕南75公里处，为中世纪从飒秣建至缚喝大路途中的一座大城②。可见以玄奘所记，粟特人活动地域之大，从北至南几乎遍及中亚。玄奘经过楚河、塔拉斯河时见到的粟特人，应该是从故乡河中地区北徙的粟特移民，所以这是《隋书》将康居、粟特相混淆的另一个原因，而后人据之便错误地认为"康国之名，隋唐始见，以前皆作康居"③。

如果说粟特与汉代康居之间还有某些联系的话，那么以粟特等同古之奄蔡，汉代阿兰聊，三国以后至隋唐的阿兰，即现在居住在高加索一带的主要居民沃舍梯人则是一个更大的舛误了。《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周书·异域传》三书几乎是字句全然相同地写道："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张星烺先生为此条材料作注曰："粟特似为俄粟特(Ossethi)之讹音，略去其首音俄字也。俄粟特民族今代仍居高加索山系间，即古代阿兰(Alans)或阿思(As)人之苗裔。粟特不可与索格多(Sogdo)相混。索格多乃伊兰人称康居也。"④其实粟

① (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② 上揭书，第98页注释。

③ 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5页。

④ 上揭书，第59页。

特正是这里提到的索格多而非康居，上文已有论述，而粟特并非“古之奄蔡”，古人今人都曾明确地指出过，并有精辟的论证①，可视为定论矣。这里需略加强调的是，奄蔡古国“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是中亚北部地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又当丝路孔道，即丝绸之路北道沿咸海、里海以北西去必经之地，而且中外史籍均反映出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匈奴西迁浪潮曾波及到这个古国。所谓“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魏书·西域传》)，“而阿兰那王国的完全被匈奴人所毁灭，则完成于公元374年”②。所以我们在研究“草原之路”、“匈奴西迁”等问题时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它。

第二节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和向东的移民

世居河中地区的粟特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史称他们：“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③。粟特民族善贾的特性和在中亚国际商路上充当中介，是有其形成之地理历史原因的。首先，河中地处亚洲腹地，四周为经济发达的文明古国包围，丝绸之路一经开通，这里就成为枢纽重地，东西方物质文化在此荟萃交融和传播，使之成为各国奇珍

---

① 参见《元史类编》卷42；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肖之兴：《〈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载《文史》第15辑；余太山：《〈魏书粟特传〉辨考》，载《文史》第21辑；莫任南：《康居古国初探》，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

② [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7、168页。

③ (宋)王溥：《唐会要》卷99，康国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74页。

异宝的聚散地，成为丝绸贸易的中转站和大仓库。而河中地区土地肥沃，沟渠纵横，气候适中，物产丰富，自古发达的农业经济也为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证。所以休养生息在此地的粟特人既有力田者，又有逐利者，各占其半，或者亦农亦商，兼而事之。这些“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具有天生的商业才能，其敏捷、勤勉、商业规模之大，令人惊叹”①的粟特人以经营国际贸易而著称，他们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都走得很远，足迹遍及西亚、中亚、印度、天山南北、河西走廊，直至长安、洛阳和河北、江南等地。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提到：“粟特人和大夏人也经常沿着从印度到达欧洲俄罗斯的通商大道前进。沿途路经阿姆河、里海、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或者经由里海、库拉斯河与黑海沿岸，这就是高加索的路线，黑海沿岸的希腊—粟特商人对这些地区并非完全陌生，他们也可能把佛教传到了那里。”②正因为粟特商队走遍天下，而他们又“不仅仅是出色的商人，而且有艺术家、手工业匠师和新宗教的传播者。他们不仅沿着中亚细亚的丝绸之路旅行和定居，而且在中国的内地和草原游牧人中间旅行和定居”③。所以“诸种文化也得到了传播的机会。再有，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人，由于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才能比较容易从事这种艰难的旅行。他们经商的范围愈广，文化相互传播的范围也就愈大，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也就是文化传播史”④。仅以语言文字为例，公元6—9世纪，粟特语言文字几乎成了丝路上共同的交际工具之一，玄奘称其“字源

---

①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② [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③ Б. Г. Гафуров.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1972г. стр263-264.（Б. Г. 加夫洛夫：《塔吉克民族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263—264页）

④ 同上注①。

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实在是很符合粟特文的情况。粟特文出自波斯时代的阿拉米亚文字草书，只有十九个音节字母，最初从右到左横写，后来受到汉文的影响，改为从上到下竖写。本世纪初，一批外国探险家如德国的勒柯克（1902—1905 年）、法国的伯希和（1907 年）、英国的斯坦因（1907 年）、俄国的鄂登堡（1910 年）等人在中国境内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河西敦煌和敦煌以西的汉代烽火台遗址出土的《粟特古书简》（共 6 封），尤有历史价值，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粟特文书，并且这批文书反映出粟持人当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如在吐鲁番发现的一本粟特日历，上面的年、月、日和节令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下面对照有汉文译文。在敦煌找到的一本粟特文佛经，是长安都城的钞本，还有一本《善恶因缘经》是粟特人译自汉文的佛经①。另外，19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先后在内蒙古发现多块公元 6—9 世纪用二三种文字书写的碑文，中有粟特文。如《木杆特勤纪功碑》（又称卜古特碑，建于 6 世纪末），正面为粟特文，背面为梵文；塞夫列依碑，用粟特文和卢尼文书写；《九姓回鹘可汗碑》（建于 820 年）为粟特文、汉文和古突厥卢尼文三种文字写成；1976 年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粟特文摩崖②。粟特文对后来的回鹘文、蒙文和满文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可谓是这些文字创造的基础。由此可见，粟特人在东方文化方面是有过贡献的。

一向以经营国际贸易著称于世、充当中西丝绸贸易居间商的

---

① ［法］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载《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第 7 辑，第 29 页。

② 黄振华：《粟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6 页。

粟特人，为了从中转贸易中获得优厚的利润，常常不惜介入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外交活动中，对其统治阶级制定国策给以一定的影响。如公元545年（大统十一年）西魏曾向突厥派出过以粟特人为首的使团。粟特人完成了使命，在西魏和突厥之间，建立起外交和商业联系①。西突厥一度控制中亚后，粟特商人力图借助突厥汗国的势力从波斯萨珊人手中夺得与东罗马帝国进行丝绸贸易的垄断经营权，就极力劝说突厥汗王也插手丝绸贸易，并代表西突厥汗国出使波斯，要求在其境内各地享有自由贸易权，结果虽遭到拒绝，却丝毫不沮丧，而是锲而不舍地说服西突厥汗王绕道里海北面，直接通使东罗马，并挑唆东罗马攻伐波斯，导致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无独有偶，在东突厥汗国里同样有大量的粟特商人，追随突厥人东西往来，并因突厥成制聚合起来，形成所谓“胡部”。汗廷政治深受粟特人影响，早期流行文字不是突厥儒尼文而是粟特文。后来唐朝平灭东突厥，专门设置鲁、丽、含、塞、依、契六个州来安置粟特部落，称为“六胡州”。公元8世纪以后，又有不少粟特商人出现在回鹘汗国境内。《新唐书》记“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公元780年，回鹘汗国发生内讧，宰相顿莫贺达干袭杀登里可汗，同时被杀的粟特商人竟达二千余人②，可见粟特商人云集回纥汗国之一斑。

国际贸易与交通、移民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粟特商人并不留恋家乡，他们沿丝路辗转贩卖，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并且具有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стр221.（《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21页）

②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到一处辄止”[①]的特点，随时随处定居殖民，建立了许多较固定的移民居点，而“粟特人商业移民地是配合商队贸易而建立的中转站”[②]。近二十年来，伴随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学者们逐步探清了中亚以东直至中原地区越来越多的粟特聚落。

首先，“从种种迹象判断，粟特人的东来是沿着怛逻斯河(Talas)、楚河(Chu)流域推进的”，证据是“7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唐高僧玄奘(600—664年)赴印求法，归来记述所历诸国情况时，不仅把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昭武九姓诸国地区称之为窣利(粟特)，而且把从羯霜那延伸到碎叶城(Sūyāb)的地区也名之为窣利，这正是因为他看到碎叶城以西的楚河流域、怛逻斯河流域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城镇，因而把这一地区纳入了窣利(粟特)的缘故”[③]。与此相补正，西方史料中提到，也正是在怛逻斯附近，出现了哈木卡特(Jamukath)等城市，是因为布哈拉(Boukhara，即昭武九姓国中的安国)的一些贵族和商人遭受阿布鲁依(Abrui)的迫害而避难来此，建造了这些城市[④]。西突厥灭亡后，怛逻斯和碎叶一带归属唐政权以羁縻州府形式统治，曾有粟特首领安车鼻施被委任为碎叶州刺史[⑤]。尽管从安车鼻施的名字看这里已经带有突厥化的色彩，不过其种族和部众属粟特族肯定无疑。从怛逻斯和碎叶向东，粟特人习惯沿丝绸之路北新道旅行。离此不远位于伊

---

①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② Б. Г. Гафуров.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1972г，стр264.（П. Г. 加夫洛夫：《塔吉克民族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264页）

③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④ 纳尔沙希(M. Narshakhi)著，饶近龙、蓝琪译：《布哈拉史》，第113页，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即《中亚史丛刊》第5期)。

⑤ 在乾陵墓前现存的六十一个藩国首领石像中，就留有“碎叶州刺史安车鼻施”的题名。

丽水(伊犁河)东岸的弓月城,就是粟特商人的一个重要商品集散地。据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词事》可知,弓月城是曹禄山家族的贸易据点,有许多家族成员(如曹禄山兄弟、外甥等)不断前去,并储存大量丝绸等货(其中仅借给李绍谨货物一次就有"二百七十五匹绢");同时也是其他粟特人的经商之处,当时汉人李绍谨就是"从安生胡向弓月城去"的,借绢之时并有曹果毅、曹毕娑等粟特商人居间作证①。可见这里是粟特商人常来常往之地。再往东去,天山北麓的庭州也是粟特人往来甚至聚居之地。这里原是西突厥下辖重镇,称为可汗浮图城,后来成为唐朝在天山以北的统治重心,是总辖天山以北各羁縻府州的北庭都护府的府治所在,交通地位重要而又比较安全,因而聚集了不少粟特人。吐鲁番出土文书表明,庭州不但有粟特商人往来交易,而且在其下辖金满县大致管有占户籍三分之一的粟特落籍者②。《突厥语大词典》和《世界境域志》也提到在这里有粟特村落③。

如果考察南疆地区,我们也会发现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和据点。在葱岭地区有羯盘陀国,唐朝曾设立葱岭镇和葱岭守捉。通过解读一些粟特文旅游题记,可以得知许

---

①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1983年版,第242—247页。

② 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306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1979年,第354页。

③ 参见依不拉音·穆依提:《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多粟特商人往来于葱岭东西及与印度河上游的勃律之间①。由此向东沿塔里木盆地边缘，北道疏勒、据史德（汉代的尉头，今图木舒克市）、龟兹、焉耆、高昌（唐朝设为西州）、伊吾（唐朝设为伊州）等地，南道于阗、播仙镇（古且末之地）、石城镇（古鄯善之地）、蒲昌海等地都发现了粟特人的踪迹或聚落②。比较明确和突出者，斯坦因所得中和三年敦煌写本（编号 917）记云："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地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地更名鄯善。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675 年）改名石城镇，隶沙州。"写本后又云"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而"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③。同时汉籍记述："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④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⑤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1908 年

---

① 如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发现的一则题记云："请圣地 K'rt 之魂予以恩赐，让我快些顺利到达渴盘陀，去看望[我]健康愉快之兄长。"（转引于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② 参考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收入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7—172 页）、《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85 页）、《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 年第 2 期）等文。

③ 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 7 编，第 28 页。

④ 《汉书》及《水经注》作伊循。

⑤ 《新唐书》卷 40，《地理志》。

伯希和发现的唐开天年间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上记有蒲昌海南粟特移民聚落之事，可与汉文史料记载互为补证。《图经》附有蒲昌海石城镇将康拂耽廷之弟地舍拔所上之申请书，书记元年为天授二年(691 年)。伯希和认为“拂”字乃“昔伊兰人之名，或由伊兰人介绍到中国所用之名，多用此字”①。这里后来出土了不少粟特文书，进一步印证了以上记载。这些资料充分告诉我们，公元 7 世纪以后，在蒲昌海南有粟特首领率众筑了四座城池：典合城(即石城②，汉楼兰国，隋鄯善镇)、新城(又曰弩支城)、蒲桃城、萨毗城③，它们均是典型的粟特移民村落，享受着自治权，并且配合商队贸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粟特资料的发现，证明这里设有在粟特宗教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祆教祠庙，存在着专门管理粟特商队和聚落的萨宝及萨宝制度，并发现了包括众多粟特人名的籍帐和契约等物，还可以确定在唐代高昌县崇化乡安乐里集中了主要的粟特人口和聚落，可知这里也是粟特人东进和移民的重要据点。

对于粟特人移居中国的情况，无论是文献史料还是考古材料都有迹可寻。在十数年研究粟特人入华踪迹的基础上，荣新江先生指出：“粟特人沿着他们经商的路线由西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区。他们东来贩易，往往结伙

---

① 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 7 编，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 卷，第 27 页。

② 据黄文弼先生考古探查后认为，婼羌古城的且尔乞都克外城很可能就是 7 世纪中叶康艳典为镇使时所重建的石城镇。城在婼羌县城南稍偏东的戈壁上，距县城 6.4 公里。城作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外城周 720 米，城墙宽 1.5 米，残高 1 米，用卵石垒砌，很可能为取名石城之由来。古城四周为戈壁，对照《图经》、唐地志的记载，且尔乞都克的地形、环境、古城建筑特点等，基本与石城镇相符。

③ 敦煌发现的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也提到此城。

而行，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并且拥有武装以自保。他们沿着传统的丝绸之路东行，有的在一些居民点留居下来，形成自己的聚落，或在可以生存的地点建立殖民地；有的继续东行，去寻找新的立脚点。这些粟特人聚落，由少到多，由弱变强，在农耕地区，称为聚落；在游牧地区，则为部落。”①伴随对敦煌卷子研究的逐步加深和更多古代墓志等资料的面世，现在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粟特人在中国内地的东渐之路及其主要的居留之地。自天山一带往东，伊吾曾有粟特人控制或占据着七城之地，贞观四年（630年）曾号“胡王”的粟特首领石万年率此七城来降，唐为此设置伊州。敦煌及其所属沙州之地，是西域进入中原的咽喉之地，粟特人也是非常之多，特别是敦煌十三乡之一从化乡系专为粟特人所设，成为自治性质颇强的粟特聚居地②。河西走廊中的瓜州常乐、甘州张掖也云集了不少粟特大族，以至于这里成为许多粟特人借以炫耀的地望③。此外，酒泉和肃州全境、姑臧及整个凉州之地，都有不少粟特聚落或部落。《魏书·西域传》记：粟特“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④。姑臧是今甘肃武威地区，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凉州粟特势力一度还很强大，其首领或被封为侯，或独霸一方（策应诸葛亮北伐的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人，号称“跨全凉之地”的康续先辈，唐初解决李轨政

---

①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5页。

② 中外学界对敦煌粟特聚落做了大量研究，主要论文、论著有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等。

③ 入华粟特人常常称籍出之会稽，实在瓜州晋昌郡治下，建康则为甘州治下建康郡或建康军。

④ 《魏书》卷102，《西域传》。

权的安兴贵兄弟等)。再向内地,粟特人有定居在陕西东部的。前秦重修《邓太尉祠碑》提到甘露四年(362 年),冯翊(今陕西渭河以北的东部地区)护军统辖"……粟特、水杂户七千"①。不过,长安和洛阳无疑是最重要的粟特人聚居地区。长安治下蓝田县是专为三千余家康姓粟特人所置;隋末有长安粟特胡何潘仁、史万宝等人聚众起义,为李渊军队入据关中做出重大贡献;德宗朝李泌检括胡客有田宅者,一时竟有四千余家自愿落籍,正式成为大唐臣民。学者们从墓志资料中检出至少三十家粟特人留居在长安醴泉、崇化、崇贤、延寿、居德等约二十个坊区内,同时城内外还有不少经营酒店、食铺或珠宝生意者。洛阳也出土了近三十方市内粟特居民的墓志,龙门石窟造像题名还揭示出洛阳粟特人聚居结社的情况。自洛阳往东北,卫州、相州、邢州、恒州、定州,都有粟特人往来或居住,有学者甚至发现比较偏僻的蒲州等地乃至江淮以远直至岭南地区也发现了粟特人的踪迹②。唐朝时期,中原以北西从灵州东至营州分布着众多的粟特部落,胜、夏、银州一带曾增设鲁、丽、含、塞、依、契六州来安置附属突厥内部的粟特降众,号称"六胡州";东北地区的营州则聚集了构成安禄山胡人集团主体的粟特部落。安禄山余部在河北一带逐步发展,一度导致了河北藩镇的胡化倾向。笔者认为,尽管有学者认定这些地区的粟特人是经过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一带东迁而来的,但是他们更多人与突厥的密切关系毋

① 转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394 页。

② 以上参考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及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 5 期)、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等文。

庸置疑①。经从天山北麓到漠北地区的草原之路，深入到突厥汗国内部，然后在东突厥分裂败亡的背景下流散中原北部，应是粟特人东渐的另一条重要路线。

关于粟特人入华后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有丰富的史籍文献和墓志碑铭为我们清晰反映出来。这些汉文史籍中留下了不少来华粟特人的姓名，如康谦（见《新唐书·孙孝哲传》）、康植、康日知（见《新唐书·康日知传》），康阿义屈达干（见《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康公神道碑铭》）、康萨陀（见《画录》、《画谱》）、康昆仑（见段安节《乐府杂录》）、康老胡雏（见李白《乐府·上云乐》）、康枚、康达□、康武通、康续、康磨伽、康留买、康庭兰、康洽（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康拂耽延（见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等。另外，吐鲁番文书中也不乏见康姓人名，如康保谦、康鸡□、康始延、康辰花、康玄感、康义罗施、康海德、康万普、康欢隆、康田立、康进感、康逮进、康全致、康元、康知引、康安住、康随风、康长受等②。载有这些姓名的文书内容涉及到户籍、买国券、银钱帐、租出田亩帐、请给物、请过所、诈病避军役，以男代赴役、领送僧尼事等，具体反映出定居在吐鲁番地区的粟特人积极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宗教等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情景。以上诸种资料使粟特人在华情况有迹可寻。

粟特人最初主要以经商这种游移不定的方式来到中国境内

---

① 六胡州的粟特人直接由突厥漠北迁来，而营州粟特人一部分是由六胡州所征发以备“二藩”和突厥的部队，还有一部分是脱离突厥或随突厥入降中原者。

②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91页；第4册，第37页；第5册，第102页；第6册，第130、591页；第7册，第75、88、211、230、313、319页；第8册，第145、175、208、237、280、492页。文物出版社1981—1987年出版。

的。他们多以行商身份从事贸易，从边境互市到内地城镇，无处不至。所出售商品以体积较小而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为主。随着对内地的熟悉，不少人开始留住下来，转为坐商，在地方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势力。8世纪中叶，入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达到繁盛阶段。从经营商品看，往来兴贩的奢侈品种类进一步增加，奴隶和牲畜等贸易业兴盛起来，其贸易活动与国计民生逐步贴近。从涉及地域看，粟特人的商路有了扩展。“这一时期较活跃的路线除了主干线之外，还有北路。这条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中西交通路线，可以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东南端。这条路线可以在从河西直接向西延伸，亦即从粟特本土出发向北进入伊犁河谷，不是折向南，而是继续向东，沿天山北坡，取准噶尔盆地南沿，经过庭州，顺天山东支延伸，进入河西走廊，与前述之路接通，粟特人经常取此道经商。”①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粟特人把经商活动与政治势力结合起来。起初他们多追随河西等地方割据政权，北朝末年至唐初则主要依附于突厥等势力，唐朝兴起则大量涌入内地，祈求中原政权的保护和支持。8世纪中叶以后粟特人社会活动发生巨大变化，大量从商业转入其他行业，从而与中原汉族社会关系密切起来。

伴随社会背景的演变，留住下来的粟特人有不少在生活习俗和文化内涵方面发生汉化，最终融进中华民族这个大熔炉中。在早期，他们多聚居而结成聚落或部落，由萨宝负责直接管理，具有一定自治性质，文化形态保持着突出的民族特色。在粟特人聚落中，萨宝由原来的商队首领变成管理政教事务的正式官员；“普通

① 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的人都是深目高鼻，有的卷发，有的短发，都穿胡服，说明聚落中几乎全是胡人，而没有汉人”；其婚姻形态，“在很长的时间里，粟特人中间保持着内部通婚的习惯”，康、安、曹、石等粟特姓氏之间的通婚非常普遍；其宴乐歌舞、出行经商、狩猎种植等皆具粟特特色；宗教信仰以祆教为主，祆祠的设立是一大特色；丧葬采取火葬形式，石棺床和骨灰瓮是其突出特点①。不过他们自入华后就受到中国政治形势的强烈影响。一方面中国政府努力并逐步加强管理措施，把萨宝等纳入中国官僚体系，采取政府任命的形式。到唐代并把治下粟特聚落纳入地方管理体制，在粟特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县乡，如西州设安乐乡，敦煌设从化乡等。另一方面，其区域流动因中国朝代变革而变化。“十六国到北朝，河西的控制力较弱，大量粟特胡人聚居河西走廊。北朝末年至唐初，突厥强盛，大量粟特人进入漠北地区。唐朝建立后，不少粟特人入仕唐朝，而唐朝的统一也为粟特人的经商活动创造了条件，粟特人及其聚落的分布更为广泛，长安和洛阳成为粟特人的聚集地，而武则天居洛阳期间，也是粟特人聚集洛阳的时代。安禄山、史思明起家柳城，营州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由于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胡人向往之地……”②

后来，粟特聚落和部落陆续被打破，粟特人逐步转化为编民，其汉化进程明显加快。聚落和部落的离散是粟特人汉化的契机所在，一般来说，在中原核心地带，这一变化过程比较快捷，而在边远

---

①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168页。

②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5页。

地区，其聚落或部落则保持较久。大致在吐蕃占领河西期间，敦煌从化乡不复存在，粟特聚落也迅速消失了。正是在这一阶段，“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事各种社会行业，参加到敦煌社会诸如社司、行人等组织中，有些还在各级政权里做官参政，广泛地同汉人及其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①。纵观唐代粟特人在中原社会中融合和汉化的过程，一方面可见他们涉入中原社会生活领域越发广泛。例如，入仕粟特人所担任官职类型由绝大部分担任武职向文武职都较普遍转化，其任职地域则自北方地区向江淮、江南等广大地区延伸；粟特人的通婚不再限于其种族内部，他们与汉族的通婚愈加广泛，所占比例也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其生活习俗与汉族人民逐步趋同。例如，粟特人改信佛教等中原流行宗教形式者日多，在敦煌尤其表现出大量的粟特人信仰佛教的情况，同时其祆教仪式也发生佛教化倾向，源出佛教而不见于中亚祆教的燃灯、赛祆等仪式盛行起来；丧葬习俗从火葬向土葬转化，祆教背景下野葬的形式则销声匿迹，像中原人那样夫妻合葬和志墓立碑等习俗日益普遍；其入仕途径由最初归附、入质、使节、技艺等形式向门荫、军功甚至科举等中原传统形式转化；由于长期杂居混血，粟特人后代文化心态发生转变，在种族上已自认为汉族，甚至在唐朝中期就发生了他们不以深目高鼻儿为己出的事情②；同时在大一统和封建思想的熏陶下

① 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② 唐代中期有“白马活胡儿”的故事记载，说一胡人后代“忽生一儿，深目高鼻，疑非其嗣”，这时家里一红马也奇怪地生下一只白驹，这人才突然想起来，这白驹是受家里原有白马的影响，而自己祖上本是胡人，入华刚刚三代，儿子不过有些返祖现象而已。

忠君义士纷纷出现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草原丝路和北亚游牧民族的密切关系，东进的粟特人又深刻受到突厥等游牧文化的各种影响。大量粟特人聚集在漠北地区，活跃于突厥或回鹘汗国，形成习于游牧和征战的部落，本来善于经商的特性逐渐为英勇善战等色彩掩盖，最后形成突厥化或回鹘化的“杂胡”。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粟特民族的“内亚化”②。由于突厥的极度强盛，这种“内亚化”现象其实蔓延了从中国北方到中亚一带广大地区，成为中古时代东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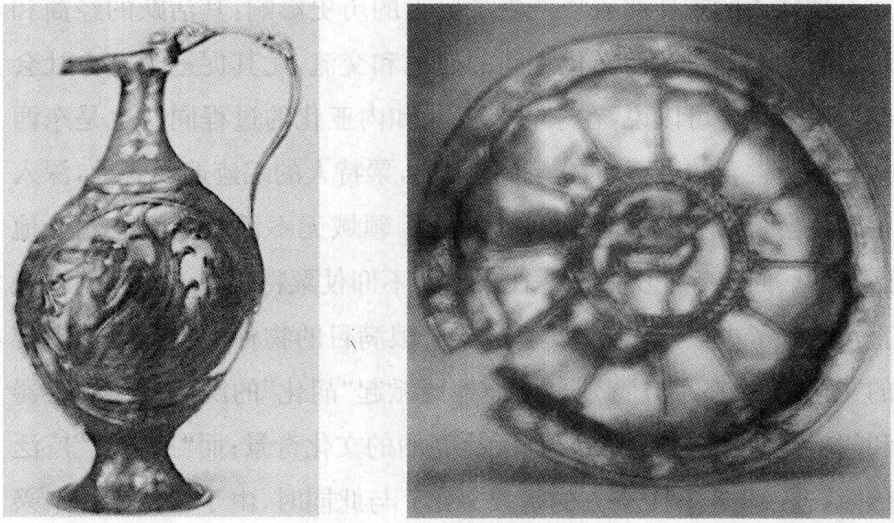
粟特人的东迁和入华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其活跃的经商和政治活动带动了东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尤其促进了东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在东方其汉化和内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东西文化广泛融合的过程。在唐帝国境内，粟特人的踪迹遍及各地，深入中国社会，无论在经济或政治、文化等领域无不活跃。而在北亚地区，突厥、回鹘等汗国的商业往来也无不仰仗粟特势力。他们的东迁直接带来了中亚乃至西方文化，从琳琅满目的物种商货到多彩多姿的文化艺术，在东方特别是中原地区掀起“胡化”的洪流。金桃银器和胡旋琵琶，成为唐代社会里无比亮丽的文化奇景；而“三夷教”广泛传播，进一步丰富了东方的宗教文化。与此同时，由于粟特人往来兴贩，大量东方文化也广泛传入到中亚乃至西域各地。美丽的丝绸、精致的漆器铜镜，乃至圆形方孔的钱币几乎蔓延西域每个角落；而《秦王破阵》乐舞竟然会在天竺诸国排演和流行，中国帝王乃至仕女形象

---

① 参考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刘惠琴、陈海涛：《唐代入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等文。

② 参考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也出现在中亚古城的壁画中。由于当时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苏俄学者巴托尔德指出："毫无疑问，(粟特)工业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①有学者非常形象地描绘了粟特人对东西文化交流的这种促进作用："通过丝绸之路，古代世界得以沟通和交流，而中亚粟特人是东西文明的主要'搬运夫'。"②在东方社会，胡风的盛行和粟特人的汉化同时进行。胡化色彩浓重的汉人生活，六州和柳城胡人骑马射猎的风情，乃至渗透着佛教内涵的敦煌祆教形式无不反映了东西文化融合的处处痕迹。



图版 12　片治肯特出土的沾染萨珊风格的粟特银壶和银碟

资料来源：B. A. 李文特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年版。

① 转引自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② 同上注。

粟特人对东方社会的影响尤其显著。英国学者吉布总结说："不可忘记，粟特人同东方的商业贸易联系，要比同西方的联系强得多，这就促使他们在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努力培植同突厥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而不是同阿拉伯人拉关系。"①这一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的注意，人们通过越发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可以明确粟特人东迁后在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所引起的诸种变化。首先，出于商业贸易的需要，粟特人希望能有强大政权提供政治上的保障。为此他们起初加强了与突厥的联系，后来支持了大唐帝国的建立，并主动将中亚地区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7到8世纪，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已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结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武力与商业相依，这可以从两方面讲。1. 武力保护商业。就这方面讲，唐初盛大的武力，以及完备的国防制度，便都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开拓疆土，以武力维持之，造成边境的安全秩序，使唐帝国的国际贸易，得到平顺的发展，这便是重要的经济意义。2. 商业支持武力。既有了伟大的武力，则武力的维持，常有赖于商业。换言之，国家养兵既多，军饷浩繁，则向商人征税以养兵。"再直白一点，唐帝国在丝绸之路东段的驻军和管理直接保护了粟特人的商业往来，而唐朝为维持驻军和管理所需要的巨额经费则主要借重了粟特人的商税。这样，粟特的商业活动无疑对大唐帝国的统一和统治起着重要作用。其次，粟特人东迁对东方社会的文化影响也毋庸置疑。中原地区的"胡化"潮流兴起于南北朝时期，繁盛于有唐一代，经久而不衰。特别在唐代中期，中原地区"胡化"现象更重，"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曾为陈寅恪等许多学者所重点强

---

①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转引王治来著《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卷。

调和分析过。再次，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粟特人无比活跃的商业活动对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作用。“它既冲击了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又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它把中原地区的封建关系引进突厥地区，从而冲击着漠北草原地带原始的宗法关系，促进了草原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对于粟特地区来说，贩运贸易的‘解决作用’却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发展”①。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粟特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非常广泛而又深刻的。

图版 13　具有西域风格的唐代海兽葡萄镜图案

资料来源：沈从文主编《唐宋铜镜》，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8 年版。

① 王尚达：《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

第三节　粟特人向中亚北部地区的移民

上述向东迁徙的粟特人仅仅是移民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粟特移民主要是分期分批地涌入了中亚北部地区，作为丝路北道通过的一段重要地带，热衷于商业活动的粟特人大量移入，更突出了这一地区在丝路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公元3世纪以后，中亚河中地区社会经济的普遍高涨引起土地兼并，土地德赫干们霸占了整套的河渠网和肥沃的地段，而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趋向赤贫。可灌溉地的面积越来越小，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失去生存资源——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只好向外寻求栖身之地，于是出现了粟特村民一批批地向北部七河地区的迁徙。这种移民活动从贵霜时期已经开始，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在公元3—5世纪，主要原因是商业利益和社会经济的变动；第二个更大的浪潮开始于7世纪，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阿拉伯人的入侵，寻找安全可靠的后方。粟特移民是采用和平流入的方式，尽管人数远不如当地原住民，但大都是些有手艺的工匠和农夫，还有精明强干的商人，他们使七河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以及与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加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粟特人从泽拉夫善河地区迁徙而来，首先在七河地区修起了一个个不同于游牧民帐篷宿营地的定居村落，这是一些散布在不大地面上的设防房屋群。房屋的墙用土坯和烧砖交替砌成，厚达一米，上有孔道以通风、透光或兼作射孔。在楚河和塔拉斯河两岸及其支流旁，高耸着谢米列契城市黄灰色的土坯城墙，和一些单独

的坚固砌体，面积不大，但很密集，考古学者们认为，这是“自由的粟特德赫干—谢米列契第一批殖民者的住房”①。他们将自己分别居住的方式带到这里，以后在这些个体设防房屋的基础上，出现了用坚固围墙环绕起来的沙赫林斯坦以及手工业、贸易区——拉巴德。于是马维兰纳赫式的城市沿塔拉斯河、楚河纷纷出现，其中有保留下粟特城名的伊斯宾札普、拉瓦肯特、布金肯特、法拉普和萨夫加尔等，也有保留了粟特移民宅院痕迹的古老的塔拉斯城、萨雷格城和巴拉沙贡城等②。从矩形的城市布局和建筑形式看，它们表现出粟特文化传统，粟特建筑师很可能参加了这些城市的建造。

粟特人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喜好和善于经商的特性使得他们在手工业生产上也是技艺高超，产品形式种类多样。如前苏联学者曾提到“康国的甲胄闻名于东西方，他们将制造的锁子甲作为贡品献给唐玄宗。由于中国的军械工匠吸取了它的样式，从而在中原军队中也出现了锁子甲”③。粟特人善于酿造葡萄酒，是他们使七河地区的酿酒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如在有粟特移民的红河古城遗址上，曾发现造酒作坊的遗迹和陶管部件④，还有分放在不同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2-74；82-83.（《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72—74页，82—83页）

② К. М. Байпаков：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21.（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第21页）

③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Т. Ⅰ. 1955 г. Vol1.（《乌兹别克共和国史》，塔什干1955年版，第1卷）

④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275.（《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75页）

处的十个陶罐，其中有一个保存了沉积的葡萄汁残迹[①]。在苏库鲁克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一个石制压榨机的底座，圆形，中央有一垂直穿孔，沿四周是泻水槽的斜沟，压榨机旁还找到大量底部有孔的器皿和十根烧制陶管[②]。公元7世纪初，玄奘经过此地时，葡萄种植酿酒业并不明显，可到了公元9世纪以后，葡萄种植业已成为这里农业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门。

最能反映粟特手工业对中亚北部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反映出东西方文化混合交流特点的是陶器制造业。粟特工匠们在陶器制造上独占鳌头，并且主要是遵照粟特陶器制造业的传统来进行生产，基本上保留了粟特地区流行的各种陶器形制和制作技术。在属于粟特移民时期的一些城市，如萨雷格、阿克别什姆、苏库鲁克等地墓葬发掘中，曾找到大量带有粟特铭文的红陶、粉红陶器皿。仅苏库鲁克地区就清理出二千五百件[③]，主要形制有双耳陶罐、碗、盆、锅、高脚酒杯、陶漏斗，还有小陶桌、三足烛台、椭圆形带顶盖的陶棺、陶纺锤和动物小雕像等。其制作技术可分为用手捏塑的粗制炊用陶器和用陶轮制作的各种器皿，有的还在淡底色上涂抹一层白色或绿色的薄釉。另外还找到大量的带把杯子、带把高水罐，把手的通常形制是水平、垂直或成圈形，安置在墩实的鼓腹和略向上扩展的颈部连接处，把手上多有圆形或椭圆形的贴饰物和铭文，通过它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特征，如突厥游牧民、波斯萨珊朝、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东土耳其斯坦佛教文化的影响，最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88.（《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88页）

② 上揭书，第93页。

③ 上揭书，第94页。

好地体现了东西文化在这一地区交融汇合后，产生了具有本地特点的新文化因素。例如在红河村出土的一件水螅式样的小器皿上，沿腹部有法文字母S形的雕刻图案，一件呈红色光泽的器皿把手上，有长椭圆形的贴饰，上面有显示佛教人物特点的妇女形象，另一个椭圆形贴饰框内的人物像表现出的大脸盘、宽胯上的细腰及姿态等都显出东突厥斯坦的艺术特征①。在苏库鲁克的发掘物中，有一个陶罐把手上的人物雕像，脸部带有古希腊式的特点，小嘴、大眼睛，鼻子线条不连额头线，眉毛为一平弧②。在把手贴饰的人物像中，不但有粟特人、突厥人，还有蒙古人的形象。《苏维埃吉尔吉斯报》的一名记者在此找到过一个陶器上的贴饰像，是一个男子，脸部明显是蒙古人种的扁圆脸盘，颧骨突出，眼框内角稍下垂，眉毛呈弧形③。在有些器皿底部，中央有交叉十字的圆圈压模印，类似6—7世纪拜占庭的印记④。而陶器装饰图案上表现最多的是萨珊波斯人的艺术特征。突出的是与公元6—8世纪织物上萨珊朝装饰图案相类似的野雉形象，如在苏库鲁克遗址的第三、四层中，即2.2米深处找到了一个带有野雉画像的深盘子，显然是当地产品，野雉画得栩栩如生，置于盘子中央，周边绕以阿拉伯铭文的装饰带，同层还出土有粟特移民祆教祭祀仪式上的器物和突骑施钱币⑤。野雉是波斯人的神鸟，被粟特工匠用模压或雕刻手法装饰到陶器的顶盖或把手上，并且用当地题材来加以补充，如在图案圈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6-77.（《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76—77页）

② 上揭书，第112页。

③ 上揭书，第110页。

④ 《吉尔吉斯考古学、人类学考察队论文集》第4集，莫斯科1960年版，第149页。

⑤ 同上注①，第97页。

内，添上动物和植物花结，甚至有中国的佛教圣花——荷花图纹①。另外常可见到一个新的题材——公山羊，这与祆教的法尼神有关。在苏库鲁克找到的一个祆教祭祀器皿的顶盖上，有线形雕刻技术刻出一只公山羊的生动形象，带有向上抬起的尾巴和向上卷起的大犄角，公山羊的嘴挨着野雉的喙，身子和头公式化地显现出来②。这种交叉题材的装饰图案说明技艺高超的陶匠师傅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吸取了邻近国家的艺术题材，使自己的作品日臻完美。从考古发掘的大量陶器分析中可以看出，粟特向七河地区移民的主要浪潮是在公元7—8世纪，这与大食人向河中地区的推进直接相关，看来一批批远徙的移民群在离开泽拉夫善河流域后，先抵达七河地区西南的恰奇（塔什干地区），这是撒马尔罕与谢米列契的间隔地带，仍在粟特范围内，从出自恰奇和七河地区大量陶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它们在形制和装饰图案上极其相近。如一件出自阿克别什姆城的带把杯子上，有一个模压多辐条轮子的装饰图案，出自恰奇的公元7—8世纪的器皿上也有相似的模印，并且作为印记的这种图案后来在谢米列契和天山地区的陶器上遇到很多③。阿克别什姆陶器的一系列形制与恰奇地区粟特文化的陶器形制相同，而恰奇的陶器又有别于撒马尔罕的粟特陶器，说明粟特文化向七河地区渗入是经过并借助了恰奇地区，或者这一地区的粟特人可能也加入了殖民楚河河谷的活动。

---

① 参考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275.（《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75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110.（《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110页）

③ 参考《吉尔吉斯考古学、人类学考察队论文集》第4集，莫斯科1960年版，第144—146页。

粟特移民进入中亚北部地区后，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诸方面，也表现出一种促进文化交叉和民族融合的作用与力量。苏联学者在描述6—8世纪谢米列契地区社会生活的情形时说到："在城市坚固围墙的内外，在密集的建筑物中，生命被泉水敲响。在这里响起突厥语、伊朗语、叙利亚语和中国话，人们穿着极其多种多样的衣服，棉布、丝绸、毛织和皮革制成的服装。粟特人以自己的高身材和轻便紧身裙而显得突出，在他们头上有时扎有丝绸的织物。突厥人穿的也是这样的衣服，但按其额发可以分辨出他们。"①11世纪《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赫木德·喀什噶里提供了有关七河地区粟特移民的材料，据他说，迁居巴拉沙贡的人民来自居住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粟特，他们采取了突厥人的服饰和风俗，会讲两种语言（粟特语和突厥语），由阿拉米亚文发展而来的粟特连体文在七河地区被突厥人，更确切地说是被突骑施人改造并发展。文字的传播一方面表现在大量器皿上有粟特铭文，如在红河遗址的一个小山丘上曾找到一个截面呈椭圆形器皿的垂直把手，上面刻有粟特连体字铭文"bandt"，苏联学者A. A. 伏列依曼释义为"满的"，笔迹是斜体，与穆格山粟特文书的古字体相同②。穆格山文书，1932年在中亚穆格山发现的粟特文献，约八十件，以羊皮书居多，其次为木简和纸书。据研究认为，粟特文书是喷赤干统治者粟特王德瓦什梯奇的档案，年代属8世纪。而此人有可能是开元十四（726年）朝贡的安国王笃娑钵提，也就是万岁通天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110.（《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110页）

② 参考《吉尔吉斯考古学、人类学考察队论文集》第4集，莫斯科1960年版，第152—155页。

元年(696年)朝贡的康国王笃娑钵提,后被阿拉伯人俘杀。已出版的主要研究著作有《穆格山文书》(影印原件),1964年出版;《穆格山所出粟特文书》第一、二册,1962年出版,第三册,1963年出版;弗列依曼等著《粟特文论集》,1934年出版。穆格山出土的纸文书十七件,其中有三件汉文文书对研究河西历史地理颇有价值①。另外,更主要的是反映在突骑施钱币上,在当地的流通货币——突骑施钱币上普遍印有粟特文尊号。

七河地区的粟特人是祆教思想和中亚伊斯兰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他们将祆教经典《阿维思塔》的思想与突厥人的萨满教观念结合在一起,从苏库鲁克文物上看到的萨满—祆教对火的崇拜仪式就是这样产生的。考古发掘找到的大量三足祭坛、祭祀用小桌、梨状小铃铛和浅盘式烛台等器物,反映出谢米列契地区祆教祭祀的情况②。而这些器物上的装饰图案同样表现了萨珊文化、粟特文化和突厥文化的混合。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的是公元

图版14　穆格山出土的羊皮纸粟特文婚约文书

资料来源:B. A. 李文特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① 参见万斯年译:《唐代粟特城寨之发掘及其出土文书》,载《唐代文献丛考》,1957年版。

② 参考《吉尔吉斯考古学、人类学考察队论文集》第4集,莫斯科1960年版,第152—155页。

5—7世纪祆教徒们用来收藏死者骨骼的陶质小棺材。小棺是用夹砂红泥经过很好的焙烧制成，外面涂有釉料，形制有矩形和椭圆形两种，上部有带着鸟头形小把手的球形顶盖。从时间顺序上看，椭圆形小棺材是粟特移民引进七河地区的矩形小棺材的变种，而且是因为模仿游牧民的帐篷，使定居民的住房更像游牧民的居室，才将其形制从长方形改成椭圆形的。与此同时，小棺材表面覆以的装饰图案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站在拱门下的人物画像和带给死者的礼物，是很典型常见的图案，现在小拱门形式上还保留，但人物画像完全消失。新鲜水果，一串串葡萄被简单的线条所代替，这些线条更像在干旱荒漠上裸露的小草茎秆。沿小棺材上端的辫形纽带贴饰像是捆紧帐篷的绳索，有时装饰图案在模仿游牧民毡上的贴花或模仿帐篷的木头框架。改造了的装饰图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思想，即小棺材的制作者——粟特工匠们试图再现出帐篷的形制，同时又给游牧民的帐篷带来了农业居民固有建筑式样的成份。这些小棺材是谢米列契地区游牧文化和定居文化相混合的一个有趣现象和明显例证①。

总之，公元5世纪以后，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向东、向北的迁徙，将中亚腹地绿洲文化和某些西亚、伊朗文化成份引入北部的游牧文化中来，扩大了城市文化的影响，使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中亚北部地区得到一次大融合。与移民相联系的是建筑传统、手工业技术、粟特文字、钱币及宗教思想的传播，粟特人在吸收当地古老文化传统和周边邻国文化长处之后，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并形成独特的

---

① 参考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29,31,35,80,110.（参见《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29、31、35、80、110页）

文化风格，为中亚北部地区的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5—7 世纪，粟特人的村落基本没有扩展，而 8—10 世纪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表现在单独设防的住宅渐渐消失，典型的封建化城市形成，沙赫林斯坦得到发展，拉巴德——即城郊商业、手工业居民区成长起来，这一切无疑更加有益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高涨。公元 8 世纪以后，西突厥汗国、突骑施、葛逻禄人先后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崛起和大量活动，唐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着力经营和有效管辖，都自然而然地与这里的粟特移民发生接触与交往。善于游说、热衷经商的粟特人介入了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政治经济交往活动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六章

6—9世纪中亚北部地区东西文化交流之盛况

公元 6—9 世纪，东西方各国都先后进入封建制度巩固和高度发展时期，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再次达到高潮。贵重而体积不大的货物，如丝绸、皮毛、铸币、香料等，大量被输送，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手工业技艺随着各民族的交往和迁徙相互转授，体系相异的各种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也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交流传播，于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东到西，从西到东，顺着丝绸之路这条不曾间断的传送带得到极为广泛的交流。在这条传送文明的大道上，中亚北部地区以极大的承受能力迎接和包容迥然不同的东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量涌入，为它们提供了在融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沃土，而自己也在吸取和兼采各种文化之所长中，创造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新文化因素，奉献给人类共同的文明宝库。这一时期，中亚北部地区本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西文化在这一地区的融合交流，主要表现在城市经济、农牧业、手工业生产、商品交换、货币贸易以及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

第一节　城市经济的特点

公元 6 世纪以后，中亚北部地区封建社会制度和城市文化逐渐形成，大量粟特移民的涌入和突厥游牧民向城市定居生活的过渡，以及游牧、农业、商业民族的相互影响，使此时此地的城市文化表现出多种因素和成份的混合，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为各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广厚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因此无论在城市的形成、数量、规模、布局、建筑风格还是职能上都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与经济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特点。

中亚北部地区的城市是从漫漫丝路上的商棚客栈、粟特移民的定居村落以及游牧民族大大小小的帐篷发展而来，尤其是应商业贸易的需要纷纷出现，反过来又以自己的存在为之服务，所以大多数城市的分布表现出他们和经过这一地区的丝绸之路系在一起。除前文已较详尽地列数了沿丝路分布的城市网点外，还可以从个别城市的名称上看出其源自商棚客栈的痕迹。如从塔拉斯河谷到楚河河谷的道路上，第一个大站是 Ахыр-Таш 城，意即“商棚城市”①。作为商业贸易网点，城市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集中和重新分配剩余产品并将它们投入交换。如前文提到的发生在弓月城的那桩丝绢案就是一个有力证明。正因为有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才使较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有了市场和中转站，得以顺利进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需要，公元 6 世纪以后，中亚北部地区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渐渐扩大，人口也在上涨。据考古勘查，谢米列契西南地区三十六座古城遗址中，有二十二座是中古作家提到过的城市，而在 6—9 世纪上半叶就记有二十九座古城遗址。南哈萨克斯坦地区这一时期记有三十座城市，其中有六座在文献中曾被提到②。它们大多分布在山间谷地和山前地带最适宜的地段上，相互大致间距 15—20 公里，构成一段段城市链条。8 世纪初，中亚大城市居民人数在一万到六万之间，中等城市是五千到一万，碎叶、塔拉斯的人口总数就不低于一万，甚至据俄文史料报道，一个不大的城市色里金，就因为冶炼业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30. (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与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版，第 30 页)

② 上揭书，第 66 页。

的发迹，居然容纳了一万异乡人①。此时城市的布局结构已渐完善，和中古其他城市一样，由三部分组成，即城堡、沙赫林斯坦（内城）和拉巴德（外城，即城郊）。一座座城堡的被发掘，证明它们在城市布局中属中心区，有高耸的堡垒建筑，兼有华丽的正面大厅，住着城市首领，有卫戍部队的住房和大贮藏室。中小土地贵族、一般市民居住在用坚固围墙环绕起来的沙赫林斯坦内，而拉巴德则是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区。城边的巴扎（集市）上可以看到东西方各地的奇珍异宝。游牧民们驱赶着牲畜、马群从草原来到这里，运来皮货、丝绸和其他战利品与市民们进行交换，甚至出售奴隶。城市居民则拿出来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如家什、武器、织物等，手工作坊就设在巴扎上。城市的这种布局，深受粟特文化的影响，如前章已述及，自公元 5 世纪起，沿着丝绸之路北上，分期分批从河中地区迁来的粟特移民定居在中亚北部，带来了马维兰赫式的城市文化。而有些粟特人聚居的移民区，从几户几十户的村落发展成数千上万人的城市，并且被命以粟特城名存在了很长时期。这些粟特侨居城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丝路贸易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有人以“粟特模式”、“粟特文化综合体”②来概括他们在这一地区城市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其实在整个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粟特移民”，还有转向定居和城市生活的突厥游牧民，以及当地的土著居民。而屈指可数的几座大城也总是被强悍的游牧民占据，选作汗帐大本营，如北庭、碎叶、塔拉斯等。其他一些中小城市为互不统属的封建主盘踞，他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1, стр286.（《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 1 卷，伏龙芝 1984 年版，第 286 页）

② 上揭书，第 33 页。

们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铸钱币，有很大的独立性。可以说，中亚北部地区城市文化的发展是粟特移民、突厥游牧民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城市不仅仅是商业贸易站，也是行政管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的中心。在城市经济中，农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城市市民与农业经济的联系，对于东方所有封建城市来说是很典型的。而且正因为农业的发展，才为手工业部门和商品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市场，成为经济贸易、商业贸易活动之前提。下面拟就城市经济中农业生产活动的情况再略作评述。

研究者们注意到城市的“农业化”是当时城市经济的一大特点，城市的大部分地面被果园、菜园、田地占据，它们分布在靠近沙赫林斯坦的宅院旁，许多村镇建筑面积和非建筑面积之比为1∶5，或者更大些，整个地块常常被一道或两道圆形长墙环绕，宽1.5—3米，高2米，长达15—20公里，为的是保护宅园、耕地免遭游牧民的践踏。这样的土堤墙在楚河、塔拉斯河以及南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城市中多可看到①。农民们住在城外郊区自己修筑的房屋内，在绿洲、河泛地上垦田耕地，他们利用山上的雪水和沟渠网进行灌溉，并且精心加以保护，沿整个河道修筑了一些驻防小堡垒，无论是在耕种期间，还是收获季节，昼夜把守，监察水的供应情况。另外还修筑了调整控制水的拦水坝，广泛采用了升水装置②。进入大田工作的农民常常穿铠披甲，携带武器，以免被游牧民捕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Ⅻ Ⅰ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 190-191.（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与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190—191页）；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 1, стр277.（《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77页）

②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 1, стр275.（《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1卷，伏龙芝1984年版，第275页）

捉，变卖为奴隶。中亚北部地区自然地形复杂，既有广袤的草原和层次分明的山地森林，为畜牧业提供了四季替换的良好牧场，又有开阔的河岸平原、山间谷地为农业提供了大量耕地。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的有“力田逐利者杂半”的粟特移民、汉人、土著居民，甚至也有部分游牧民。在定居村落上，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古迹叠压混合，同期存在，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特征。如苏联考古工作者1936 年在谢米列契地区打开的鲁郭夫遗址就是这样的村落，既有残留下来的、半定居式住房的土坯墟和用粘土厚厚涂抹的地面，屋内有马蹄形的炉灶，还找到了大量母牛、马、绵羊、驴、骆驼、骞驴（一种野驴）、鹿、高鼻羚羊的骨骼①，说明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有家畜饲养业，也有放牧和狩猎。类似的情况在楚河河谷和塔拉斯河流域是大量存在的。苏联考古发掘揭示出在这里分布着许多定居村落，它们的古迹和文化层性质极为复杂，因为定居村落往往建立在从前属塞种和乌孙游牧民的古墓地上。到了 6—8 世纪，定居农民和畜牧人又同期存在，使两种文化掺和到一起。如位于楚河右岸、劳动者集体农庄内的肯斯梅契古城，按照穆斯林地理学家马格吉西的意见，可以比定为雅卡雷格村，后者很可能是从突厥词“яка”即“岸”、“边”产生出来的名称，在它的四周分散着一些加强防御的村落和客栈，村民中包括有“在河泛地上种植水稻的汉人”②。马格吉西认为，雅卡雷格城是其所在地区的一个中心，“正像中国人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1950г, стр71.（《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71 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1950г, стр27.（《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27 页）

称这样的中心，是从楚河河谷到伊犁河道路上的主要直达运输点”①。这种定居村镇与古商道路线相重合的特点，必然使当地的社会生产不会处在封闭状态，而是有可能更多地从周边国家与地区获得有益于生产发展的条件，如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传入，植物品种的交换等。据说乌孙游牧民喜好的一种羊肉抓饭就是用中国大米和土种公羊肉做成的，这种饭食的推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前1世纪。游牧民们从喜好农业食品到引进良种，借助自由流入或被俘的汉人开始了早期的农业生产，直到公元6世纪后，粟特移民使这种生产更加成熟，并作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得到进一步发展。7世纪初，玄奘法师路经此地，就曾记下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些情况。如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法师谈到碎叶城“土宜糜、麦、蒲萄”，怛逻斯城“土宜气序，大同素叶”，从此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想必这批汉人移民仍然保持着务农城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于中宅居”，代代相传。所以元代耶律楚材行经此地，见到的也是数百里平川上，有大城、良田和水利灌溉设施②。从怛逻斯城再向西南，所经白水城③，“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逾胜怛逻斯”。恭御城④“原隰膏腴，树林翁郁”；笯赤建国⑤“地沃壤，备稼穑，草木郁茂，苹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以上三城分布在从塔拉斯城到塔什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1950г, стр66.（《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66页）

② （清）李光庭：《汉西域图考》卷1。

③ 白水城在塔什干城东北，锡尔河中游右岸，是一座大的商业中心城市，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第80页。

④ 城今具体方位不清。

⑤ 此城为今塔什干地区的汗拉巴德。见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 1973 г, стр198.（别尼茨基：《中亚中古城市》，列宁格勒1973年版，第198页）

干城的道路上，这里从 7 世纪以后，是突厥人和穆斯林之间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并且伴随着军事防御的需要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条新的贸易商道经过这里，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加以注意。另外，苏联考古工作者多年来在这一地区找到过大量的圆盘石磨、石头碾子，烧焦的麦粒、叠铺在一起的麦秆，储存谷物的大小陶罐，大、小麦粒、果核、杏干、各种瓜籽，以及铁制工具犁、铧、锄、镰刀、园艺剪子①等实物，也能反映出当地农业生产的部分情况，说明商品粮和果蔬的生产已在农业部门占到相当的比重。而这种农业生产多面经营和融于城市经济的状况，自然有利于不同地区和经济类别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第二节　蓬勃发展的多种手工业

公元 6—9 世纪，在中亚北部地区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中，手工业生产占有突出显要的位置，表现在手工产品种类增多，各生产部门分工渐细，除传统产品继续发展外，又不断更新品种，尤其是在产品制作技艺和装饰内容等方面，表现出东西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汇合。究其原因是，一方面手工业者队伍扩大，如有陶匠、木匠、铁匠、矿工、铸工、织工、建筑工人、镀锡工人等，而且成份复杂，不仅有当地工匠，还有汉人工匠、粟特工匠、叙利亚人或其他民族的匠人。他们或是作战被俘后重操旧业，或是随使团、商队出走的自由移民。这些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86,88,93.（《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86、88、93 页）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者，自然将各自持有的手工技术施展到生产中去，创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手工产品。另一方面，此时中亚北部与周边各国家地区之间频繁的政治、经济交往，甚至军事冲突，也使唐代中原地区、波斯萨珊王朝、粟特河中地区、外高加索和拜占庭帝国等多方面的文化影响渗透和深入进来，大量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各国手工业产品，包括战利品，成为工匠们仿制的样品。如考古发掘的大量突骑施钱币，就是东罗马钱币索里德①和唐朝钱币的粗仿制品。在出土陶器上有明显模仿拜占庭的印记；锻造业也显出受了阿尔泰—叶尼塞地区工匠的影响②。当地工匠在仿制外来产品的同时，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某些被重新理解后的异国母题进入当地喜用的艺术题材中，如陶器和金属器皿上的萨珊式装饰图案圈内常夹入表现佛教主题的荷花，一些壁画和雕塑也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东突厥斯坦的影响。总之，通过手工业生产，我们看到的是东西方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叉以及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混合。而这种文化的复合发展又具体表现在制陶业、金属加工业、织纤业、皮革、木材、石器、玉器加工和建筑业等诸多方面。

制陶业

中亚北部地区的陶器制作呈现出东西两地区截然不同的特色。其东部，即新疆北部地区明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乌孙时期开始，陶器在形制、工艺、装饰等诸方面就与中国彩陶业的发展一脉相承，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它是以中原为中心，经甘肃东部，

---

① 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公元 309 年发行的金币，重 4.55 克。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81-82.（《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81—82 页）

河西走廊西端，新疆东部、中部直达西部，渐次递进西传的。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疆东部到伊犁河流域墓葬出土的一些彩陶的器型纹饰来看，上述传播路线是完全可信的。如在天山以北古迹中出土的黑陶壶与内地壶形制一致；昭苏萨勒外堡二号乌孙墓中出土的一套素面陶罐、陶壶、陶盆，制作简朴粗犷，其风格与内地陶器极其类似，说明中亚北部地区东部的制陶业一直处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是中国制陶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①。而西部，即锡尔河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制陶业呈现出北部游牧文化与南部农业文化交叉混合的特点。从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实物看，除粟特陶器外，以突厥陶器为多。陶器型制为适应其用途而显得独特，一种储放食品的陶器，有着大容积的球形腹部和圆底，圆柱形的小口短颈，口沿外翻，并用一块织物盖住瓶口，然后在口沿下紧紧扎住。另外还有炊具、茶具、饭碗等，大多为圆底、球腹、小口颈，器皿凸出总部位（如把手、壶嘴）较小，一般不超过最大腹径，为的是尽可能减少损坏。器皿惯用球形是从实用考虑出发，因为只有球形最耐压，适宜游牧时携带。陶器制作方法极为简单，或捏塑或模制，使用夹砂黄粘土，未经高温充分焙烧，陶片多呈黑色、灰色。根据游牧民已会制造铁器来判断，不是无法达到高温，而是因为烧陶简单。如在奥特拉尔城北面拉巴德地面上发现一个 8—9 世纪的制陶炉，呈梨形，长 2.7 米，宽 2.5 米，炉灶是一个翻倒过来的

①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三十年》，第 9 页；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2 期。

无底大陶罐，周围用土坯砌上①。燃料是木头、粪块、叉明科植物等②。此外陶器中还有小底，带凹形底托，腹部向上伸展呈圆锥体或圆柱形的；平底，无底托，口沿略厚，稍向外卷的。与这些形制相类似的器皿曾出自叶尼塞和阿尔泰突厥人墓葬中，而它们的造型和各部位比例又有些类似贵霜文化中高脚杯式的器皿。于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南西伯利亚陶器和给突厥陶器以新变体的贵霜形式的交叉，它们是一批极其富有文化混合表现力的制品。还有一种侧壁垂直的釜型陶器，有把手，其外形也可与出自贵霜陶器群的杯状器皿相对照。另外发现的大批手制陶碗，其内层表面是一些用手旋转的圆圈痕迹，外层表面有用刀雕刻的痕迹覆以红色或棕色颜料，按其形制和制作技术来看，极像出自费尔干纳的陶器。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七河地区的陶器生产颇受贵霜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人称之为贵霜式陶器，而这种影响是从公元 6 世纪中叶至 8 世纪通过突厥人表现出来的。除突厥游牧民的制陶业外，此时七河地区在从事陶器制作方面，更为主要的影响和大量的工匠来自粟特移民，具体情况因前文已有过介绍，兹不赘述。

金属加工业

中亚北部地区丰富的矿藏，生产生活的需要，历史上长期形成和积累的生产经验与传统，使金属加工业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里我们侧重介绍一下铁制业、铜制业和金银加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90.（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与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版，第 90 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63.（《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63 页）

工业。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仅塔拉斯河谷山地部分与采矿业、冶炼业有关联的城市就有四座，即色里金、库里捷卡、普肯特和苏斯，其中又以色里金的冶铁业为要。铁矿从周围山里取得，放入粘土涂抹的坑内，燃料多用天山云杉，温度可高达 1000℃，在用生吹方法得到土制熟铁后，再用热锻造法补充打制成各种武器或衣服、马具上的饰物。在别吉克里克出土的一幅水彩画上，画有铁匠工作的情景，并且在画的下角有题记："这是铁匠。"对于突厥较晚时期来说，专用名词"Тимичи"即"铁匠"，无论是在景教碑文中，还是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都不止一次地碰到①。铁器制品中有各种形制的剑，如截面为扁平，带有光滑手柄的楔形双刃剑，截面几乎是椭圆形的双刃剑，带有十字交叉形或月亮形手柄的剑，以及小巧玲珑的三菱铁箭镞等，这些武器除自己使用外还运往呼罗珊和伊朗，在那里价值很高，深受欢迎②。除武器外，铁还被用来制作衣服上的扣环和马具什物等。突厥人是扣环的发明者，这种扣环带有可移动的小舌，至今仍被我们广泛地应用在衣物和马的挽具上。扣环通常用青铜或铁制成，非常精致，上面有金银制成的薄片贴饰，并以动物图案来装饰。图案上各种野兽呈现的静止动作，已改变了早期动物风格式样中所看到的那种富有现实主义的表现力，但仍不失与阿尔泰、米努辛斯克地区装璜艺术的特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具什物中还有马勒（嚼环）、马蹬。6—8 世纪首先出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3.（《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73 页）

②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 1, стр283.（《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 1 卷，伏龙芝 1984 年版，第 283 页）

现的是马蹬，马蹬上面是很有特色的框架，带有穿皮条的孔①。尽管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但看来为了制造武器而未滥用铁，许多器物和装饰珍品仍用青铜制造。

铜在七河地区，尤其在哈萨克斯坦的东北部和南部，与铅、锡一样广为人知。青铜加工时适宜浇铸，常被用来制作扣环和装饰品，尤其是中国式铜镜的仿制品。在中亚北部地区墓葬发掘中找到为数不少的青铜器镜，其中有中国制品，如著名的海兽葡萄镜。镜子背面有图案花纹，常常是中间绘以海兽，杂以葡萄花纹，外层绕以鹊花蜂蝶等，有的是葡萄居其中，石榴、海马、凤凰绕其边；还有的是中层为海马，外层为海燕，夹以绕转的葡萄枝，真是千姿百态，十分精美②。海马葡萄花纹图案本出自西域，用以装饰铜镜，唐代始盛，可谓西域文明东传的一个例证③。汉唐铜镜传入西域后，在当地出现了许多仿制品，它们主要在外形上模仿中国铜镜，而在背面的装饰图案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如有的镜子上，出现了对鸟图案，在萨雷格城找到的一面中国式铜镜，上面有四个成十字交叉、对称排列的菩萨像，菩萨安坐在凤凰上。凤凰是某些古代民族神话中，自焚滞后又能从灰烬中再生的鸟，用作复活的象征。在菩萨像间填满了云状物和野雁的画像。在南吉尔吉斯的喀喇布拉克也出土了一面中国式铜镜，另有一面铜镜的镜柄有女人像，具有印度风格，至少从姿态看来是这样④。但也有些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8.（《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78 页）

② 冯云鹏：《金石索》卷 6。

③ 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④ ［俄］费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81 年版，第 25 页。

当地制作的铜镜上完全没有图案花纹，较晚时期的中国式铜镜出现了长手柄，沿镜子外圈的缘饰上带有表示穆斯林祝福词的阿拉伯铭文①。

金银加工也多采用铸造法。例如用铸出的金丝做成透花编织物，加工成非常精细的手镯、螺旋形耳环，上面嵌有小金粒。珠宝首饰匠们多采用叶状金片覆盖在青铜制品上加以装饰，金片上的花纹图案是用冲模法制出②。在阿列克塞洛夫斯基城找到一枚长15.5厘米的中国发簪，一端被砸扁呈小铲状。而在这座城内还找到其他的中国物品，如上面提到的无图案铜镜、中国钱币等③。在中亚北部地区，锻造手工业是独立出来的生产部门，不同其他行业带有家庭手工业的性质。从大量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当地铁矿蕴藏丰富，人们早已熟知冶炼和铸造各种生产、生活中使用的铁器和武器。在金属加工制作方面，中西文化的交流表现出产品种类、形制装饰内容、工艺技术的相互影响和学习，这是一种互为双向的交流与学习。

织纤业

织纤业在游牧民的家庭手工业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与华丽精美的丝绸比起来，毛织物、亚麻布显得更敦厚结实，广为劳动人民所喜爱，并且作为交换物，也早有东传。《北堂书钞》卷143引班固《与弟超书》曰："月支毾㲪，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太平御览》

---

① 关于铜镜的材料主要见于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42, 78,126,143.（《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42、78、126、143页）

② 上揭书，第64页。

③ 上揭书，第126页。

卷820引吴笃《赵书》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献珊瑚、琉璃、(毼氎)、白叠。"毼氎是一种毛织品，其用途服虔在《通俗文》中介绍说："毼氎者，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①罽，也是毛织品的一种。按《说文》解释"西胡毳布也"②。汉高祖九年下令："贾人勿得衣锦、绣罽……"将罽与锦、绣并举，足见它在当时织物中的价值。能与文献史料相映证的是考古资料。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吐鲁番找到一件高昌早期的罽(编号75ТКМ 90：11·1)采用汉锦的传统织法，为经线显花，有红、黄、白、褐四色，分成白褐色、红黄色、白褐红色，纬线为褐色，每平方厘米明、夹纬各六枚，经线为十七枚③。在七河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也找到大量反映当地纺织业的古物，如织机的构件——机轴，是截面呈圆形的棒状物，一端稍尖，另一端通常套有扁圆形，有时是圆锥形的纺锤，纺锤有陶制、石制或骨制，曾找到一个公绵羊骨做成的纺锤，上面有一道贯通的槽，为的是磨光毛线。纺锤的直径和轴长之间的比例为1：11，即3.5厘米比40厘米，这样轴飞快旋转，并将梳好的柔软的毛有力地拧成线④。在塔拉斯地区的阔克·马尔达遗址上一共找到三百四十个纺锤，说明在这里很可能有一个纺织作坊，具有不小

① 《太平御览》卷708。

②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④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64,71.(《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64、71页)

的生产规模①。织物中还有用织布机生产的亚麻布，宽度不超过 50 厘米②。另外在考古发掘中还常常遇到一些显然是外来的织物，其中尤以中国内地生产的丝绸为要。如 1978 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曾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的古代车师墓中，发掘出不少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织品，绢、菱纹罗和刺绣等③。有一件刺绣品，白色，绢底上以绿、褐红等色绣出的花草凤纹图案，不论是技法，还是图案风格，都可看出是中原地区汉代流行的产品④。这些同地生产的丝绸大多是皇家赐品、贸易商品或战利品。由于丝绸需求量很大，所以也不排除当地居民制造丝绸的可能。早自汉代，下嫁公主的和亲队伍中就有织工随行。8 世纪中叶，因怛逻斯战败漫游中亚、西亚的杜环也曾明确记载了流散这一带的汉人工匠中有纺织工人。可以想见，这些来自中原的织纤工，也会因陋就简，用自己的手艺为新主人和当地群众服务，或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所以在出自七河地区肯阔尼斯克墓地的丝绸实物中，有一种粗糙的丝绸，显然不同于来自中国的优质丝绸，很可能就是当地产品⑤。

除了中国丝织品和织纤技术不断西传外，西方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也有经中亚地区东传至中国境内的，其对唐代的丝织业发生很大影响，使之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织法上，由汉锦

---

①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89.（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与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版，第 89 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64.（《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64 页）

③ 《新疆日报》1978 年 3 月 17 日。

④ 《新疆史学》创刊号，1979 年，第 108 页。

⑤ 同上注②。

的经线起花改为西方传统织法，也是一种较容易的织法：纬线显花，并采用了向印度学习的蜡染和绞缬。在花纹图案上，盛行西方式的植物纹母题和波斯萨珊朝式的以联珠缀成圆圈，内填各种对禽纹、对兽纹，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①。这些联珠套环，内饰对鸭、对鹿、对鸟的纹饰，都是在纬线上起花，是中国工匠用西方的传统技法织成，这种中西合璧的织物充分反映出中西文化的相互学习和影响。

图版 15　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的汉代鸟兽纹锦

资料来源：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其他

中亚北部地区游牧民的家庭手工业尽管在技术方法上较东西方文明古国的生产水平要低得多，但仍不失分工较细，品种繁多，

① 参考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载《考古学报》1963 年第 1 期，收入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证实了游牧民具有对各类生产的认识，以及吸收外来文化和承担文化传播中介的能力。

游牧民擅长皮革加工，沃林《关于塔拉斯河谷 9—16 世纪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报道》认为“皮革来自突厥并被硝熟”，然后缝成衣裤、无后跟靴、箭袋、盾牌、挽具上的皮带等。这些皮革制品作为交换物也曾源源不断地流入定居农民的手中，对补充和改善农业民族的生活条件起了积极的作用。如阿拉伯学者阿尔·穆卡达西报道，从塔什干地区输出“高级的鲨革马鞍”①，深受欢迎。宋朝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中提到：“带衣所重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帨帨、算囊、刀砺之类。”从用途来看，所谓蹀躞就是腰带，多为皮制。皮革加工时使用刮刀，从两面仔细地刮去毛和肌肉组织，有时还染以各种颜色，考古找到的皮革块中就有涂以红、紫红和靛蓝色的。

中亚北部地区丰富的木材资源为木制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木材加工制成各种器物，如酒杯、盘子、小桌、榻、童摇篮、箭杆、马鞍部件等②。除本地制品外，中国的木器、漆器也曾不止一次地在楚河、塔拉斯河一带的墓葬中找到③。

游牧民们喜用软玉制品，它们有时被用来作为挽具上的扣环、贴边。这种圆圈形和半圆圈形的扣环，以及一些玉碗、玉器等在天山和外伊犁阿拉套山的突厥人古墓中都有发现。苏联学者认为，

---

①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ol 1, стр284.（《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 1 卷，伏龙芝 1984 年版，第 284 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65.（《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65 页）

③ 上揭书，第 66 页。

给游牧民提供软玉手工制品的工匠师傅无疑是回鹘人或中国人①。

中亚北部地区普遍存在着石制业，除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石磨、石碾被大量发现外，更多的是与游牧民葬制有关的石俑，分布在新疆北部广大的草原地带，东起阿尔泰，西至霍城，在昭苏县、塔城专区、巴里坤草原等处都找到6—9世纪的突厥石像墓，而且在伊塞克湖南岸、七河地区、蒙古草原也发现有类似的，公元7—10世纪的石雕像，亦属于突厥人制品。如在伊犁地区共发现石雕像四处，其中在昭苏的两处是石雕人像，在霍城有两处，一是人像，一是动物像，这些雕像大多是在原石上用极简单的线条刻划而成②。在楚河地区达尔达巴兰狭谷发现带有石俑的突厥古墓，有两个石俑，双手拿着盅，叠放在腹前。在阿列克塞洛夫斯基城也找到一个头被打碎的石俑，其左手握着一个大高脚杯，右手拿着一个捣槌。有趣的是在鲁兹肯特城找到了一个平底大高脚杯的实物，其外形很像石俑手上的高脚杯，时间可定在公元6—8世纪。而这种手执盅的行武军人雕像，其姿势看来是从中国雕塑中借用来的③。关于石人的用途，或认为是“疑兵”、“翁仲”④；或认为是“杀人石”，还有认为是突厥人在墓前的自立像⑤。根据绝大部分石人和石棺并存的情况判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8.（《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第78页）

②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③ 关于石俑的材料见于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19，79，101，126.（《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楚河河谷》，第19、79、101、126页）

④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5：“扣肯巴克水东近淖尔岸，有城堡遗址，石翁仲一，堰仆草中，着巾佩剑，左手当胸，若捧物状……余语此翁仲古疑兵之遗……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欤。”

⑤ 李征：《阿勒泰地区石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第7—8期。

断，石俑应与突厥人葬俗有关，并涉及到突厥人的宗教意识和祭祀仪式。汉文献有曰："阙特勤死，诏……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①

从建筑上看，中亚北部地区此时也受到唐代文化的影响，如仿制的建筑材料。在阿克别什姆一座佛教寺院的考古发掘中找到的莲花纹瓦当，就是仿唐制品。瓦呈圆形或半圆形，模制，泥质灰陶，中作莲花纹，外有凸弦纹一周，与唐大明宫含光殿出土的莲纹瓦当相同②。另外，在龟兹城遗址中找到的四块烧砖，其中子母砖两块，掌印纹砖和压纹方砖（残）各一块，其形制、花纹互为一致，若与唐大明宫出土的铺地方砖作比较，就可明显看出是受唐代的影响③。在阿克别什姆还找到一块红色窄瓦的小碎片，保留下来的仅仅是瓦的最上部图案：心形的齿状缘饰，内含填有三个十字的圆圈，在缘饰上方画的是火焰舌形或翎毛形的曲折线。由于碎片过小，难以窥见图案全貌，但其风格类似中国画。图案是用尖木棍画上去的，十分清晰。另外的一些瓦，上有用手指轻轻画上去的铭文，或源出回鹘，或是梵文铭文④。

至此，我们对中亚北部地区各主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介绍，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来证实，当地封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能够跻身于东西文化的交流之中，并作为交流传播的中介，融合了各种文化之所长，从而为这种交流更为广泛地展开

---

① 《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上》。

② Л. Р. 肯兹拉索夫等：《阿克别什姆城出土的古钱币》，载《东方学研究所科学简报告》第 16 辑，莫斯科 1958 年，第 524 页。

③ 《唐长安大明宫》图版 52—55；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第 58—59 页。

④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52.（《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第 52 页）

和更为深入地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节 以丝绸为主的商业贸易和几种货币

公元6—9世纪，东西方几大文明古国都先后进入封建经济高度发展，贸易往来极其繁荣时期。黄河流域，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从而使唐朝中期以前的生产关系发生一些改变，劳动群众争得一个榨取稍有节制的环境，社会经济在较安定的形势下获得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外加长江流域自东晋以降，经济持续上升，开发成新的经济富饶区，从而使社会财富剧增，使唐朝政府拥有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无疑会促进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繁荣又更加刺激并加强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国内外市场。唐代最为典型的商业区是都城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据文献记载，各市四面均为六百步，合八百八十九米，考古探测结果表明，西市每面边长约一千零五十米，市内街道成井字形，街宽在二十米以上，街面有车辙痕迹。西市上有绢行、大衣行、秤行、果子铺、鞯辔行、药行、金银行等繁多的行业。东市附近达官贵人的邸宅较多，不及商贾云集的西市热闹，但也有二百二十多行。据《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条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郑棨《开天传信记略》曰："开元初，上励精图治，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胡地万余里，入河

湟之赋税，左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开远门为长安西门，西方商贾来长安，即由此门入城，并且他们多住在城西南的长安县，在西市活动。这些西域胡商蕃客拥有雄厚的资本，开设各种店铺，其中尤以珠宝店和酒店为多。如西市有波斯邸，有颇受唐人赞赏，善识珠宝的老波斯；有以美酒歌舞酬客的酒肆胡姬，他们源源不断地来自西域，反映出唐代中原与西方的商业贸易关系最为密切。

此时称霸西方的阿拉伯人创建的大食帝国，自公元 7 世纪 30 年代起再次向外扩张，8 世纪初征服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从 8 世纪中叶到 9 世纪中叶阿拔斯朝最初一百年间，是大食帝国经济繁荣昌盛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对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贸易中深受欢迎的产品很多，如大马士革的缎子，库法的绢，布哈拉的毯子，叙利亚沿海城市的玻璃等。首都巴格达舟车辐凑，成为政治、经济、工商贸易中心，远自中国的丝绸和磁器，南亚、东南亚的香料，罗斯与北欧的毛皮，东非的金砂、象牙，突厥的宝石等处处可见，巴格达甚至有专卖中国货物的市场。阿拉伯人先后征服的叙利亚、伊朗等地，都是古老的文化发达地区，受其文化影响，加上吸取一些希腊和印度文化成分，使融合形成的阿拉伯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文化性质。随着阿拉伯人的迁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文化推向亚洲和非洲，发生很大影响。反之，东方文化也借助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典型的有中国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度的数字十进位法等，所以阿拉伯人对东西文化的交流传播是颇有贡献的。南亚的印度经过 5—7 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生产力提高了，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农产品有了剩余并转化为商品，德干东南部发现的 6—8世纪铭文中，提到村镇市场出售各种农作物和椰子、甘蔗、油料等经济作物，手工业有较细的分工，精美的手工产品，如棉织品、

金银宝饰、漆器象牙制品等，使市场繁荣，也使印度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有了较大增长。历史悠久的萨珊王朝存在了四个世纪，公元5世纪以前，正是其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大规模灌溉工程的修筑，棉花、水稻、甘蔗等新作物的栽培，锻冶技术的提高，呢绒、毛毯制作的精美，加上波斯地处中国、印度、地中海国家交通商路的要道上，使古老波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更易于外传，仅波斯本土产生的祆教、摩尼教的传播就使中亚国家及东西方各国深受萨珊文化的影响，这从隋唐时期若干艺术品的图案与形制上，从欧洲中古时期一些教堂的壁画装饰中均可以看出痕迹。6世纪中期，萨珊王朝被新兴强大的突厥汗国所灭，但萨珊王朝时期所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泯灭，仍然在东西方文化的荟萃交融中继续发生影响和作用。

处在上述经济繁盛大国包围圈之中的中亚北部地区，除了以自身城市经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相呼应外，还积极投身到更大的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去。其具体表现是，城市商业网点增多，贸易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当时存在着三个主要方向的交换关系，即国家与国家之间沿丝绸之路的商队贸易，城市内部的贸易，以及城市与游牧草原之间的贸易。商道更加趋于稳定，沿着古商道，许多新的城郊居民区修建起来，而且东部的城市明显较西部要多，分布也密，这是因为在东西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仍然是丝绸，所以越向东靠近丝绸生产的地方，贸易点和转运站就越多。丝绸不易保存，但仍不乏在众多的古墓发掘中找到了大量的丝织物残片，吐鲁番出土文书上也有不少关于丝绸的记载。一般多见于随葬衣物疏中。当时各贸易国对丝绸需求量的增多，以及唐代丝织手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为丝绸贸易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与条件。从文献史料中可以看出，各大城市里均有手工作坊，官府作坊里有“短蕃匠”和“长上匠”，仅少府监就有轮蕃匠一万九千八百余人，将作监有一万五千多人。这些工匠“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①，是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匠人。他们以高超的技艺，制作出精美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社会最高水平。以最为发达的织纤业来看，官府手工业不仅规模宏大，分工也细。据记载，织维之作有十，组绶之作有五，绀线之作有四，练染之作有六②。丝织品种繁多，有绢、锦、缯、绫等。吐鲁番出土一件唐代晕繝提花锦裙，锦用黄、白、绿、粉红、茶、褐六色经线组成，再在斜纹晕色彩条底上，用金黄色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锦上添花，十分好看。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代薄绢上，镶有精美的佛画，而其余绢幡，也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幡两面绘画，挂在穹门或过道上，随风摇曳，不阻碍光线，非常精美。白居易就曾有诗赞叹缭绫巧夺天工之奇技，曰：“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异彩奇纹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③缭绫是用青白两色丝织成的花绫，丝细质轻，费功极大。另外还有用三交五织特殊法织成的八棱绫，无花轻薄的轻容纱，一匹足够四丈、重量只有半两的轻绢等。唐朝织纤业的发达还表现在民间手工业上。如定州（剑南道北部，今四川高县附近）大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

① 《唐六典》卷 7。
② 《唐六典》卷 22。
③ 《全唐诗》卷 427。

还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为来往商人提供方便。家庭手工业规模如此之大，显然与贸易有关。而官府手工业虽然主要生产满足统治阶级生活所需要的高级奢侈品，并非商品生产，但这些消费品也常转为商品，如贡赐贸易、互市贸易时，内地丝织品大量外销，其中就不乏官府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这些官府和民间生产的丝绸大量投入对外贸易，使从事此项贸易的各国商人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因而无论是粟特人、波斯人，甚至叙利亚、犹太人，以后又有九姓回鹘人，都在竭力控制丝路，以图垄断丝绸贸易。结果是，他们都从丝路贸易中得到好处，又都没有成为丝绸贸易的唯一经营者。他们或是利益均沾，或是一个取代一个，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陆上丝绸贸易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海上交通兴起而渐渐衰落时，回鹘人经营的绢马贸易将其又一次推向高潮，并且使中亚北部地区成为这次高潮中的主要地区。回鹘人不但将大批丝绢从蒙古草原运往中亚、西亚，而且也将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琉璃、香药等来自西亚、中亚的产品运往中原。除传统的丝绸贸易外，中亚北部地区与东西方还进行其他稀有珍品和奢侈品的过境贸易，如宝石、珍珠、金银制品、毛皮、地毯、香料、药材、良种马、精美的瓷器等。除回鹘、粟特商人在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外，突厥游牧民也积极参与贸易活动。他们用牲畜和畜产品进行交换，出售自己生产的铁和铁制武器，还把侵袭邻国时劫掠的大量宝物当成贸易商品，尤其是奴隶贸易也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在穆斯林世界中，奴隶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商品”，游牧民们不断地把内外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变为奴隶出售，换取自己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与草原游牧民的商品交换是在定期的贸易集市上进行。碎叶每年的集市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大量商人，是中亚最大的集市之一。塔拉斯城在穆斯林史料

中被称为“进入葛逻禄人国家的大门”①，指的就是稍晚时期的葛逻禄人与穆斯林商人进行商业贸易时，据此城为一大关市。在伊斯宾札普和拉夫契卡特城的贸易集市，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贸易额（的纳尔流通量）竟达十万。游牧民从山地草原赶来大批的牲畜，在集市结束时，没有卖出去的淘汰牲口就被屠宰掉，将肉出售给居民②。巴托尔德也曾指出过：“和游牧民族的商业贸易从来就有着重大的意义。从他们那里取得大量的供屠宰的牲口和驮载的牲口，皮革、毛货和奴隶。反之，与定居民族的商业贸易对于因此而取得衣服、粮食等物品的游牧民族也是必需的……游牧民们不等商队来到草原，就把自己的畜群赶到邻近居民点的边界上进行贸易。”③城市内部的贸易是在活跃的巴札上随时进行的，在一些城址发掘时，曾找到过秤盘、金属或石制的秤砣，说明存在着零星贸易④。

中亚北部地区对外商业贸易采取的主要形式是以物易物，这种贸易形式是从贡赐品，即互赠礼品中自然得出的结果，所以考古发现的“外币”十分缺乏。在游牧民当中流通的仅仅是当地冲制的突骑施首领发行的钱币。当然，发掘得到的古物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外币，如萨珊朝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以及七河地区找到一些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75.（《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第 75 页）

②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283.（K. M.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与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版，第 283 页）

③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Ⅰ. 1963г, стр297.（《巴托尔德文集》第 1 卷，莫斯科 1963 年版，第 297 页）

④ 同上注②，第 284 页。

唐币等，但它们大多不是作为贸易手段，而是从赠赐物品的渠道流入中亚的，这与在匈奴古墓中经常找到汉代钱币的情况不同。不过，从为数不多的古钱币材料上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些当时东西交往的特点与情况。

在游牧民当中流通的主要是由突骑施首领发行，在当地冲制的青铜钱币。如1953—1954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阿克别什姆城及其周围地区工作时，曾找到过一些古钱，基本上可分为三类：1. 喀喇汗朝钱币（一些单件和装有七十六枚钱币的一个皮钱袋）；2. 四枚中国钱币；3. 五十七枚突骑施钱币①。从五十七枚突骑施钱币来看，又可分作四种形制，均是按照中国式钱币铸造的圆形方孔钱，其中第一种形制的钱币共有十八枚，上有粟特铭文，意为“神圣的突骑施汗的钱”。研究这组钱币的苏联学者O. И. 斯米尔诺娃认为，铭文的句法符合粟特语言规范，但内容则是模仿唐币上的刻文“开元通宝”，并举出古钱学中的类似现象，即在米努辛斯克地区找到的一枚8世纪钱币，其正面刻有汉字“开元通宝”，背面刻有卢尼文，经雷格德洛研究认为铭文是“流通钱币”的意思。第二种形制的钱币共有二十二枚，直径16—22毫米不等，其一面有类似上述的铭文，另一面上有夹在铭文中的某种戳号，据伯恩斯坦研究认为，戳号是中国象形字的异体。第三种形制的钱币有八枚，直径在11—13毫米之间，背面刻文相同，正面有题词和符号，显系粟特王公而非突厥汗王的尊号，故由此判断，这类钱币是以粟特王公的名义发行，严格来讲不属突骑施钱币。第四种形制的钱币仅有一枚，直径20毫米，重2.5克，外圆内方，有周郭，正面有压入汉字的痕

① 以下关于突骑施钱币的材料见 Л. Р. 肯兹拉索夫等：《阿克别什姆城出土的古钱币》，载《东方学研究所科学简报》第16辑，莫斯科1958年版，第527、542、544、551页。

迹，很可能是用汉币印模制成。总的看来，这些钱币的制作技术似乎并不比唐币逊色，所以有人提出，此时突厥汗王的造币场里很可能有中国工匠，甚至有人认为汗国制造并发行中国王朝批准的钱币。钱币上带有当地统治者名号的戳记，反映出 7—8 世纪这里有本地的“制币厂”。钱币的制作主要受汉文化的影响，而钱币上的粟特铭文又说明钱币制造与粟特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突厥汗王在制造发行钱币时，能够正面刻上自己的标记，背面借用粟特铭文的题词，表明在突厥人中已广泛掌握和使用粟特文字。类似的突厥钱币，尤其是较晚的突骑施钱币，几乎在每一座位于商道上的古城中都能找到，发行时间多属公元 7—8 世纪。如在伊塞克湖北岸发现若干突厥文汉文合璧的突厥钱币①，说明随着实物交换的发展，在大宗贸易时，商品货币关系也略有发展。

中亚北部地区考古所得中古中期的外币主要是唐币，而唐币中为数最多的又是开元通宝。如上述在阿克别什姆城找到的四枚中国钱币属于唐朝发行，其中有两枚正面刻有“开元通宝”，而在伏龙芝、阿列克塞洛夫斯基城及七河地区其他一些城市的突厥古墓中，也分别找到单个的开元通宝钱②。开元钱不是年号，取开辟新纪元的含义，通宝意为通行的宝货，是唐初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始铸。它结束了两汉以来的五铢钱制，进入通宝钱时期，历时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封建社会货币经济的影响很大。开元钱的重量、大小、质量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的要

---

①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91—1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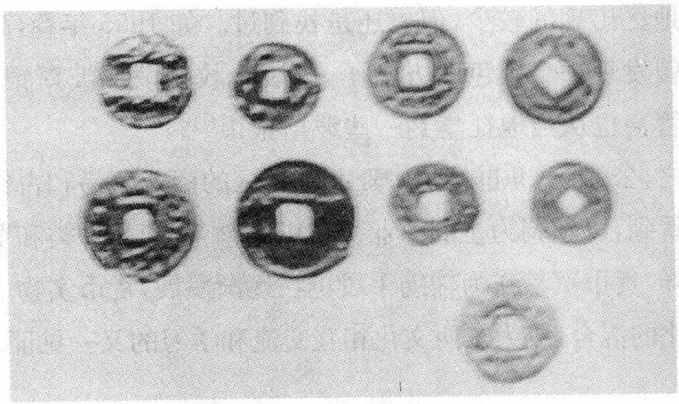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92, 126.（《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第 92，126 页）

求，在较长时间内制作精整，币值稳定，购买力较高，史称轻重适中，人民乐用。从唐初到以后各代所铸开元通宝，基本形制不变。直到玄宗晚年，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私钱充斥，第五琦主持铸大钱。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铸“乾元重宝”，以一文当开元钱十文。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乱平，物价缓和，通货不够，于是代宗、德宗两朝又增炉铸“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也是些减重的劣质小钱。上述三种钱在塔里木盆地以北和七河地区均有发现。如黄文弼先生在库车地区找到过“大历元宝”，在焉耆地区的明屋也拾到过一枚建中钱①。上述提到在阿克别什姆找到的四枚唐币中，除去两枚开元通宝，肯兹拉索夫等人在《阿克别什姆城出土的古钱币》一文中指出，还有一枚“乾元重宝”和一枚“大历元宝”，都是正面刻字，背面光滑平整②。玄宗以后，唐朝晚期钱币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发现，说明安史乱后，尽管丝路阻塞，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势力锐减，但双方关系并未完全断绝。另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唐朝钱币陆续流入中亚北部地区后，虽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但却成为突厥钱币和粟特移民制作钱币时的仿制品，从而在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

①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7页。

② T.P.肯兹拉索夫等：《阿克别什姆城出土的古钱币》，载《东方学研究所科学简报》第16辑，莫斯科1958年版，第524页。



图版 16　索格底亚那片治肯特遗址出土的中国式青铜钱币

资料来源：B. A. 李文特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年版。

马克思指出“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①。这一情况在我们所论及的地区也有反映。如丝路沿里海的水路和草原大路向北行进，到了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流域，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贵霜时代的古钱币。在谢米列契地区遇到过萨曼王朝的钱币迪尔加姆，即伊朗的辅币，等于五十费尔。在伊犁地区，吐鲁番吁子古城发现过阿拉伯文铜钱二枚，一枚两面都刻有阿拉伯文字，径 2.3 厘米，另一枚字迹不清，径 2.2 厘米，连同其他遗物判断，此城在 8 世纪前后可能已有居民，一直存在到 13 世纪。因为阿拉伯文铜钱很可能就是回鹘或蒙古统治时期所通用的一种钱币②。波斯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南疆、青海、河西走廊直至长安及内地其他城市多有发现，虽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②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 页。

在北部地区出现的较少，但也还是找到过。如1955年春，高昌农民犁地时曾发现一个黑色的方盒子，内装十枚古萨珊波斯银币，以后新疆文管会也从当地征集到一些波斯银币①。

总之，公元6—9世纪从中亚北部地区的商业贸易和古钱币材料中可以看到，以丝绸为主的商业贸易极其繁荣，商品种类和贸易形式极其多样，货币贸易作为辅助手段也在逐渐发展，货币实物上显现出几种文化的混合，成为东西文化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又一见证。

第四节　兼容并蓄的宗教和文化

中亚地区因民族混居，流动性大，故表现在宗教方面也常常是多种宗教或教派同时并存，相安无事。有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受到迫害、被斥为异端的教派来到中亚地区反而能受到重视和保护，找到自己的临时避难处，如景教、摩尼教就是这样。而在历史上起过一定影响和作用的祆教，本身就源起于中亚，所以有人将中亚地区喻为各种宗教的陈列所，的确是很贴切的②。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宗教，往往既不受地区、国家、民族差异的限制，本身又能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联，所以宗教，尤其是世界性的大教，具有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联系起来的纽带作用，是我们在研究文化交流史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中亚北部地区中古历史上，曾经同时容纳着几种宗教。一般来说，主要居民突厥人信仰的是原始萨满教，这一点已为公元568

① 李遇春：《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勘察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② 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4页。

年出使西突厥的东罗马使臣蔡马库斯所亲见。史载："围绕蔡马库斯及从人，取其行李，置众中。摇铃击鼓于其上。又有手持香者，火势熊熊，来往绕走，状类疯狂，指天画地，几若魔鬼诚被其驱除者。咒既读毕，乃请蔡马库斯经过两火间。其人亦自陆续走过两火间。谓如是，则妖魔悉可洗净也。"①这种以火洁净其身的仪式出自相信火有帮助人们消除灾害的能力，与后世蒙古人实行的通过火堆才能进入汗帐是相同的，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使臣是心怀叵测来谒见汗王的。以后沙畹在记 598 年左右突厥事时说："突厥拜火，亦敬空气水土，然仅奉天地之唯一造化主为神，以马牛羊祀之。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②而贞观初玄奘在西突厥汗帐会见统叶护可汗时，见到的也是"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③。以上所谈突厥人拜火的仪式均由巫师来主持，其"状类疯狂，指天画地"，"预言未来事"，这显然是巫师作法的特点，与下面将要谈到的波斯火祆教拜火并非一回事。西突厥人在进入中亚北部地区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着原来萨满教的信仰，但也不排斥佛教、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在人数上仅次于突厥人的粟特移民主要是信奉祆教。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火教、火祆教、拜火教、波斯教等，唐代称之为祆教。公元前 6 世纪由出生于显贵的斯皮达马家族的琐罗亚斯德改革原始的雅利安宗教，在巴克特利亚地区创建，公元 3—7 世纪成为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并广为传播。该教经典《阿吠陀经》(阿维斯塔)，又称《波斯古经》，主张善

---

①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册，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 108 页。

②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222 页。

③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2。

恶二元论，崇拜火，认为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善端的最高神阿胡拉·玛兹达的象征，其代表中亚南部从事农业的、定居的东伊朗语居民之利益；而台伐斯是邪神、恶魔，也是北方游牧人的崇拜者。善恶两端相争，个人可以从中自由选择，所以要求人们从善避恶、弃暗投明，联合起来抵抗游牧人的侵扰。南北朝时祆教传入中国，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带头奉祀。隋唐时东西京城都建有祆祠，并设立萨宝府和祀官，其中主要祀奉者为侨居中国的西域人。祆教在中亚北部地区一度因粟特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成为颇具影响、拥有较多信徒的宗教。考古发掘找到大量与祆教有关的文物，如前文提到过的烛台、灯盏、祭祀小桌、陶质小棺材，以及器皿和把手上的公山羊造形，大多与祆教的祭祀仪式和崇拜神有关。

在粟特人和突厥人中，摩尼教也得到迅速发展。巴托尔德曾经提到，7世纪初玄奘路经此地时，在阿姆河与楚河之间，文化上是统一的，衣着服饰、语言文字尽皆划一，而“摩尼教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①。摩尼教是糅合了祆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而成，以二宗三际论为根本教义，三封、十戒为主要戒律，又称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等。3世纪摩尼初创此教时，曾得到萨珊国王沙波尔一世(241—272年在位)的庇护，在沙波尔继嗣瓦拉姆一世在位时被斥为异端，遭到禁止和迫害，摩尼被残酷处死，但因此却推动了该教向欧、亚、非大陆的广泛传播，约公元6—7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有波斯摩尼教高僧佛多诞来长安，始将该教传入内地，并在都城长安、河南府、太原地及长江流域诸州广建大云光明寺。武宗会昌毁佛(845年)时，遭到沉重打击，遂

①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Ⅱ. Ч. Ⅰ. 1964г, стр33.(《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莫斯科1964年版，第33页)

转为秘密宗教和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历宋、元、明代，长期存在于民间。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由新疆传入漠北回鹘汗国的情况。此时的回鹘汗国政治、经济实力强盛，与唐朝关系密切，又控制着内地与西域联系的主要通道，成为丝路贸易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摩尼教因在回鹘汗国内备受尊重，奉为国教，信徒遍布，摩尼师又身居高位，极能影响最高统治者的国事决策，所以在回鹘汗国对外关系，尤其是丝路贸易活动方面，不可排除摩尼教的作用与影响。摩尼教遗物在中国境内和七河地区均有发现，如敦煌卷子中找到的摩尼教经卷，是研究摩尼教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1957 年在江布尔城附近发现一件小而有趣的古物：一个泥质小徽章，塑以妇女头像，并带有头饰。苏联学者认为，这件物品“同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类似艺术品相比，可能就是公元 6 世纪的摩尼教女神”①。

图版 17　高昌故城摩尼教经典残页

资料来源：马承源、岳峰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

① ［俄］费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81 年版，第 16 页。

中亚地区在宗教方面宏大的兼容性，尤以涉及政治关系的时候有突出表现，除上述摩尼教是这样，基督教一分支的景教也是这样。景教又称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公元5世纪由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所倡导，主张基督二位二性说①，后在教会内部斗争中失败被逐，向东逃亡，一度得到波斯国王的优待和庇护，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在西亚、中亚等地广为传播。贞观9年(635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传入长安，三年后建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该教在中国境内“法流十道……寺满百城”②的盛况。直到会昌5年遭毁佛厄运波及，一时绝迹于中原，但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依然流行。元代与传入的天主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景教遗物在我们所论及的地区内也曾多有发现，突出的是1954年在阿克别什姆发掘的一座带有教徒墓地的基督教教堂，时间可定在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遗址从西向东伸延的总长度为三十六米，宽达十五米，塌落下来的小块建筑石膏灰泥上留有色泽鲜艳的壁画痕迹。教堂的中央房屋具有十字形的布局，所谓带“裸露十字架”的变体，其类似公元7—8世纪小亚细亚和阿美尼亚十字形穹顶教堂的布局。这种建筑形制是叙利亚人在阿拉伯人之前带进中亚的。在教堂中央房屋的南面有一个面积4.5米×2.25米的单独房屋，可能是浸礼堂。建筑围墙下面以及院内发现许多属于同一时期的基督教墓葬，据说这是苏联至今

---

① 该说不同意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本体”，而认为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因此玛利亚只能是基督之母而不是上帝之母，后被指为是将基督看作具有两个不同的“位格”。

②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15页。

所发现的最早的基督教徒墓地①。墓内发现有贴身戴的铜质十字架，挂在铜丝小环上，有 7—8 世纪典型的饰物扁平环状玉石耳环和有圆斑的玻璃串珠，葬者多为欧罗巴人种②。基督教教堂的发现证实了古文献资料关于景教徒早期深入中亚地区的记载，而且阿克别什姆的教堂建筑中亦明显地表现出文化的混合性，即叙利亚的十字形圆顶教堂结构与中亚围墙庭院式相结合的特点。这一布局形式后来又沿用到穆斯林清真寺和陵墓中去了，因为在阿拉伯人侵入中亚以后，经常略加改建，甚至不作变动地就把基督教教堂变成清真寺，如塔拉斯城的景教教堂，9 世纪末被改建成清真寺③。所以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又自然延伸到以后的穆斯林文化中。

在阿克别什姆城内与基督教堂同时并存的还有两座佛教寺院。一座是肯兹拉索夫领导的考古队在 1953—1954 年的工作中查明，位于沙赫林斯坦界外，属于 7 世纪末到 8 世纪的大僧院，有许多保存良好的佛寺特征，据说是由粟特工匠修建的④，并且同阿富汗北部的苏尔赫·科塔尔僧院有很多相似之处。僧院呈四方形，长七十六公尺，宽二十二公尺，轴线东西向，内有大量建筑和雕刻残

---

① ［俄］费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81 年版，第 23 页；《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第 81 页。

② Л. Р. 肯兹拉索夫等：《阿克别什姆城出土的古钱币》，载《东方学研究所科学简报》第 16 辑，莫斯科 1958 年，第 521—523 页。

③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1950г, стр126.（《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第 126 页）

④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94.（K. M.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与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 1986 年版，第 94 页）

迹，甚至有用来覆盖屋顶的中国唐代瓦①，还有残破的壁画。引人注意的是一尊大菩萨坐像，约高达四米，另有一些小型泥塑彩绘像、镀金徽章、泥印等。这座僧院似在8世纪下半叶被毁于火，后又遭葛逻禄破坏，许多出土物证明突厥游牧民及其后来者就在原佛寺废墟上定居了下来。继肯兹拉索夫之后一年，贾布林在上述僧院以东二百五十公尺处又发现一座僧院，其建筑形式颇异于前者，正方形，无庭院，内有雕刻残迹甚多，还有壁画、钱币等。这座僧院似于公元7世纪末被毁，可能是突骑施入侵的结果②。在肯兹拉索夫以前，伯恩斯坦于1939—1940年也曾在楚河流域的几座古城内发现不少佛教遗迹，如红河古城的两座佛寺，萨雷格的僧院和朱尔的佛寺等。伯恩斯坦认为这是西迁回鹘在9世纪中叶带入吉尔吉斯北部的③，但后来在阿克别什姆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佛教的存在和影响要早得多，起码不晚于景教和祆教。

宗教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为了宣传教义，扩大影响，各种宗教都会采用生动形象的艺术手法来进行宣传布教，中亚南部的犍陀罗艺术，中国的敦煌艺术就都是这样产生的。而中亚北部地区既然具有多种宗教同时并存的特点，那么表现各种宗教思想的文化艺术也就在共存中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如1940年打开的巴拉沙贡佛寺遗址上找到大量的泥饰物、小雕像、半圆形空心柱、壁柱、飞檐等的断片，断片上有典型的古希腊罗马式，穿有皱褶

---

① Л. Р. 肯兹拉索夫等《阿克别什姆城出土的古钱币》，载《东方学研究所科学简报》第16辑，莫斯科1958年，第524页。

②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页。

③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Ⅵ-начало ⅩⅢ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г, стр79.（К. М.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与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阿拉木图1986年版，第79页）

裙的人体雕像。一个佛教神兽像在制法上显示出是阿赫美尼德王朝式的浅浮雕仿制品①。在陶器和金属器上的萨珊式图案装饰圈内，夹有佛教圣花——荷花，看来是源于坎达尔艺术形式的贵霜晚期的佛教主题②。祆教表现宗教意识的艺术形象主要是牡绵羊和蛇，前者是太阳的象征物，到处可见，后者有可能是水和土的象征，也是祆教祭祀的对象。通常是借助贴上的弯曲条带来表现，条带上有起伏的波纹和装饰图案的刻纹，它们均使人强烈地感到东突厥斯坦的影响③。另外在萨雷格城找到一些水彩壁画的残片，其中有一块画的是翠菊花束，黑色轮廓是用毛笔勾出来的，画底染上红、黄、白、兰等各种颜色，花瓣互相重叠，整个花纹图案很像中国北方的紫苑花，按其壁画的题材和处理手法，是属于东突厥斯坦的绘画艺术。苏联学者认为："房间内壁画的特点无疑说明画匠的出身和他的高超技艺。毫无疑问，在萨雷格城有自己的汉人艺术家。因为水彩壁画只可能在当地完成，而不可能像在这里找到的中国铜镜那样通过商业贸易运来。"④

从语言文字上看，北部地区也具有文化混合的特点。突厥语和粟特语都在广泛使用。突厥语在这里是以不同于东突厥语的热卡尤什方言为代表，但同时也使用来自东突厥的卢尼文和粟特字母，看来是利用东突厥汗国的语言作为文学语言。在 8 世纪的突厥钱币上，我们看到粟特字体顺利地战胜了古突厥文（卢尼文），在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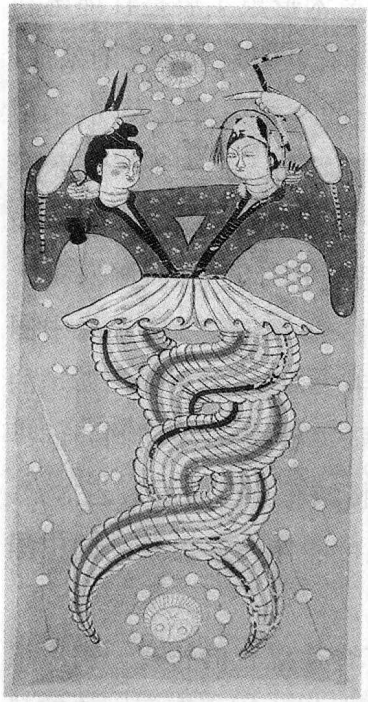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29.（《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莫斯科 1950 年，第 29 页）

② 上揭书，第 81 页。

③ 上揭书，第 82 页。

④ 上揭书，第 127 页。

之前，突厥人是用卢尼文到处去刻写铭文和题词的。如在塔拉斯墓碑上看到的题词，一面出自乌尔札尔的仿中国铜镜上的铭文，以及在列尼德狭谷（沿塔拉斯河谷的一个隘口）找到的一个路标牌上的刻字都为此提供了材料①。只有突厥人才使用的卢尼文，有可能是叶尼塞河的吉尔吉斯人带来的。而粟特连体字则突厥人和粟特人都在使用，因为突骑施钱币上就有粟特字铭文。粟特文字起源于阿拉米亚文，字母显系中古伊朗语文字系统，或从右向左横写，或自上而下竖写向右移行，玄奘称它“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②。



图版18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女娲伏羲像

资料来源：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粟特语作为中亚地区广泛流行的语言，直到13世纪蒙古入侵时期还在使用。粟特文有几种变体，其中以撒马尔罕变体占主导地位，通常被人们径称为“粟特文字”，并随着粟特移民广泛流入许多地区。在我国敦煌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28-29.（《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莫斯科1950年，第28—29页）

② （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75页。

一带曾有不少粟特文书出土，公元 5 世纪前后，出现佛经粟特字体，晚至 7 世纪之内，又形成草体粟特文字。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书和七河地区发现的粟特铭文就是这种草体文。除突厥卢尼文和粟特文字外，还应该注意叙利亚文，它们是根据塔拉斯的出土古物所得知的。9 世纪以后，在一些器皿上又出现有回鹘铭文，并且还找到一份用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祈祷文①。而汉文在这一地区被广泛知晓可以通过钱币来证明。语言文字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联系和沟通的必要工具与手段。中亚北部地区长期以来使用多种繁杂的语言文字，是为了适应东西文化交往的需要，也是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混合的必然结果。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стр80.（《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4 辑《楚河河谷》，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80 页）

结束语

总括全文所述，显然可见中亚北部地区与中西陆路交通发展的全过程息息相关，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经久维持都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历史活动的累累踪迹。远自旧石器时代起，东西方物质文明已在这里相遇，露出了人类早期文化交流的曙光和不同类型的文化在相互汲取中进一步发展的端倪，可见人类文明一经产生，就不会囿于孤立，必然要相互交往的规律。

中亚北部地区以其宽广的地域，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展示出博大的容量和胸怀，为一批批骑马游牧民族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历史活动大舞台，使之成为一股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继塞种游牧集团之后，匈奴、乌孙、月氏、嚈哒、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直到契丹、蒙古，这些来自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几乎无一例外、从不间断地向西活动，迁徙的浪头，震荡的强波，一路拍打着所经地区和国家的肌体。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一个古老国家的奴隶制度被埋葬了；欧洲日尔曼民族国家纷纷突起，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随之形成；斯拉夫人不堪阿哇尔人、突厥人的骚扰，也在不断寻觅安家的乐土，逐渐形成现在的布局；一千年后，蒙古人再次掀起的冲击强波，把蒙元帝国和四大汗国推向欧亚大陆的霸主地位。所以研究世界历史，离不开研究那些从东向西滚滚压来的游牧民族，也离不开对他们出身摇篮地和活动基地——中亚北部地区的研究。

黄河流域的古老文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休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建，逐渐融汇而成。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史。只是中古中期以前，历史的砝码重心多压在北面。表现在，从秦汉以来直至隋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偏北，与中原王朝交往最甚的也是北方各游牧民族，所以出

自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使历代统治阶级的目光所在，着力经营的主要是北部。从万里长城的修筑到和亲队伍的西去，丝绸之路的开辟，直到近代史上与沙俄扩张主义的斗争，无不显示出北方民族和北部地区的重要。所以无论是纵向研究中国通史，还是横向研究各王朝断代史，无论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史，还是以民族平等的原则研究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离不开对中亚北部地区的研究。

世界上本没有路，是需要开出了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强调这条路的开辟主要是为了将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实际上，丝绸之路一经出现就成为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的输送带，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代名词。在这条曲折漫长的丝绸之路所经国家和地区中，中亚北部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除早期游牧民族金戈铁马踏出的北方草原之路与信史记载的丝路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外，中古中期（公元5—9世纪）的几百年内，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一步步将丝路重心向北推移，使中亚北部一度成为中西交通的闹区和要地。直到陆路交通极盛而衰，转向海路之后，维系陆路交通持续不断主要也是靠北部地区。正因为如此，中亚北部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荟萃了东西文明的精华，为人类文化的交融提供了优沃的土壤和广阔的场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近代以前，中国始终走在世界文明前列，总是有所发明，有所创建，并将无数的文化成果和珍品慷慨无私地奉献给全人类，所以研究古代的国际关系，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外关系史，这是我国著名史学家朱杰勤先生提出的一个极有概括性、科学性的专用名词，也是史学研究发展至今，一门既重要

又年轻的学科。正如朱先生指出的："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我们看到过去中国人民对世界人类的伟大贡献，而引以自豪。今天我们对四化建设更应充满信心。一方面，从爱国主义出发，尽快地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从国际主义出发，还要进一步为全人类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①遵循先生的这一谆谆教导，我选择了中亚北部地区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这一课题，并深深体会到，当年的丝绸之路，将来更是欧亚孔道，随着我国四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开发西北，加强公路、铁路建设，发展航空事业，促进我国与毗邻各国经济文化的相互学习与交流，一个当代丝绸之路的再度繁荣，必将会到来。

① 朱杰勤：《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文史知识》1984年第5期。

重要参考文献

一、古籍

1.《穆天子传》,上海印书馆 1937 年影印吴王官辑《古今逸史》本。

2.《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

3.《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4.《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5.《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6.《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7.《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8.《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9.《周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10.《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11.《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12.《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13.(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14.(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15.(唐)玄奘、辨机著,季羡林等注释:《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16.(唐)慧立、彦悰著,孙毓堂、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17.(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

18.(唐)张籍:《张司业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19.(唐)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监修,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

20.(唐)杜佑著,王文锦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21.(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2.(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2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4.(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缩印本。

25.(宋)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

2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万刻本。

27.(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

28.(清)徐松:《西域水道记》,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23册。

29.(清)汪之昌:《青学斋集》,谭其骧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

30.(清)李光庭:《汉西域图考》,《清朝藩属舆地丛书》第5册,台湾国风出版社1967年版。

31. 官修:《新疆图志》,收入《中国边疆丛书》第13册。

32.(清)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

二、论著

1. 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

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3.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4. 冯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5.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6.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7.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8.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9.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10.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1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12.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 1981—1987 年陆续出版。

13.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 1962 年版。

14. 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15. 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6.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7.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18. 王炳华、王明哲著:《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9. 车慕奇:《丝绸之旅》,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

20.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1. 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 新疆社会科学院文物考古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3.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24.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

25.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

26.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7.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8. 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29.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0.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和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1.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

32. 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3. 6卷本《中亚文明史》,现已见第1卷,由A. H. 丹尼和V. M. 马松主编,芮传明译;第2卷,由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译;第3卷,由B. A. 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余太山统一审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

34. 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论文

1. 吴研春:《古代亚欧大陆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 期。

2. 吴研春:《草原动物纹艺术产生的思想根源和文化背景》,《新疆艺术》(汉文版)1998 年第 1 期。

3. 魏长洪、陈香苓:《中亚界定研究概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4 期。

4. 木子:《中国西域楼兰学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民族研究》1996 年第 1 期。

5. 李琪:《论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阿尔泰历史文化研究走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1 期。

6. 郑炳林、屈直敏:《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研讨会综述》,《敦煌学辑刊》2004 年第 1 期。

7. 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

8. 胡振华:《中亚与中亚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9. 李琪:《中亚史前文化的开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西北史地》1998 年第 2 期。

10.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6 期。

11. 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西域研究》1996 年第 2 期。

12. 陈立柱:《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3. 钱伯泉:《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4. 徐文堪:《"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

15. 曾宪法:《先秦时期塞种人之族源及其东渐问题》,《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6. 彭树智:《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7. 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18. 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19. 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20. 郑志清:《论匈奴冲击下的中西文明》,《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21. 马利清:《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年第1期。

22. 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 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西迁》,《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24. 钱伯泉:《乌孙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迁的经过》,《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

25. 薛宗正:《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族群的西迁和崛起》,《西域研究》1995 年第 3 期。

26. 王宏谋:《古代内陆欧亚的社会形态及交通路线》,《昌吉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27. 龚缨晏:《远古时期的"草原通道"》,《浙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 5 期。

28. 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1 期。

29. 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2001 年第 4 期。

30. 赵评春:《西汉玉门关、县及其长城建置时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41 期。

31. 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32. 吴其昌:《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纪功碑跋尾》,载《国学季刊》2 卷 2 号,1929 年 12 月。

33. 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新疆社会科学》1982 年第 3 期。

34. 钱伯泉:《唐轮台位置续考》,《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

35. 黄文弼:《高昌麴氏年表》,收入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36. 许序雅:《〈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辨析》,《中国边疆史

地研究》1998年第4期。

37. 季羡林:《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8. 严耕望:《唐代长安灵州道及灵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载《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5卷1期。

39. 严耕望:《唐代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考》,载《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6卷1期。

40. 王有德:《再谈唐代轮台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41. 林必成:《唐代"轮台"初探》,《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42. 薛宗正:《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43. 王炳华:《回顾1982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4. 黄文弼:《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45. 马国荣:《北魏与西域关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46. 赵荣织:《纷乱时期中原封建王朝对西域的管辖》,《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47.《新疆考古三个月》,《考古简讯》1958年第5期。

48.《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2期。

49. 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

50. 肖之兴:《〈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文史》第十五辑。

51. 余太山:《〈魏书·粟特传〉辨考》,《文史》第二十一辑。

52. 黄振华:《粟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北京1982年,第176页。

53. 依不拉音·穆依提:《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4.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55.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收入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72页。

56.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5页。

57. 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5期。

58. 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9.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60. 陈海涛:《康居与康国关系考》,《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3期。

65. 李鸿宾:《西域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66. 莫任南:《康居古国初探》,《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

67. 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

研究》1994年第1期。

68.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168页。

69. 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70. 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71. 刘惠琴、陈海涛:《唐代入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2. 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3. 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74. 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收入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75. 李遇春:《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勘察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76. 朱杰勤:《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文史知识》1984年第5期。

77. 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四、重要译著或外文文献

1.[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

2.[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捷]赫罗兹尼著,谢德风、孙秉莹译:《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

4.[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美]摩尔根著,杨东莼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6.[俄]П.Г.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7.[俄]B.B.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8.[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

9.[俄]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刊行本。

10.[希腊]希罗多德著,王敦书编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1.[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2.[英]哈·麦金德著,陈江等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3.[法]L.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5.[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16.[俄]费鲁姆金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译:《苏联中亚考古》,1981年。

17.[日]安部建夫著,宋肃瀛、间美松、徐伯夫译:《西回鹘王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英]珀西·赛克斯著,张家麟译:《阿富汗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19.[法]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

20. K. Ⅲ. 哈菲佐娃著,阿拉腾奥其尔译:《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21. 纳尔沙希(M. Narshakhī)著,饶近龙、蓝琪译:《布哈拉史》,《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即《中亚史丛刊》第5期),第113页。

22. 山田信夫:《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2、3期连载。

23. 丹尼斯·西诺尔著,喻融融译:《什么是中亚》,《民族译丛》1986年第1期。

24. 峰巍撰,姚义田译:《出土中国镜的列别节夫卡古坟》,《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25.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第一卷,伏龙芝1984年版。

26. Б. Г. Гафуров.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Б. Г. 加夫洛夫:《塔吉克民族史》,莫斯科1972年版。

27. А. Л. Монгайт, Археология в СССР. Изд. АН СССР. М. 1955г.

А. Л.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版。

28. К. М. Байпако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Юж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емиречья (Ⅵ-начало ⅩⅡ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6. 苏联哈萨克斯坦科学出版社,阿拉木图1986年版。

拜帕柯夫:《南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中古城市文化》,哈萨克斯坦科学出版社,阿拉木图1986年版。

29.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14.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 М-Л 1950г.

《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14辑,七河流域考古论文《楚河河谷》,莫斯科1950年版。

30.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Ⅰ. 1963г. Т. Ⅱ. Ч. Ⅰ. 1964г. Т. Ⅲ. 1965г. Т. 5. 1968г. М.

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莫斯科,卷1,1963年版;卷2第1册,1964年版;卷三,1965年版;卷五,1968年版。

31.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 1973 г.

А. М. 别列尼茨基等:《中亚中世纪城市》,列宁格勒1973年版。

32. Киргиз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Т. Ⅱ. М. 1950 г.

《吉尔吉斯考古学民族学志考察报告》,卷二,莫斯科,1950年版。

33. К. А. Акишев, Г. А. Кушаев.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долины реки Или. 1963г.

K. A. 阿吉谢夫,Г. A. 库沙耶夫:《伊犁河谷塞人和乌孙人的古文化》,1963 年版。

34. Кожемяко П. Н. Ранне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города и поселение Чуйской долины, ФР. 1959 г.

Л. Н. 阔日缅科:《楚河河谷的中世纪早期城镇》,伏龙芝,1959 年版。

35. Б. Г. Гафуров, Таджики Древнейшая, древняя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М. 1972 г.

Б. Г. 加富罗夫:《塔吉克远古、古代、中世纪历史》,莫斯科,1972 年版。

36.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ов и Киргизии, выпуск Ⅰ. М. 1973 г.

《吉尔吉斯人及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一辑,莫斯科,1973 年版。

37.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Туркмен и Туркмении, Т. Ⅰ. М-Л 1939 г.

《土库曼人及土库曼斯坦地区历史资料》,卷一,莫斯科—列宁格勒,1939 年版。

38.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ии, Т. Ⅰ. Фр. 1963 г.

《吉尔吉斯历史》,卷一,伏龙芝,1963 年版。

39.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Т. Ⅰ. 1957 г. Т. Ⅱ 1979 г. Алма-Ата.

《哈萨克共和国史》,卷一,1957 年版;卷二,1979 年版;阿拉

木图。

40.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Т. Ⅰ. 1955 г.

《乌兹别克共和国史》,卷一,1955 年版。

41.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 Ⅱ. М. 1964 г.

《塔吉克民族史》,卷二,莫斯科,1964 年版。

42. Народы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Ⅰ. М. 1962 г.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卷一,莫斯科,1962 年版。

43. Истор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Узбекстана. Выпуск Ⅻ. Ташкент 1975 г.

《乌兹别克斯坦的物质文化史》,第十二辑,塔什干,1975 年版。

44.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 Куль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 1940 г.

А. Ю. 雅库勃夫斯基:《爱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中亚的文化和艺术》,列宁格勒,1940 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作者=纪宗安著
页数=285
SS号=12006877
DX号=
出版日期=2008.1
出版社=中华书局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中亚北部地区的远古文化
　　第一节　　中亚四至及它的北部地区
　　第二节　　远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曙光
第二章　早期游牧民的西迁与东西文化交流
　　第一节　　塞人，早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者
　　第二节　　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
第三章　中亚北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
　　第一节　　丝路北道的前身——草原之路
　　第二节　　新北道的出现及里程走向
　　第三节　　交通网络和重要城镇
第四章　丝路贸易重心的北移及其原因
　　第一节　　公元３—６世纪的中亚形势与丝路贸易
　　第二节　　西突厥的崛起和唐朝政府在中亚北部地区的经营
第五章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第一节　　“粟特”辨析
　　第二节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和向东的移民
　　第三节　　粟特人向中亚北部地区的移民
第六章　６—９世纪中亚北部地区东西文化交流之盛况
　　第一节　城市经济的特点
　　第二节　　蓬勃发展的多种手工业
　　第三节　　以丝绸为主的商业贸易和几种货币
　　第四节　　兼容并蓄的宗教和文化
结束语
重要参考文献
地图
地图１　古代文明发展与中亚的沟通作用
地图２　中亚与中亚北部范围
地图３　中亚与中亚北部地形
地图４　中亚与中亚北部植被分布
地图５　　５世纪以前亚欧民族大迁徙
地图６　草原丝绸之路与早期文明传播
地图７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图版
图版１　阿尔泰放牧岩画及其图案
图版２　巴里坤兰湾子遗址出土的环首铜刀
图版３　新疆境内出土的古塞人干尸

图版４　新疆新源县出土的战国塞人铜武士像
图版５　具有塞人文化风格的承兽铜盘（天山阿拉沟出土，战国—汉）
图版６　天山阿拉沟出土的虎形圆金牌（战国—汉）
图版７　新源县出土的匈奴铜鍑（魏晋南北朝）
图版８　新疆昭苏县的汉代乌孙封土墓
图版９　天山阿拉沟口唐代烽燧遗址
图版１０　乌拉斯塔亦石人雕像
图版１１　新疆若羌县唐代吐蕃古城堡
图版１２　片治肯特出土的沾染萨珊风格的粟特银壶和银碟
图版１３　具有西域风格的唐代海兽葡萄镜图案
图版１４　穆格山出土的羊皮纸粟特文婚约文书
图版１５　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的汉代鸟兽纹锦
图版１６　索格底亚那片治肯特遗址出土的中国式青铜钱币
图版１７　高昌故城摩尼教经典残页
图版１８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女娲伏羲像